

千秋家国梦

曾纪鑫 著

东方出版中心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千秋家国梦

曾纪鑫 著

出版:东方出版中心

印张:10.25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6)

字数:226千字 插页5

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版次:1999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

经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刷

印刷: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

印数:1—6,000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ISBN 7-80627-465-0/I·151

定价:20.0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作家曾纪鑫近几年来思考地域文化、历史名人及现实社会问题的大文化散文著作。

全书由 15 篇各自独立的文章组成,但强烈的忧患意识与炽热的爱乡爱国之心始终是本书的主调。作者以地处中华腹心位置的荆楚地区为标本,通过一个个历史人物的命运遭际、一桩桩历史事件的风云变幻、一处处历史名胜的兴衰荣枯起笔,毅然穿透那重重的历史帷幕,犀利的笔触直指现实社会那一个个令人尴尬的沉重话题。其中,《走出古隆中》、《古城荆州》等文热切地呼唤改革,希望人们冲决封建网罗,摒弃小农意识,以跃身现代文明的大潮中去中流击水。《千古绝响》、《医中之圣》等文在讴歌古老中华辉煌历史的同时,也尖锐地抨击了其抑制创造、埋没人才的传统情性,真情呼吁为中华崛起而展现一片任鸟飞翔的蓝天。《放弃与守望》、《走向自觉之路》等文则以 98 特大洪水肆虐为背景,既歌颂了军民勇战洪魔的伟大精神,也敏锐指出了违背自然规律、不尊重科学而带来的弊端。

作者以子规啼血般的热情写下的这一组散文,不仅文化内涵丰富,可读性强,而且很有历史沧桑感及穿透力。这一切,对处于世纪之交的人们如何客观审视历史、面向未来都不无启发意义。

凤凰涅槃(代序) / 1

走出古隆中 / 1

天下第一楼 / 32

千古绝响 / 56

西塞山感怀 / 80

禅语五祖寺 / 94

青铜时代 / 106

古城荆州 / 124

道教圣地武当山 / 151

辛亥首义 / 173

茶韵仙骨 / 195

寂寞与热闹 / 220

医中之圣 / 233

放弃与守望 / 260

走向自觉之路 / 284

附录 / 321

鳳凰涅槃

(代序)

—

“风，起于青萍之末，浸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

如果我们以楚国著名诗人宋玉在《风赋》中描述“大王之风”的词句来形容楚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兴盛之势，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供御王事。”楚人初创时期生计之艰，由此可见一斑。然而，经过十几代人的艰苦创业，荆楚就从一个方圆仅五十公里的蕞尔小国，发展成为能够问鼎中原的泱泱大国，并创造出了我国先秦时期区域文化中水平最高、成就最大的楚文化，其丰富灿烂与瑰丽多姿足与当时的希腊文明抗衡媲美，达到了人类上古文明的巅峰。

湖北，是楚人活动的主要舞台，是古楚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也是楚文化的滥觞之地与核心所在，于是，“荆楚”也就成了湖北的代称。

当我们极目楚天,透过苍茫的云烟与厚重的帷幕,将目光推向遥远的历史深处时,仍能强烈地感受到当年荆楚雄风那席卷中华大地的磅礴之势。

荆楚,作为一个地方性区域,曾有过两次难得的辉煌。

第一次是战国时期的楚国,其领土之广阔,人口之众多,国力之强盛,文化之灿烂,不仅居于秦、齐、燕、韩、赵、魏六国之上,也超过了当时的波斯帝国。

雄风劲吹,“哗啦哗啦”地翻动着一页页斑斓的文明画卷,楚国古老的历史顿时变得生动而鲜活起来,楚民们艰难的生存、顽强的拓展、伟大的创造,便如浮雕般地凸显在我们眼前。

哲学家老子首开以系统理论探索宇宙奥秘之先河,创建了道家学说,孕育了此后盛行中华大地的唯一本土宗教——道教;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另三人为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作家拉伯雷、古巴诗人马蒂,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评出)之一、我国第一个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独领风骚,创立了新型的文学样式楚辞,成为浪漫主义诗歌之源;深埋地底几千年的曾侯乙编钟重现天日,以其独特的“千古绝响”征服了人们,被誉为中华古文明的一大奇迹;楚国的刺绣、漆器、雕刻、书法、金石、帛画、壁画等工艺美术堪称中华艺术瑰宝;楚人创立了独特的天文与历法,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绘有二十八宿青龙白虎的衣箱盖天文图,是我国目前为止发现最早的天文资料;楚民创造的先进采矿冶炼技术,特别是“失蜡法”铸造工艺,其原理在二十世纪的高科技领域仍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更是向世人昭示了楚国在采矿冶炼技术上的惊人成就……

秦始皇统一六国,荆楚由一个独立的诸侯国变为秦王朝的一个区域。楚国虽然消亡了,但楚文化精神却如一条看不见的汹涌河流,滋润着广袤的荆楚大地,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荆楚

后人。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正是楚人的振臂一呼，揭竿而起，才结束了强秦的专制与残暴统治。此后，浪漫绮丽的荆楚文化便融汇到凌驾于区域个性之上的汉文化共性之中，具有了整个华夏文化的普同性，在绵延的历史长河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在宗教领域，道教源于荆山楚水，也兴盛于斯，全国著名道教圣地武当山自古以来令人叹为观止；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流派广布，其中影响最大、最具中国化特色的禅宗也诞生于黄梅县东山的五祖寺。

以科技而言，唐代陆羽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首开茶文化之先河；明代李时珍编著《本草纲目》，集我国古代中医学之大成。

论文艺创作，唐代的孟浩然与皮日休分别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和晚唐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以公安三袁为首的“公安派”和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双双成为明代中叶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学流派；宋代书画四大家之一的米芾与近代的张裕钊堪称荆楚艺苑中的两朵奇葩。

.....

及至十九世纪末叶二十世纪初期，湖广总督张之洞引来“西方火种”，严厉推行“湖北新政”。一股科学、民主与自由的清新之风，带来了荆楚大地的又一次崛起与强盛。

于是，湖北由一个落后的内陆省区，一跃而与近代化程度甚高的上海、广东并驾齐驱，成为与北洋系统相互并列的又一个洋务建设中心。

湖北新政造成了封建文化的逸轨，诱发了专制社会的裂变，引发了推翻满清统治、结束封建皇帝的武昌首义。一时间，荆楚大地成为全国辛亥革命浪潮的中心，武汉也俨然成了当时

的民国之首都。

然而，令人扼腕浩叹的是，荆楚的两次鼎盛最后都以无可挽回的衰落作结。

秦国东征，扫平六雄，显赫的楚国从此灰飞烟灭，永远消失在历史的深处。此后，汉王朝定儒家于一尊，民族的个性与活力给束缚在狭窄的空间左奔右突，徒然作着无谓的自我挣扎。唐宋以降，荆楚文化虽也有过嘹亮婉转的歌喉，留下了几阕华彩乐章，但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不觉显得过于单调、喑哑而沉闷；荆楚上空，虽也有过几颗耀眼的明星，却远没有群星闪烁的动人与璀璨。楚国消亡，此后的荆楚大地再也没有诞生过堪与上古楚文化相互比肩的新型文化。

而兴起于近代的第二次强盛也随着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的窃取而分崩离析，革命异化、新军解体、新政中断，荆楚也就再次论为一个落后的内陆省份。

在武汉晴川阁，我见到了一块古碑，上书“荆楚雄风”四个大字，字体雄浑，笔力遒劲。我静静地观看，默默地感受，不知怎的，总觉得这块石碑有点不对劲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发现第一个“荆”字显得过于单薄，缺少一股浑厚与大气的风韵，与后面三字的风格难以和谐统一。近前仔细一瞧，原来这是一块断碑，“荆”字是后人重写、雕刻后补缀上去的。我虽然对这一补写的“荆”字背景与当时情景不甚了然，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重写时，必然在后代书法家之间进行了一番应征与筛选，竞争与淘汰，从而优中选优。可就是这选中的最优之“荆”字，却怎么也赶不上前人的笔力、技法与气势。

昔日那席卷中华大地的“荆楚雄风”今日安在？

我们在不断地追问，在艰难地寻找，在认真地思索……

二

强劲、浑厚而博大的雄风过后,天空似乎显得格外的寥廓与明净,大地似乎变得特别的空旷与宁静,生命中应有的热烈与激情、智慧与才华、创造与豪迈仿佛已被先祖列宗们提前支取而挥洒殆尽。

这,便是我置身荆楚山水天地间的切肤之感。

我在古楚国腹地荆州一个位于湘鄂交界之处的古朴、闭塞而偏僻的乡村长大。那里至今仍不通汽车,唯有一条条细长的土路与外部世界相连,村民们在顺乎四时及生老病死的自然循环中,在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生活轨道上既无奈又执著地生存着。天空游移的云彩,田园驯顺的老牛,沟渠缓缓的清流以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村民们所构筑的田园宁静氛围沁入我生长的每一时刻。这里,难道就是两千多年前曾经创造过世界第一流文明的荆楚腹地?这里,难道就是曾经搅动历史的荆楚雄风之中心?多少次,我独自一人仰望长空,情不自禁地大声追问。然而,回答我的只有那一声声悠悠绵绵的回音。我喊出的声音撞在一堵肉眼无法看见的厚墙上,又给反弹回来了——这是一种深沉得无法化解且带有几分恐怖色彩的异化宁静!

尽管怀疑,但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却是那么真实而无可更改。楚国的先民们在我宁静的故乡,确曾挥洒过生命的狂热与激情,建立过轰轰烈烈的丰功伟绩,创造过异彩纷呈、泽被后世的荆楚文化。

面对辉煌的历史,我的心灵深处,也就有了一股莫名躁动的生命潜流。只有站在狂风骤雨、雷电交加的旷野,在一股股充塞天地的呼啸暴风、一阵阵水天相接的瓢泼大雨、一道道掠

过长空的炫目闪电、一声声震耳欲聋的轰鸣雷霆中，我才多少感受到了当年楚国的雄奇与宏伟。

于是，我的心中便有了一种探究荆楚文明之源、再现当年奇风异彩、追寻荆楚雄风足迹的强烈渴望。

十八岁那年，我告别了生我养我的故乡，结束了一段漫长的农村生活，步入了喧嚣而躁动的城市。从此，“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便成了我生活的主要目标与追求。

在有目的的初始阅读中，一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看得我热血沸腾、回肠荡气，“天眼”大开。从此，我才觉得自己的脑袋不再长在别人的肩上，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思想。

关于出游，我在收入本书的《走出古隆中》一文中曾经写道：

我惯常的游览方式，便是独自一人，身背行囊，寂寞地行走在名山大川、名胜古迹之间。而我的内心，非但没有寂寞，反而时时涌动着一股奔腾的激动与昂扬。我沉浸在当时当地的气氛环境中，或独立思索，或与自然山水对话，或与圣人贤哲进行一场场充满睿智与机锋的辩论。我在这不断的思索、对话与辩论中获得了一种不可言喻的独特享受，而人，也就这样一点点、一步步地得以超越和升华。

十多年来，我的足迹涉及大半个中国，但走得最多最熟的，还是给我以生命之源的荆楚大地。

从三峡到神农架、武当山、大别山、西塞山，从诸葛亮故居古隆中到陆羽纪念馆、禅宗五祖寺、闻一多纪念馆、李时珍纪念馆，从古楚都纪南城到新石器文化遗址纱帽山、东坡赤壁、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都留下了我的足迹，而我的工作与生活

之地,也经历了从荆州而黄石、武汉。我踽踽独行在一条寂寞漫长却又一时难于抵达目的的艰难旅途,也就不难理解余秋雨先生为何要将他在漂泊旅程中写下的一篇篇才气横溢的散文结集名为《文化苦旅》了。

我苦苦地行走着,同时更在苦苦地思索着。

作为楚国文化有机部分的青铜文明曾是我国历史上一部雄浑奇崛、辉煌灿烂的交响诗篇,却为何没有形成中华民族的科学之源?陆羽首开茶文化之先河,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股蔚为壮观的“茶潮”,可在国内,不论茶的物质形态,还是文化精神,却反而落后了,原因何在?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集我国中医学之大成,可从此以后,中医学却鲜有发展,在西方医学无情而致命的冲击下,中医几近摧毁,这到底是哪根“神经”出了问题?中国化的禅宗为何经由日本的发扬与光大才在西方世界卷起了一股“禅宗热”?诸葛亮唯有走出故居古隆中,唯有“参政从政”一途才能实现他人生的终极价值吗?大禹时代,先民们就已具有了治理洪水的成功经验,为何四千多年过去了,长江水患却愈演愈烈,成为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危机之一?以武昌首义而触发的全国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主宰中国历史命运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为何封建专制的阴魂仍然笼罩在民族上空久久不散?音乐在战国时期,就以楚国曾侯乙编钟为标志步入成熟时期,此后,为什么中国音乐却渐成衰颓之势滑入历史的深谷一直低迷徘徊?……

从荆楚大地灿烂文明所引发出来的思索长久地萦绕在我的脑际,怎么也挥散不去。于是,我索性由此生发开来,从古到今,由家而国,从湖北到全国,从中到西,纵横驰骋,上下捭阖,展开了一番别有韵味的探讨。

我以为,导致民族落后与国势衰弱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

文化体系与社会机制出了“毛病”。

自汉代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始,中国的命运就由冥冥之中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给决定了。

儒教是所谓的古代“圣人”孔子一次性完成的艺术古董,他讲究的是“述而不作”。当述而不作上升为全民的指导性思想时,整个民族,也就丧失了应有的创造性与活力,从上到下地变得“阳痿”起来。

实在难以想象,一个只知守成、不懂创造的民族能在竞争日剧的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就更不用说永葆青春活力长盛不衰了。

而诞生于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儒家文化体系,是与专制、愚昧、礼教、等级连在一起的,其中最为缺少的就是科学、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等现代文明精神。

儒教的所谓知识,对于自然和社会来说,都是一些伪知识,仅仅是做人的道德伦理知识。儒家注重实践的急功近利态度在客观上限制了中国人的理性思辨能力,束缚了中国古代形而上学与逻辑学的发展,从而导致了科学的落后。从严格的理论意义而言,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科学,有的只是工艺。即以国人长期引为自豪的“四大发明”而言,说到底仅属工艺的范畴。

儒家也有民主,但其民主是“为民作主”,是一种统治者高高凌驾于老百姓之上肆意践踏人权的“民主”。

儒教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从来就没有什么平等与自由可言。

儒教的社会结构模式,是家庭的延伸,即所谓的“家国同构”。家是国的缩小,国是家的放大。家有一家之长,国有一国之主;家庭有父子等级,国家有君臣之别;家庭讲求礼治,国家也就以礼代法,封建官僚教训子民常常动用的就是与父亲抽打

儿子屁股同样类型的刑罚。直至今天,地方官员仍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父母官”。

由此可见,在缺少现代精神的儒教文化体系中,怎么也生长不出现代文明的优良种子。

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而彻底地挣脱儒教的束缚,不能完善与健全正常的社会机制,必将永远处于封建愚昧、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局面!

然而,儒教的务实性与世俗化却又与现代的某些精神并行不悖,它的主要内容也无法证伪。因此,尽管历来反孔的呼声不断,却一时难于使之达到推陈出新的地步。而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已在古老的中华大地积淀得过于深厚,随便抓起一把泥土轻轻一捏,也会挤出一些封建的汁液。封建意识与专制残余只要一遇机会,就会死灰复燃。

那么,我们何时才能走出历史的阴影与文化的怪圈,重建中华上古文明的辉煌?

三

我一边行走,一边思索,虽也将自己的一些感受零星记下,却迟迟没有创作一篇像模像样的文章。直到1993年在同学朱移德的陪同下游了一趟禅宗的策源地黄梅五祖寺,为禅者们刻苦修行、超越物欲、把握自我、独立思索、大胆怀疑、追求独立人格的精神深深震撼,更为平凡朴实、生动活泼、博大精深的禅宗为人类价值信仰的批判与重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系而激动不已,这才情不自禁地写下了我的第一篇文化散文《禅语五祖寺》。

此后,又断断续续地写过几篇,也就搁下了。

我在寻找一个强有力的契机、支点与坐标。

直到去年八月,本书的框架与轮廓才“浮出海面”。我决定选取荆楚大地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历史与文化景观,进行多侧面、多方位的描述与抒怀,透视与比较,解剖与反思。比如,以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为依托,展开对中国青铜文化的巡礼;选取武当山,对道教及国民的宗教意识进行剖析;以曾侯乙编钟为基点,反思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由陆羽纪念馆散发开来,论述中国茶文化的历史与现状;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线索,对中医文化的特征进行描述与反思;在引导读者进入诸葛亮故居古隆中的过程中,探索千百年来纠缠在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心头难以化解的“隆中情结”;以武昌起义为切入点,探讨历史怪圈的束缚及文化土壤对国民性的深刻影响……从点到面,由古而今,中西比较,以此而勾勒出一副中华民族“千年家国梦”的斑斓图景。

与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取得联系后,褚赣生先生更是促成了本书主旨及结构的形成与明晰。

至此,我才真正开始了本书主要篇目的创作。

我写得很苦,也很累。

面对电脑,我常常一坐就是半天,好不容易敲打几行字句,很快又因不甚满意而被自己删得一干二净。而此前,我可算得上是一个创作的“快攻手”,曾经创造过一天“高产”两万字的速度。

在进行了八年多的专业创作之后,我似乎才第一次领悟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内在涵义。

在一个信息密集的现代化社会里,作者到底还能够干些什么富有价值与意义的“活路”?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得信息,谁也不愿“恭听”重复的唠叨。面对着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搜

集而来的一大堆资料,我当然没有必要复述前人的话语。每一个公民都有资格、都有可能占有同样的资料与事实,作家与普通读者的区别,就在于他能高屋建瓴,对一大堆资料与事实尽量进行全方位的检索与透视,领会其精髓,把握其实质,道出自己独特而深刻的感悟。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创作状态中,我对哲学的探究、对历史的思索、对文化的解悟、对人生的体验、对社会的认识也就获得了少有的升华与飞跃。

在创作的过程中,我思考得最多的还是楚文化的发展与命运。

在上古时代,荆楚文化与希腊文化,一东一西地构成了闪耀着熠熠光华的人类“双子座”。关于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楚史研究专家张正明先生曾作过详细的比较,在此我们不妨抄录如下:

青铜冶铸的工艺水平,楚高于希腊。锻铁是希腊早于楚,可锻铸铁却是楚早于希腊。当楚国及其邻国的工师在丝绸上表现他们多彩多姿的意匠之时,希腊及其邻国还不知丝绸究竟是怎样生产出来的。希腊留下了许多彩绘的陶瓶,楚留下了许多彩绘的漆器,它们都以典雅华丽见称于世,但就工艺而论,陶瓶不如漆器复杂。希腊因多石少林,发展了石砌的殿堂;楚则多林少石,发展了木构的台榭。论操舟航海,楚人不能与希腊人比肩;论驱车陷阵,则希腊人不能与楚人方轨。石雕,是楚不及希腊;木雕,却是希腊不及楚。以人物为题材的造型艺术,是希腊居前;至于音乐,却是楚领先。就哲学和文学来说,楚和希腊各有千秋。政治体制方面,希腊的长处在于民主制,楚的长处

在于集中制……从文化的总体成就来看，楚与希腊难分轩轻。它们从不同的方向出发，都登上了上古文明的峰顶。

然而，正是这两种堪称当时世界第一流的不同文化，它们的发展与命运却大相径庭。

希腊文化构成了今日西方文明的源头、基石与主体，在两千多年的漫漫时光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当今世界文明的主流，它从西到东，以其雷霆万钧之势几乎横扫、征服了整个人类。

而秦灭楚后，即对楚文化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与摧残；汉朝定儒家于一尊，楚文化虽然一息尚存，但仅仅作为儒家文化的补充，作为统治阶级调和矛盾的缓冲，作为一种无声的潜流才得以传承于世。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不是强秦扫平六合，而是楚国一统天下，是楚文化作为一股强大的主流贯注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那么，今日的中国会是一番怎样的情景呢？

谁也无法描述、勾勒与想象！

然而，我以为无论其发展图景如何，总比灭绝人性的儒教要强似百倍！

弘扬楚文化，我所看重的并不是它的表现形式，而是其内在的荆楚精神——尚勇好武的奋斗精神，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有容乃大的开放精神，念祖忠君的爱国精神以及烛幽洞微的探索精神。

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抱残守缺，顽冥不化，拒绝人类的真正文明。现代化、市场化、民主化、法制化已成为席卷全球的一体化发展趋势。我们只有敢于正视现实，承认落后，奋发图强，加入到世界文明的大合唱之中，才有可能赶上和超过现有

的发达国家。

楚国先民视凤凰为民族的图腾之物。在他们眼里，凤是至真至善至美的神鸟，是雍容华贵、伟岸英武的象征，人的精魂也只有在凤凰的引领下才能飞升九天遨游八极。

凤有“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的传统。楚之凤凰不鸣久矣，我们翘首以待它的一飞冲天与一鸣惊人！

传说凤凰满五百岁后，便集香木自焚，然后从死灰中再生，将变得更加美丽动人并获得永生。

于是，我的耳畔，不禁断断续续地响起了郭沫若《凤凰涅槃》的歌声：

火光熊熊了。
香气蓬蓬了。
时期已到了。
死期已到了……

听潮涨了，
死了的光明更生了……

春潮涨了，
死了的宇宙更生了……

生潮涨了，
死了的凤凰更生了……

我们更生了……

我们新鲜，我们净朗，
我们华美，我们芬芳……

我们热诚，我们挚爱。
我们欢乐，我们和谐……

我们生动，我们自由。
我们雄浑，我们悠久……

我们欢唱，我们翱翔。
我们翱翔，我们欢唱……

这既是凤凰涅槃的歌声，也是中华民族涅槃的歌声！五百年前的明朝中期，中国文化即已达到它的极致与顶峰，封建社会就已走入了发展的死胡同。“五百年来的眼泪倾泻如瀑/五百年来的眼泪淋漓如烛/流不尽的眼泪/洗不尽的污浊/烧不熄的情炎/荡不去的羞辱/我们这缥缈的浮生/到底要向哪儿安宿？”在这世纪之交与千年之交的历史转折关头，正是中华民族千古涅槃的最佳时刻与最佳选择！

本书的创作，于我来说，也是一次涅槃与新生。1999年，是我人生的第三个本命年。三十六，是古楚国长期流传下来的一个极为尊崇的隐数，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与哲学意蕴。人生

于三十六岁一分为二,前半辈子的生活就此结束,后半辈子人生即将拉开帷幕。在我故乡荆州一带,至今仍流行着三十六岁庆寿的习俗:生日这天,亲朋好友携带匾额、礼金前来祝贺,燃放鞭炮,大摆筵席,其隆重程度毫不亚于婚礼。我母亲就曾千里迢迢地专程从乡下赶来为我的三十六岁庆祝。以三十六岁作为人生涅槃的分界线,我此后的创作,也自当是另一番新的光景了……

1999年3月于黄石—武汉

走出古隆中

一

一部《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描写几乎达到了完美无缺的程度。他不仅是智慧的化身，更是道德的楷模，集忠贞、信义、坚韧、谨慎、睿智、机敏、勤勉、清廉于一身。作者将自己心中的价值观念与理想追求寄托在他的身上，并对其外在形象也进行了一番精心的塑造，描写为手执羽扇、头戴纶巾、身披鹤氅，一副道骨仙风、飘逸潇洒的名士形象。

尽管《三国演义》有鲁迅所说的“状诸葛之多智而近似妖”之嫌，但对诸葛亮外表形象的设计与规范却相当准确到位。

据晋代裴后《语林》记载：“诸葛武侯与宣王在渭滨将战，宣王戎服莅事，使人视武侯——乘素舆、葛巾、毛扇，指麾三军，皆随其进止。宣王闻而叹曰：‘可谓名士矣！’”

诸葛亮的形象通过对手之口加以叙说，令人感到更加真实。

罗贯中正是以这些史料为依据，在《三国演义》中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独特形象。

诸葛亮具有千古不衰的动人魅力，除了智慧超人、道德坚贞等内在的人格因素外，我以为与他的衣着打扮、名士“派头”等外在形象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一副自在自如、自然自信的飘逸洒脱与那些畏手畏脚、呆板迂腐的传统儒生形成鲜明对照。当我们打开漫漫的历史画卷，翻到三国那一页时，诸葛亮的形象便如一道神奇而夺目的光芒，突然闪耀在我们眼前，那发黄的长幅纸卷也因此而增添了几分亮色。

如果没有羽扇、纶巾、鹤氅这些富有象征意义的“行头”，诸葛亮再聪明、再智慧、再道德、再忠廉，恐怕也难以达到今日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程度。

那么，诸葛亮何以形成了一副与传统儒生迥然有别的具有道骨仙风的名士形象？

这与他独特的人生追求与生活阅历相关，具体而言，是襄阳隆中十年隐居生活改造了他，塑造了他，从而结出了一颗神奇的果实。

诸葛亮受刘备三顾茅庐之礼聘而出山，那年正好二十七岁，非常巧合的是，二十七年后，诸葛亮北伐中原而卒，享年五十四岁。

因此，以诸葛亮走出隆中为界，我们可以将他的生命历程一分为二。

于个体生命而言，二十七岁的年龄，其生理、心理皆已进入成熟的季节。刚一成熟，就被刘备的“火眼金睛”看中而“摘取”。于是，一直被失意、失败的纠缠与追赶弄得疲于奔命的刘备从此奠定了鼎立三国的基础，由名不副实的“皇叔”摇身一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皇帝。而诸葛亮这颗掩映在万绿丛中的果子也似乎是为了刘备这位明主而悬挂在葱茏的枝头，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隐士成为一名光耀千秋的“天下第一相”。

走出古隆中，是诸葛亮经过一番认真权衡后的重大选择，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关键转折。

只有走出古隆中，诸葛亮的远大抱负与人生价值才得以实现，生命才以一种全新的形式步入灿烂与辉煌。

然而，如果没有古隆中的经历，没有一段不长不短、躬耕南阳的隐居生活，也就没有诸葛亮的闻达，那么，历史人物的长廊中将因此而少却一个熠熠闪光的独特形象。

是古隆中的自然环境与文化氛围，浸润了诸葛亮的心智，养育了他的才智，确立了他的品德，塑造了他的人格，成就了他的辉煌。

即使走出以后，诸葛亮的政治意识、军事行动、言行举止仍不知不觉地受着‘隆中意识’的左右与影响。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诸葛亮的十年隆中生活，不仅决定了他的人生基础与政治生命，也决定了刘备、关羽、张飞、赵云等重要人物的命运走向以及蜀国的兴盛衰弱。

那么，且让我们随着诸葛亮的人生足迹，一步一步地走向襄阳，走进古隆中，看看这块风水宝地是怎样融于诸葛亮的血肉之中，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二

诸葛亮并非生于襄阳，而是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县）人。他于东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生于一个地方官吏世家，兄弟姊妹五人，父亲时任太山郡丞。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比那贫苦百姓自然要强似百倍。

然而，灾难与不幸却像一把利剑残酷地刺向一个幸福而平静的家庭。诸葛亮约三岁时，母亲病故；八岁那年，又遭父丧。

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只剩下了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于是，叔父诸葛玄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养育他们的重任。

诸葛亮十三岁那年，叔父诸葛玄被袁术任命为豫章（今江西南昌）太守。其时，兄长诸葛瑾已只身流亡江东投靠了孙权；叔父赶至江西赴任，诸葛亮兄妹四人只得离开山东，随叔父诸葛玄入赣。可不多久，汉朝廷却任命了朱皓为豫章新太守，以接替诸葛玄。

官职丢了，薪俸没了，一大群幼小的子女环绕膝下。怎样才能将他们哺育成人呢？被迫离任的诸葛玄茫然四顾，一时间仿佛陷入了走投无路的绝境。

突然，他想起了正占据荆州的刘表，过去，他们俩也算得上是一对好朋友。只是时过境迁，也不知今日做了荆州牧的刘表会如何对待自己。管不了那么多，活命要紧，只得厚着脸皮、拖儿带女地上荆州去走一遭了。

当时，荆州的治所不在荆州古城，而在襄阳。襄阳位于汉水和唐白河的交汇处，南拊江汉，西屏川陕，为南北水陆重要通道。于是，诸葛玄挈妇将雏，一路风尘仆仆地从江西赶往襄阳投奔刘表。

在诸葛亮一行到来之前，作为东汉末年颇有名望的“八俊”之一的刘表，已在刺史任上将荆州这块广袤而肥沃的地盘治理得有声有色。他不仅扫平了治所内的土豪武装，还与孙坚在襄阳打了一场史称“樊邓之战”的恶仗。素以骁勇闻名的孙坚在战斗中中箭身亡，刘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战后荆州，与烽火频频的其他地方相比，成了一块战争的缓冲地带，变得相对地平静起来。刘表奖励农桑，休养生息，吸引人才，“起立学校，博求儒术”，招来了大批关西、兖、豫学士，就连在豫东打了败仗的刘备，也投奔到刘表麾下。

就在这样一种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中，诸葛玄一行来到襄阳。他们来得正是时候，自然受到了刘表的热情接纳。

于是，诸葛玄一家人、诸葛亮兄弟姊妹四人就在襄阳安顿下来，过了几年颇为安逸的日子。

这期间，诸葛亮进入刘表设立在城南二里之地的“学业堂”读书。尽管没有确凿的史料记载，但我们可以想见得到，儿时的诸葛亮，肯定受到了较为良好的启蒙教育，也就是说，在进入学业堂之前，已有了一定的知识基础。过着颠沛流离生活的诸葛亮根本没有想到还能进入正规学堂进行系统学习，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学习非常刻苦勤奋。

在此，我们有必要提及诸葛亮的学习内容。

学堂不是封闭的世外桃源，教育与政治、社会、时代息息相关。战国时诸子百家争鸣的自由活泼，已随六国的消亡变成后人常待追忆、向往的黄金盛世不再复归，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经过帝王的首肯与诏示，被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延及东汉，儒家经学更盛，成了士人们升官进爵的必由工具。据《后汉书》补注引《镇南碑》记载，当时的荆襄，已是“鸿生巨儒，朝夕讲论”；“古典毕集充于州闾”。由此可见，襄阳的儒学风气已相当浓厚。而诸葛亮的业师，即为当时荆州的儒学代表人物司马德操，一位功底颇深的古文经学家。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中，诸葛亮接受的只能是儒家教育。

当时的儒学，多少还具有一定的生命活力。统治者将它定于一尊，肯定有着一定的合理内涵。只是它被一代又一代统治者所利用，将它作为束缚自由、阉割人性的工具，才逐步走向教条化，变为一道约束中国知识分子的桎梏，成为名副其实的“儒教”。

儒学教育在诸葛亮身上打下的烙印相当深刻，他日后的入

世进取、对刘备的忠贞不移、生活上的节制克欲等道德观念与行为规范，都可视为此段学堂教育的结果。

好在诸葛亮在学业堂的时间不长，也更因为他有着远大的理想与抱负，这才没有被儒学束住手脚。否则，他极有可能成为一个皓首穷经、寻章摘句的酸儒。即使从最好的角度设想，大不了就是一名“鸿生巨儒”。即使巨儒也罢，没有多少发展创造，只会“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有多大的意义与价值，对社会又能作出多大的贡献与付出呢？

一个看似偶然的事件发生作用，改变了诸葛亮的命运。

公元197年，也就是他进入学业堂后的第三年，叔父诸葛玄去世。此时的诸葛亮一定十分悲伤，三岁丧母、八岁丧父，跟着叔父东奔西走，饱经战乱、流荡之苦，一颗敏感的心灵无时无刻不在经受着痛苦的打磨。刚在襄阳过了三年较为稳定的生活，没想到自己一直依靠着的叔父又匆匆撒手人寰。命运于他，怎样这般冷酷无情？

叔父之死，比失去父亲更为伤心。毕竟，父亲亡时他不到八岁，还不甚懂事，不知道什么叫做悲伤；毕竟，这些年一直跟着叔父，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与谆谆不倦的教诲是他心头的温暖、寄托与支柱啊！

诸葛亮伏在叔父身上嚎啕大哭，他恨不得让自己汹涌的泪水将这充满了灾难与痛苦的人世彻底淹没。

在哀婉的哭声中，诸葛亮变得成熟起来。

叔父走了，失去了基本生活来源，他变得无依无靠，再也不能继续呆在学业堂就学读书了；自己已经十七岁，到了自主自立的年龄，应担负起自己的命运与未来才是。

十七岁，一个既自尊又脆弱的特殊年龄。

正是在这一年，诸葛亮决定不再寄人篱下，仰人鼻息，他要

凭借自己的劳动与本事，过一种自食其力的全新生活。

于是，他毅然决然地离开襄阳城，来到了城西约二十六华里的隆中村。

襄阳，是他人生的一个中转站，是他进入古隆中的一道不可缺少的序幕。

只有进入隆中，一颗优良的种子才找到了合适的土壤，得到了充沛的水分与养分。

三

隆中山因一山“隆然冲起”而得名。

诸葛亮隐居的隆中村，坐落在隆中山南麓。

于隆中村的自然环境，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描写道：“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篁交翠。”也算得上山青水秀，风景优美，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矣。

当时，隆中属荆州南阳郡邓县管辖。沿隆中山东行，不到四里，即汉水南岸，乘船北渡，就是邓县县城。而从隆中到荆州治所襄阳，快马只需半个时辰，毛驴一个时辰，即使步行，二十多里路程，也要不了多长时间。

诸葛亮之所以选择隆中隐居，看中的正是它不近不远的地理位置。

他并不想做一名真正的隐士，而是潜伏静观，以待天时。如果遁入名山大川，隐入白云深处，过于远离尘嚣，就不能掌握人间信息，了解社会变革；若是太近，又不免流于浮华虚荣，达不到潜心隐志、冷静思索的目的。他之所以态度坚决地离开襄阳，我以为其叔父诸葛玄之死，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他找到

的一个“借口”与“由头”而已，还有比这表象更为深层的内在原因。以诸葛亮睿智、敏感的天资，他肯定不满于儒学的专制与禁锢，感受到了襄阳城内奢靡浮华、醉生梦死的龌龊之风。

若是留恋襄阳的话，诸葛亮完全可以继续在那里生活下去。

但他要想使自己过得清醒一些，自由一些，深刻一些，便选择了隆中。

刚到襄阳不久，诸葛亮的大姐就经叔父作主，嫁给了蒯祺。蒯家是襄阳最有势力的大族之一，蒯祺曾任过房陵太守，家在今襄阳和宜城之间。不久，二姐又嫁给了当时最有声望的名士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辗转流落襄阳的姐弟四人，如今就剩下相依为命的兄弟两人。于是，诸葛亮携弟诸葛均一同走进了山青水秀的隆中村。

没想到这一住就是十年。

家境贫困，兄弟俩因陋就简，搭了一座草庐遮风蔽雨。好在这些年的艰难生活造就了兄弟俩吃苦耐劳的精神，他们并不以此为苦，反而充满了一种获得独立后的自信、自足与自乐。

隐居隆中后，诸葛亮做的事情主要有三件：白天躬耕陇亩，晚上挑灯夜读，闲暇之际拜会名士、结交朋友。

耕种收割对从未接触过农活劳作的诸葛亮来说，无疑是相当沉重的。在襄阳随便找点什么活儿干干都可糊嘴讨生活，为了磨炼自己造就自己，他的隐居隆中多少带有一点自我放逐的意味。“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诸葛亮肯定常常默念这背得滚瓜烂熟的孟子名言，以此激发、勉励自己。

是的，如果一点农活之苦都吃不消，还侈谈什么胸怀大志、成就大业呢？

在襄阳求学时，诸葛亮便常常“抱膝长啸”，对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等三名要好的学友说：“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反过来问他将来可做到什么官职，诸葛亮笑而不言。他为何不予正面回答？那一笑之中包含着什么内容？《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中为我们记载了答案：“（诸葛）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原来，诸葛亮的志向与抱负远大得很，他对一般的什么刺史、郡守并不感兴趣，要做，就做能够拯衰复兴、济世救民的像管仲、乐毅那样的辅相。当时，学友反问，他不好伤他们的自尊，只有含蓄地笑笑作答。诸葛亮是否真的具有廓清寰宇所需的经天纬地之才？一般之人，都表示怀疑，只有几位对他有着深刻了解的朋友才以为言之不虚。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不仅有着远大的理想，并对自己的实现理想的才智充满了相当的自信。

农耕劳作磨炼了他的意志，强健了他的体魄，使他得以贴近大地，贴近自然，掌握中国农村的底层现状，了解广大民众的生活疾苦。这对他日后的惜民力、反奢侈、倡节俭、讲实际等品格和作风的形成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并且，他还在古朴聪慧的农民身上学到了许多在经卷上难以学到的知识，比如北伐中原时制作的木牛流马，很可能就是对当时农村的一种运输工具的改进，至少也与他在隆中时会得到过某位能工巧匠的传授技艺与启发指点有关。

在隆中，诸葛亮对自己的要求相当严格，白天耕种，晚上则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捧卷阅读。

摇动、跳跃的光亮将诸葛亮本来就显得消瘦颀长的身影拉得更长，映照在泥糊的棚壁上，从这夸张而多少有点怪诞的影

子身上,我们理解了《三国演义》中何以对他的描写带有一点“近似妖”的荒诞色彩,说到底,这只不过是对现实的一种折射反映而已。

诸葛亮手捧一本发黄的经卷,一会儿认真地看着,一会儿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一会儿握管挥毫、笔走龙蛇地写下自己的独特认识与心得感受……灯光越来越暗,发出了“哗哗剥剥”的声响,他定睛一看,原来是灯芯结满了豆大的灯花。他只得放下经卷,挑去灯花,并将灯芯往外拨了拨。屋内顿时变得亮堂起来,就又拾过书本,凑近油灯,再次进入了物我两忘的神游境界……

多少次,他就这样和衣伏在油灯旁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

白天的劳作实在太累,晚上的阅读太认真了,刚入隆中,诸葛亮的隐居生活多少带有一种自虐的苛刻与严酷。

对此,诸葛亮曾著文道:“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他又说:“静以修身,俭以养性。”

入静去浮、精诚刻苦、脚踏实地、持之以恒,这就是诸葛亮端正的学习态度。就其学习方法而言,也显得与众不同,因他聪颖绝伦,常常一目十行,“独观其大略”,不搞繁琐的考证,不做寻章摘句的蠢虫,而能从总体上对历史、人物、学问予以把握。

这期间,诸葛亮的阅读视野已超越了儒家经典狭窄范围,广泛涉猎了很多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书籍,并对道家、墨家、法家、黄老、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在《论诸子》一文中写道:“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礼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在对诸子之得失进行一番审慎的分析后,他博采众长,融会贯

通，充分地吸取百家的合理养分。

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当属道家与道教。道家以《老子》、《庄子》为立身经典，往往独自隐居在中国的穷乡僻壤之间，奉行人格独立、个性自由、顺应自然、生活俭朴等准则，其生活方式即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道教则指形成于二世纪的一种宗教流派，其实践与经典所载往往有别，提倡静坐、炼丹，与独立遁世的道家实践相比较，更多的是依靠迷信和正规仪式，相信鬼神、画符念咒，具有等级森严的组织。

无论是道家还是道教，都在诸葛亮身上刻下了或深或浅的印痕。

诸葛亮在隆中身体力行的，正是道家所提倡、实践的那种生活方式。他的感受与体验，与老庄有着血脉相通的关系，因此，一旦道学进入他的视野，就如迷路的行人发现了一条畅通的归途。

诸葛亮真有一种回家的良好感觉。捧读道家经典，过着道家奉行的生活方式，结交的朋友也是当地知名的道学隐士如庞德公、黄承彦、司马徽等人。

公元200年，也就是诸葛亮隐居隆中三年后，“官渡之战”爆发，曹操以少胜多战胜袁绍，基本上统一了北方。于是，荆、益二州就成了曹操与孙权注目、争夺、吞并的焦点。政治、军事形势的急剧变化犹如涌动的春潮奔卷而来，猛烈地冲刷着襄阳大地。一批英才便在这独特而重要的政治环境中经受历史的锻打与磨炼，日渐塑造成形，除了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诸葛亮外，还有庞统、徐庶、孟建、石韬、庞山民、崔州平等一批杰出的风云人物。他们互相拜访，频繁交往，互通信息，集思广益，交换政治见解与思想心得，相互切磋，相互砥砺，相得益彰。

于是，除躬耕陇亩的剪影外，我们还看见了诸葛亮在隆中、

襄阳及其他名士隐居的鱼梁州、白沙州等地或悠闲散步、或匆匆奔走、或策驴而行、或鞭马如风的多姿身影。

隆中，是诸葛亮潜心养志之地；襄阳，是他眺望中国、全局在胸的“桥头堡”；鱼梁州、白沙州等地，既是他求知的营养之源，也是他验证才华、砥砺思想、锤炼磨打的所在。

在诸葛亮交往、接触的隐士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当数庞德公。庞德公是诸葛亮二姐的公公，他在当地有着很高的威望与影响，可视为襄阳地区名士、隐士集团的自然首领。刘表曾多次请他出来做官，都遭拒绝。庞德公有“知人之鉴”，品评人物，颇具权威。他瞧不起儒生，认为他们不过是一些迂腐的庸才，而真正的有用之才是那些懂得时务的良才。诸葛亮尊重他，常到他的住所城东鱼梁州登门求教；庞德公深知诸葛亮，对他颇为器重。在概括、评价当地人才时，他称朋友司马德操为“水镜”，侄儿庞统为“凤雏”，诸葛亮则为“卧龙”。卧龙者——一条蓄精养锐、等待观望的真龙，时机一到，可就要升空腾飞、遨游八极、搅动九州了。

在诸葛亮隐居隆中的日子里，值得一提的还有他的婚姻。对此，《襄阳记》曾有所记载：

黄承彦者，高爽开朗，为河南名士，谓诸葛亮曰：“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发，而才甚相配。”孔明许，即载送之。时人以为笑乐，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

我们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一些隐藏在这段文字背后的内涵。

黄承彦乃一有名有才之士，主动提出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诸

诸葛亮,说明他相当看重佩服诸葛亮。黄承彦看中的不仅有他的才华,还有他远大的未来,更看中了他的德行,觉得他是一个可以托付之人。不然的话,他是不会随随便便将女儿许诺于人的。“丑女”一词,从黄承彦口中说出,我们还以为是自谦之词,但见后面所叙乡人对诸葛亮婚配的嘲笑,我们方知他娶的媳妇的确是一丑女,恐怕还不是一般的丑呢,不然的话,时人就不会把‘孔明择妇’作为告诫他人的一个典型例证了。

身高八尺、有才有貌的诸葛亮想娶一个漂亮的妻子并非难事,可他怎么娶了一个奇丑无比的女人为妻呢?于他来说,恐怕也是作了一番反复权衡的。黄承彦为沔南名士,与其女儿结婚可得到他的真心教诲与全力帮助;黄氏乃刘表后妻蔡氏、妻舅蔡瑁的外甥女,与她结成姻缘,不仅可与刘表攀亲,还可与襄阳豪族、当权派蔡瑁建立关系,可以奠定一定的社会基础;再则,黄氏虽不美,但‘才堪相配’,得一贤内助,对自己日后功业将会大有帮助。

民间曾有传说,说黄承彦家藏传世兵书,诸葛亮意欲借阅。但黄家规定,兵书不能借与外人。为了读得兵书,诸葛亮只得与黄氏结为连理。而黄承彦,也就将祖传兵书作为女儿的嫁妆全数送与了诸葛亮。

历史分析与民间传说,两者互为印证,它们都说明了一点,诸葛亮之所以迎娶丑女黄氏,动机与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更好地充实自己以成就大业,实现远大的理想与抱负。

诸葛亮是一讲求实际之人,他注重的是藏在外表后面的实质性东西,深邃且远大的目光所凝聚的焦点唯有‘未来’二字!

其实,在一个三宫六院、三妻四妾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妻子外表美不美并无多大关系。妻貌不美,自有其他途径补偿,不仅可以纳妾,还可寻花问柳。诸葛亮自然不会出入那藏污纳垢

的烟花柳巷，但后来纳妾，却是不争的事实。

四

诸葛亮在隆中那块小小的地方一住就是十年，当我终于觉得可以写写古隆中而安静地坐在书桌前将电脑敲得“噼啪”直响时，离游览襄阳隆中的日子已是七年有余了。

岁月如风，它吹去了浮华与轻荡，留下的是经过秋霜冬雪之后的成熟，这成熟有如一颗晶莹、沉淀的丰收之果。

一如诸葛亮的隐居隆中，如果没有这七年多时间的思索，我实在没有把握来写这篇《走出古隆中》。

当年游览隆中，当属“借光”之举。1991年春天，一个全国性的歌曲、舞蹈创作会议在襄阳召开，会议间隙，主办者拉着一车与会人员于一天午餐后去了隆中。欢歌笑语洒在专为游览修建的柏油马路上，一直洒向幽静的隆中，也不知吵醒诸葛亮的午睡没有。作为其中的一员，如果惊扰了他的美梦与宁静，我只有抱愧而已。

其实，我并不喜欢这种喧嚣的游览方式。一大群人挤在一起，热之闹之，什么都看了，又似乎什么都没看；来了去了，快疾如风，有时连走马观花都谈不上。最要命的是，你到了一处古幽之景，置身的仍是滚滚红尘，根本不能进入游览地的环境与氛围之中，也就全然没有独特的感受与体验，更不要说有什么深刻的思考了。

我惯常的游览方式，便是独自一人，身背行囊，寂寞地行走在名山大川、名胜古迹之间。而我的内心，非但没有寂寞，反而时时涌动着一股奔腾的激动与昂扬。我沉浸在当时当地的气氛环境中，或独立思索，或与自然山水对话，或与圣人贤哲进行

一场场充满睿智与机锋的辩论。我在这不断的思索、对话与辩论中获得了一种不可言喻的独特享受，而人，也就这样一点点、一步步地得以超越和升华。

夹在一群游人中尽管无法免俗，但我仍以惯常的方式进行着一种无望的挣扎。面对隆中幽静的山水，一个问题不知怎么突然就跳进了我的脑海：当年，诸葛亮是否想到过幽静的隆中 will 因他的隐居而成为后人们的游览与凭吊之地呢？

我以为他不仅如此想过，这个念头还曾经在他的脑海里占据过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也是他能够潜心隐志、磨砺自我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正如一个将拳头收回后打出去更加有力的拳击手，诸葛亮的隐居隆中，并非要做一个真正的隐士，而是为了更好地“出山”。一旦出山，就是卧龙腾空，将像管仲、乐毅那样建功立业。于是乎，人们对他发迹之地的观光与仰慕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了。

与他日后所要驰骋的广阔天地相比，隆中的范围是那么狭小。十年的时间，就在这么一块小小的地盘活动，隆中于诸葛亮，就像一件穿了十个春夏秋冬都不曾脱下的衣衫，上面自然也要留下一些补丁。

一进隆中，迎面就是一座古朴雄伟的石牌坊，上刻“古隆中”三个大字。两旁石柱上，刻着“诗圣”杜甫的著名诗句：“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沿此处进入隆中，清幽雅致的景色中，与诸葛亮有关的遗址景点有躬耕田、抱膝亭、六角井、梁父岩、老龙洞、半月溪、小虹桥、三祠堂、草庐亭、武侯祠、野云庵等，它们与古隆中牌坊，共同构成了“隆中十二景”。

当我们的身影在隆中的这些遗址古迹间晃动、行走、凭吊、慨叹时，我分明感到一双无所不在的目光正灼灼投射在我的周围。抬眼上望，哦，原来是诸葛亮端坐隆中山顶，那超越千古的

智慧之眼,似乎在默默地向我讲述着一个动人的历史故事。素有料事如神之称的诸葛亮即使当年,肯定就遥想到了隆中日后的发迹与兴盛,并设计了一些值得凭吊、具有文化价值的景点。如果上天有灵,当他见到一千七百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在他的思维与设计模式中转来转去的时候,将会作何感想呢?

据史书记载,诸葛亮出山不久,其弟诸葛均也离开隆中,做了一个长水校尉的小官。以后,一户姓董的人家在诸葛亮的草庐住过一段时间,随着这家人的相继死去,此地便无人居住了,显得更加幽静、寂寞,且有几分荒凉。直到公元305年,荆州刺史刘弘到诸葛亮故宅观光,触景生情,才命人作了一篇《祭诸葛丞相文》,刻于石碑之上立在隆中。五十年后,又有一位名叫刁凿的荆州刺史别驾前来隆中祭奠,写了一篇《诸葛武侯宅铭》,刻碑立在诸葛亮故宅附近。此后,武侯祠也就依据石碑所立之处兴建起来,并围绕他留下的生活遗址修了一些相应的景点:汲水用过的水井砌个石栏杆,称为六角井;耕种过的田地叫做躬耕田;歇息过的岩石名为抱膝石;在一旁赏过月的小溪称做半月溪;刘备三顾茅庐时遇到黄承彦的小石桥叫做小虹桥;常站在上面吟诵《梁父吟》的岩石就叫梁父岩……明万历年间,荆南道观察使吴授又在隆中修造了三顾堂、古柏亭、野云庵等景观。

有兴便有衰,古隆中这块因诸葛孔明隐居而出名的土地,在历史的长河中,一如我们脚下的每一块土地,也免不了要经受一些兴衰的劫波与轮回。

古隆中曾遭到空前的破坏,诸葛武侯祠也几经变迁。其中有自然灾害如洪水的冲击与侵蚀,也有人为的破坏与毁弃。最大的一次人为破坏当数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袭封襄王的简王朱见淑觉得隆中景色绝佳,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便拆除

有关纪念诸葛亮的古迹建筑，毁坏碑铭石刻，在山上建造自己的陵墓，并把隆中山改为座山。

一百五十多年后，李自成攻克襄阳，对明王朝恨之入骨的农民起义军不仅将藩王及其子孙杀得一个不剩，也将隆中襄简王的陵墓扫荡一空。玉石俱焚，古隆中变成了一堆废墟。

直到半个世纪后，郢襄观察使蒋兴芑在东山梁修复诸葛武侯祠，隆中的主体建筑这才固定下来直到如今。

有清一代，此后虽有过多兴建与维修，但因战乱频繁，直到解放前夕，古隆中到处都是断碑残垣、砖块瓦砾，破烂不堪，一派萧索凄凉之景。

解放后，隆中被列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52年成立文物管理处，1954年开始较大规模的兴建、修葺与装饰，这才构成了今日隆中风景名胜迹的总体格局。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诸葛亮站在隆中山顶，望着一千七百多年的风云变幻与人世沧桑，兴也罢，衰也好，一切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于是，当他无意间触到我那疑问的目光时，只是将手中的羽毛扇悠闲地摇了几摇，嘴角现出一抹微笑，拂来几缕云烟，渐渐远去。可是，就在他将要淡出我视野的最后一瞬，我分明觉出那微笑之中竟带有几分苦涩。

诸葛亮定格在我脑海里的形象竟是一个颇具意味的苦涩的微笑，这不禁使我更加惑然。

七年多来，这一苦涩的微笑不依不饶地追逐着我、纠缠着我、压迫着我，甚至在睡梦中也不曾将我放过。

我苦苦地寻求着藏在那苦笑背后的答案。

一切应该发生的已经发生，并凝成永恒的历史，这本在诸葛亮的预想之中。可是，一些不应该发生的却也发生，完全出

乎他的意料之外。这对料事如神的诸葛亮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嘲笑讽刺。对此,他无可奈何,就以苦笑置之,并让我来破解其中之意?

那么,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事情到底有哪些呢?

其一、他没有想到,后人会因为他的隐居之地到底何在而打一场不大不小的笔墨官司。问题出就出在他在《出师表》中的一句自陈:“臣本布衣,躬耕南阳。”于是,就有了诸葛亮的躬耕之地是河南南阳,还是湖北襄阳的争论。三国时,隆中村归邓县管辖,邓县为南阳郡属地,而南阳郡又是荆州的一块地盘。这样弯来绕去,几经变迁,就有不少后人误以为河南南阳是他的隐居之处了,并将南阳附近的山岗命名为卧龙岗,还修了诸葛草庐、诸葛书院等纪念性的建筑。这本无多大争议的诸葛隐居之地,“官司”竟从元朝一直打到本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才基本上尘埃落定。攀龙附凤的势利心态,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矣。如果我们将诸葛亮换成秦桧,还会有人来争他的或出生、或学习、或隐居的地方所属权吗?记得清朝乾隆年间有个叫秦确泉的名士拜谒岳飞坟墓,曾经感叹道:“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不仅取名不用“桧”字,就连因同姓秦都感到羞愧,秦桧简直就成了流行的瘟疫,人人唯恐避之不及,还会有谁去攀亲拉故呢?

其二、为什么一千七百多年的时光流逝了,而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少陋习陈规、人格缺陷、不良心态不仅没有随着岁月与时光一同流走,反而变得更加顽固了呢?一条长长的锁链套着他们的手脚,一个难解的怪圈迷惑了他们的眼光,束缚与羁绊,难道真如代代相传的基因难以挣脱难以超越吗?

当然还有其三、其四,可是限于篇幅,还是让我们将诸葛亮那留在嘴角的苦涩微笑暂时搁下,回到他隐居隆中的“修炼”日

子吧。

隆中的优美风光、躬耕田亩的身体力行、与天空大地的水乳交融、诸子百家特别是道家的影响、朋友的启迪与熏陶、时代风云的激荡……这些，都在不知不觉地塑造着一个崭新的诸葛亮。

刚入隆中，他还只算得上是一个稚嫩的儒生，毛头毛脑、畏手畏脚，打量世界的目光中时时透着一股惊怯与疑惧；而一旦经过隆中这一熔炉的铸造，他就变了，变得自信成熟起来，时时处处透着一股道家的风范，一副游刃有余的洒脱与自在。因有着深厚的儒学底蕴，又使得诸葛亮有别于纯粹的道家，从而显出一份难得的儒雅与达观。诸葛亮对诸子百家的吸收，是以儒学为基础，道家为主体，博采旁家的综合与统一。他变得更加深沉了、博大了，其外在形象也换成了一副道家的装束与打扮，直至出山后也不曾改变。

诸葛亮成熟了，可这颗艳艳的红果将由谁来摘取呢？明主在择贤，诸葛亮也在暗暗地比较、选择着：“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

诸葛亮诵着《梁父吟》，等待着天时，等待着明主。可是，在这悠闲的等待与选择背后，分明透着一种焦灼与渴盼。

他已成熟，若不摘取，一旦错过季节，只能委地为泥了。人生也有涯，他不可能像姜太公那样等到胡子白了才在渭水河畔以一条垂钓的直钩来求得武王的垂青与重用。可是，他环顾四周，眺望中原，将目光投向辽阔的整个中国大地，似乎没有发现一个真正的“明主”：刘表“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且目光短浅，自然不足与谋；曹操打败袁术，击杀吕布，消灭袁绍，雄心勃勃，力量雄厚，可他奸恶狡诈，挟天子

以令诸侯，以诸葛亮之高风亮节，自然不愿与之同流。孙权任用贤能，称霸一方，且兄长诸葛瑾也在那里为官，但他偏安江东，无帝王气候，难成霸业；此外，还有占据益州的刘璋，占据凉州的马腾、韩遂等，他们虽有较大地盘，但缺乏王者之才，内部矛盾重重，力量颇为弱小……

当时，诸葛亮肯定也知道刘备是个何等样的角色，可他自己连屁股大的一块地盘都没有，正依附刘表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也就根本不可能被诸葛亮目为可以栖身、依附的大树。

然而，令诸葛亮没有想到的是，刘备却找到隆中，上他的门拜访来了。

刘备以所谓皇叔的正统身分，常常做一些恢复大汉江山、坐上皇帝宝座的美梦。你可以将此称为志向远大，也可视为野心勃勃，就看从哪个角度去理解去看待了。刘备的野心渐渐引起了刘表的怀疑，就想设计将他杀害。刘备机警，发现后得以逃脱。于是，刘表处是呆不下去了，就想独自干一番大事。成大事者必有奇才相辅，经许多名士介绍，刘备终于认准了诸葛亮这条卧龙，以为得诸葛者即可得天下。于是，就有了我们所熟知的“三顾茅庐”的故事。

刘备聘请诸葛亮，只不过是他的的一厢情愿，如果诸葛亮不买账、不认同，不说三请，就是三十请、三百请他也不会出山的。

可是，诸葛亮终于出山了。

难道他的十年修炼就真的只为刘备一人？非也！

此前，刘备不识诸葛，可诸葛早就知道他有几斤几两了。刘备除有一个皇叔的头衔与为人忠厚信义之外，并无经天纬地之才，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武功，根本配不上“枭雄”二字。拿他与当时突出的曹操、孙权相比，充其量只能算得上是个二流角色。而诸葛亮之所以愿意随同刘备出山，一是其诚心所至，

二为情势所迫，三者刘备也有几分王者气候，可以成就一番霸业。

曹操平定北方乌桓后，即将挥师南下直指荆州。不说刘表不是曹操对手，就是孙权，恐怕也得望风而降。如此一来，中原天下，将尽入奸雄彀中。一旦局势平定，任凭是谁，也就再无回天之力了。此时若再不出山阻遏曹操，恐怕终其一生，也就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只能一辈子怀才不遇而老死隆中了。这当然跟他的意愿与志向悖逆。如果刘备不来相请，他恐怕也会自我出山寻找别的出路。

可是，刘备带着他的结义兄弟，带着一片至诚之心来了，一请不在，又来二请。情势急迫，看来只得降格以求了，况且刘备也算是一个可辅之人。如果刘备诚心第三次再来相请，他就准备跟着一同出山了。见了面，总得有点什么让人心服的东西才是。于是，就根据这些年静观全局的心得与刘备军事集团的特点和当时所占据的地位，一番思索，草拟了一份政治、军事对策，这就是有名的《隆中对》。

果不其然，刘备又来第三次相请。即便此时，诸葛亮还要考验他一番，故作冷漠高深之态，再三推托。没想到诸葛亮越拿架子，刘备就越是谦恭。在刘备的多次恳请之下，诸葛亮这才仿佛于不经意间畅谈天下大势，也就是他早已准备好了的《隆中对》。刘备一听，茅塞顿开，当下即拜请他出山。诸葛亮还想推托，刘备黔驴技穷，只得使出最后一招厉害的“杀手锏”，当即放声大哭，一边抹泪一边说道：“先生此时还不出山，老百姓可怎么办啊？！”不说别的，即从年龄而言，刘备要大诸葛亮整整二十岁，一位四十七岁的中年人对着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能做到如此诚心诚意，何复他求？这回，诸葛亮真的感动了，二话不说，就答应他出山相助。

五

诸葛亮依依不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隐居十年的隆中。临走时，他嘱咐弟弟诸葛均看管好茅舍田产，说他还会回来的。什么时候回来，为什么要回来？回来干什么？当时，诸葛亮的心境一定相当复杂，面对未来与人生想了很多很多。

在此，我无法将他当时内心真实而复杂的想法一一复原呈现在读者面前，只能陈述一件无可更改的事实，那就是自诸葛亮跟随刘备离开隆中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也有史书记载，诸葛亮归附刘备，是“亮诣备”，属毛遂自荐，并非三顾茅庐的结果。如《蜀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中载：“刘备屯于樊城。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

以上作为一种异说（《九州春秋》亦有此说）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我仍相信是刘备亲到隆中相请，才有诸葛亮的出山。他曾在《出师表》中白纸黑字地写道：“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只要是人才，其“出山”的形式并不重要，“毛遂自荐”表明人才自我的信心与勇气，“三顾茅庐”说明伯乐的明鉴与赤诚。如属自荐，诸葛亮没有必要在文中掩盖事实真相；再则，他出山时的不少见证人与闻说者还在，其他姑且不论，且拿堂堂丞相来说，如果曲意做假，其威信何在？

在此，我们所看重的不是形式，而是“出山”这一事实本身。诸葛亮曾在隆中隐居十年，现在已经出山了。他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执羽扇，潇洒自信，游刃有余，指挥若定，其形象哪有半点尘世之味？活脱脱一位自天外飘然而至、无所不能的

神仙！

是的，他来自幽静林深的隆中，自与那俗不可耐之人有着天壤之别。隆中不仅塑造了他的外在形象，也造就了他的内在风骨。自出山后，他虽然一次都没回过隆中，却是“众里寻它千百度”，多少次依稀梦里回到它的怀中。那无所不在的隆中意识，更是深入他的骨髓，弥漫着他的身心，终其一生，也不曾有过半点改变。

诸葛亮出山后，在新野小试牛刀，尔后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大破曹军、借取荆州、智取汉中、奠定蜀国、七擒孟获、六出祁山……以二十七个短暂春秋，干出了多少惊天动地的伟业，真可谓酣畅淋漓、回肠荡气也！

然而，这一切，都与他的“隆中意识”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我们先以“诸葛七星坛祭风”为例来看他的“多智而近妖”的妖气。

赤壁大战在即，可万事齐备，还欠东风。没有东风，大事难成。在此功亏一篑之际，诸葛亮成竹在胸，筑坛祭风。他按四方八位、二十八宿、六十四卦，立下“七星坛”，然后沐浴斋戒，跣足披发、焚香注水、念咒作法、呼风唤雨……乍一看，这哪里还像一个军师，分明就是一个装神弄鬼的巫师。可一旦透过罩在其上的迷雾，我们就能发现不少隐秘。

火烧曹营的东南风自然不是诸葛亮念咒作法换来的，可他博采诸学，不仅具有天文、星相、气候的理论知识，而且长期生活在江汉之间，有着丰富的实际经验，他完全可以根据季节、天相预测到气候及风向的变化。所谓唤风，不如说是诸葛亮早已预知那东南风来临的时间与级数，巧妙地加以利用而已。可他为什么要玩一套神秘的把戏呢？一是为了脱身，当时他置身东

吴，已招致周瑜忌恨。为了脱身，他故意要求东吴士兵守坛摆脱其他人的监视，再为士兵定了一些清规戒律，不许走动、交头接耳等。当风一起，他就从容走下祭坛，没有任何阻拦地直奔夏口而去；二是为刘备争功；三是利用神秘高玄的东西树立自己的威望。他故意渲染借风这一事件，没有风，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曹军一到，唯有束手就擒而已。风终于来了，却是他唤来的。没有他的本事，没有刘备派他前来相助，一切都将付诸流水。因此，东南风一来，周瑜大为惊骇，其他人也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后世的子孙更是将他奉为无所不能的神明。

这就是诸葛亮的“妖气”，其妖不妖。罗贯中以如此夸张、怪诞的手笔描写诸葛亮，我以为是深得其神韵的。诸葛亮深受道学影响，其中除了道家的成分，还有道教的意味。什么呼风唤雨、飞沙走石、撒豆成兵、奇门遁甲、斋醮符咒……全是道教信徒们所惯用的手法。诸葛亮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偶尔用之，何足为奇？

赤壁大战之后，诸葛亮就开始着手实施自己在隆中为刘备制定的三分天下的蓝图：“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

就今天来看，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制定的战略决策，的确达到了人力所能尽之的程度。刘备要想谋取霸业，首先得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大本营。可这有利的地盘上哪儿去取呢？曹操拥兵百万，不可与之争锋；孙权已历三世，国险民附，只能为援而不可图；还剩荆、益、凉、雍四州，而凉、雍偏远，作为势单力薄的刘备，自然无法远途跋涉、千里袭取。于是，唯有荆、益二州可取了。

欲图荆、益二州，说说容易，要真正得到手，也难得很啊！自公元207年《隆中对》问世，到公元214年刘备占据成都，就

用了八年的时间。事实上，荆州是借来的，益州也只能说是骗来的。《隆中对》中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是达到了，可借来的荆州却为此后吴、蜀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化，为诸葛亮战略目标的实施埋下了严重的祸根。

占据荆、益二州后，便进入了战略计划的第二阶段：内修政理，外联孙权，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一旦天下有变，即兵分二路夹击曹魏，一统天下。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诸葛亮殚精竭虑，却未能如愿以偿。

内修政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诸葛亮都做得很好。问题就出在刘备的高层核心人物关羽身上。他与孙权交恶，将诸葛亮费尽心力好不容易“借”来的荆州弄丢了。丢就丢了，这也罢了，可作为最高领袖人物的刘备却头脑发昏，完全置《隆中对》中的决策而不顾，举全蜀国之兵与东吴开战。结果折兵损将，惨败而归，耗尽了蜀国的人力物力。

司马徽在向刘备举荐诸葛亮后会仰天大笑曰：“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由上观之，诸葛不仅不得其时，也不得其主。刘备只要稍稍冷静一点，英明一些，又何至于将个人恩怨置于国家大业之上？

与东吴之战，是蜀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自此，它变得羸弱疲惫，气数渐尽，只能苟延残喘，屈指计算自己的灭亡之日了。

而这时的诸葛亮，以一单薄之躯，仍在作着实现隆中决策的努力。荆州一失，二路夹击曹魏的计划变成泡影。二路不成，只能自蜀地一路进击中原了。其时，三国之中，蜀国最为虚弱，其兵力、物力远远不及曹魏，连固守保命都要看日子，可诸葛亮却还在一而再、再而三地倾力北伐中原。他的这一做法，被不少后人视为以攻为守的明智之策。我以为并非如此，若守

蜀地，凭借山河之险，以诸葛亮之智之威，完全可以举重若轻。可每一次征伐，带给蜀国的却是在负重的赢牛背上再加两倍、三倍的重荷，直至耗尽精力，趴在地下为止。

作为智慧化身的诸葛亮不能不知道他这样做所带来的实际恶果，可他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手持长矛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只不过诸葛亮手中握持的是一把轻飘飘而又沉甸甸的羽毛扇而已。

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冲刺，虽然没有达到一统天下的目的，但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人格却吸引、震撼、感动了一代又一代后人。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如果将事业的成功作为价值实现的客观标准，诸葛亮也许只能算是一个失败者，可他在《三国演义》里却实现了在封建社会里由传统价值观念所限制的一个人可能达到的并为当时社会所接受的最高人生价值。

史载诸葛亮死了一百多年之后，桓温带兵征蜀，遇见了武侯时的一个小吏，“年百余岁，温问曰：‘诸葛丞相今谁与比？’答曰：‘诸葛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没后，不见其比。’”不觉其异，说明平易近人，不见其比，显示诸葛亮的魅力已超越时空。

是的，诸葛亮输给了曹魏，但他的人格力量、道德力量、智慧力量、意志力量赢得了后人的信服与崇拜。

成功也好，失败也罢，都与他的隐居隆中密不可分。他的“逆天而动”、不可为而为之是为了实现《隆中对》的战略决策；他受命托孤全力辅助阿斗是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他的生活俭朴、廉洁奉公、清心寡欲是隆中自给自足生活的一种延伸，更是为了实践他在隆中所形成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人生哲学；“诸葛一生惟谨慎”，不敢弄险，如果隆中山水奇崛巍

峨，恐怕他在治国用兵上也就能妙计迭出、以奇制胜了……

诸葛亮虽然走出了古隆中，但他终其一生，也未能走出“隆中意识”。他自从走出隆中后便一次也没回过隆中，可他却时时躺在隆中的怀抱里旧梦重温。他虽然听从着道德与意志的力量义无反顾地向前走着，却不时地回首眺望，目光越过重重关山最后落在隆中的上空难以离开……

这便是诸葛亮怎么也无法化解的与血肉交融一体的隆中情结隆中意识！

六

尽管历史无法假设，但我仍常常回溯时光向着三国那激荡的风云叩问：如果没有诸葛亮的出山，如果还晚出两年，如果他辅助的不是刘备而是刘表或曹操或孙权，那该是怎样的一番光景呢？

时势可以造就英雄，英雄无法创造时势。可英雄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却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虽然无法阻止、改变历史的向前发展，却能加速或延缓历史的进程。

遥想当时，曹操挥师南指，荆州已降，东吴一片恐慌，此时若没有诸葛亮的介入，没有他的联吴抗曹，刘备将死无葬身之地，东吴也会望风而降。中国归于曹操一统，也就没有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的局面发生了。若谓不信，即将诸葛亮从《三国志》或《三国演义》中抽出试试，一部三国历史，该怎么个发展怎么个写下去呀？没有诸葛亮的出山，不仅一段三国，就是整个中国的灿烂历史，恐怕也要因此而黯然失色许多。

然而，历史发生了就发生了，你可以从各种不同角度来观察它，解释它，演绎它，却怎么也不能重新改写那些已经发生的

基本事实。

诸葛亮也是如此。

他的出山是一件无法更改的事实。即使活在今天，他也仍要走出古隆中进入到喧嚣的历史中心来的。

这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传统，也是他们的莫大悲哀。

从古到今，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以儒家的出世为主、道家的隐世为辅。乾坤清朗，明主现世，他们就出山了，积极进取，博取功名，建立功业；一遇挫折，或遭贬谪，就退隐山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可一颗心，仍记挂着君王，仍在寻找时机，翘首以待。他们的退隐入山，大多是求得声名，待价而沽，积累更多的政治资本，为了更好地出山。

范仲淹曾在《岳阳楼记》中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态作了概括而准确的精彩描写：“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

为什么知识分子的脸上总是挂满忧愁无法开颜？关键在于他有忧国忧民之心，而封建统治太专制太残暴，老百姓太艰难太困苦了。作为渺小的知识分子来说，光是忧愁又能起多大作用呢？居庙堂之高，君王高兴了，就拿你当个工具使一使来用一用；不高兴了不耐烦了，就要将你关进牢狱，弄不好还要开刀问斩。即使到了这个份上，你还得脑袋碰地，将头磕得山响，一个劲地谢恩。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哪有半点人格尊严可言？而这一切，都是自己找来的，是自己作践自己，自己糟蹋自己。你一天到晚忧这个忧那个，谁又来买你的账呀？君王不买账自不必说，就是老百姓，看见你这副愁眉苦脸的酸腐迂夫子怪相，也要作践你几句，说你是书呆子，他们倒常能苦中求乐自得其乐达观开朗得很呢！

写到这里，我真的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感到深深的、深深的

悲哀。即便最优秀者如诸葛亮，也不能全然走出这一无形的巨大的怪圈。他虽然尽得道家之风韵，但儿时的儒学根底决定了他从小想着的就是当官，“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说他的同学只能当怎样怎样的官，而他却能当位极人臣的如管仲、乐毅那样的大官。所不同者，他想当的是大官与清官，是匡时救民的官。不管是当怎样的官，反正没能挣脱“官”的范畴。他的隐居隆中就是为了当官，因此，其出山是怎么也无法避免的，就看他投靠谁依附谁了。他终于遇到了刘备，有一种如鱼得水之感，对刘备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但刘备并不怎么把他当回事。明明在隆中谈得好好的对策说得好好的价码，可刘备就是要破坏，硬要跟东吴打一场恶仗，根本不把他这个丞相放在眼里。惨败而归，忧愤交加，快要咽气了，这才想起诸葛亮的英明，这才想到要真正的用一用他，才来了个临终托孤。诸葛亮自然又是感激得不行，结果是一个怎么也扶不起的阿斗也不怎么把他当回事儿，兴之所至，可以一纸诏令，打乱他的战略部署，儿戏般地将他从前线召回。知识分子要干成一点事儿，也真够难的了。如果诸葛亮此时取而代之呢？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什么事情都可做得，就是这儒家的忠义纲常万万不能破坏！

于是，诸葛亮活到五十四岁这一坎上，就死在了北伐中原的任上。他不仅死得其所，也死得其时。二十七岁出山，为蜀国奔波了二十七个春秋撒手而去，两个二十七，多么富有趣味的神秘之数啊！

他谨慎了一生，勤勉了一生，奋斗了一生，驰骋了一生，可就是怎么也没有真正走出他所隐居的古隆中。不唯是他，在中国历史上，又有多少知识分子走出过这一无形的磁场这一巨大的怪圈了呢？

“学而优则仕”，读了书不做官去干什么呢？这好像是一件

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我将这一疑问放在古代,那么,不正常倒是我了。

我不想苛求他们。生于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社会本身就够可怜的了,还好意思对他们再加鞭挞吗?我只想说,是我脚下的这块土壤决定了一切。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人生的价值只有通过做官才能实现。当一个个憔悴而忧愁的身影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拥挤不堪时,我心中涌动的是一股莫名的悲哀,除了悲哀还是悲哀,唯有悲哀而已。

于是,我也就不难理解诸葛亮定格在我脑海里的那一苦涩的微笑了。

其中自有他的难言之隐,也有对后世一代代知识分子的无言警策或期待。

所幸的是,世界的价值正变得日益多元化起来,读书再也不是仅仅为了做官,人生价值的实现途径也越来越多了。整个世界,包括中国在内,正在静悄悄地发生着一场深刻的权力的转移——由做官到金钱而知识。

今日确实有着不少知识分子,已真正“走出古隆中”,超越了诸葛亮的隆中情结与隆中意识。他们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了,已潇洒地走向那新世纪的地平线,一抹艳艳的曙光正照射在他们身上。

这才是诸葛亮瞩目后世的期望所在,也正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

恍惚中,诸葛亮的形象又出现在我的眼前,他那留在嘴角的微笑渐渐地由苦涩变得灿烂起来。

天下第一楼

一

黄鹤楼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大得我们似乎只有仰视的份儿。就连唐代素有“诗仙”之称的李白登临此楼，也不得不将惯有的疏狂收敛几分。

想那李白是何等了不得的人物，他有如行云野鹤，每到一处名胜，总是兴味盎然，诗情勃发，大笔一挥，便有佳作问世，一问世就能穿越漫漫时空，来它个千古流传。像这样的诗作我们只要信手一拈，就可列出一大串，比如《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早发白帝城》、《独坐敬亭山》、《望天门山》等等都是。于心仪已久的黄鹤楼，李白更是蓄了一股英气、豪气与灵气，一旦喷发而出，很有可能又是一首新颖别致的千古绝唱。

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李白的仙气与才气。

此时，他就站在我的眼前，背剪双手，昂然挺立在黄鹤楼头。阵阵清爽潮润的江风拂面而来，吹动着他的衣襟，耳际的长发、腰际的飘带，还有上翘的胡须，都在这清风的吹拂中轻逸、空灵地舞动不已。同时律动着的，还有眼前的两根巨大飘带，一条是

长江,另一条则是汉水。李白觉得自己就是那舞带之人,左手握着奶黄色的长江,右手攥着碧绿色的汉水,将它们舞得烟雾缭绕、云蒸霞蔚。“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他真想将这气势磅礴的诗句用于长江。可是,既然已用它状写了黄河,哪能自己抄袭自己呢?得有更为新颖奇特、卓然超绝的创作与描摹才是。正这么想着,他闻到了一股奇异的芳香,这是隔江吹来的对岸鹦鹉洲上那些绿树、青草、野花的芬芳,李白贪婪地吮吸着,恨不得将它们全都吸入心脾。高山楼阁,花香云烟,清风吹送,一时间,他仿佛置身于蓬莱仙境,陶醉得无以复加。突然地,就有新奇的灵感自天边飞来了,犹如一道耀眼的闪电划过脑海的长空,照亮了心灵的宇宙。顿时,李白兴致勃发,诗情盎然。于是,将一杯斟得满满的好酒端在手中,仰脖一饮而尽,然后摇摇晃晃地走向迎门的粉墙。童子自然知晓主人的心思,赶紧端着一盘早就磨得浓浓的墨汁跟了过来。只见李白握一管大号毛笔,慢慢伸向砚台,饱蘸,抬头,举笔,正待挥洒,却突然像中了魔似的呆在原地……

他怔怔地望着楼壁,停在空中的毛笔半天也没有落下。

如岩浆般在胸中涌动的诗情正待喷射,突然间被一个无形的盖子给严严实实地罩住了。于是,我们便听得李白一声长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有诗在上头。”说着,不由得将蘸满墨汁的毛笔静悄悄地放下,于心悦诚服中免不了带着几分黯然神伤。

原来,这“盖子”并非什么天外之物,而是一首用小楷字体题在楼壁上的七言律诗: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诗的作者名崔颢，唐代诗人，具体出生年月不详，死于公元754年。而李白则比他多活了八年，由此可以想见，他们不仅同属于唐朝，还在同一时代生活过。崔颢中过进士，当过司寇员外郎，早期写流于浮艳的闺情诗，后游历边塞，受粗犷的边地风光之陶冶与浸润，诗风由此而变得雄浑奔放起来，著有一本《崔颢集》。但真正流传于世的，也就这么一首《黄鹤楼》。

若拿崔颢与李白相比，如果说前者是一颗闪光的星辰，那么后者足可称得上是一轮炫目的太阳了。

李白的诗作雄奇浪漫，狂放不羁，这种风格不仅贯注于他的创作，也表现在他的生活之中。意气风发之时，他将皇帝老子也不放在眼里，至于要高力士为他脱靴磨墨，那就更不在话下。就是这样的一个李白，却为崔颢的一首《黄鹤楼》折服了。

李白没有因为自己的赫赫声名而对崔颢流露半点鄙薄之情，也无丝毫文人相轻的嫉妒。他所看重的，便是题在楼上的诗作，它将自己登临黄鹤楼之所见、所想都状写、表达出来了。于是，李白不由得发自内心地由衷赞叹道：“好诗，真乃好诗也！”本想题诗的他将笔一搁后，又仰头注目，开始认真地欣赏起石壁上的《黄鹤楼》来。

好一幅惺惺相惜、文人相亲、融融泄泄的动人图景，真个羡煞人也！

李白搁笔，并非他无法用诗歌描写黄鹤楼的雄伟壮观，而是因为崔颢已先于他在石壁上题写了一首难以超越的《黄鹤楼》。他既不愿重复自己，也不想重复别人制造文字垃圾。李白搁笔，不仅无损于他的“诗仙”形象，反而增添了他的人格魅力，展示了一个真正诗人所具有的纯粹、真诚、自知、

坦荡的高贵品质。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写得好，不仅名扬四海，还可改变人生境遇。伟大的诗人，不仅是老百姓心中的偶像，就是皇帝官吏，也得敬着、让着几分。在一个长夜漫漫的专制国度里，正因为保有一份对于诗歌文化的崇奉以及诗人们的纯粹与真诚、浪漫与执著，这一承续的传统维持着一线难得的生机，中华民族才得以充满活力，千百年来在一次次颠踬后依然顽强地从地上爬起，挺直腰身。

《黄鹤楼》能深得李白服膺，也的确称得上是一首艺术魅力经久不衰的千古绝唱了。在形式上，它别树一格，前半两联略带散行，不太合律诗要求，且不避用词重复之嫌；在内容上，既写了黄鹤楼传说，也写了周围景致，还抒发了作者情感，可谓怀古咏今、情景交融。特别是那“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名句，不知惹出了多少后来者的扼腕浩叹与幽古情思。

崔颢的《黄鹤楼》一诗，使得黄鹤楼更加声名远扬。

这便是典型的文因楼生，楼以文显。

李白没在楼壁题诗，只不过感叹了一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没想到这也为黄鹤楼增光添彩，使得它声名更为卓著。后人为了强调、纪念李白搁笔这一传说，使它变得具体形象、可知可感，就在黄鹤楼旁修了一座“搁笔亭”。

黄鹤楼的名气，就是这样在绵绵不断的时间之河中由不断增加的传说与不断新修的附属建筑一点一滴地累积而成。

由此看来，所谓名气，说到底，便是一种历史与文化的沉淀。

二

黄鹤楼的名气大得我多少有点缩手缩脚，好几次想为它写点什么，都因为担心其描写不能准确到位而搁笔。

此次，它作为我要创作的系列文化散文《千秋家国梦》里的一个重要题材，我是不得不写了。

为了更好地捕捉、贴近、把握它内在的灵魂与气韵，我又一次来到了黄鹤楼。

一道高大的围墙已将黄鹤楼圈了个严严实实，以黄鹤楼为主体兴建的系列附属建筑，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风景群。于是，就有了今天的黄鹤楼公园。

要想走近黄鹤楼，必须越过森严的公园大门。

我一步一步地走近大门，向门房里的管理人员说明来意，并掏出了有关证件。然而，回答我的却是满脸的冷漠。

我只得掏出三十元人民币购买一张“入场券”。

于是就想，不知李白当时登楼买过“入场券”否？要是门票价格稍微高一点，作为一个有时吃饭都要看日子的穷诗人，恐怕就没有登临黄鹤楼的缘分与雅兴了。那么，在中国民间文学的瑰宝中，会不会遗憾地少却一个颇富意味的有趣传说呢？

然而，从李白当年潇洒登楼而言，可以看出他并未因门票有过半为难与不悦。由此可见，即使唐朝时兴门票制的话，恐怕也只是象征性的吧？

其实，黄鹤楼修复之初，门票只有一元，也是象征性的，不曾想只有几年时间，身价突然如此高贵起来。黄鹤楼兴建之初，本是一座平民化的楼阁，如今却越来越变成为一处贵族化的景点，这多少叫人有点难以接受。

于是，我的心中，又平添了一份惶恐。只要平易近人，不管名气多大，总可以接近与对话。可是，一旦变为养尊处优的贵族，那就只有敬而远之的份儿了。

而我不能对其远之，我越是走近它，越是贴近它，才能更好地把握它的内在精神。如能与其达到融为一体的程度，当是我所追求的一种美妙至境。

为了达到这种至境，我只有在心中仍将它视为一介草民。

我缓缓地向上爬着，脚步轻轻的。

我觉得自己不是在登楼，而是行走在一片茂密的森林中。周围静静的，静得可以听见落叶掉在地下的声响。我的脚下，便是一层厚厚的、枯黄的落叶。落叶实在是太厚太厚了，我走在上面，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柔软与舒适。最底下的落叶朽了，腐了，化为腐殖质被树根吸收，滋润、养育了一棵棵参天大树；秋天一到，绿叶老了，枯了，黄了，又飘落了……冬去春来，又有旧的落叶化为泥土，新的嫩叶在大树的枝头绽开……落叶与新绿，就这样生生不息地轮回不已。我无法知道脚下的落叶到底堆积了多少层，也看不见那底层的泥土。

这一层又一层的落叶，便是一代又一代文化的积淀；而泥土，则是文化的活力与源头。正是它们，滋润、养育了黄鹤楼这棵葳蕤雄奇的参天大树。

尽管落叶再厚，我也要将它们一层一层地掀开，探寻那泥土的本质之源……

其实，黄鹤楼初建之始，也只能算是一介“草民”。

浩浩长江之水自青藏高原奔泻而下，一路穿山越岭，汇纳百川，江面日渐宽阔。流到武汉，突然间就有两座高大的山岭给它来了个“下马威”，像铁钳般将它紧紧地夹束其中。这两座山

岭，一座是龟山，一座是蛇山。“龟蛇锁大江”，龟蛇要锁，长江要奔，相互间肯定免不了一番大的搏斗与僵持。结果是双方都作出了一定的让步与妥协，大江依然东去，两座山岭绵延着却将各自的‘手脚’伸向了江心，这也使得我们今日所见到的江山更为雄浑奇崛。

却说蛇山逶迤，延伸至江水之中，便形成了一座石矶，人们将它称之为“黄鹄矶”，又曰黄鹄山。矶头临水而立的那面石壁显得格外峻峭，就有不少人登高眺望，把酒临风。但见波涛汹涌，江鸥飞舞，白帆点点，彩云飘飘……此情此景，实在令人心旷神怡、赏心悦目不已。渐渐地，黄鹄矶就有了一点名气，大家都想目睹一下此地的优美风景。时间一长，游人就多了起来，络绎不绝、熙来攘往的，把个孤立江中的矶头，弄得煞是热闹。

于是，就经常听得有人言道：“要是在黄鹄矶上修一座楼阁就好啦，既可登高远眺，又可供游人歇息，呷酒品茗，观赏风景，此乐何极？”

想的人多了，说的人多了，大有呼之欲出之势。

在此情势之下，一座小小的楼阁也就不得不应运而生了。

草创的黄鹤楼阁肯定相当简陋，不管怎么说，毕竟有了一座可遮日头、可避风雨的阁楼，这就够了。

当然，这也是一座极端平民化的建筑，即使穷人，也能泰然步入，掏出一串铜钱，开怀地喝上几杯；哪怕乞丐，也可不必交纳门票，自由步入，虽无钱沽酒，也能吹吹清风、看看景致，将人生的苦恼与忧愁暂时抛却脑后。

这是一座多么可亲可爱的楼阁啊，它给苦难深重的平民百姓该是带来了多少难以言说的喜悦与欢乐啊！

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富想象的民族，每一风景名胜，总免不了流传着一些优美动人的神话与传说。令人如沐春风、亲切温

暖的黄鹤楼,更是有着许许多多百姓大众的参与创造,这便衍生出了多种版本的神话与传说。

从古到今,世间只有白鹤、灰鹤、丹顶鹤,根本就没有什么黄鹤出现过。既如此,为何要将它名为黄鹤楼呢?

人们凭着丰富的想象,搬出了传统文化中的道与仙来加以诠释。

故事自然是相当的精彩动人,在此,我只能抽取其梗概,简略地叙述而已。

第一种说法是,古代有个神仙,名叫王子安,他曾驾着一只黄鹤在天空飞翔,突然间朝下一望,就见到了龟蛇锁大江的如画风景,不觉自天而降,落在蛇山伸向江心的石矶上,着实欣赏了一番。后人便在他小憩过的地方修了一座楼,取名黄鹤楼。

第二种说法也离不了黄鹤。说的是江夏人费祎看中黄鹄矶,便在此修道。成仙后,常乘一只黄鹤重游故地。后人见了,在此专门造了一座招徕黄鹤的阁楼,其名自然就叫黄鹤楼了。

还有第三种传说。

有个姓辛的寡妇,含辛茹苦地抚养着几个孩子,为了谋生,就变卖家什,东借西凑地在人来人往的黄鹄矶头开了一家酒店。酒店开张,生意颇为红火,辛氏尝到了赚钱的滋味,整日价喜笑颜开。一日,店里突然进来一个瘦骨嶙峋、衣衫褴褛的老道向她讨酒喝,辛氏没有拒绝。没想到此后他天天来店喝酒,却分文不付地扬长而去。辛氏心里自然不悦,但想到自己往日的贫困处境,将心比心,也就忍了,总是笑脸相迎,半点不提酒钱的事儿。一月后,老道来此向辛氏告辞:“贫道明日就要远游,承蒙关照款待,无以为谢,送你一只黄鹤吧。”说着,就在迎门的粉墙上画了一只黄鹤,然后变作一缕轻烟飘然而逝。辛氏掉头不见老道,便知自己遇上了仙人。再看老道画的那只栩栩

如生的黄鹤，不觉拍手相招，黄鹤竟从墙上跳了下来，悠然长鸣，翩翩起舞，为客助兴。有了这只黄鹤，辛氏酒店的生意更加兴隆了，真的是不尽财源滚滚来。时间一长，辛氏大富大贵，就忘了穷人的本质，不仅穿金戴银大肆铺张，心肠也变得歹毒起来，根本不把穷人放在眼里，对他们常常吆三喝四，破口大骂。忽一日，那位神秘的老道又来了，他招一招手，唤下黄鹤，跨腿骑上，说道：“此地不宜久留，咱们还是走吧。”话音刚落，黄鹤展开双翅，一声长啸，直冲云霄，眨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辛氏见状，突然醒悟，决心痛改前非，重做一个善良的好人。于是，她拿出这些年来积攒的所有家产，在黄鹤矶上修了一座高楼供人登临观景。为了纪念那位老道与黄鹤，她请人写了一块匾额挂在门楼上，上书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黄鹤楼”。

后一传说没有前两种纯粹，掺和了不少道德与训诫的色彩。这，恐怕与黄鹤楼的不断发展及越来越尊贵不无关系，我们今日仍能深深地感到当时创造这一传说的普通民众内心自然流露而出的一股潜在的不满。

无论哪种传说，结局都是一样的，那就是黄鹤已杳然飘走。“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诗句道尽了人们登临黄鹤楼仰望苍穹时心中涌起的失落、怀念、旷远、寂寥与怆然等多重复杂情愫——一种千百年来凝聚而成的“黄鹤情结”。这，也许就是崔颢的《黄鹤楼》能引起广泛共鸣，其艺术魅力经久不衰的原因之所在吧？！

神话与传说固然优美动人，如果我们透过其神秘的面纱加以考证，其实黄鹤楼的名称由来简洁而明了：黄鹤楼因建在黄鹤山上，鹤是天鹅，又名鸿鹄，与鹤本不是同一种鸟，但古字“鹄”与“鹤”可以通用，《湖北通志》上曾明确地记载过黄鹤山又名黄鹤山。黄鹤矶以其形状颜色酷似黄色天鹅而得名，黄鹤楼

又因建于黄鹤矶上而著称。于是，以鹄称山、以鹤称楼，也就相沿成习了。

三

大抵民间之物也好，民间传说也罢，只有得到官方的认可，才可形诸文字，载入史册。否则，就只算得上“野狐禅”。当然，一旦纳入官方的所谓正统轨道，其味道与意义也就变得面目全非了。

黄鹤楼进入帝王将相的视野，明文载入史册，最早当数三国时期。据《三国志·孙权传》记载：“（黄武）二年春正月，曹真分军据江陵中洲。是月，城江夏山。”江夏山即黄鹤山。唐《元和郡县志》又载：“吴黄武二年城江夏山，以安屯戍地也。城西临大江，西南角因矶名楼，为黄鹤楼。”也就是说，黄鹤楼始建于三国孙吴黄武二年，即公元223年，建楼目的不为别的，主要出于军事上的需要。

当时，吕蒙用计杀了关羽，刘备亲率十几万大军东下报仇。孙权半点不敢懈怠，准备与刘备打一场大仗、恶仗，便在长江边上依据黄鹤山之险，修了一座周长约三里的坚固城池作屯军营垒，又在黄鹤矶头建一高楼以作观察瞭望之用。

这高楼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堞借阻，高观枕流，即是日后闻名遐迩的黄鹤楼了。

也只有这次，经了东吴的大力修建，黄鹤楼才称得上是一座真正的楼阁。昔日民间所筑，与之相比，不过是一件“小儿科”罢了。

也只有这时，黄鹤楼才弄了个“出生证”，得到了真正的承认，确立了自己名正言顺的身份。即使从三国算起，黄鹤楼也

有一千七百多年的悠久历史了。

将黄鹤楼的出生定于军事上的考虑与需要而载入史册，这似乎预示了它日后所面临的多舛命运。

此后的黄鹤楼，也的确与战争、烈火、雷电、灾难等不祥之物结下了不解之缘。

东吴所建之黄鹤楼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今已见不到半点文字与图画之类的说明与记载，后人只能根据它的性质——一座军事岗楼而去想象它的形状与气势了。

晋灭东吴，三国归于一统，黄鹤楼的军事价值便逐渐消失，又恢复、回归了它的本真，变为登临游冶的胜地。然而，它就像一个历经沧桑的妇人，虽然变得更加成熟而丰盈，却失去了少女时代的质朴与纯粹。黄鹤楼一旦纳入官方的范畴，民间的成分就少了，此地成了达官贵人和文人骚客们‘游必于是，宴必于是’的地方。如果仅有官吏的身影，黄鹤楼将不知变得酸腐、俗气到什么程度。幸而有了文人们的参与介入，黄鹤楼这才保有了昔日那份独有的灵气、纯真与美好，并为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珍贵的文化史料。

于是，唐朝的黄鹤楼之形状，就有一份难得的文字资料呈现在我们眼前，使之变得可感可知了。唐人阎伯瑾在《黄鹤楼记》一文中描写黄鹤楼道：“耸构巍峨，高标嵒岈，上依河汉，下临江流；重檐翼舒，四闼霞敞，坐窥井邑，俯拍云烟，亦荆吴形胜之最也……”

历史无情，那些游冶黄鹤楼的达官显贵早被岁月的风雨冲刷得一干二净，变成一条曝光的胶卷。然而，历史又是如此多情，那些登临过黄鹤楼的真正文人、伟大诗人，他们的形象总是一个个鲜活如浮雕般地凸显在我们眼前。

有唐一代，就我们所知登过此楼的著名诗人，除崔颢、李白

外,还有宋之问、孟浩然、王维、白居易、刘禹锡、贾岛、杜牧、罗隐等,且都留下过意境优美、脍炙人口的诗作。

其实,李白的搁笔也算不得十分彻底,只不过并未像崔颢那样正面描写黄鹤楼而已。一种‘黄鹤情结’郁积在他的心中,不吐不快。于是,就换了个角度从侧面状写。他自然不会在黄鹤楼迎门的粉墙上题写,而是铺开大幅宣纸潇洒挥毫。写一首还不尽兴,索性让那曾经压抑过的才思如瀑布般尽情倾泻。他无遮无拦地一气写来,仅《全唐诗》就收了八首,且都算得上是些名篇佳作。在此我们不妨抄录两首为证: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

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搁笔楼修了,诗也写了,物质的、精神的全都有了。李白游了一趟黄鹤楼,风流简直让他一个人给占全了。

四

黄鹤楼那层层凌空的翘角悬挂着的风铃在不断吹送的长风中丁当作响,一如袅袅的钟磬清脆悠长。这铃声响在游人心

处，让他们着实感到了一股生命的愉悦与欢畅。

可是，历史总要不时地将它残酷的一面呈现给人类，人们往往还来不及啜饮生命的甘浆，就会遭受战争的强暴与凌虐，将幸福的梦境碾得粉碎。

盛唐在“安史之乱”的打击下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很快就降下了它那厚重的历史帷幕，“耸构巍峨”的黄鹤楼也随着唐朝的灰飞烟灭走完了它的又一次生命旅程。

武汉扼长江、汉水，控荆带楚，交通便捷，为九省通衢之地，占尽天时地利，每每可得风气之先，昂然走在文明的前列。也正因为地势优越，每次战争，也免不了要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坐落在地望险要的黄鹄矶上的黄鹤楼，在战乱中自然也就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相互争夺的重要目标，常常经受战火的灭顶之灾。

然而，每次毁灭之后，伴随着新时代的诞生，黄鹤楼犹如野火烧不尽的青草，春风一吹，就会焕发出更为蓬勃的盎然生机，又在原址上耸起一座新的高楼，且一次比一次更为壮观。

由黄鹤楼的兴衰，也可窥见一个民族顽强不屈的创造活力。

黄鹤楼随唐朝灭亡而消失，又随宋朝的建立拔地而起，兴起了一座气势更加巍然的宋式黄鹤楼。

宋朝黄鹤楼，不仅有了文字记载，更有了形象可感的图画。我们可以从留存至今的两幅宋画《长江万里图卷》和《黄鹤楼》中窥见其形制。除主楼外，还修有配亭、游人循曲栏；主楼雄峙于矶头城垣的高台之上，与下面的台、轩、廊组成了一组完整的建筑群体。与仅有主楼的唐代黄鹤楼相比，宋朝的建筑艺术实在是大大地跨进了一步。

按过去一般说法，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饱受异

族欺凌之苦。黄鹤楼也未能幸免，在南宋中期一度被毁，半个多世纪后才得以重建。

元朝的黄鹤楼形制也保留在两幅画中，一为《武昌货墨》，一为《黄鹤楼图》，画中的黄鹤楼已成一组围墙合抱的建筑群落，主楼斗拱重檐，分为两层。

此后，明清两朝对黄鹤楼的重建活动较多，具体统计数字为明代四次，清朝五次。明朝的黄鹤楼风格隽秀，外形“下隆上锐”，其状如笋，塔式楼阁，高为三层。明朝有件值得一提的大事，那就是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将蛇山对岸的整块地盘一分为二，变为汉口与汉阳，构成了今日武汉三镇之格局。游人站在高达三层的明式黄鹤楼上，但见长江与汉水在此相汇，两水相激，波涛更为汹涌，江面更加宽阔，风景更为壮观，感受也就变得更为丰富了。

清朝对黄鹤楼的修建可谓达到了古代顶峰，建筑格局大大有别于宋、元、明朝，风格奇特。据《武昌府志·图考》，康熙黄鹤楼已为四层、八角，建筑群体变成了单体，歇山顶变成了攒尖顶。同治年间，更是大兴土木，动用一千多名工匠，耗费三万多两白银，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建成的黄鹤楼高达三十米，全楼计有四十八根柱头，七十二条屋脊，三百六十架斗拱，三层飞檐和楼顶面均为黄色琉璃瓦。这，也是清朝建造的最后一座黄鹤楼了。

纵观古代黄鹤楼的兴衰变迁，我们发现，每一朝代，都有它独特的风格，大抵唐宋雄浑古朴，元楼堂皇富丽，明楼隽秀清雅，清楼奇特瑰伟。又因武汉占据地理之便，黄鹤楼以一种博大的胸怀，迎接着八面来风，它吸取了亭、楼、塔、阁等不同建筑形式的造型特点，将它们融于一炉，凝成了自己独有的建筑风格与文化品位。同时，我们还见到，当它遭受劫难之后，总是越

建越高，越建越雄伟，越建越多姿，每次都要超过以前的规模。

黄鹤楼，就那么昂然迎着拍岸的惊涛站立黄鹄矶头，生生灭灭，不息不止，它本身所经历的风雨磨难不仅构成一部社会兴衰、朝代更替的历史，而且还是一部独特的建筑史，一部丰厚的文化史。

在楼衰楼兴的漫漫历史时空，我们见得最多的，活动最为频繁的，还是那些仁人志士、迁客骚人的身影。

旧一代的文人走出了我们的视野，新一代的墨客又风尘仆仆地赶来了。他们登临此楼，凭江临风，或歌吟胜景，指点江山，或洒泪长啸，排遣愁怀，或拍栏而惊，忧国忧民。

这一长串接踵而来的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中，唐朝以后，我们熟悉的即有苏轼、苏辙、岳飞、陆游、范成大、张居正、方孝孺、毕沅、姚鼐、袁枚、赵翼、黄遵宪……

在文人骚客眼里，黄鹤楼的形式与建构倒在其次，他们所看重的，是黄鹤楼的灵魂。黄鹤楼建筑，只不过是他们抒发胸臆的外在依托与触发点罢了。他们不管黄鹤楼建得如何，不问其多高多大，哪怕就是毁了只剩下一片瓦砾、一堆废墟，他们也会来的。来了就要咏物言志，吟诗抒怀。“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我以为，文人骚客的“骚劲”，就表现在这份令人感佩的难得的天真与执著之上。

其中最值得一书的，还是文武双全的南宋爱国名将岳飞，他留下一首《登黄鹤楼有感，调寄满江红》，慷慨激昂，堪称绝妙佳作：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
兵安在？膏锋镞；民安在？填沟壑。

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去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作此词时的岳飞正屯兵鄂州，治军之暇，他也来到了黄鹤楼。登楼眺远，北望中原，满目疮痍，何日才能收回故国版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睹物生情，热血沸腾，不禁仰天长啸，字字句句，令人回肠荡气。可惜的是，他终于没能“一鞭直渡清河洛”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含冤而逝，也就无法“再续汉阳游，骑黄鹤”了，从而留下一个常令后人扼腕长叹的天大遗憾。

此篇《登黄鹤楼有感》，足以与他另一首著名的《满江红》（即“怒发冲冠……”）相媲美，构成了岳飞词作中的一双白璧。

莫说蔚为大观的唐诗宋词了，仅明清两代，流传下来的有关黄鹤楼诗文就多达五百多首。加上那不计其数的楹联、匾额、碑刻、书法、绘画等作品，黄鹤楼千百年来积淀而成的历史文化实实在在地构成了一座令人仰视的高大山峰。

五

岁月的风铃丁当作响，它固执地不停地响着，穿过漫漫历史长空，千百年来保持着一以贯之的风格，既冷漠又热情、既淡然又执著、既悠然又迫切地响着、响着……

它不紧不慢地响着，一转瞬，就到了公元1927年，黄鹤楼那饱经沧桑的历史长卷上又记下了它新的一页。

这年春天，一个三十多岁的瘦高个年轻人出现在黄鹤楼上，他就是日后主宰中国命运长达二十七年之久的湖南人毛泽东。当时，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正静悄悄地酝酿、发生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北洋军阀、国民党、共产党在进行着一场决定性的较

量。这三种力量中，最为弱小的共产党人不得不与国民党结成联盟。1927年3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武汉举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于是，对农民问题最具研究与发言权的毛泽东从湖南匆匆来到武汉，主持了农讲所的实际工作。

来汉之前，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以此为转折点，毛泽东抓住了中国革命的症结之所在，只要把握好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问题，其他一切，皆可迎刃而解。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这最终夺取胜利的革命思想。他来武汉，就是为了将自己的思想理论付诸实践。

毛泽东站在黄鹤楼上，眺望四周，觉得自己正站在中国跳动的心脏之上。京汉铁路穿越南北，滚滚长江流贯东西，两根纵横的长线在此构成一个巨大的坐标，而黄鹤楼，不正是这一坐标的中心点吗？

天旷地远，黄鹤杳然，烟雨茫茫……面对无限江山的毛泽东，一时间肯定想了很多很多。我们且看他当时慨然写下的一首《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虽然中国的革命运动正处于低潮阶段，但他的内心，却涌动着一股沛然莫能之抑的澎湃激情。此刻，尽管他没有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一位英明领袖与革命舵手，但对未来却充满了必胜的信心。那种‘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天斗，其乐无穷’的斗争激情和‘人定胜天’、藐视一切、战胜一切的磅礴气势，终其一生，从来就没有丧失过。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有气势的诗人只有两位，一位是李白，另一位就是毛泽东了。他那种囊括宇宙的浪漫诗情令我折服，他的每一首诗词我都可以倒背如流，并从中获得一份独特而难得的文学滋养。

然而，写诗是一回事，从事革命与建设又是另一回事。如果以一种狂放不羁的浪漫诗情在辽阔的中国版图上没有限制地挥洒，恐怕就会留下一些令后人难以理解的举止了。

当时毛泽东所登的黄鹤楼应有两座，一为护理湖广总督端方建于1904年的西洋黄鹤楼：平顶、钢筋结构、水泥抹面、圆拱形玻璃窗外带钟楼；一为湖广总督陈夔龙于1907年建在钟楼东北隅、近似黄鹤楼的“奥略楼”。清朝同治年间耗费巨资修造的那座黄鹤楼，已于五十多年前的光绪十年毁于一场大火。站在这强加于黄鹤矶头不伦不类的洋式、近似黄鹤楼上，了望对岸汉口被洋人占据的沿江大片租界，面对即将与之进行殊死搏斗的北洋军阀；而他所要发动的革命运动，其依靠对象却是中国大地上土得不能再土的农民。洋与土，形成了触目惊心的鲜明对照。那种对‘洋’的本能反感，此时恐怕已在毛泽东心中开始凸显。如果我们从发生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他日后所执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与此次的登临黄鹤楼，似乎有着一种相当重要的关联……

岁月如梭，二十九年的光阴眨眼间就从人世间溜走了。

一九五六年五月，毛泽东又来到武汉。此时，不管是西洋式黄鹤楼，还是近似传统黄鹤楼的“奥略楼”，都已不复存在。因修建长江大桥时，选定黄鹤矶为武昌桥头，上面的建筑已全部拆除了。无楼可登，毛泽东就畅游长江，并写下了一首《水调歌头·游泳》。

今非昔比，毛泽东这时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身体已然发胖。更为重要的是，他已被奉为全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其心境，已没有当年的焦虑、迷茫与促迫，而是“胜似闲庭信步”，但仍葆有气吞山河的浪漫与激昂。遥想1927年站在黄鹤楼这一坐标点时，心中总感到缺少了一些什么。少了什么呢？原来是一个“桥”字。只有建造一座大桥跨越长江天堑，京广线才没有停顿与间断，南北一线的气韵才得以通畅。另外，黄鹤矶上不伦不类的洋楼与不甚起眼的“奥略楼”，哪里还有昔日半点黄鹤楼的影子？典型的名不副实！应该耸立起一座真正的、高大的、传统风格的黄鹤楼取而代之才是！而现在，大桥桥墩已浮出水面，“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动人图景，马上就要变成现实。那么，应该着手考虑两个新的计划了，一是重建一座超越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的新型黄鹤楼；二是将长江拦腰截断，建造一座后无来者的三峡大坝。于是，他的眼前浮出了更新更美的远景：“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如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巫山神女见状，将会对我们作何观感呢？毛泽东以一个天才诗人的奇特想象继续写道：“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是啊，世界变化得太大太快了，就连神仙都跟不上趟了，不得不大为惊叹了，遑论渺小如蚂蚁的人类？

毛泽东想到做到，于是，在横渡万里长江之后，即向有关方面提出了重建黄鹤楼的设想。

1957年，毛泽东再次南下武汉，正式表态，并拨出专款，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黄鹤楼重建委员会。

得到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亲自拍板，黄鹤楼享受到了亘古未有的殊荣。

六

然而，由于自然灾害和政治动乱等缘由，重建黄鹤楼的计划曾两度搁浅。直到1975年，其设计方案才正式推出。

黄鹤楼的重建方案原有二十多个，其中为专家所推许、首肯的是宋式黄鹤楼方案。

若论中国古代建筑之峰巅，当数宋朝。宋代建筑，既保留了汉唐遗风，又没有明清的浮华与委琐。按宋式黄鹤楼方案，新楼因地制宜，依山造形，平面展开，尽得道家之风韵，与周围环境贴切地融为一体，透出一股难得的道骨仙风。

黄鹤楼之黄鹤，本来就是与道家中的神与仙紧密连在一起的。

中国的事情之所以复杂糟糕，其症结往往就在于长官的意志代表一切。在具有几千年历史传统的官本位阴影笼罩下，专家们算得了什么？专家的意见再好再科学，手中无权，也只得撒手兴叹。

于是，现在所建新黄鹤楼以清代黄鹤楼为蓝本，并采用了现代建筑材料与工艺。

旧址黄鹤矶已成桥头，新黄鹤楼建在哪里为好呢？

即使按照黄鹤楼越修越高的发展规律来看，临水且低矮的黄鹤矶也不太适合了。于是，就建在了后面高耸的蛇山之上。

新黄鹤楼于1981年破土动工，1985年主体工程竣工后开

始对外开放。

新建成的黄鹤楼共有五层，攒尖顶，层层飞檐，金色琉璃瓦覆盖。它高达 51.4 米，宽为 32 米，不仅地势高于以往，就其本身，也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座旧楼。主楼修成后，工程并未停止，此后又按公园的规划与模式开始建造系列附属建筑群，有配亭、轩廊、牌坊、浮雕等，如胜象宝塔、涌月台、太白堂、搁笔亭、南楼、北榭、石镜亭、抱膝亭、留云阁、辛氏酒店、江城别墅……这些园林建筑群直到 1990 年才大体完工，粗略一算，约有景点一百多处。与之相配的，还有楼堂亭阁内陈列着的壁画、楹联、匾额、书法等艺术作品以及山石、盆景、花卉等装饰之物。

自有史记载的早期三国黄鹤楼以来，经过一千七百多年的风雨兴衰，从一条约三里长的围城所圈着的一座高观枕流的军事岗楼，到今日以黄鹤楼为中心而形成的占地约十七公顷、圈得严严实实的黄鹤楼公园，黄鹤楼似乎在证实着马克思的一条重要思想辩证法：历史往往会出现惊人的相似，但它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一种螺旋式的向前发展。

今日黄鹤楼，离故址黄鹤矶数百米之远，它那高大的气势足可俯视、君临一切，似乎在与对岸曾有亚洲第一高塔之称的龟山电视塔一比高低。民谣曰：“武昌有个黄鹤楼，半头插在云里头。”可谓言之有据，言之有理矣。

今日之黄鹤楼，虽然舍弃了宋式黄鹤楼格局，但自有其难得的特点与优势。无论其高度体积、地势方位、构制形式、建筑工艺，还是名胜古迹、园林布局、陈列展览、绿化配置，均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座旧楼。它容纳百川、博采众长，集古今之大成，实为一座具有较高品位的文化名楼。

于是，今日之黄鹤楼，受到不少中外人士的赞誉，甚至有人将其比之于“黄山归来不看岳”而言为“黄鹤归来不登楼”。是

的,即使与同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岳阳楼、滕王阁相比,其建制、规模与气势也超出其上。称它为“天下第一楼”,半点也不为过。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黄鹤楼,作为一座沉淀了深厚传统历史文化内涵的千古名楼,对社会心理的作用与影响也是悠久、深远而多面的。

除正面的浸润而外,对其负面影响也不应忽略。

我记得民间还流传着这么一句民谣,那就是“黄鹤楼上看翻船”。只要稍作分析,一种袖手旁观、幸灾乐祸的变态心理不是溢于言表么?在黄鹤楼上看见江中船只的倾覆,若想下去救助,一时恐怕也来不及。即便如此,我们不能怀点同情之心么?不是可以想想此后免于翻船的法子么?可在一些人阴暗的心里,却延续着邪恶的因子;“看戏不怕台高”,恨不得能为江中翻船一饱眼福而庆幸欢呼才是;若是没有翻船,他们恐怕还得为自己白白地爬了一趟高楼而深感遗憾吧?

再看新建的黄鹤楼,从主楼到配亭、轩廊、牌坊等附属建筑,都是一片耀眼的黄色。为何全取黄色?这恐怕与黄鹤楼的“黄”字不无关联。可是,自然界自古以来本无黄鹤,干嘛非要弄上清一色的黄不可呢?再者,如果黄鹤楼只能是黄的,那么,白马寺就得全是白的,紫光塔全是紫的,金刚塔全是金的了……如此推来,其思维模式、建筑设计不是太简单,太“小儿科”了吗?即使如此,主楼用黄色即可,那些附属建筑群为何也要追求这种唯一的色彩呢?

这,既是“文革”单一的思维模式的结果,也受了黄色是皇权、高贵的象征等封建专制的潜意识影响。新黄鹤楼虽建于“文革”之后,但其设计方案却诞生在“文革”轰轰烈烈之时,且经过主席的点头恩准。打上“文革”时代的烙印,自是在所难

免了。

说到底，巍峨高耸、整体庞大、色调单一的黄鹤楼是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值得忧虑的是，不知它所形成的文化因子要影响到什么时候，也不知其潜在的作用深刻到什么程度。

我们无法苛求历史苛求前人，但应该有足够的勇气面对残缺，正视千百年来积累至今的沉甸甸的现实。指出黄鹤楼存在的负面因素，是抱了一种对未来负责的忧患与严肃，其意旨就是为了让此后登临、观赏黄鹤楼的人们保有一种清醒的认识。

好在真正的文化人士并不太着意于黄鹤楼的外在形式，我在前面曾写过，他们心中有着一种强烈的“黄鹤情结”，他们所看重的，是黄鹤楼的内在底蕴——心灵的、精神的黄鹤楼。黄鹤楼是一个特殊的符号，心中无物为有物，心中有物为无物，“黄鹤飞去且飞去，白云可留不可留”。物质的、外观的黄鹤楼之有无与形式，于他们来说，并非那么重要。

其实，今日黄鹤楼再高再大，只要站在楼顶，也就可以对它来一番整体超越了。让我们暂时忘却身下的黄鹤楼，作一番放眼远眺吧！但见龟蛇二山，夹江对峙；对岸晴川阁历历可见，晴川饭店遥遥相望；汉水长江，汇为一流，波涛滚滚，一泻千里；百舸争流，往来如梭；昔日翻船之惨，已成历史；大桥飞架，车流如织；五百年前的荒凉芦洲汉口，已是大厦林立，一派繁华……

由此看来，今日高耸的黄鹤楼实在是为游人提供了一个新的坐标系，它使得我们的视野更为开阔。于是，思想、胸怀也在这种开阔与迎面吹来的朗朗清风中得到了过滤与净化。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清代萨迎阿状写黄鹤楼的一条名联：

一楼萃三楚精神，云鹤俱空横笛在；
二水汇百川支派，古今无尽大江流。

鹤来鹤去，楼废楼兴，人事更迭，千年如斯。而我们所看重的，却是黄鹤楼千百年来凝成的精神气韵与文化精粹。这潜在而浓厚的“黄鹤情结”，将如长流的江水，如光耀之日月，永远流贯、映照在人们心头。

千古绝响

—

1997年7月,被誉为“古代世界第八奇迹”的曾侯乙编钟在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庆典音乐会上奏响了中华民族的世纪强音。选用代表中国青铜时代顶峰的铜器——曾侯乙编钟在这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时刻演出,那古朴粗犷、雄浑奇崛的千古绝响不仅洗去了国民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耻辱与创伤,也预示着中华民族面对新的世纪,必将复兴强盛,创造出一种无愧于新时代的灿烂与辉煌。

曾侯乙编钟作为战国时期的曾国君主曾侯乙的陪葬在地底深埋了两千四百多年,于1978年才重见天日。

与安阳殷墟甲骨文、西安秦兵马俑、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等中国重大考古成就相似,曾侯乙墓的发现与发掘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当年,在湖北随州城郊一个名叫擂鼓墩的小山包上,原武汉军区空军后勤雷达修理所在扩建营房、开山平地时,突然挖出一片与周围地面颜色迥异的褐土。不久,又在褐土层下挖出

了一块两米多长、一米见宽的长方形石板。该所副所长解德敏爱好考古,凭直觉,他意识到褐土层下可能埋有古墓。经多次向随县县委汇报,这才引起了有关领导与部门的高度重视。1978年3月,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队队长谭维四率队赶赴随州实地勘测,发现褐土层就是一个面积约二百二十平方米,比长沙马王堆汉墓大六倍的超级古墓。与此同时,考古队还发现部队施工钻出的炮眼离墓地顶层相距仅0.8米,如果没有解德敏的“考古意识”与认真保护,只要在这一炮眼里填满炸药,火光一闪,这座古墓及墓中埋藏的所有珍宝就有可能惨遭灭顶之灾。那么,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中国古代青铜文明,将会遭到无法弥补的损失,缺少一座巍峨挺拔的高峰。

曾侯乙墓中的文物之丰富,制作之精美,稀世之珍贵,保存之完好,为同期墓葬所罕见。该墓出土的文物总数多达15404件,按质地可分为青铜、漆木、铅锡、皮革、金、玉、竹、丝、麻、陶;按用途可分为乐器、礼器、兵器、车马器、生活用品、竹简等。除人们熟知的编钟外,还有许多文物也堪称国宝。如出土的铜盘尊,是目前所见到的纹饰最为复杂精美的商周青铜器,被列为全国青铜文物十大精品之一;墓中的五弦琴、十弦琴、竹笛、排箫等乐器,均属首次发现;绘有二十八宿青龙白虎的衣箱盖天文图,是目前为止发现最早的天文资料,说明二十八宿体系源于我国;各种器物的铭文字数多达12696个,为同期同类墓中铭文之最,有战国早期“辞典”之称;墓葬兵器4777件,为我国目前古墓出土兵器总量第一,其中的钺、双戈戟属首次出土……

曾侯乙墓文物的发掘,不仅为研究东周史、湖北地方史提供了新的实例与新的课题,而且对我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天文学、青铜铸造等古代科学技术的研究

及我国雕塑史、绘画史、工艺美术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还对我国的早期文字研究、汉字发展史具有重要的价值。二十年来，引起了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天文学、音乐、冶金铸造等学科的有关专家们的高度重视与潜心研究，成果斐然。

二

曾侯乙墓丰富的文物能够如此完好地保存于今，自然得益于当年的墓葬。否则，它们早就在两千多年绵绵不绝的天灾人祸中惨遭毁弃，于风云流转中不知所终了。

封建君王、贵族将生前喜爱之物深埋坟墓，准备死后继续享用。他们以坟墓为中介，幻想将生前与死后连为一体，线型发展，永远为主为官，寻欢作乐。他们极其渴望在死后的岁月能够拥有生前的一切，继续有人为他们服务、供他们驱使，万古不变。因此，他们生前广为搜罗，利用手中的权力尽可能地死后生活早作准备。不少封建帝王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耗用大量人力物力，为自己修筑坟墓，生前挥霍，死后享受，满足一己私欲。

殉葬与陪葬这一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专利’在我们今日看来，是历史发展的一种悖论。它残酷无情地斩断一个个活泼泼的生命之源，暴殄天物地将一件件稀世珍宝埋入地底，其专制残暴、惨无人道与聚敛财物、毁弃文明对当时的社会而言，无疑是一场沉重的灾难。然而，也正因了这种特殊的保存，才使得我们穿越历史的屏障，多少窥见、感知遥远的古代先民们所创造的文明。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墓葬都能够较为完整地为我们保存古

人的信息。丰富的墓葬本身就是一块无形的招牌与巨大的磁场，它吸引着当朝以至后代形形色色的人们为之绞尽脑汁、不择手段地攫取。盗墓、挖掘、抢掠层出不穷，不少文物就是通过这种种途径或遭毁弃，或流落民间以至异国他乡。也有许多文物长年累月埋在暗无天日的地底早就毁坏，还有不少墓葬可能成为万古之谜永远无法为后人破解。

曾侯乙墓中的葬品如此丰富，它不会不引起后人的觊觎。1978年，考古队于勘探之初，就在曾侯乙墓椁盖板上发现了一个窃洞。根据现场遗留的一些盗墓工具分析，此墓曾在战国晚期至秦汉时被盗墓者“光顾”过。

那么，曾侯乙墓中的所存文物是否完整？又有多少珍宝已被他人窃走？

这一疑问自挖掘之初就困扰着考古人员及有关专家、学者，并引起了一场长达近二十年的争论。前不久，谜团才得以解开。湖北省博物馆、中国地质大学等单位的有关专家对曾侯乙墓区的地下水进行实地勘探研究，其结果表明，该墓所处地层位于地下水平面下。也就是说，曾侯乙及墓中的陪物埋葬不久，就有地下水渗入，淹没了墓室高度三分之二的水平位置。当年，盗墓者凿开墓椁盖板，往里一瞧，发现全是积水，不禁大为扫兴，只得无功而返。也许，他们还下到深深的积水中探摸了一阵，结果什么名堂也没有捞到。他们留下的洞口只有80厘米见方，要想在这一小小的洞口盗走极有价值的瑰宝，其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渗入墓内的自然积水不仅挡住了盗墓者的视线与野心，还从另一方面对墓中的文物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常言道，“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只半年。”随州擂鼓墩的地理位置与自然气候决定了它的地下土壤长期处于不干不湿的

状态，因此，如果没有地下水的渗入，曾侯乙墓中的文物也许早就腐朽不堪了。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是上帝的造化与安排，有意将一座青铜时代的丰富宝藏完整地推现在世人面前。

不说两千年前的盗墓者，就是本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对曾侯乙墓的发掘也颇为艰难。从所需人力、物力、财力而言，决不亚于一个大型遗址的发掘，运用了直升机、吊车、卡车、潜水泵等一些现代化的技术手段。

据有关资料介绍，当考古队完成现场的清理工作，决定起吊墓葬椁盖板时，围观的群众从四面八方如潮水般涌来，每天多达两万之众，安全保卫与发掘工作显得同等重要。椁盖板共由 47 块梓木组成，最长的十多米，重达四吨。部队支援的解放牌五吨吊车在这些庞大的木板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只得调来崭新的黄河牌十吨大吊车，才将一块块沉重的木板移开。盖板揭去，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并非想象中的炫目耀眼的瑰宝，而是一片约三米深的积水，但见一些棺木横七竖八地浮在水面，看不清浑浊的水下到底藏着何物。

工作人员开始往外抽水，缓缓下降的水面渐渐浮出了三段横梁与一根木柱。一位年轻的发掘队员自告奋勇地爬上跳板趴在水面上方顺着横梁往下摸。摸着摸着，他突然大声嚷叫起来：“摸着了，是编钟，我摸到一排编钟啦……”

一声兴奋的叫喊，宣告了古编钟的“破土而出”。1978 年 5 月 22 日凌晨，墓室积水抽干后，曾侯乙编钟露出了它的“庐山真面目”：总重量为 2 567 公斤的 65 个大小编钟除少数几件震落地面外，其余的全部悬挂在木质的钟架上。历经了二千四百多年的岁月侵蚀与积水浸泡，仍然整整齐齐、完好无损、雄伟壮观，令人惊叹不已！

三

随州地处淮水之南，汉水以东，北为桐柏山地，南为大洪山脉。两山遥相对峙，支脉四延，形成山地、丘陵、岗地、平原四级阶梯。中部地势平坦，史称“随州走廊”，自古以来是北连南阳平原，南接江汉平原的天然通道。这里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兼得大江南北之利。

编钟的出土地擂鼓墩位于随州市区西北约三公里处，这里依山傍水，居高临下，视野开阔，是一块相当不错的“风水宝地”。

曾侯乙，名不见经传，事不着史籍，生平阅历无从考稽。他所看重的，似乎是一种内在的拥有，在一个既不繁华也不荒凉的地方默默地躺着，一躺就是两千多年。如果没有当年解放军部队的开山平地，也许就那么永远静静地、默默地躺下去了。然而，曾侯乙墓葬终被世人发现，他的名声顿时显赫，超过了历史上的许多封建帝王。

人们在破解编钟及墓葬之谜的同时，自然会对墓主进行一番探究。

墓中出土的绝大多数青铜器上，几乎都有“曾侯乙之寝戈”等具名曾侯乙的铭文，曾侯乙无疑是该墓的主人，并且还是曾国的一名君主，“曾”国之“侯”名“乙”。根据出土骨架鉴定，曾侯乙，男性，年龄约在 42 至 45 岁之间。墓中出土的一件铸钟上铸有一段铭文，大意是，铸钟为楚惠王五十六年所赠，这年，楚惠王在酉阳得到曾侯乙弃世的消息，便制作了这件宗庙所用的礼器对他祭奠，并将它永远用于享祀。楚惠王五十六年，即公元前 433 年。也就是说，曾侯乙当葬于这一年或稍晚一点的

时间。

曾国即随国(对此,学术界仍存争议,尚有曾灭随、随灭曾而改称曾、曾为楚的封国等说),是西周姬姓的封国,曾经一个时期,它的势力较为强盛,并有一些小国依附于它,敢于公开与楚国对抗。后在楚国的多次征伐中败北,逐渐沦为楚的属国。公元前506年,吴国大败楚国,楚昭王辗转逃到曾国,吴军要求曾国交出楚昭王,遭曾国婉言拒绝。昭王感激不尽,与曾人歃血而盟,曾、楚关系大为改善。这一友好关系维护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楚、曾联盟七十三年之后,楚昭王的儿子楚惠王知道曾国君王逝世的消息,即铸钟祭祀以送,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曾国作为楚国的属国,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的公元前331~324年间才告消亡,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楚王及其他诸侯国官员所送礼品,在曾侯乙墓内的器物铭文中都有所记载。那么,其他物件如编钟、漆器、绢纱、金盞、兵器、玻璃珠等珍宝,当为曾国自己铸造了。一个蕞尔小国的文明在两千四百多年前即如此发达、成熟,实在令人难以想象。特别是编钟的出土、复制与演奏,更使今人将中国青铜文化与音乐文化的认识与研究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曾侯乙墓中的器物,总量为十吨之巨,造型复杂,纹饰精美,堪称当时世界一流水平。在制作工艺上,综合使用了浑铸、分铸、锡焊、铜焊、雕刻、镶嵌、铆接、熔模铸造等多种技术。尤其是编钟,均用高纯铜、铅、锡原料铸成,在铜、锡、铅的运用比例上相当科学完美;它采用复杂的钟腔构造,使得每一个钟都能发出两个互不干扰的音阶;编钟用组合陶范铸成,这些陶范先由细泥做成,慢慢阴干,然后烧成。一件钟就需一百多块陶范,要求块块不干裂,不变形,拼合严密,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经过翻模、制壳、熔化、浇注等多道工序而铸得的钟胚必然存在误

差,还须细致的调试才能达到预期的音高。编钟的焊接只有采用一种可与现今媲美的冷焊工艺才能达到设计要求。编钟表面的浮雕花饰,其铸造也相当困难……

秦汉以后,编钟铸造技术失传。后代虽也多次铸钟,但“其声清浊多不法,数毁”。特别是一钟双音的奥秘,虽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所揭示,但就是无法变成实践,以至明清所铸编钟只能依凭改变壁厚来控制音高,音响效果远远不及先秦古钟。1979年6月,武汉机械工艺所将曾侯乙中层编钟的两件复制成功,才结束了编钟铸造失传的历史。

然而,曾侯乙编钟上的铭文制作技术——一种在汉代即已绝迹的青铜错金工艺却长期得不到解决,以致编钟出土二十余年来,只有仿制件却没有完全复制件。1998年初,武汉金银制品厂接到参与为台湾制作复制全套编钟的任务后,成立了一个攻关小组,从嵌铜嵌金技术中受到启发,几经反复,才攻克了在古青铜时代广泛应用的错金技术——成功地复制了编钟铭文。在长达两千年的失传后,运用光谱半定量、电子探针扫描、化学定量分析、激光全息摄影等现代高科技成果分析检测、复制还原,才使编钟铸造技术达到了古人的生产水平,由此可以想见,我们的祖先在青铜时代创造的文明该是多么辉煌!

曾侯乙编钟深埋地底两千四百多年重见天日,其音乐性能仍然很好,演奏时音色优美,音域宽广,它的演奏音域只比现代钢琴少两个八度音,音附结构相当于今天的C大调七声音阶,总音域跨五个八度。其中心部位十二个半音皆全,具有六宫以上的旋宫转调能力,可以演奏古今中外多种曲调。曾侯乙钟、磬等音乐器物上显示标音与乐律内容的铭文,总字数为3755个,涉及音乐调式、律名、阶名、变化音名、旋宫法、固定名标音体系、音乐术语等诸多方面,相当全面地反映了先秦乐律学的

高度发展水平。不少音乐专家、学者认为,曾侯乙编钟所反映的乐律学成就,使得中国音乐史及世界音乐史的某些结论不得不重新加以修改。比如,它确认了“三分损益法”产生十二律不是战国末期由希腊传入,而是春秋时期就已存在;它确认了战国早期中国已采用七声音阶,确认了当时中国就已有旋宫转调的乐学规范及实践的可能……并且,它所体现、反映的有关音乐学问题,博大精深,“都非少数人和短时期所能探讨清楚”。

面对奥秘无穷的编钟,美国音乐权威人士 G. 麦克伦十分心悦诚服地说道:“曾侯钟及其排列方法、命名系统和调律都显示出‘结构’上的成熟;复杂的律制与高超的工艺都超过了我们迄今对古代音乐世界一切东西的猜想。不仅其制造的技术水平,而且在哲学——音乐学上所获得的成就都使我们高度钦佩。同是处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却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堪与之比较的具有音乐价值的工艺品,虽然我们一向习惯于崇拜古希腊。”

与古希腊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战国年代,两种文化相互比较,我们虽然有许多方面落后于人,但音乐却远远地走在了古希腊的前面。

四

据考证,钟的前身即铃。

铃在古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牧人把铃铛系在牲畜脖颈,铃声荡起一片悠扬的牧歌;王公贵族将“銮铃”悬在身拉座车的骏马项下,铃声响处,“闲人”闪开;高大的建筑物中檐牙高耸,风铃丁当,在和风中荡漾开来,一派安宁祥和……

铃,是缩小了的钟;钟,是放大了的铃。

从原始的次甬钟到早商的扁圆形铜铃，至殷商的编铙、西周中期三件一组的穆王编钟，发展到八件一组，历经春秋时期的九件、十三件一组，继而达到战国时期的大型编钟，历经了一千多年漫长的发展时期。

“钟鸣鼎食”，商周青铜器中的重器鼎与钟，除了它们的实用价值外，更多的是一种象征，祭祀天地与宗庙的礼器。鼎，由煮食的炊具发展为礼器，象征丰衣足食；钟，那清脆、悠扬的乐声弥漫人间，体现了社会的安宁与和平。炊烟袅袅，钟声悠扬，人民富足，歌舞升平，该是一种多么令人神往的美好境界啊！

慢慢地，作为众乐之首的编钟，就成了王公贵族权势与地位的一个标志，成为皇家乐队中必不可少的一种乐器。谁拥有的编钟越多、规模越大，地位也就越加尊贵。从河南新郑、淅川、信阳，山西长治，陕西扶风，四川涪陵，一直到云南等地都有规模不等的编钟出土，已遭毁弃或深埋地底的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出土的编钟中，九枚一组的已达不少，但像曾侯乙编钟达到六十五枚的，可谓群钟之首矣。

即使规模宏大的曾侯乙编钟，在当时的楚国而言，其规格也只称得上二级水平。商周以礼乐制度定名位、分等级，作为楚国之属的曾国制作的编钟，其规模、音域、水平当然不能超过宗主国。据《淮南子》所记，吴王阖闾伐楚，柏举之战，楚兵败绩，吴军进入郢都，“破九龙之钟”；又据《贾子》所载：“子胥入郢，毁十龙之钟”。这从已出土的楚惠王铸钟的舞部、鼓部、篆带和枚面都有互相盘绕的龙形纹饰浮雕这一点，也证明“九龙之钟”与“十龙之钟”当为楚国规格最高的编钟。而曾侯乙编钟只有木质钟架横梁两端的青铜套上铸有浮雕龙纹，其规格自在“九龙之钟”、“十龙之钟”之下。也就是说，楚国王宫里曾出现过比曾侯乙编钟更加宏伟壮观、富丽堂皇的编钟。吴军当年毁

掉的，便是这一最大的编钟系列了。也许，尚有幸存的“漏网”者埋于地底，说不定一个偶然的机，就有一套规模最高的编钟重见天日、“破土而出”呢！

且不说那具有帝王之尊的“九龙之钟”与“十龙之钟”，即使已经出土的曾侯乙编钟，也就足够我们惊叹不已的了！

曾侯乙墓发掘后，鉴于当时的随县没有博物馆，无法保存这批国家级文物，也没有相应的科技力量进行研究，便将编钟等出土文物运往武汉东湖之滨的湖北省博物馆内集中保存。此后，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人士一直动议为它营造一个新家”。1990年，编钟馆破土动工；1998年12月，编钟原件开始搬迁；1999年元月，新馆对外开放。编钟馆除有两层陈列厅外，还有一个九百平方米的演奏大厅。

我是在湖北省博物馆陈列大楼内见到的这批曾侯乙墓葬品。除编钟原件外，还有尊盘、尊缶、青铜车马器、青铜戈、戟、矛、殳、箭镞等大量的珍贵文物。当然，最令我看重的还是规模宏大的编钟。

编钟共计64件，其中钮钟19件，甬钟45件，另有楚王赠送的铸钟一件。其中最大的一件甬钟重达203.6公斤，最小的重8.3公斤，总重量为两吨半。它们分三层三组悬挂在曲尺形钟架上，上层、中层适宜演奏高音，下层适合低音演奏。钟架全长10.79米，高2.67米，为铜木结构。它不仅容量大，而且稳定性强，抗压系数高，负重两吨半，历经两千四百多年站立不倒，可算古代力学的又一代表杰作。

编钟的成分与组合相当讲究，每一钟都能发出两个音符，铸造时必须严格根据“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等金属和谐原理熔造，才能奏出最美的乐音。六十多个钟，大小有别，重量不一，音高不等，“分工明确”。悬挂时，得分上中下三层排列，各

就各位，有条不紊，如有一个错置，则整个编钟的结构就会混乱。六十五个钟，可有几千种排列方式，而最佳的组合只有一种——就是出土时的悬挂方式。

这套出土编钟，想必曾侯乙生前就多次享用过。根据死后仍按演奏方式悬挂在他的墓穴之中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想他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爱乐之人。当然，他的看重编钟，也有可能是将其视为王侯之尊的一种象征之物。不管怎样，他之喜爱音乐这一点，是怎么也不可否认的。湖北省博物馆中所藏，也正是按了他生前、死后的排列方式悬挂在陈列大厅。

站在规模宏大的曾侯乙编钟前，我实在难以想象，这就是我们古人曾经演奏过的一种大乐。

编钟的敲击工具是一根 T 字型木锤和圆木杠，木锤用于敲击上层钮钟及中层甬钟，木杠用来撞击下层大甬钟。

这时，我的眼前立时浮现出了一群乐人，他们手持木锤、木杠，缓缓地敲向编钟。“宫——”一声深沉、悠远、绵长的神秘之音从巨大的低音甬钟流溢而出，穿越了两千四百多年的漫长时光。“当——”又一个编钟奏响了，乐人们挥舞木锤木杠，脚踏时而欢快激越、时而深沉蕴藉的节奏，闪跳腾挪，令人眼花缭乱地敲响、撞击着一个个编钟。清脆的高音、含蓄的中音、幽然如梦的低音相互和鸣，构成了一曲与天地同和的宏大交响……眼前的现实背景突然消失，幻成了楚国王宫，厅堂精美豪华，墙壁涂抹香料，装饰奇珍异宝；一片摇曳的红烛中，一群妖艳迷人的妙龄少女穿金戴银，轻舞长袖，款动细腰，踏着编钟之音翩翩起舞。乐人撞击得更加猛烈了，整个钟架仿佛都在摇晃，钟声更加纷繁、复杂、激越、宏伟，同时，杂以隆隆鼓声、当当磬声、泱泱琴声等多种伴和的音响。在这钟乐悠悠、歌声婉转、舞女款款、笑声琅琅之中，曾侯乙与他的大臣家人举杯共盏，饱尝美味佳

肴，陶醉在一片其乐融融的人间天堂……他们当然希望这种生活亘古不变，永世长存，可是，一道不可逾越的生死界限使得贵族、平民在此获得了同等的权利与公平。既然死亡必不可免，他们便一厢情愿地幻想能将生前的享乐带入死后的生活。于是，就有了我们今日所见到的完整无缺的曾侯乙编钟。

五

我国在两千四百多年以前，就已拥有曾侯乙编钟这样宏伟壮观的乐器，具有了相当丰富独特的音乐理论。如果依此继续向前发展，今日中国音乐之发达，当遥居世界领先地位。然而令我们丧气的是，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

即以乐器而言，中国民乐队中的绝大多数乐器并非中国本土所造，都属“外来户”。

比如中国乐队里的核心角色扬琴，本名叫做“德西马琴”，诞生于西亚的亚述与波斯。它先是被十字军带到欧洲，约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再由欧洲人经过海路进入广东，然后传遍了中国大陆。因从西方而来，刚开始，大家都把它称为“洋琴”，时间一长，就改为扬琴了。

比如琵琶，我国也曾有过一种名叫“琵琶”的乐器，不过那是青铜做的，与现在的琵琶完全是两回事。它诞生于公元前105年，在唐朝就失传了。今天的琵琶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在那儿名叫琉特琴，由印度经西域古国龟兹传入中国，因它神似已经失传的琵琶，就把“琵琶”一名送给了琉特。在中国扎根的琉特不仅换了一个中国古乐器名，在此基础上，还以竹木为材料，繁衍出大阮、中阮、三弦、秦琴、月琴、柳琴等庞大的“琉特家族”。

再比如民间非常流行的唢呐,无论北方、南方的节庆日子及红白喜事,农民兄弟总是鼓足腮帮,灵巧地按动指头,吹出一片悠扬婉转的别致天空。在大多中国人眼里,可能从来就没有想到它会是一个“舶来品”。其实,你只要瞧那名字,就会联想到“咖啡”、“可可”、“坦克”等外来名词,想到“唢呐”也是一个音译的产物。唢呐源于伊朗,它的别名“祖尔奈”、“苏尔纳”也与阿拉伯语的译音相近。

还比如二胡,在我的生命中,对二胡一直怀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深厚感情。在家乡为农的艰难岁月里,锯开一段楠竹,蒙上一块蛇皮,插上一根木杆,以胶线为琴弓,在小镇文具店买来两根弦索,一把自制的二胡就这样诞生了。它曾陪我欢乐伴我忧愁随我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我的心里,一直以为它是中国古代流传至今的国粹。不久前见到一份音乐资料,才知实际情况颇有出入。二胡诞生很晚,于1927年才问世。那一年,刘天华把江南的“南胡”带到北京进行了一番彻底的改造,加长琴身,扩大音域,加大把位,才变成了一种音量大、音域宽的民族乐器,它的经典作品《二泉映月》在三十年代末期才得以诞生。此后,广东才有了大胡和低胡。

……

若将以上一大批“主力军”从中国音乐世家中“清除”出场,那么,中国乐队的舞台就显得空空荡荡的了。毋庸讳言,在中国乐队中,乐器不是“外来产品”,就是近几十年的“新货”。

那么,中国的民族乐器都到哪儿去了呢?

大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湮没失传了。

我国古代乐器按制作材料分为八类,也叫“八音”,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按演奏方式,又可分为打击、吹奏,弹拨等三类。这些古代乐器,有的长期失传,如“滥竽充数”里面

的“竽”，今天我们就无法见到，可当时，包括南郭先生在内的乐队就是一个拥有三百人的庞大乐队；如筑，我们只知它曾被高渐离当作武器砸向秦始皇，现在连它的形制、构造都弄不清楚了；再比如埙，据说吹出的音调特别苍凉、古朴、浑厚，今天在一般的城乡也难以见到；还比如箛、排箫、柷鼓等，也都流失不见了。而现存的一些远古乐器，因时代、社会的变更，它们的价值与地位也在不知不觉地退居陪衬的次要地位。

两千四百多年前，当巨大的编钟在中华大地神采飞扬之时，素以高度文明闻名的古希腊的代表乐器不过是一种牧羊人吹奏的双管“奥罗斯”；当一千二百多年前的盛唐音乐已拥有万人以上的“音声人”（即皇家乐署人员）和风格各异的“十部乐”时，欧洲音乐还处于蒙昧时代。然而，约在一千年前，欧洲的宗教音乐崛起了，古典和声出现了。特别是到了巴赫、亨德尔时代，欧洲音乐突飞猛进。

近一千年来，欧洲音乐已走过了以旋律为主、旋律与和声并重、以和声为主等三个发展阶段。和声的地位日益显赫，音乐作品在和声的作用下构成了一座座精美的“立体建筑”。而中国的和声学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旋律始终占据主要地位。中国传统音乐中，不论声乐、器乐、还是戏曲音乐、说唱音乐、民间器音乐、民歌音乐、古典乐曲，都以其旋律优美取胜。

我国音乐在战国时期以编钟为标志，就已步入成熟之期。而汉、唐两代，更是音乐发展史上的两座巍然耸峙、令人仰视的高峰。此后，中国音乐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乐器失传，理论枯萎，规模缩小，统治者禁锢……一旦衰颓，大有覆水难收之势，一下子就滑入了历史的深谷低迷徘徊。而与中国截然相反的是，似乎就在同一时期，西方音乐却在一块滋润、肥沃的土壤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一边是发展，一边是衰颓，时间一长，

距离越拉越大,反差也就显得更为突出。西洋音乐伴随西方物质与文化对中华大地的猛烈冲击,便成为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只不过是时间迟早的事情罢了。

六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不唯“文以载道”,即抽象的音乐,也蒙上了“教化”的阴影。据现有文字资料所记,西周时期的周公旦即为“制礼、作乐”的首倡者。到了孔子手里,又将“礼”与“乐”的关系详加阐述,并以无数条文规定人们去遵守,以确立、稳定封建制度的等级秩序。

曾侯乙编钟,便是一件典型的“礼乐”代表作品。

它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制作精巧,象征着侯王的权力与尊贵。但因曾国所处的属国地位,它又不得不屈于“九龙之钟”、“十龙之钟”之下。曾侯乙编钟的每一甬钟与钮钟,不仅大小有别,并有明确的等级秩序。同音区而不同组的钟变化音结构不同,同一音高的相应各钟又存在着分值的细微差别,哪件挂于上层,何件居于中、下层地位,相当严谨,不得随意僭越。曾侯乙编钟首先是作为礼器而存在,然后才算得上是一件乐器。因此,它的视觉意义重于抽象的乐音。人们见到庞大的编钟,不得不被它的富丽堂皇、雄伟壮观所震慑;而那轰然作响的音乐,更是在人们的心中鸣响起一种宗教般的肃穆之情。曾侯乙编钟,是典型的王者之物,它不可能深入民间,为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普通大众所拥有、享用。编钟,作为一个庞大整体的乐器系列,只要缺失了其中的一部分钟叶,哪怕只是其中的一件,它的音响就要逊色,或是难以成调;它的排列组合稍不到位,也要影响到旋律与节奏;而演奏时,若是缺少一个乐工,或是技法不够

纯熟，配合不够默契，流出的乐音也要大打折扣。因此，从编钟的铸造、运输、安装，到调音、演奏，每一程序都相当精密，只要某一方面出错，将会影响整体效果。而编钟的每一部件又是那么沉重，在具体操作处理时难免出现偏差。因此，它不仅难于流入民间，即使宫廷间的传承，也相当困难。只要某一环节发生断裂，就会导致失传。再则，编钟由它的初始阶段发展到曾侯乙编钟这样庞大精美，除了继续增加它的钟数、重量、体积、纹饰，铸成所谓的“九龙之钟”、“十龙之钟”外，实在难以想象，它将如何继续向前发展。事物一旦达到顶峰，就会停滞不前，开始衰退，编钟的发展便是如此。“九龙之钟”、“十龙之钟”惨遭毁弃，曾侯乙编钟埋入地底，铸造方法失传，往后发展下去，编钟的历史也就中断了。作为一件曾经存在过、辉煌过的古乐，在相当漫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成了后人遥远的追忆。因此，它的出土问世，满足人们的怀想渴望，再现中华古国乐中之王的熠熠风采，引得万人瞩目、举世轰动，也就在所必然了。

如果我们稍微展开一下探讨的笔触，看看汉唐时期我国音乐的辉煌与衰落，将会发现许多令人深思的音乐现象。

汉朝音乐之发达，仅从皇家置有音乐机构“乐府”这一点就可得以证明。乐府中，不仅有普通的演奏乐工，更有一批采诗作赋、作曲的第一流创作人才，如优秀的辞赋家司马相如就曾供职于乐府，著名音乐家李延年曾为乐府协律都尉。据《汉书·礼乐志》记载，公元前6年汉哀帝罢乐时乐府已达829人。如此庞大的专业机构，拥有第一流的音乐人才，存在了一百余年，不仅推动了民间音乐、边塞音乐、礼仪音乐、军乐、舞蹈的发展，创造了不少优秀的乐种，而且对后世的音乐、文学、舞蹈影响深远。特别是乐府歌辞，既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歌瑰宝，还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乐府诗”，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

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唐朝皇家乐署更是盛况空前，分为梨园、教坊、鼓吹署、大乐署等多种专业机构。据《新唐书·礼乐志》所载：“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一隶太常及鼓吹署……总号音人，至数万人。”如果加上皇室以外各贵族王公、地方官衙及士大夫们“衙前乐”与“家乐”人数，唐代从乐者人数之多，当为中国历史之最。唐代涌现出了李龟年、李鹤年、曹妙达、白明达等史籍有名有姓的优秀音乐人才近百名，还对前代音乐进行了革新，按演奏方式（坐与立）及演奏场合将“十部乐”改革为坐部伎、立部伎、雅乐等独特的形式；创作了《秦王破阵乐》、《太平乐》、《霓裳羽衣曲》、《荔枝香》等优秀歌舞作品……

然而，汉、唐音乐每当达到极盛，就开始走向衰落，其原因何在？

汉、唐音乐靠皇家提倡，以国库为后盾，通过“运动”的方式以达兴盛。一旦皇家的兴趣转移，经济萧条，战乱爆发，运动消失，人才流失，便会突然跌入低谷。

音乐的传承与延续相当脆弱，那一个个抽象的音符仿佛一个个活泼而调皮的精灵，它们在天地宇宙间、在人们的心灵间跳动飘舞，似有形而无形，似有音而无音，似可抓握又难于驾驭，稍纵即逝。音乐与其他门类的艺术如文学、美术、书法相比，其传世性显得更为艰难而脆弱。汉乐府的音乐早已湮灭无闻，但《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等乐府诗一直流传至今；此后的相和歌、清商乐、燕乐、词乐也都先后失传，如宋词的音乐形式只剩下了一个个汉字书写的词牌名，而作为文学形式的词作尚能脍炙人口，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后人。

音乐的传承一靠记谱，二靠乐器，三靠人才。

古时没有录音设备，要想将灵动、飘荡的音符固定、保存下

来,只有依靠乐谱。可是,中国几千年一直没有记谱。到三国时期,才有了文字谱,而工尺谱最早则见于宋朝《梦溪笔谈》一书。这两种记谱法都不甚科学,勾勾抹抹的文字谱仅作一种提示,无法翻译;工尺谱虽有了唱名,但既无节奏,也无时值。今日的简谱(阿拉伯数字谱)与正谱(五线谱)都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没有科学、先进、精确的乐谱,乐曲一旦失传,也就无从把握、恢复了。

乐器的流传,与其制作材料、质地关系相当密切。一般而言,竹木皮革类易毁易失,金石类可长存久远。但像编钟这样庞大、繁复的重器,固则固矣,却也不便流传。因此,除了材料质地外,重量、体积、繁简等因素对乐器的流传影响也不可忽视。

音乐人才除了勤奋,天赋尤为重要。往往需几代音乐人的努力、长期的影响作用,才能诞生一个伟大的音乐家。可这样的音乐天才,在封建帝王眼里,不过他们脚下一个可以踢来踢去的奴才,可凭至高无上的权力随意支配他们的生死。如我国古代著名音乐家、汉乐府协律李延年,自己没有半点罪过,却在公元前87年受兄弟牵连而惨遭杀害。社会每有动乱,音乐人才也成了军阀们屠刀下的可怜羔羊。而中国音乐最讲究的是口授心传,很少使用笔墨记录。于是,一代音乐人死去,这代人所发展、创造的音乐也就随之消亡了。

我以为,音乐的传承延续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民间化。民间是一块广阔无边、潜力无穷的肥沃土壤。只有影响民间、深入民间,音乐“火种”才有可能长存不灭。而中国古代音乐,严格来说都属宫廷音乐,为封建贵族阶层所专有。每有战乱,王公贵族首当其冲,对音乐的破坏也就最为厉害。并且每一次改朝换代,新的王朝都要做出一些否定前朝的姿

态与行为，即使前一朝代的音乐没有多少破坏，也要遭到新建王朝的否定。

音乐民间化，涉及到一个普及与提高的问题。

在随州，出土的编钟除曾侯乙编钟外，还在均川、安居等农村的一些东周平民墓地中发掘出不少小型编钟。这说明当时的随人喜好编钟已成一种时尚，不仅王室拥有，普通民众也视家庭经济状况铸造或大或小的编钟。近年来历史学家发现，随州古城的框架也酷似一叶编钟。这显然为古代建筑学家有意为之，《左传》曾载“随民喜乐”，由此可见一斑。然而，这种时尚跟我们今天所说的普及与提高的涵义完全是两码事。全民普及编钟，在此基础上提高到曾侯乙编钟的水平，才是真正的普及与提高。而那时的实际情况，却是民间受王室的影响，把拥有编钟作为一种时髦。

只有在普及的基础上得到提高，才不致于出现断裂，才有可能绵绵不绝地向前发展。而封建统治者对民间音乐禁锢至深，翻阅《资治通鉴》等史书，皇宫每有喜庆，才许民间歌舞休息几日。封建君主、王公大臣们可日日歌舞欢宴，而普通百姓连放歌奏乐也得皇帝恩赐。好不容易允许歌乐一番，又要受到礼教的束缚，讲究什么中庸平和、不温不火。而民间乐人，更是被视为低贱的“下三烂”职业。在一个没有歌舞的死气沉沉的社会，很难想象音乐会有长足的发展与美妙的前景。即使皇家音乐，明朝后，也开始走向严肃、古板、呆滞的极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常被后人称道的康熙、雍正盛世，却是中国历史上最不重视音乐的枯燥时期。

七

曾侯乙编钟埋在地底两千四百多年不锈不蚀、不残不缺，出土后还能演奏各种乐曲，且音域宽厚深广，乐音优美响亮，这实在是人类考古史、音乐史上的一大奇迹。

曾侯乙编钟刚出土，就于1978年的建军节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随州炮师某部举行了一场原件音乐演奏会。音乐会以《东方红》开场，接着演奏了《楚殇》、《一路平安》、《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中外名曲，最后以一曲《国际歌》落幕。音乐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观众如痴如醉，许多人禁不住热泪盈眶。

1979年，外交部邀请各国驻中国外交使节及其夫人，在武汉欣赏了编钟演奏的古今中外名曲，反响强烈，受到高度赞赏。

1983年，湖北省歌舞剧团创作了一台古朴、粗犷、浪漫的《编钟乐舞》，成为与《丝路花雨》、《仿唐乐舞》并驾齐驱的反映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秀之作。湖北省歌舞团曾带着他们的保留节目《编钟乐舞》访问北美，受到当地观众及政府首脑的热烈欢迎与高度赞扬。

1984年7月，形似声似的全套曾侯乙编钟复制成功。

1997年7月1日，曾侯乙编钟（完整复制件）在香港回归庆典演出交响曲《1997：天地人》，大放异彩。

如今，曾侯乙编钟已有四套复制件，它们在频频出访中蜚声海外。最新的一套铸于1998年，经测音显示，其优秀率创下曾侯乙编钟复制件的最高标准，现已陈列在台湾省台北市孙中山纪念馆。

.....

曾侯乙编钟在地底沉寂了两千四百多年以后，依然那么青

春勃勃、活力斐然，它的身影与音响通过现代化的先进传播手段，几乎充满了世界的每一角落。

曾侯乙编钟从它的铸成之日起就决定了它的“王者之气”，它震惊过两千四百多年前的远古；它自1978年出土至今，牵引了无数世人的目光；我们完全可以预见，它还将在人类未来的岁月之河里永远“风光”下去。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胡风一段震聋发聩的话语，他曾在《三十万言书》中写道：“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我们应该当做劳动底成果去看，当做智能发展底结果去看……这个灿烂性，是人民内容和人底意义还没有被民主革命的光所照亮出来的历史性的内容。在这个灿烂的古代文化里面，固然包含有表现了我们祖先底作为人的梦想和追求的一些‘精华’，但更多的却是我们祖先底作为治人者的残酷的‘智慧’和作为治于人者的安命的‘道德’，更多的是这种汗牛充栋的，虽然是我们祖先创造出来的却又压死了我们祖先的‘糟粕’。如果不加以‘清理’和‘批判’，把作为‘思想材料’的文化遗产完全升为‘优良的传统’，只是囫圇吞枣地去‘继承’和‘发扬’，这一个沉重的包袱是要把我们压得透不过气来……”

我之所以大段引用，是想将胡风的思想完整地套在“灿烂的古代文化”之结晶——曾侯乙编钟之上。

曾侯乙编钟是封建时代的杰作，它代表了那一时代的生产、技术、文化等方面的高度成就，也反映了那一时代的多重特色，形式与内容相互契合，融为一体。编钟和奏，固然反映了盛世的平和、安宁与富足，能够唤起国人强烈的历史情怀与民族的自豪情感。但是，编钟所尘封了的那些封建符号也会随着一个个跃动的音符迸射而出，与国人脑中几千年来一脉相续至今仍然存留的封建细胞一拍即合。“文革”时期，中国大地最为流

行两首歌曲，一为《东方红》，一为《国际歌》，虽同为“社会主义歌曲”，可内容与形式却大相径庭。在此，我们不妨将这一中一西的两首歌曲稍加比较：以形式而言，《东方红》为民歌，曲式古朴、单调，《国际歌》为典型的西洋乐曲，具有现代的基本音乐要素。在内容方面，《东方红》宣扬的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圣人明君思想，对所谓“大救星”歌功颂德，每当它的旋律响起，我的眼前就出现了一群憨厚愚昧的民众跪在封建君王的膝下山呼万岁、乞恩求告的情景；而《国际歌》则否定了“神仙皇帝”与“救世主”，它所高扬的，是挣脱禁锢、解放思想与人类的平等，人人都应自力自主，人人都可创造历史，人人都是历史的主人。

封建社会，在中华大地淤积得实在是太久太久了；封建的东西，如封建思想、封建人格、封建制度沉淀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与心理深处，稍不留神，就会死灰复燃。

对待曾侯乙编钟，在惊喜、赞叹、欣赏之余，我总是对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用“敬而远之”一词形容虽不怎么恰当，但至少反映了我的一种心态。

面对曾侯乙编钟，我的灵魂曾为之颤抖，我的心灵也曾大声地疾呼与企盼，但愿封建幽灵不要附着于“千古绝响”之上，但愿曾侯乙编钟经过一番洗礼能与今天的时代精神合拍，但愿我们所倾听的编钟之音，永远清脆亮丽、纯粹明净，不要含有与时代进步不相符的杂质。

西塞山感怀

—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西塞山的千古闻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唐代诗人张志和的这首《渔父》词。

当我背诵着这首著名的词作时，很自然地就联想到了柳宗元的绝句《江雪》：

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虽为一词一诗，但它们体裁接近，所绘意境都是那么清幽高雅，超拔绝俗：在一处山青水秀、风景如画的地方，有一个

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的垂钓之人，手握一根富有弹性的钓竿，安详地坐在水边，静静地等待鱼儿上钩……但比较而言，我更喜欢张志和的《渔父》词。柳宗元的《江雪》，曲折地反映了作者被贬柳州后的寂寞心情和不屈性格，透出的是一股凄厉之美，似乎少了点人间的烟火味道：在一片冰天雪地之中，凛冽的严寒使得飞鸟归隐，人踪灭迹，这等恶劣的气候，哪有多少鱼儿前来咬钩？何况这垂钓之人又是一个年龄衰迈的老翁。与其说在垂钓，倒不如认为是在抗争、在参禅，与姜子牙的“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似有异曲同工之妙。画面固然美好，意境虽然深远，但与我的现实、与我的心境自有着一段相当遥远的距离。而张志和的《渔父》词则不然，读来使人感到异常的亲切、贴近：飞翔的白鹭衔来了美丽的春天，盛开的桃花将它烘托得更加鲜艳灿烂，沉寂了一冬的鱼儿舒展身躯一抖漫长的寒梦，在一片热烈与喧闹的流水中，相互嬉戏着追逐飘落的残红……静坐水边的钓人，置身这生机盎然的春天，感受温暖的“斜风”拂面，遥看飘洒的“细雨”润物，欣赏朦胧的诗情画意，面对一条条鳞光闪烁的猎获之物——鳊鱼，想想看，无论是谁，恐怕都有点留连忘返，不想归去了。

《渔父》词将苍岩、白鹭、桃红与清澈的流水、黄褐色的鳊鱼、青色的斗笠、绿色的蓑衣别出心裁地融于同一画面，色彩鲜明，构思巧妙，意境优美，人们在诵读作品时，眼前分明出现了一幅有声有色的水乡春汛图。动与静、隐与显、雅与俗在这首词作中和谐一体，契合了中国广大民众的审美心理，无论文人雅士，还是普通百姓，都能喜爱接受。

《渔父》既为词牌名，想来当有悠扬婉转、美妙动人的曲谱可供人传唱，载歌载舞的。可惜传至今日的只有一个个墨写的汉字，那些跳跃的音符早已消失，与天籁融于一体了。

我对《渔父》词青睐有加，还在于它不时勾起了我对故乡的亲切回忆——一个偏僻原始、有山有水的村落，少年的我常常光着脚丫、手持钓竿，坐在堰塘河边静静地垂钓。当然，那时的我，垂钓的目的只有一个，钓到更多的鱼改善单调乏味的伙食，为清贫的生活注入一点难得的“口福之乐”。

长期以来，西塞山在我眼中不过是一座文学描写中的想象山峰，一道能激发我回忆、呼唤我亲情的心灵风景。

直至1988年9月，我来到位于黄石市的湖北师范学院历史系进修深造，才得以一睹“真容”，进入到它那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之中。

二

择了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几位高年级同乡陪我向西塞山进发。

半路上，他们告诉我，前不久，政治系八七级一位长得如花似玉的女老乡在西塞山绝壁之处攀缘时，抓握不稳，突然摔入山底的江水之中当场殒命，后来就埋在了那儿的苍松翠柏间。我听后不禁一震，在我心中一直充满了诗情画意的西塞山，竟然如此狰狞恐怖，将一个柔弱女子的生命与美丽毁于一旦，它怎能如此残酷无情？！

其实，我早就知道西塞山是一处有名的古战场，战死在那儿的军人又何止千万？！然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我却将它与温柔美丽对立的另一面给遗忘在记忆的深处了。

在描写西塞山的优秀诗词中，与张志和的《渔父》词齐名的，还有一首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张志和的《渔父》，借助西塞山美好的自然风光抒发个人的志趣情怀。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描写了晋太康元年（280）正月，王濬统率水军自成都出发沿江东下攻伐孙吴，在西塞山遭遇吴军用铁链横锁长江的阻截，王濬水军成功地突破封锁直下金陵（即今南京市）的历史事实。该诗着重的是西塞山的人文历史——战争，表达了作者反对割据反对战争，反思历史慨叹人生的思想境界。

同一座山峰，竟将温柔恬静与金戈铁马巧妙地融为一体，西塞山，到底是一副怎样的面目啊？我在脑海里想象着，渴望一睹真容的心情不知不觉间更加迫切了。

乘车沿江东行，站在市内公共汽车的终点站道士袱，抬头向上一望，西塞山就在眼前，没想到它与市区贴得如此之近。

放眼四周，逶迤起伏的黄荆山脉像一群骏马在辽阔的江南大地沿东西方向奔腾不息，而西塞山却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离群掉头北上。这时，洪波翻涌的长江拦住了它的去路，野马拼尽全身力气，凭空一跃，希望跨过江面，奔向对岸。然而，江面是那样的宽阔，它根本无法超越。只听得一声轰响，腾跃空中的野马猝然落入江心。一阵徒然的挣扎过后，野马慢慢地就闭上了它那壮志未酬的双眼。临死之前，它将自己的满腔仇恨与悲愤凝成了一座山峰，横塞长江。

西塞山高仅一百七十多米，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高大雄伟。我们沿着一条铺了碎石块的简易公路缓缓上行，不一会就

站在了山顶。向下望去，西塞山像楔入长江的一把利斧，拦遏江流。山被水冲，水被山阻，山水相激，蔚为壮观。在长江中游沿岸，恐怕还没有其他任何一座山峰像西塞山这样倔强地与长江较劲。那刀削斧劈般陡峭的石壁便是千百年来与江水抗争所留下的见证，它也因了这些累累“伤痕”而在人们眼里变得更加神奇而顽强。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的“仙”于西塞山而言，就是它对长江顽强不屈的束缚阻遏及千锤百炼而留下的险峻峭拔。西塞山之所以成为历来兵家扼守长江中游的战略要地，除了江北的广畴沃野宜于筹饷，江南的“九十里地黄荆山”便于隐蔽外，更在于此地江面狭窄，山势突兀，崖陡水汇，易守难攻。古时，长江流域的交通运输以航运为主，“千寻铁锁沉江底”，一道粗大的锁链在狭窄的江面拦腰横截，西塞山就成了长江中游的咽喉与门户。不管顺流东下金陵、扬州，还是逆流西行攻取武昌、江陵，谁也绕不开西塞山这把坚实牢固的铁锁。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我在西塞山的攀行中感受得最为深刻。上山时，我们沿了山南缓缓起伏的山坡，走得轻松自如，并未消耗多大的体力。下山时，我们没按原路退回，而是选择了被千百年来江水冲刷得陡峭如削的山北。一条蜿蜒崎岖的羊肠小道忽而直下，忽而斜刺；山坡时而巨岩，时而陡坡。你只有盯着脚下的小路，借助两旁的荆棘、藤条、树枝，有时甚至是手脚并用，才能缓步而下。

“势从千里奔，直入中流断。岚横秋塞雄，地束惊流满。”唐人韦应物的这首《西塞山》便很好地描绘了它壮美而雄奇的自然风光。

西塞山自古以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还与它的所在地——道士袱是一处绝妙的南北横渡之地有关。这里江面宽阔，水深流急，横渡自然费时艰难；如果江面狭窄，激流奔涌，就一般情

况而言，横渡也会十分困难，而西塞山的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江水滚滚东去，西塞山横截而半，急流受挫，在此形成了一股特殊的回流。回流不激，横渡起来，既快且稳。故此，当地有民谣曰：“走尽天下路，道士袱好过渡。两边回水流，中间夹一流。”不论是进军江南，还是征伐江北，西塞山都是长江中游一处最佳的渡口。

快到山底了，道路折向左边。行不多远，便是人称“一步险”、“一线峡”的所在。左旁是千仞悬崖，右旁的江边是一道直立的长条形崖石，一条羊肠小径穿行其间，仅容一人侧身而过。

走过“一线峡”，便是后人修筑的一条几近垂直的下山石磴。石道两旁悬空，有铁链可作扶手。但每下一步，都是对意志的一种考验。举步向前，身体似乎悬在空中，陡峭的石崖压在头顶，脚底的江流汹涌澎湃，令人心惊胆颤。此前，我登过泰山，上过神农架，攀过武当，以高大雄伟而言，西塞山自然不能与它们相提并论，但其险峻不仅可与之比肩，且显得更加独特，原因就在于脚底的那条长江！江水湍急，一片明晃晃的、炫目的耀眼白光刺激着、诱惑着你的目光。你抓握两边的铁链，尽管小心翼翼地轻移着脚步，却不得不时时望一眼脚下惊心动魄的长江，悬崖的奇险与长江的惊涛在你的胸底融汇着激起阵阵远比江水更为宏阔的波涛。稍不留神，你就极有可能在这儿被山体的奇险、被激越的浪涛吸附而去。我那位大学生老乡就是在此中断了宝贵的青春，年轻的生命与永恒的自然融为一体，留下了一个不该划上的句号。

于是，不少游人下行至此，不免望而生畏、裹足不前了。他们环顾四周，欣赏一番大自然的壮美，遥想一番风云激荡的历史，凭吊感慨一番，也就返身而归了。

无限风光在险峰，你只有下到山底，才能领略西塞山独有

的风韵。下面,还有一个桃花古洞、一根曾经拴过沉江铁锁的铁钉。当然,要想见到这两处遗迹,还得具备一番探险的勇气,贴身侧行走过一道一面绝壁一面临江宽仅尺许的小径,攀缘一段垂直而下的铁链。

桃花洞是一个只有六平方米的天然石洞,洞口刻有“桃花古洞”四个清晰可见的大字,洞内石壁留有一块块残缺漫漶、无法辨认的碑文。一块天然岩石又将内里分隔为一大一小两个洞穴,每洞上面都有一个顶洞,大洞的左壁还有一个向上的小洞,洞口极狭,可容一人勉强而入,里面神秘莫测。千百年来,长江激流向着阻遏它前进东下的西塞山不停地发动着猛烈的“攻击”,长期的冲刷使得山体出现了无数溶洞,据说这个小洞就与西塞山体那许许多多的溶洞相连,洞中有洞,洞洞相连,洞洞相通,洞洞相套,别有洞天。“桃花流水鳜鱼肥”,春汛来临、春水陡涨,澎湃的江水便从这个神秘的桃花古洞涌出,一条条肥美的鳜鱼顽童般地在此嬉戏游乐。这里存有一处称为钓鱼台的名胜,据说,当年张志和就是稳坐此地,悠然临波,钓出一个个鲜活肥美的鳜鱼。由此可见,这里当是一处典型的回水窝,不然的话,江流湍急,不说鱼钩钓线会被水冲走,就是鱼儿也难以停留片刻。回水窝不仅水流平缓,还有着各种丰富的食源,正是鱼类们栖身的“天堂”。遥想当年,张志和隐身在桃花古洞这处风景如画、鱼儿汇集、幽然恬静的地方修身养性、怡然垂钓,眼帘映入的是桃红柳绿,鼻里嗅闻的是花草芬芳,两耳充满的是鸟语潮声,心头感受的是勃勃生机,比那世外桃源还要令人陶醉令人神往,真个羡煞人也!

在桃花洞右侧上首,有块西塞矶头石,石上留有一根约三寸长的不锈钢钉。传说这就是刘禹锡《西塞山怀古》诗中所描写的那场战争的遗物,当年的横江铁索就是拴在这根茶杯口粗

的铁钉上面。

桃花洞、钓鱼台与铁钉、铁索同存，宁静祥和、悠然怡悦与战火熊熊、血肉纷飞同在，这似乎令人有点不可思议。

三

其实，西塞山在古代历史中的重要与辉煌，更多的还在于它是一处举足轻重的战略军事要塞、东南诸省的门户，正所谓“鼎足纷争地，雄分虎豹关”。只不过人们厌恶动乱痛恨战争，渴望和平向往宁静，便有意无意地遮掩了它的血雨腥风，彰显了它所具有的温馨祥和。

“至今西塞山头上，犹是当年征战痕。”据史籍所载，从东汉末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西塞山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战争共计一百多次，平均不到十年，这里就有一次相当惨烈的争夺，人们将西塞山称为古战场，一点也不为过。

公元199年，庐江太守刘勋与孙策从兄孙贲于彭泽一战而败，便退据西塞山占据有利地势，筑垒自守，并向荆州太守刘表告急，求救于江夏太守黄祖。黄祖派儿子黄射前往增援，两军在西塞山展开了一场激战，结果孙策大败刘勋与黄射联军，俘获兵员两千，战船千艘，势力大增，为九年后联手刘备、大破曹操的赤壁之战奠定了厚实的军事基础。

刘禹锡《西塞山怀古》所描写的那场战争，发生在三国末年晋灭蜀后。公元280年，晋武帝决计讨伐东吴统一全国，任命益州刺史王濬为龙骧将军，建造大型战船，统率水师八万，沿长江东下袭取东吴。吴国在长江中游的咽喉之地西塞山早有部署，据《晋书·王濬传》载：“吴人于江险碇要害之处，并以铁索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逆距船。”王濬大军至西塞

山受到“铁索横江”之阻，只得命令军士制造大筏数十，上面扎着披甲执仗的草人，由极通水性的兵士引导向前。筏遇铁锥，锥便随着筏子顺流而去。然后，又命制作火炬长十多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放置船前，烧熔铁索。铁索一断，天险无所凭依，王濬顺利地突破西塞封锁，大军势如破竹，直抵东吴首都。事已至此，局势无以挽回，吴王孙皓也只有“一片降幡出石头”的份儿了。

公元477年，南朝宋镇西将军沈攸之起兵江陵反叛，宋顺帝率军讨伐，兵分八路扼守西塞山，堵住沈攸之东下的去路，逼得他无功而返，回江陵后被杀。

东晋、南北朝时期，与朝代更迭有关的几次战争，都在西塞山展开过激战。

此后，几乎每一朝代都在西塞山有过或大或小的战争。

公元784年，唐朝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占据西塞山下的重镇道士袱，唐军经过一番激战，才从叛军手中夺回。

宋朝时，西塞山下建有一座规模较大的兵库。

元朝末年，农民起义军领袖徐寿辉与元军大将铁木儿在西塞山脚曾经大动干戈。

明朝末年，李自成率军东下拟攻宣州。船队行至黄石江面，突遇狂风暴雨，李自成便率少量部队在西塞山登岸，经大冶县转入咸宁，后在通山遇害。

清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放弃武昌，大军蔽江东下拟攻南京。清兵急忙于西塞山设防阻截，两军在此相遇，太平军大破清军。

1938年，数万日军海陆空三路大举进攻西塞山，国民党三个师的兵力在此明碉暗堡，高炮林立，重兵把守。经过五昼夜混战，双方死伤惨重，“尸体成堆，血流成河，腥臭气味，弥漫巨

野”。

……

千百年的争战不息，自然在西塞山留下了不少古代遗物。这里，曾出土过南宋古墓葬品，但更多的却是窖藏的大批金器、银锭与铜钱。自1598年至1967年间，此地共发掘出土了六次窖藏。其中金窖一座，银窖一座，钱窖四座，包括西汉初年（前180）铸造的“半两钱”至宋理宗淳祐九年（1249）铸造的“淳祐通宝”，前后一千四百多年几乎各个历史朝代的铜钱，总量多达数百万斤。

一处军事要塞，绝少兵器出土，也没有发现阵亡将士规模庞大的集体墓葬，却前前后后出土了这么多的金银铜钱，原因何在？是谁把这么多的金钱埋在这里？为何要藏于西塞山这一兵家必争之地？如遇战争，难道不会首当其冲地遭到劫掠吗？……

面对这一连串的疑问，专家们作出了多种分析与推测，有的认为西塞山既是一处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自然设有军库以利军费支出，而唯有国家的庞大军库，才能容纳得了历次发现的这么多金、银、铜钱。只是出于军事紧迫来不及撤走，便长埋此地了。那么，是否为三国时东吴孙权、孙皓的国库？还有的专家认为此地钱财为吕文德所藏。吕文德，南宋时人，出身贫穷，曾任过都统制、福州观察使、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四川总领财赋兼领马军行司、太尉、京湖安抚制置屯田使、湖广总领财赋兼四川宣抚使等多种职务，行使军事、行政、财政大权。他曾多次与蒙古军队较量，死后追封为义郡王，入葬西塞山道士袱。从他一生的职务来看，已具备积聚、掌握、使用巨额钱财的条件。这些钱财，或是他的私产，或为他掌握使用的地方军资及负责征收的赋税。吕文德生前就将家属安置在西塞山。宋末

元初时，西塞山一带却显得异常平静，未曾发生战事。吕文德置身动荡之秋，加之征战频繁，南宋岌岌可危，大量钱财难以选择一处安全转移之地，于是，将其埋入地底以保无虞，当是他选择的一个最佳方案。并且所有钱窖，都出土于西塞山麓吕文德的旧宅基地，这也就更加证实了有关专家的这一推测。

不论何种情形，钱币的发掘至少证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西塞山不仅是一座著名的军事要塞，还与经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同时，这里的民族文化也独具特色，内容相当丰富。

道士袱镇因位于西塞山脚，也就成了一处驻军、设防的军事重镇。长期的军营设置自然刺激着当地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历朝统治者都在道士袱设有官府，此地还是全国有名的盐仓集中之地。镇内街道纵横、店铺毗连，十分繁华。明清之际，道士袱进入全盛时期，全镇居民七千多户，有七仓（盐仓）、八典（典当铺）、九庙（寺庙）、一观（道教宫观）。道士袱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游客，各种盛会更是体现了此地吴头楚尾的民风民俗，其中最负盛名的有正月十五龙灯会、谷雨节的牡丹会、五月端阳神舟会……流风所及，西塞山乡民现在仍然一年一度地举行着规模空前的龙舟活动。

然而，1938年日寇与国民党军队在这里发生的那场酷烈战争，使道士袱成为一片焦土与废墟，元气大伤，渐渐衰落为一个萧条破败的村落。直至今日，也没有恢复昔日的繁华。

四

我从湖北师范学院毕业后，就调到了黄石工作。于是，对西塞山的了解与认识也就更加多了。每有亲友前来，我必带他

们前往西塞，登临讲解一番。即使平时，三两好友，也会约了一同踏青郊游，攀缘西塞。近十年来，到底去了多少次，连我自己也记不清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阅历的丰富，对历史、社会、人生的认识逐步加深，我对西塞山的透视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感与把握。在我眼里，西塞山再也不是一座自然的山峰，它已凝成一种人格的化身。它的历史、发展与变化，活脱脱就是一个中国农民的缩影。憨厚、古朴的农民拘谨地守望着自己的家园，盘弄着一块斗大的田亩。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详宁静，十分知足地享受着田园之乐与天伦之乐。他们爱好和平，与世无争，知足常乐，恬淡安谧。然而，这只是他们性格中的一个表面。如果遭遇天灾、人祸、兵燹，生存不下去了，或是在外力的推动与裹挟之下，他们性格中的另一面就会立时凸显，长期的压抑一旦遇到突破口释放出来，将会使他们内心有如烈火焚烧，变得狂暴不安，在仇恨与毁灭的渴望中揭竿而起，在不计后果的横扫中获得一种难以言喻的快感与满足。这股力量往往具有不可阻挡的摧枯拉朽之势，历代王朝就是在一次次农民的起义浪潮中灰飞烟灭而退出历史舞台的。

中国农民的这种两面性也为西塞山所拥有。

过去，由于受历史条件及社会环境的制约，中国农民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追求，他们的希望所在，也即所谓的远大目标吧，不过就是勤勉耕作，积攒钱币，或埋于地底，或购置田产，当一名地主或富裕农民。同时，在对先辈传统的承续及自我的创造中，也发展、形成了自己一套大同小异的独特文化。这些文化的精蕴平时隐藏在他们细微而精的一举一动之中，在一些重大的节日，便显现为婚丧嫁娶的仪式与各种各样的集会、活动等民风民俗之中。而西塞山及它脚下的道士袱，也十分明显

地具有着这些特征。

在现代化的今天,西塞山作为军事要塞的功能已不复存在。但是,它分明又在发生着一些重大而突出的变化,进行着自我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山的西面,是张之洞创建的已有百年历史、沿江绵延十多公里的大冶钢厂,这里生产的钢铁源源不断地输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为机械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山的东南,是建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 170 钢厂,这是从原西德引进先进设备而建成的一座公园式、现代化的大型无缝钢管生产厂家。站在西塞山巅,放眼眺望,它已被四周的机械化、工业化的浪潮所包围。从另一角度而言,西塞山就是今日这些厂矿企业的象征,它摇身一变,就由一个具有两面性的古朴农民变成了一个头戴钢盔、身穿制服的产业工人。

置身世纪之交,经受现代化、信息化的强烈冲击,西塞山脚下的百年老厂——大冶钢厂,又面临着一场新的挑战:生产设备的更新、知识结构的调整、管理模式的改革、各种信息的吸收……它们都在催生一种新的工业与新的文明。那么,西塞山在这一改革创新的气氛浸润中,又得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了。

独特的西塞山,它浓缩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与变化,活脱脱就是从古代到近代而现代的国民艰难蜕变与转型的一个颇具形象的化身。

博大恢宏的唐朝,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它在我们眼里自然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历史时期。可是,那时的刘禹锡,面对兀然耸立的西塞山,就在吟哦慨叹、抒发感怀,展开了既富浪漫诗意、又具沉重之笔的“怀古”之韵。相对而言,西塞山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来说,真的是太古老太古老了!它的历史、军事、政治、经济与文化的长期积淀,本身就是一座新的令人仰止的

挺拔高山。古人长逝,包括他们创造的一切历史与文明,已不复再,无论后人怎样凭吊多么感怀,面对的都只能是一段厚重的历史,一页无法更改的沧桑。西塞山是古老的,又是常新的,它千百年来无言地耸立着,包容一切,涵盖一切,吞吐一切,依然那么年轻,风姿绰约。而我们也正跃动着、生活着、充实着,因此,怀古是为了更好地立足今天,展望明天,创造出一种远远超越古人的生活模式与完美人格。

禅语五祖寺

世界喧嚣浮躁，欲达禅境，着实不易。一个偶然的机，我来到中国禅宗的策源地——黄梅五祖寺，置身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人间佛界、摒弃纷纷攘攘的俗世尘缘，心智沉浸于弥漫萦绕的禅宗氛围中，默默地感受与体验，在迷蒙与达悟、执著与超拔、俗界与空无中反思历史，静观人生，遂得如下现代禅语呈示于世。



五祖寺位于距黄梅县城十八公里的东山之腰。当然，此处的东山可不是成语“东山再起”的那座东山。那座东山在今绍兴市内，东晋谢安曾隐居于此，后受朝廷征召出山再当大任。不过，本文所讲东山也不寻常，它乃大别山脉之余绪，海拔高度四百六十多米，呈凤凰形状，有灵气与飘逸流贯其间，寺庙建于三百米处的半山之腰。因此，远远望去，东山全无半点超脱凡世、威严凛然之感，倒像一个和颜慈目、豁达朴素的老人颐养天年。比照那泰山、武当山、九华山等名山古刹，其山势之高耸雄

伟、寺庙之险峻超拔，东山与五祖寺，就显得十分寒伧了。极其普通的山岭与寺庙，实在难以想象此处便是曾经风靡中华、名扬海外、影响至今的禅宗祖庭之所在。

然而，沿东山南麓缓缓上升的小径攀缘，行不多远，迎面耸立的释迦多宝如来佛塔给了我一个突如其来的惊奇。塔八角五级，高约六米。一座高仅六米的小塔，说它耸立，有点言过其实，但塔体的浑实与造型的简朴着实给我以强烈的震撼。塔的底座是一块凿成八角棱柱的岩石，呈立鼓状，墩厚而浑实；以上五层，外形皆无变化，只是逐级按比例缩小，每层以山蕉叶式出檐为界；达至顶端，便是一个莲瓣宝盖。除第一层南面雕凿有长方形佛龕，内供奉佛像外，其余皆未镂空，厚重的石块叠次相砌，保持着完整浑然的本色。它使我想起了西方锋芒毕露的哥特式教堂，想起了那些我曾拜谒过的高耸挺拔、精巧与超绝的名山宝塔，与它们相比，眼前的佛塔全然是另一种风格。它不以高大雄伟、精美剔透取胜，而以简朴浑厚卓然独立于世；它诉说的是别一种语言，透出的是禅的信息。禅与浮华权贵绝缘，于平凡处见精神，在日常生活中显露真性，以单纯自然彻悟真理。呵，禅！这就是禅！是的，释迦多宝如来佛塔犹如一位大智大慧的长者，以它脱俗的姿态、博大的内涵、默默的无语将我引导开启，使我窥见了禅之意蕴。由此，我才感到自己真正步入了禅境。

长方形石板直铺着蜿蜒向上，两旁是茂盛的树木。漫步古径，我默默地感受，认真地观赏，不愿放过一处微小独异的景点。当以禅的眼光看待世间万物之时，那么，禅便无处不在，无时不现了。我像一个天真好奇的孩童，观看苍松翠竹，谛听百鸟鸣唱，嗅闻花草芬芳……当我们以另一种方式，另一种角度面对世界拥抱世界时，自会有一种全新感受与深刻的认识贯通

心灵。我以为这便是人类超越自我的方式之一。

又一处景点令我流连注目，这便是西塔林。塔林是五祖寺埋藏方丈、主持与名僧的墓场，共有三个，分别为西塔林、东塔林与李塔林。西塔林为明代僧人开辟而成，原有墓塔五十多座，因人为拆毁、自然坍塌与洪水冲刷之故，现仅存二座。它们是千仞冈墓塔和瑞髻昌、廓庵合塔。

唯有方丈、主持、名僧才有资格建墓立塔，普通和尚是难以享受这种资格与待遇的。这当然是等级森严的一种反映，即便超凡脱尘的佛门禅宗也难以例外。但是，如果我们以宗教的也即禅的眼光来看待塔林，那当有一番新的解说了。禅境无穷，无论贵贱，只要虔诚地追求，人人皆能成为方丈、主持与名僧。禅的面前，人人自由平等。那么，建墓立塔便可看成是对僧众锲而不舍探索真理的一种激赏与鼓励了。

千仞冈墓塔由一块四方形青灰色岩石直立而成，长宽皆为零点三米，高二米多；另一瑞髻昌、廓庵合塔八角三级，高也不过五米。由此可见，它与奢侈华贵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为禅师作一生的见证，表明某禅师对禅宗的承前启后、源远流长尽过一份绵薄之力。禅师们的死，一是病死，二是老死。他们既不轻生自杀，也不追求长生，而是将生命视作一种自然。并且，他们开中华火葬之先：化青烟升空，与空气合一，与蓝天融汇，生死之潇洒与禅的境界化为一体。那塔下所葬，不过是禅师的骨灰与舍利而已，尸身早已遁入禅师们认定的“空”与“无”之中。

正如此思索着，我见到一个塔洞，形如三间小屋，四周均用青石板竖砌作墙，上面的顶盖也是青石板，洞穴的用途在此成为一种空有的形式。但是，这空空的洞穴却并非空洞无物，它本身具有的意义使我沉思不已。它到底在诉说些什么呢？有

一点是明确的，这塔林便是禅，无处不现的禅。禅师们并不放弃最后的一次努力在向世人昭示着玄妙无边、奥秘无穷的禅理。

二

沿石阶继续攀登，进老山门，过飞虹桥，见求儿塔，向左一转，便是五祖寺的主体建筑群了。

天王殿、大雄宝殿、毗卢殿、圣母殿、观音堂等殿堂，与我在别处所见的佛教建筑并无二致。进入殿堂，便是供奉的高大佛像；像前立香案，案上置香火供品；案前放蒲团，以供游人叩拜。一旁，还有一些新的庙堂正在施工。一进入五祖寺建筑群落的空间，我便感到了世间的纷繁与扰乱。游人如织，高声笑语喧哗不绝，小贩的吆喝与叫卖声充斥其间。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那些请求施舍的当代乞丐、卖纸香鞭炮及手持相机为你殷勤服务的个体户们的纠缠不休，还有鞭炮声、焚烧黄裱纸后飞舞的灰屑与呛人的烟雾。一位笑容甜美的姑娘令人无法拒绝地端着相机为我和同行的友人“咔嚓”一声后，至今没有收到她会许诺半月内寄来的照片，尽管我们向她缴纳了足够的费用。

建筑的威严高耸、斑斓华贵与芸芸众生的嬉戏喧闹、为利来往，与禅之本意实在大相径庭。五祖弘忍当初在此建庙传法，其意绝非如此。当然，他也无法预料、左右社会的发展与变化。这使我想到了宗教与世俗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宗教如果绝然超尘脱俗，藏之高山，悄然独立，那无疑于自取灭亡。它必须在尘世间传播教义，争取信徒，扩大影响。但是，如果过于世俗化，也会导致它的衰落与灭亡。这就存在着一个度的问题，如何在宗教与世俗间把握一个最佳契合点。宗教世俗化，

世俗宗教化,这是一种无法理清的怪圈与悖论。五祖寺建于公元654年,迄今为止,已焚毁过近十次。没有世俗,五祖寺早已荡然无存;因为世俗,五祖寺饱经沧桑。尽管面目全非,但它历经一千三百多年的风风雨雨,依然顽强地耸立于此,以后还会生生不息地与世长存。这流经历史的兴衰起落,是否本身也是一种禅,常人难以企及的大禅?宗弼禅师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另有禅师禅语云:“始随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天晴日头出,雨下地上湿”;“竹影扫阶尘不动,月穿潭底水无痕”……此等禅机妙语,能否使我们窥见历史与人生之奥秘于一斑呢?

三

不知不觉地,我步入了真身殿。此乃供奉五祖弘忍真身之所在。弘忍死后尸身不腐,未经密封、药物等处理,历经千百年仍完好如初,这实在是一个奇迹。可惜的是,弘忍真身已于1927年被毁;后塑有油沙像,“文革”初又毁;1984年,真身殿经过无数次兵火后重新翻修,于次年再次为弘忍塑像,现安放在塔内。也就是说,所谓的弘忍真身,已是三生之身了。尽管如此,我仍感到面对着的是一位活生生的禅学大师,是一位令后人永远崇敬的大师!

禅宗作为佛教的一个支派自达摩西土东来,经慧可、僧璨、道信,传至弘忍,使之中国化,始得畅行于世。在此之前,达摩禅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虽然争取到了部分僧众,在佛教界占据了一定的位置,但力量还很薄弱,地位远未巩固。慧可弟子倍受北方禅学派系排斥,又逢北周武帝灭法,为求生存与发展,不得不向南方转移,进入江淮之间的山林地区。弘忍二十

三岁那年，偶遇道信禅师而至黄梅县双峰山出家，学习僧业。二十八年（651年），弘忍得道信付传法衣而为中国第五代禅宗祖师。又三年，弘忍另辟道场东山寺，改革禅法，发扬禅学，而后几乎取代了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以来的以玄学为主的哲学思想。

弘忍学法于双峰山，传法于东山；唐高宗曾两次遣使诏弘忍入京，他固辞不赴。终其一生，弘忍足迹未出黄梅县境，而禅宗却经他手发展创造，教化大盛，风靡海内外。这在世界宗教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奇迹。这奇迹的关键在于他所倡导的“东山法门”，使印度禅宗中国化，方能在中华这块广袤肥沃的大地上开花结果。

具体而言，东山法门对禅宗的改造主要在于以下三点。

（一）改传经典。达摩以降，禅宗皆奉《楞伽经》为教旨，弘忍毅然将它易之为《金刚经》。改奉经典，其实质就是改革禅法，将主张静坐安心的渐悟法门改为主张顿悟成佛的禅学。道信传给弘忍的尽是渐悟禅法，弘忍一改师宗，的确需要一股非凡的勇气。这种勇气在于弘忍既通儒学，也通老庄之学，他深刻地认识到，欲使禅宗盛行，必须因势利导以适应中国的传统思想才能达到目的，而顿悟比渐悟更加适合中国民众的生存思维方式。

（二）农禅并重。从达摩到僧璨，禅僧一直沿袭印度僧侣乞食为生的清规，一衣一钵，不事农活，严戒杀生，云游四海。至道信后期，提出努力劳作、自食其力的主张。继而弘忍大力提倡以农为主，实行农禅并修。僧徒们聚集东山，白日劳作，晚间习禅。弘忍作为一代创业祖师，身体力行，常上山种植、砍柴、担水。这样，弘忍便把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紧密地结合到僧众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上来，与中国封建社会

的结构进一步得到协调。僧众可以不必依赖布施、乞食为生，也进一步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主动权。

（三）改革陈规。弘忍之前，禅宗在嗣法传承方式上一直是阶梯单传。但这种传统的师徒单传方式已不能适应迅速成长的禅法需要，为此，弘忍打破论资排辈的常规，采取分头开弘的传法方式。只要慧根浑厚，法门有路，均能受到他的器重。慧能来五祖寺习禅不过八月，便得到弘忍赏识，授之以禅学要义。弘忍僧徒中，得其法要者，见于史载的便有二十八人，他们各化一方，弘扬东山法门，遂使达摩一系禅学盛行全国。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弘忍的改革之所以成功，主要在于适应了封建社会的客观实际。

四

弘忍在他选择法嗣时对众僧说：“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呈示见解。若悟大意，付汝法衣，为第六代祖。”神秀乃书偈于南廊壁，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在碓房舂米的慧能闻说此偈，沉思良久，说道：“美则美矣，了则未了。”他虽不识文字，但也作一偈，请人代书于神秀偈旁：“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围绕这两首偈语及传授衣钵，引发出许多历史传奇来。归纳一下，其线索如下：弘忍见慧能偈后，大为欢喜，又见众人惊异，恐有人加害，便用鞋将偈擦掉，并伪言曰：“亦未见性。”暗地却约慧能至室，遮闭门窗，为他讲说《金刚经》，并授法衣，是为六祖。神秀乃弘忍大弟子，觉知自己的传承地位受到威胁，欲置慧能于死地，从而展开了一场刀光剑影的袈裟争夺战。在弘

忍及其他富有正义感的僧人帮助下，慧能走脱东山，渡江南下。神秀又派人追赶，其中将军出身的慧明行动敏捷，很快在赣南的大庾岭赶上了慧能。慧能将袈裟放在地上说：“衣钵表信，只是传统的证信，可以力争吗？”慧明去拿袈裟，却怎么也提不动，遂请慧能说法，当下大悟，感动得痛哭流涕，于是皈依慧能，改法名为道明……

一千多年来，围绕这一经过，后人以诸如戏曲、绘画、电影等形式加以传播，其悬念之扣人心弦，情节之曲折复杂，传奇之玄乎幽妙，令人倾倒。

但是，只要我们稍加留意，拨开千年障目的迷雾，就可以看清其本来面目。

从迄今为止的全部初期禅宗史料来看，弘忍虽重顿教，但也并未废弃渐教。本着大乘佛教普渡众生的宗旨，弘忍根据不同的对象，实行的是“密来自呈，当理与法”的传统方式。弘忍究竟传法与谁史书并无一致而确切的记载。其原因，事实上是他最终并未指定一具体的继承人。弘忍在东山传法的二十一年间，跟随学道者数以万计，常住门徒多达一千以上，可谓人才济济，得法者甚众。此后居山传道、各化一方者便达二十八人。

据《传法宝记》所述，神秀极受弘忍器重，临终前“无有付嘱”。弘忍死后，神秀隐居玉泉寺，十多年没有开法的设想，当然也就没有传法。可见神秀并无争法统的野心。他后来被武则天、唐中宗推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也非出于本意，曾一再要求还山未被应允，还会向中宗推荐过慧能，并亲自作出邀请。事实上，神秀与慧能之间并无纷争，更谈不上刀光剑影的袈裟争夺战了。南北禅宗之分，神秀与慧能理所当然地分别成为北宗、南宗的领袖。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北宗逐渐衰微，南宗日益兴盛，在南北禅宗的对抗中以绝对压倒的优势取胜。

“胜者王侯败者寇”，出现歪曲诋毁北宗及其首领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神秀一系毕竟是衰落了，以慧能所代表的南宗却日益走向兴盛。其原因何在？如果研究一下，是否可以使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思想与文化增加一些更深刻的认识呢？

北宗禅学也有过它的鼎盛期。在七世纪末至八世纪上半叶的近半个世纪内，盛行京洛，成为朝野、僧侣众所公认的正统禅法。据《宋高僧传》载：“两京皆宗神秀，若不念之鱼鲋附沼龙。”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到了贵族官僚的重视与扶持，另一方面也是接受本土儒家伦理道德与当时十分盛行的华严宗思想改造的结果。然而，北宗虽讲顿悟，但渐悟已成为修行的重点与中心；儒家的熏陶更使北宗不能摆脱守旧观念的束缚；加之北宗的社会基础是那些已趋衰落而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世族及他们卵翼下的知识分子，且北宗禅师中的相当一部分本身就是名门世族子弟，这样，北宗禅学走向衰落的历史命运也就无法避免了。

南宗禅直到慧能去世后的二十年中，其禅法一直默默无闻。安史之乱时，慧能的大弟子神会以九十岁的高龄为唐王朝筹募军饷，建立大功。唐肃宗由此十分敬重神会，此后敕立他为第七祖，慧能的南宗一派遂成为禅宗的正统。当然，南宗的兴盛更是内部教义的思想方式和日常生活方式完全中国化的结果。慧能出身樵夫，文墨不通，缺乏经典研究的兴趣，提倡“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学说，强调自心的觉悟，把本心的迷悟看作能否成佛的唯一标准。这样，便把广大佛教徒从浩繁的经卷、深奥的教义、传统的规范中解放出来。南宗以平民为对象，不依靠寺院、经典、佛像及一切表面的形式仪节，而是

与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富有世俗社会生动活泼的气息，将世俗与天国、凡夫与神佛相统一，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宗教革命。乃至唐武宗会昌年间灭佛毁法后，佛学别的宗派全部衰微，唯有南禅却反而更加兴盛发达了。

五

禅到底是什么？有人言，禅之大意在于悟心成佛。又有人说，禅就是大开悟眼以认识真理。耕云先生在《迈向生命底圆满》一书中则系统地将禅之要旨概括为四点：（一）禅是生命的永恒相；（二）禅是自他不二的所以然；（三）禅是心的原态，（四）禅是宇宙的唯一真实，是佛经所讲的实相，也就是真理。他们说的都是佛禅之精义。但禅毕竟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绝妙，不能依靠他为证悟得之，只有凭借独特的个体生命去感受、去体验、去领悟，才能拨开迷雾见真谛。

出真身殿，过法雨塔，登通天路，我继续向上，经五祖大满宝塔、象石，最后站在了讲经台上。顿时，我心头一亮，脑海里闪过一道灵光，一种大彻大悟的洞开豁然呈现，胸中升起一股愉悦自足的情感。

讲经台是一正方形平台，全用砂岩石块铺成，面积约六十多平方米。试想一下，一群僧众盘坐在山中一块宽阔的石台上聆听大师说法，下面是悬崖峭壁，万丈深渊，白云萦绕；头顶是红日高照，金光万道，蓝空如洗；阵阵清风夹带着鸟语花香、竹叶松影缓缓拂面，沁入心脾……此情此景，该是何等的惬意美妙啊！幽静、清雅、纯朴、深邃，与教堂、书院的学究迂阔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在这里，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人生在凝神静观中默然与天同行，超越了有限的人生束缚，体悟着宇宙万物的

奥秘、自然天道的规律。我即自然，自然即我，无欲无念，物我时空，融而为一。这，不是一种典型的禅又是什么？正是从这里，走出了一群生动活泼、执著追求的禅者。他们刻苦修行，超越物欲，把握自我，热爱人生，独立思考，大胆怀疑，穿行在中华广袤的大地与高耸的山峰之间，探求独立完整的人格表现，创造出一种积极向上的生存艺术，给中国的哲学思想、语言文字、文化风俗、文学艺术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远播海外。它历经千百年的风雨沧桑，犹如一朵永不衰败的奇葩，光洁鲜亮，多彩芬芳。魅力所至，乃使当今西方世界掀起了一股空前的禅学热潮。正所谓“果证千年，花开四叶；学行万里，名播五洲”。

缓缓步至东山顶峰，无甚庙堂建筑，不过几处遗址而已。极目远望，我被东山之幽谧、之深邃所震撼。向南，百里平川阡陌纵横，太白、龙感二湖镶嵌其间，好一幅美妙的田园风光！将目光继续远推，便是浩浩荡荡的万里长江与巍然耸立于大江之南的庐山了。环眺东西北面，群山簇拥，峰峦叠嶂，如大海汹涌的浪潮，正一波一波地涌向东山，涌入浩瀚博大的禅宗胸怀。下望，古寺建筑隐于半山腰间；脚底，两条河流似玉带将东山缠绕、装扮。这些山川河流、平畴湖泊、古寺建筑，构成一个完美的整体，正形象地向我展示着禅风禅骨，诉说着禅境禅语。

什么是禅？这就是禅！遍地皆禅！就看你去怎样感悟与体验了。

当然，禅也有大小，真伪之分；禅也有一个积累、渐进、飞跃的过程。小禅属渐进，大禅属飞跃，它们构成质与量的辩证关系。生活中需要大禅，但绝不排斥时时涌现的小禅。至于那些装模作样、捕风捉影的伪禅，人们将它形象地称之为“野狐禅”、“口头禅”，则必须坚决摒弃。

平凡朴实、生动活泼、博大精深的禅宗实在为人类价值信仰的批判与重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系。禅学大师遗留于世的真理及真身、舍利，无不向我们昭示着一种不灭的永恒。当我们以宗教般的热情与执著，在有限中体验无限，在历史中感受未来，在瞬间体验永恒，在此岸感受彼岸，那么，新信仰的曙光必将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破晓于世界的东方而照耀人类。

青铜时代

—

青铜时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部雄浑奇崛、辉煌灿烂的交响诗篇。

由青铜时代产生、积淀、结晶而成的青铜文化,历经千百年的风雨剥蚀、战争浩劫与自然淘汰,至今仍闪烁着动人的光芒。以重达八百七十五公斤的司母戊大方鼎、气势磅礴的曾侯乙编钟、精美绝伦的越王勾践剑为代表的青铜器物及其他传世的各种青铜礼器、食器、兵器,如鼎、缶、尊、爵、觚、斧、戈、戟、矛、弩等,无不向人们述说着青铜时代的多彩风姿,展示着青铜文化的丰富内涵,映射着青铜制作的高超技术……

青铜时代,是一个足可令每一个中国人感到回肠荡气、迷恋陶醉、骄傲自豪的伟大时代!

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面对光彩夺目的青铜器物,感叹赞赏之余,却因资料匮乏而对制作这些精美器物的原料——铜的开采过程、冶炼技术不甚明了,“史文阙佚,考古者为之茫然”,只好“姑且存而不论”。位于湖北省黄石市境内的大冶铜

绿山古铜矿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便很好地填补了这一空白,解决了远古时期铜是如何开采与冶炼这一重大的历史课题,被称为建国以来中国考古新发现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掘规模最大、生产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处古铜矿遗址,被中外专家学者认为“是世界冶金史上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

因此,青铜时代虽然已在翻卷的历史云烟中消逝了两千几百年,我们仍可在那卷帙浩繁的史籍中追寻它的依稀风采,在留存于世的青铜器物中感受它的脉搏跳动,在一种自北宋末年就开始有组织地研究的专门学问——金石学中见识它的精深绝妙,更可在发掘出土的铜绿山青铜冶炼遗址中感受它的博大宏伟。

1994年底,我受命创作一部反映青铜时代的大型历史剧《青铜九鼎》,不仅较为系统地研究了青铜文化,还在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住了几天,从感性上充分认识古代先民们在一个较为封闭的特殊环境中付出的艰辛劳动、闪现的聪明才华与创造的文明成果。

二

铜绿山所在地的铜铁矿藏非常丰富,经过好几千年的开采,至今储量仍相当可观,一个现代化的铜矿就坐落在古铜矿遗址博物馆附近。

很久以来,铜绿山周围满山遍野都是炼铜炉渣,覆盖面积约十四万平方米,最厚处三米多,总量至少在五十万吨以上。铜渣一直就在那儿堆着,风吹雨淋,日晒夜露,岁月悠悠,无人问津。一片废弃的铜渣在重功利与实用并为生存奔波挣扎的

普通人眼里,引不起多大的重视与注意,按说也是一桩十分平常的事情。

后来,铜绿山来了一支地质勘探队,一堆堆的铜渣自然就引起了这些被现代科学思想“洗过脑”的队员们的注目:这么多的冶炼遗物属谁人开采?是什么时代留存下来的?它们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历史事实?走访民间,有的说是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军攻占鄂城时在此安营扎寨,铸造兵器所留;有的讲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大军杀退金兵,制造大冶之剑遗存……传说纷纭,一时难以深入考究,也就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

直到1973年,当地矿工在电铲掘进到离地表四十多米深的古矿井里,发现了一批铜斧。几位爱好历史的工程技术人员对此既感到兴奋,又感到迷惑,我国在战国末期就已进入铁器时代,难道说唐宋时人还在使用这样的铜制工具开采铜矿吗?又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堆积的铜渣、迷离的传说、古老的铜斧……这一切,似乎都在向人们默默地诉说着一个久远而瑰丽、奇妙而宏伟、真实而迷人的历史事实。为了揭开笼罩着这一历史事实的神秘面纱,技术人员立即将铜斧送往中国历史博物馆,以求得到一个真实而圆满的答案与解说。

一支由中国历史博物馆和省、市、县、矿等共同组织的考古队伍很快赶赴现场,开展调查发掘。

于是,一个从西周历经春秋战国,一直延续到西汉的巨大古铜矿遗址这才被人们发现,并引起了轰动。

1984年底,我国第一座古铜矿遗址博物馆以它那特有的风姿在铜绿山古采矿遗址拔地而起,举世瞩目,吸引了无数中外游客。

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必然中带着很大的偶然性因素。如果没有地质勘探队的前期走访,如果没有那几把铜

斧的出土问世,如果没有引起现场工程技术人员的足够重视,如果没有他们对历史的极大兴趣,如果没有考古队的调查发掘……这一系列如果中,只要有一环出现断裂,也许铜绿山上遍布着的,还是一堆堆在世人眼中视为无用或累赘的“废物”。

在我们脚下这块生生不息、有过几千年灿烂文明的古老土地上,该有多少类似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文物宝库或是没有发现,或者无可挽回地惨遭毁弃,或在目光短浅的各种建设与开发的浪潮中日渐消失。

科学、理性而自觉地对待历史遗产,避免盲目与无序,开掘保护人类的共同文化财富,不仅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神圣使命,也是提高国民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

铜绿山海拔不到一百米,谈不上巍峨高大,但是地底却蕴藏着取之不竭的丰富矿藏。为了很好地保护国家重点文物,有关部门已决定不再对铜绿山进行现代露天开采。山上发掘的遗址有三处,博物馆修建在一号考古发掘现场,虽是一座没有多大特色的现代楼房,但建筑依照遗址特点、保护与陈列等要求设计规划,与周围的环境也就显得较为和谐。登上台阶,进入展厅,除了一旁陈列着的必要的模型、介绍与说明外,赫然映入眼帘的,就是大厅中心一块四百平方米的古代采矿遗址。

这是一块没有经过任何修饰与改动,完全保持了历史原貌的古代遗址。当时发掘出来是个什么样子,陈列时遗物的位置、样子都不改变,“原汤原汁”。它自然地裸露着,不加掩饰地袒呈着,穿越了两千七百多年的漫长时光向人们展示着它那独特的风采。没有战争及其他人为的破坏,没有刻意的修补、添加与点缀,时代如此久远而又保存得这么完整的历史文化遗迹,不仅在中国,恐怕在世界上也是难得一见的。

遗址中,一条条井巷纵横交错、层层叠压、密如蛛网。那些

支护着井架的树木，虽然经历了二千七百多年，仍牢牢地挺立支撑着。井架形状不一，或竖井，或斜巷，或平巷盲井，它们构成了一个向下挖掘、向前开采的完整体系。

先民们对铜的认识利用也有一个不断深化、开采技术不断发展的艰难过程。

石器时代末期，古人发现了一种明显优于石块的红铜，这是一种夹在石头中的天然纯铜，因外观呈现红色，所以就叫红铜。人们在对红铜的使用中慢慢地发明了熔铸术，掌握了从天然铜矿石里提炼铜质、冶熔青铜、铸铜成器的方法。于是，人类也就完成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过渡与转变，漫长的石器时代结束了，青铜时代的灿烂曙光喷薄而出。铜器的广泛使用必然导致用铜量的猛增，铜矿的开采也就显得相当重要了。

铜绿山何以得名？据清《大冶县志》记载，因其一带“山顶高平，巨石对峙，每骤雨过时，有铜绿如雪花小豆点缀土石之上。”由此可以想见，铜绿山的矿藏该是多么丰富，先民们只要根据地表的奇特面貌——雨后雪花般的铜绿就可以找到富矿。后来，人们又发现了一种名为铜草花的植物可以指示矿藏，开采也就更加广泛了。日子一长，地表的矿藏利用殆尽，自然要向地底掘进。巷道越挖越深，就得有支护的木框架撑持，才不致于坍塌塌方，才能保证开采的顺利进行。好在铜绿山周围山深林密，生长着各种各样茂盛的树木可供利用。他们选择了青刚栎、化香、豆梨等几种质地坚韧、弹性良好、可防虫害的树种作为支护原料。随着开采的不断加深，矿石被挖走后留下的空间越来越多，支撑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框架的方式也由榫卯式方框发展到搭接式方框。直到今天，这些支护方法还在矿井沿用，完全可以同现代木结构的支护媲美。

通过这种搭设支护井架的方式，先民们在没有任何金属机

械和动力的条件下,已将铜矿开采到地表六十米以下,这实在是一个堪称伟大的奇迹。

面对古老的遗址与出土的铜斧、铜镑、木杵、木臼、木钩、竹篾、草绳、木瓢、木桶、竹火签等大量工具,先民们当年开采铜矿的情景,便如浮雕般生动地凸现在我的眼前……

昏暗的井巷中,他们扬起手中的铜斧、铜镑、铜镢等开采工具,拚尽全身力气砍下,铜斧与坚硬的岩石碰撞着发出了清脆的响声与喷溅的火花。一下下,一声声,岩石被一点点地“啃”掉。矿工们把这些宝贝般的矿石装入竹筐,蜷缩身子,在曲里拐弯、狭窄潮湿的井巷中爬行着往外拖送。运到垂直的竖井,见得着一星亮光,他们把装满矿石的竹筐放到粗糙的木制机械工具上,然后由井口上面的工人完成下一道工序,将这些从地底深处采掘的铜矿石缓缓提升地面。

地底越来越深了,坑道里出现了积水,矿工们不得不使用木水槽、木撮瓢、木桶等工具排水。预定的矿脉采完,下一个目标在哪里?如何选择下一道矿脉?他们先将矿物碾成粉末放入木斗淘洗,比重小的被水冲走,比重大的就沉淀在木斗内。这时,他们点燃竹火签,在一簇簇跳跃的火光映照下仔细观察,沉淀物中有色颗粒多的就是富矿,少的便是贫矿。定好目标,稍作调整,开辟一条新的井巷,又向着另一道富脉矿体艰难掘进。上层采完了,只得转向更深的地底。巷道一深,通风也成了问题。于是,他们就利用空气对流原理,在一部分井筒底部升火,空气受热膨胀,必然形成一股强大的气流,将井下污浊的空气排出井外,新鲜的空气则随之从另一些井筒涌入补充。

先民们为了得到宝贵的矿石,利用当地、当时的简陋条件,在艰难地开掘着地底矿藏的同时,也在开采着大脑的丰富矿藏,将人类早期的朴素智慧几乎发挥到了极致。如果不是身临

其境感同身受,实在难以想象古人们能够凭借一些简单的木料、粗糙的工具一层一层地掘进到地底四十至六十米,并成功地解决了塌陷、通风、照明、运输、提升等难题。当然,他们的每一次努力与成功,都付出了相当残酷的代价。不说艰苦的劳作,即使长期无所事事地呆在狭窄、阴暗、潮湿、缺氧的井巷之中,在现代人来说,恐怕都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矿工们那些用以栖身、运输、掘进、开采的地底巷道实在是过于狭窄了,狭窄到今天一个中等身材的人赤手空拳也难以爬进爬出。对此,我们只能解释为近三千年以来人类身体素质的不断提高与进化。事实也是如此,古人身材一般都比较矮小,一些出土展览的完好古尸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而铜绿山的矿工们,长年累月地在地底生活、劳作,更是被恶劣的环境折磨得瘦骨嶙峋以致身体变异出现畸型。不难想象,矿工们患有多种无法医治的疾病,寿命一般都不会很长。他们是在以自己的身体、智慧、寿命为燃料,点亮了青铜文明的璀璨光芒……

博物馆内陈列的不过是一处已经发掘的采矿遗址,在铜绿山矿区底部,还埋藏着大量这样的古矿井。根据遗留在铜绿山附近八平方公里范围内堆积着的数十万吨古代矿渣推算,产铜量约为十万吨左右,如果以它作原料,可以铸造曾侯乙编钟四万套。古人留存的矿渣均呈薄片状,表面光滑,流动性能良好,冶炼温度控制在 1200°C 左右。专家们认为,渣好铜必好。经渣样分析表明,渣型合理,渣含铜大多低于 0.7% ,粗铜纯度已达 94% 。所有这些,似乎都在默默地告诉后人,铜绿山附近除了埋藏着古代大量先进的矿石开采遗址外,必有一套成熟的冶炼技术和相应的设施。为了揭示这一奥秘,考古队又在铜绿山一带重点发掘出古代炼铜遗址三处,共清理出古代炼铜炉二十七座。值得一书的是十一号矿体,发掘出土了西周至春秋时期

的炼铜炉八座,其中两座保存较为完整,炉体结构基本具备了现代鼓风炉的式样。在三千多年的西周时期,先民们就在使用鼓风竖炉冶炼,这不仅在中国冶金史上属首次发现,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鼓风炼铜竖炉是一种连续加料、间断排渣、排铜的高效率铜炉。用鼓风炉还原熔炼,不仅要求炉体坚固,结构合理,具备各种防护措施,还涉及到先进的设备及复杂的技术问题,比如需要一千多度的高温,需要相当的风量、风压的鼓风技术,需要相应的耐火材料,要控制好炉内的还原气氛,要掌握先进的配渣技术等等。鼓风竖炉在西方还是一个多世纪前随着多门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才出现的产物。国际上有史可查的运用鼓风竖炉还原冶炼的最早遗址位于法国里昂,它的确切年代是1828年。

铜绿山鼓风炼铜竖炉高达1.5米左右,由炉基、炉缸、炉身三部分组成。炉基置有垫石;炉缸底部设有风沟,利于防潮保温,可有效地防止炉缸冻结;炉体的不同部位使用了不同的耐火材料配制夯筑,为冶炼创造了十分理想的保温条件,所以,在当时炉温超过1200℃的状况下,竖炉能够正常操作、连续冶炼。

面对这一古代的先进炼铜技术,国际冶金史专家、美国教授麦丁情不自禁地赞叹道:“在世界其他地方,看了很多古代矿冶遗物,铜绿山才是第一流的。中东等地虽然很早就开始了铜矿的冶炼,但保存这样大规模的地下采掘遗址,较完好的冶炼用炉,炉渣温度高,流动性好,含铜量低是很少见的,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为了向人们形象地展示鼓风炼铜竖炉,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博物馆对它成功地进行了复原。站在复原的炼炉前,透过几千年的历史面纱,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群衣衫褴褛的古代矿工,他

们正围绕在竖炉四周艰辛地劳作：有的拿着石砧、石球敲击开采出来的矿石破碎选料，有的躬着身子正一屈一伸地拉着风箱，有的往炉内加送矿料、往炉底添加燃料，有的在认真地观察着炉内矿石的熔炼，以把握火候掌握结构变化……风声呼呼，炉火熊熊，矿工们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好一幅生动的古代矿工冶炼图！突然，铜水出炉了，艳艳的红流自炼炉的金门奔腾而出，一片耀眼的光芒，笼罩在竖炉上空。顿时，矿工们古铜色的脸膛闪过一股神圣的灵光，成功的喜悦与欢呼自他们的胸腔一如鲜亮的铜水奔涌而出，整个铜绿山似乎都在沸腾。这非同寻常的充满了科学与理性的光芒与声音，不仅扩散到当时的中华大地，更穿越了茫茫的历史时空，尽管它们是那么微弱，却分明不断地在我的眼前闪耀与耳畔回响……

三

以生产工具的发展为衡量标志，古代人类社会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这三个历史阶段。（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在石器时代前，还有一个木器时代。）

青铜时代是人类物资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二个时代，人类使用金属的第一个时代。

在石器时代末期，人类已经发现了红铜，因此，我们可以将红铜的使用视为青铜时代的先声。红铜就是天然纯铜，外观呈红色，故名。它往往夹在山间的石块里面，原始人在选择石器材料制作工具时，自然会碰上这种天然铜块。开始，他们不过把它当作一种普通的石材加以处理。在长期的捶打、敲击、剥制与琢磨过程中，他们发现红铜具有与普通石材迥异的性质，不易劈裂，可以锤薄、延展，并且具有赏心悦目的光泽。于是，

他们就把它制成小小的器物或精美的装饰品。后来又发现了红铜所具有的另一独特性质,它经过烈火熔化后不仅能够重新凝固,还可以根据需要改变原来的形状。人们以此为突破口发展演进,慢慢就发明了熔铸术,掌握了从天然铜矿石中提炼铜质、冶铜成器的方法。自此,人类对红铜的利用才与石器的打制最终区别开来,进入真正的金属时代。

红铜虽然不像石块那样易破易碎,不像石头那样难以改变形状,不像石器那样一旦破碎就要报废,但是,它的硬度较低,一般不宜于制作生产工具,并且天然铜块极为有限,这些弱点都限制了其优越性的有效发挥,没有引起社会经济面貌的重大变革,在生产工具史上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时代。因此,考古学家将这一独特时期称为“金石并用时代”,附着于新石器时代末期。

对石器取而代之的不是红铜,而是青铜!

青铜是铜与锡的合金,其颜色呈青灰色,所以称为青铜。红铜与锡都属软金属,但二者按照适当的比例配合炼成合金后,就具有了硬度高、熔点低、便于铸造、轮廓分明、不易锈蚀、外观美丽等兼有石器、红铜器的长处而又克服了二者不足的优越性能。于是,青铜被用来大量地制造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攻守武器,它的广泛使用,不仅促使社会经济面貌发生重大变化,更导致了社会制度的变更。

我国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由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历经了夏、商、西周、春秋等朝代,至战国末年即告结束,约一千七八百年。

我以为,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震天撼地的时期,当属那些历史的转型与变革时代,其中尤以生产力的革新并推动、导致生产关系的变更为最。以近代为例,西方的坚船重炮打开了中

国的大门,物质文明的侵入给广大的中国民众带来了无以言说的巨大痛苦与迷惑、失落与彷徨。在东西方两种不同文明的撞击中,他们震惊他们选择,终而发愤以图强盛,于是开始了巨大且艰难的变革与转型。依此类推,青铜这一先进生产原料的发明、出现与使用,也必然带来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更新;而生产力的发达,又将导致生产关系的萌芽与建立,这是一系列不可避免的连锁反应。事实也正是如此,青铜大量使用的结果,便是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与演变。

颇意味的是,我国奴隶制的发生、发展与衰亡不仅与青铜时代相始终,还与青铜时代最具代表性的青铜九鼎相生相灭。

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逐步架空了舜帝,接管了他手中的实权,然后将他流放于南方的蛮荒之地。后人为了美化大禹,便篡改为舜帝巡行至苍梧之野染病而亡。大禹治水成功后,便“收天下美铜铸九鼎,列分野以象九州”。因此,我们可以将大禹时期视为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过渡阶段。而到了他的儿子后,就干脆撕开了温情脉脉的遮羞布,置极有可能禅让接班的伯益于死地,从他父亲手中接过大权,确立了世袭王权制,成为父权家长制的始作俑者,开创了中国历史“家天下”的先河。至此,我国原始社会宣告结束,正式进入奴隶制国家社会,与其相生相伴的青铜时代也拉开了厚重的帷幕。

此后,青铜九鼎便成了王权的象征,为历代统治者所收藏。

战国时期,楚庄王曾挥军北伐,陈兵洛水,向周王朝炫耀武力,周定王派遣王孙满慰劳楚师,楚子便询问传国之宝九鼎的轻重与大小。楚子问鼎,即含有夺取周王朝天下的意思。后来,人们使用“问鼎”一词意指图谋夺取政权。那时,铜绿山早就成为楚国疆土,铜矿的开采、冶炼与利用为楚庄王的文功武

略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

战国末年,秦国丞相吕不韦领兵消灭西周,九鼎也被移往秦宫。此后,秦嬴政也就真的灭了六国,一统中国,成为君临天下的第一任皇帝。秦朝建立后,秦始皇尽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熔铸了十二个高大的铜人。秦始皇的这一举措,固然是为了销毁武器,削弱六国遗民的反抗力量。而那时,锋利的铁器早就开始大量使用,青铜时代已进入尾声,因此,铜人的铸造,也是铁器对青铜取而代之的一个象征。十多年后,秦朝灭亡,大禹打铸的青铜九鼎也就随之不知所终了。

秦汉以后,青铜生产虽然还在长期延续着,但是,它已不能代表中国物质文化的最高水平,只能算作青铜文化一息悠然仅存的余脉。

对青铜时代的定位与研究,主要取决于青铜所铸造的物件——青铜器。精美的青铜器能够长期保存下来,一方面在于青铜的物理、化学性能良好,不易侵蚀朽坏;另一方面,也在于人们对它的重视与珍爱。一般而言,青铜器具大多为贵族阶层所享受的高档用品,他们不仅生前使用,死后也要带入坟墓作为陪葬;也有遭遇意外出逃时将它们埋入地窖。于是,后人通过挖掘、盗墓等方式使得这些珍贵的青铜器“民间化”,从而流传于世。青铜器的制作代表了青铜时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实物形态综合反映了当时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风貌,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学术价值:对铜器生产过程的研究,可以了解当时冶金技术的发展程度;对青铜礼器、兵器、乐器、工具的研究,可以了解当时社会的生产水平、经济状况及贵族的生活、礼乐、战争等情况;对器物造型与纹饰的研究,可以把握古人的审美观念与心理崇尚;特别是青铜器上留下的铭文,更是一群“会说话”的古代见证,价值不可估量……青铜器有组织的研究始于

北宋末年,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著录的铜器已有七、八千件,从其上的铭文记载而言,大约有80%以上为周器,也有少数可以断定为商器。

郭沫若把中国青铜器时代分为滥觞期(殷商前期)、勃古期(殷商后期及周初成康昭穆之世)、开放期(恭懿以后至春秋中叶)、新式期(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四个历史时期。

我国的青铜时代属于商、周朝代,这一时期,也是奴隶制生产最盛的时候。商周铜器种类繁多,铸造极其精巧,造型奇特生动,纹饰繁缛华美,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与魅力。在青铜文明史上体积与重量堪称巨型的铜器也是出自这一时期。如商代的司母戊大方鼎,通耳高1.33米,重达875公斤;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一对大缶,每件重三百多公斤;同墓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更是举世闻名,总重量达二千五百多公斤,这套编钟发音清脆宏亮,每组铜钟的音阶都符合音律要求,至今仍可演奏音域宽广的乐曲。这些青铜器气势雄伟、蔚为壮观,而造型与纹饰却又显得那么精巧别致、玲珑剔透,融大气磅礴与典雅精致于一体,巧夺天工,令人拍案叫绝,在世界青铜文化之林中独具一格,以典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大放光彩。

四

由于青铜器的大量传世并凝聚、浓缩了青铜时代与青铜文明的诸多信息,后人的目光自然聚焦其上,从北宋年间开始,就形成了一种颇具专业性质的研究学问——金石学,传承、延续至今,可谓硕果累累矣。

然而,前人在对青铜器颇有建树的研究中,却有意无意地

忽略了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铜的开采与冶炼。这不仅因为前人的认识有限,更与开采与冶炼的资料匮乏及遗物的阙如密切相关。

古人对铜绿山古矿开采与冶炼所记载的文字资料至今连片言只语也无法找到。当时,矿工们仅只专注于艰辛的劳作,恐怕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要把他们的生产经验与生活方式形诸文字。先民们素以直观朴素见长,或是不善将日常的生产与生活上升至理性的高度,或是不愿立言。即以我国最伟大的哲学家老子、孔子而言,也是如此。老子若不出关,后人们也就见不到惜墨如金的五千言《道德经》;孔子的一部《论语》,并非他的亲自著述,也是后生们聆听教诲后记录整理而成的。在此,我可以肯定地断言,铜绿山的矿工们根本就没有留下相关的文字资料,在恶劣的环境、艰辛的劳作与疾病的折磨下,也许,在他们的头脑里连这一想法都不曾有过。如果没有留存的遗物,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只是一片茫茫的空白,当然也就无从着手研究了。

好在有了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根据实物实景,我们便可推测想象,恢复原貌,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了。对青铜的开采、冶炼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青铜文化的内涵,还可对青铜时代与青铜文化的整体研究起到实质性的突破与开拓作用。

在对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参观、研究与认识中,我发现了涉及中国文化及历史发展与走向的两个重大问题。

其一,当地除了大量的古矿井与为数众多的古熔炉外,却没有发现一处铸造作坊遗址。也就是说,铜绿山的矿石从地底开采出来,就近冶炼为一锭锭的粗铜后,即通过大冶湖进入长江水道,运往别处加工锻造,铸成一件件精美的青铜器具供贵族阶层享用。铜绿山所能做的,便是将那些炼成的粗糙铜块源

源不断地输出,铸造成器的最后一道工序,全然被统治者所垄断。他们没有使用铜块的权利,当然也就无法掌握铸造的精密技术,就连开矿使用的那些铜铸铜斧等青铜生产工具,也是从外地输送进来的。

这一情形不唯古代,即使今天,铜绿山所在的黄石市也没有多大改变。黄石素有江南聚宝盆之称,丰富的矿产自然使得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祖祖辈辈感到由衷的自豪。然而,丰富的资源在给当地人民带来荣耀与财富的同时,也在他们的心灵深处产生了一种可怕的情性——“靠山吃山”。如果能靠捡矿石吃饭,靠卖资源发财,谁还愿去绞尽脑汁、费心尽力地开拓新的发展之路?因此,长期以来,当地民众、当地企业大都围着开山挖石兜圈子,半饥半饱地吃着“资源饭”,以致错过了一次又一次调整结构、自我完善、经济腾飞的良机。

今日现代化的露天开采已将当年的铜绿山从原海拔一百多米的山峰降成凹入地底的锅形山谷,一台台穿孔机飞转着天轮,一部部电铲自如地伸展着钢铁巨臂,一辆辆大型卡车往来如梭;地底的开采已深入山体六百米以下,一条条上下盘旋的幽长隧道简直就是一座座复杂的迷宫,在铜矿技术人员的引导及讲解下,也弄得我晕头转脑,不辨东西。现在无论露天开采,还是地底作业,与先民们那屈身井巷的手工掘进,自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铜绿山矿的冶炼,也全部实行了大规模的机械化与自动化,一座座高大的厂房,一台台磨碎、搅拌、熔炼的机械设备,依山而架的一根根粗大管道,不知不觉地将你从眼前的现实拉回远古的竖炉,两相比较,你不禁更为现代文明的发达而感到由衷的惊叹。

尽管如此,可自古以来“吃资源饭”的格局与模式却没有半点变化。铜块冶炼后,仍是运往外地再行精加工。若以 1994

年的价格而言,一吨粗铜 1.8 万元,经过电解后可增值到 2.3 万元,而加工成漆包线就变成了 4 万元。如果黄石运出的不是粗铜,而是加工后的漆包线,一吨就可增值 2.2 万元。黄石市每年生产粗铜约 6 万吨,如果自己消化加工一半,那该增值多少?这笔账人人都会算,可因历史的惰性、认识的限制与条件的束缚,一时就是难以改变,无法转轨。

对资源和传统产业的过分依赖,必然导致经济结构的失调,形成大投入、高耗能、重污染的产业格局。况且,资源不能再生,总有穷尽之日。如果长期陷于短视,我们必将对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不唯黄石,许多地方乃至整个国家,都存在着“靠山吃山”的依赖与惰性。过去,我们总是一个劲地念叨祖国地大物博,并为此豪情满怀。然而,当我们从自我陶醉的迷梦中醒来睁眼一瞧时,东边地狭物薄的蕞尔小国日本却又一次跑在了我们的前面。具有丰富的资源当然不错,而能够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并善于借用别人(包括外地与外国)的资源,才是一种真正的本事!

其次,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堆积层由近及远地包括近期堆积层,地表扰乱层,隋唐堆积层,战国至春秋堆积层,春秋早、中期堆积层,西周晚期堆积层六个层次。这些堆积虽然年代不同、层次有别,但显示出的冶炼技术与指标却是一脉相承。它向我们十分清楚地表明,我国数千年的冶金史从烧陶到炼铜,从炼铜鼓风炉的应用与完善,都是沿着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自成体系,很少借鉴与交流。

最早使用青铜的是巴比伦人,这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那里的资源主要为丰富的天然气、石油气和石油胶,再就是脚下的泥土、地底的矿石。于是,他们就将泥土、矿石与火这

些丰富的资源结合在一起,发明了陶瓷、砖瓦、青铜、铁、玻璃等先进的物质文明。巴比伦人使用青铜的时间远比中国早,因燃料与原材料的不同,他们的冶炼体系与我国古代自然有别,优劣互现。如能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必能产生新的质变与飞跃,出现新的矿冶发展格局。可是,我国丰富的铜矿资源大多位于南方,据《尚书·禹贡》所记,九州之中,贡金三品的仅为荆州与扬州。金三品即铜、金、银三种,其中尤以铜为主。古代交通不便,而荆州、扬州与巴比伦一东一西,而矿冶又受着地理环境与条件的严格限制,也就难以相互沟通交流,只有封闭地依照自己的特点一脉相承地发展着。而中国文明又过于早熟,到了一定时期,也就进入了它的鼎盛期与顶峰期,再往前走,要么停滞不前,要么进入一条死胡同。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尽管当地仍储藏着丰富的铜矿资源,可开采与冶炼却不知于何时消失殆尽,留给后人的,不过是一堆堆遗弃的矿渣、一座座废弃的竖炉、一道道深埋的矿井、一层层不同的堆积、一个个难解的哑谜而已。即使古代的采矿、冶炼技术没有消失,一如继往地向前发展着,因受体系、条件的制约,也永远不可能发展到机械化的自动开采与冶炼。今日的开采、冶炼技术与模式,纯属引进与“拿来”之物。

扯远了,还是让我们回到“青铜时代”这一话题。尽管铜器的最早使用不在中国,但我们的祖先在青铜时代以聪明的智慧,以其独有的体系创造出了无与伦比的青铜文化,在世界上曾长期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青铜文明的衰落是历史的必然,青铜由铁器取代是人类进步的表征。人类的文明总是不断地由旧时代向新时代递进、演变、发展,每一时代都有它独特的内涵,只有领会并把握住时代的本质,才能登上时代的顶峰,创造时代的辉煌。而我们的祖

先在青铜时代,正是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研究青铜时代,借鉴古人智慧,对我们反思近代工业文明的落后,把握新时代的内涵与本质,在跨世纪之交的今天有着非同寻常的积极意义。

古城荆州

—

荆州之名,由来已久。相传上古时代大禹治水定天下,置九州,荆州即为全国的九个州之一。对此,《禹贡》等书曾有过“荆及衡阳惟荆州”的记述。汉武帝时,设置荆州刺史部,将其治所称作荆州城。于是,荆州定为城名和作为行政区划名,便一直沿用至今。

从小就生活在古楚国心脏腹地的我,对荆州古城自然是仰慕久之。然而,有好几次,我到了沙市市,离荆州城也不过十里之遥了,却因种种原因而与它失之交臂。这未免令人颇感遗憾,第一次进入荆州古城,我已经二十三岁了。二十三岁的我,还在公安县城的一所小学里当着最后一年的“孩子王”。那年,正是我人生中最为苦闷的一个艰难时期。我不知道那日复一日、枯燥难捱的教书生涯何时才是尽头,不知道未来的人生之路到底该怎样选择,不知道常常萌动着的青春冲动会将一个怎样的“她”推在我的面前……我渴望拥有一切却又真正的一无所有,脑里装满了囫圇吞下的古今中外文学、哲学、政治、历史

等各类名著，作着漫无边际的玄想，作着一些朦胧瑰丽的美梦，一颗敏感的心灵伸出无数长长的触角追求着、探知着，既无所适从又多愁善感。正是在这种独特的生存状态与心灵境况下，我第一次走进了荆州古城。

那年，挚友甘能行正在荆州师范专科学校进修学习。下车后，我便直奔该校找到了他。荆州师专坐落在古城西南，紧傍古城墙。晚饭后，甘能行陪我散步，我们海阔天空地聊着，不知不觉地走上了城墙。荆州的城墙实在是太古老了，宽厚的脚基土墙攀附着一些藤蔓植物，散布着由蛇、獾、兔等动物打掘的许多或大或小的洞穴；城头的砖墙不知砌于何时，块块青砖在风霜雨雪的侵蚀中早已斑驳，仿佛一位风烛残年、长着满脸老年斑的老人。这座古老的城墙，早已失去防护与战略意义，它的存在，也如一位有过骄傲的青春年华、有过火红的丰收岁月如今已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迈之年的老人，不过是一道没有散尽的余晖，一个自然生命过渡的必然阶段，某种可以不断昭示启迪世人的象征。此时，夕阳西下，一抹阳光斜斜地照了过来，将古老的城墙染得一片血红。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昔日发生在荆州城头那一场场充满了血腥的战争。作为历史见证的城墙仍在，那血腥已随风雨飘逝远去而永远不再。古老的城墙、西下的夕阳，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是那么奇妙地融为一体。而置身于天地间的我们，脚踏城墙，沐浴阳光，沿着蜿蜒的城墙就那么晃悠悠地走着。漫步于我们，不过是一种可长可短、可快可慢的过程，心之所系全在相互间的谈话。以古老的城墙作观照，话题自然离不了历史，但我们谈得更多的还是当下的现实与充满了希望的未来。时令已值初秋，可城头墙边的野草树木还旺盛着苍翠的浓绿，墙外护城河中静静的河水犹如一块硕大的碧玉闪烁着绿色的光芒。绿色，是生命的符号，是活力的体现，是

盎然的青春。它们依附城墙而在，却与衰颓的城墙形成强烈的反差。于是，我的心灵之弦被一双看不见的巧手在轻轻地、轻轻地弹拨着，声音越来越大，慢慢地就在我胸腔间轰响共鸣。青灰与土黄相杂的城墙、艳红的夕阳、苍翠的草木、绿色的河水，这些艳丽丰富的各种色调，它们对比悬殊，却又显得那么和谐，交融着构成了一幅美妙的油画。而我，就置身在这油画中间。突然间，我仿佛受到天后，一道灵光闪过，胸中一片光明。不知怎么回事，心头一直压抑、充斥着的那些迷惘、彷徨、孤寂、苦闷、忧郁等情绪不觉一扫而空。我唯一的感受，便如周围的风光，城墙千百年来静静而卧，草木尽情地展示着应有的风姿蓬勃而生，晚霞燃烧过后，天空现出一轮皎皎明月。一时间，我的心中，只觉一片澄明，大有“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之境……

第一次走进荆州古城，它就给了我一种无可言说的天后，使我的生命获得了一种丰沛的力量，焕发出了一种别样的风姿。那天傍晚在荆州城墙的散步与谈话，仿佛成了我与友人生命的一道界碑。此后不久，我即告别了漫长的教师生涯，而能行君也南下深圳开辟他人生的另一道亮丽风景去了。

第一次荆州之行，我就从心底喜欢上了这座古老的城镇。此后，我总是不放过每一个机会，不断地进入荆州，转转名胜，逛逛古迹，走走城墙，还常常乘车自东门而入，从西门而出，穿越整个狭长的古城。最近一次游览，是1998年的初秋，我从武汉赶回故乡，又特地逗留古城，逛了荆州博物馆，登了西门，走了城墙。

荆州古城就像一本内涵丰富、奥秘无穷的大书，随着我的不断深入与翻阅，它那悠久的历史与多彩的丰姿便一点点地在我眼前展开、呈现，一天天地变得生动而鲜活起来。

二

荆州城建之初，是没有城墙的，也不叫荆州。

春秋初期，楚国随着国力的不断强盛与领土的不断拓展，为了更好地控制征服之地，窥伺中原诸夏，于楚文王元年（前689），将都城从宜城县东迁至纪南城。纪南城位于现荆州城北约五公里处，因在纪山之南，故名纪南，又称“郢”。郢都地处江汉平原腹地，兼有水陆之便，东接云梦，西扼巫巴，北连中原通衢，南临长江天险，不仅自然条件优越，且战略地位尤其重要。郢都四周，皆为一望无际的坦荡平原，为了防守，不得不修筑高大的城墙。城墙全用黄土堆垒而成，有的地段高达一至两丈。郢都总面积十六平方公里，比现在的荆州古城要大两倍多。

那时，长江河道还未南移，现在的荆州城址濒临长江，当地虽然生活着居民，也有最初的城郭，但根本不成规模与气候。郢都建成之后，楚王的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了位于长江之滨的这块风水宝地，就在岸边修建了官船码头，筑起了豪华的宫殿，名曰“渚宫”，意为别居之宫，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楚王的临江别墅。于是，原来不甚起眼的地盘，眨眼间就变成了楚都出入长江的门户、楚王消闲度假的别宫、民众汇集的热闹所在。此后，古人常将渚宫作为楚都和荆州城的代称，如唐人余知古编了一本记述楚国掌故的杂史，书名就叫《渚宫故事》；南朝梁元帝在此称帝，史书便载“即帝位于渚宫”。

楚国，又名荆楚，一度是春秋战国时诸侯各国中地盘最大、国力最强的王国。集楚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于一身的楚都纪南，建城之初，即足称雄阔而繁华，是当时南方最大的城市及我国最大的都会之一。陆游曾在《楚宫行》一诗中写道：

“汉水方城一何壮，大路并驰车百辆。”汉代哲学家桓谭在《新论》中描写当时纪南城内的盛况为：“车挂毂，民摩肩，市路相交，号为朝衣新而暮衣弊。”车碰车，人挨人，早晨出门穿的新衣服，晚上就已挤成旧衣了。以致今日，民间仍将楚都纪南城称作“挤烂城”。

楚国的迁都与郢都纪南的发达，为荆州城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有利契机。当时的渚宫，作为楚都通往长江的门户与楚王常常光顾的出入之所，一定是商贾云集、车鳞马嘶，一派兴旺，正所谓“渚宫自昔称繁盛，二十一万肩相摩。”

然而，随着秦国的日益强盛与楚国的逐渐衰弱，郢都城遭受了一场永劫不复的灾难。

就在郢都建城四百四十一年后的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军大举进攻楚国，锐不可挡，楚军连连惨败，秦国大将白起率军深入楚国腹地，很快就攻陷了郢都。纪南城破，秦军即对昔日的宿敌、抗秦力量最强的楚人开始了疯狂的报复行为。残暴的屠杀与抢掠过后，他们焚烧宫殿，将繁华的郢都变成一片焦土，余波所及，一把大火，将楚先王的陵墓区也烧了个一干二净。

历经二十个楚王的郢都纪南城就这样无可挽回地衰落了，此后再也没有中兴过。两千多年后的今天，那方圆数十里的城址之上，已是稻麦青青、阡陌交错、农户散落、炊烟袅袅，一派典型的田园风光。然而，昔日那长蛇般蜿蜒的莽莽城垣、高大的烽火台、大型宫殿及手工作坊基址等，至今犹可辨认。站在镌刻着“楚纪南故城”五个大字的石碑前，面对眼前这些历经了两千多年岁月侵蚀的郢都遗迹及随处可见的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遥想当年华丽炫目的宫殿、纵横交错的街道、摩肩接踵的人群及喧嚣嘈杂的市声，真有一种沧海桑田的感慨。

可是,渚宫不仅没有随着郢都纪南的覆没而消失,它反而变得更加繁荣昌盛了。

渚宫因郢都而发迹,因了临江这一便利的地理位置,也许,它的发展有朝一日可能超过纪南。但是,如果没有郢都的猝然毁灭,渚宫至少将有一段漫长的岁月长期居于纪南的陪衬地位。

郢都虽然消失了,但荆州地区这一优越的自然环境与重要的战略位置需要一座新的都城,恢复并完善昔日纪南城的多重功能。于是,由已有一定基础、规模与气候的渚宫取而代之,便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了。

仿佛一夜之间,一颗耀眼的星辰闪烁在辽阔的夜空,跃升至历史的表面,出现在世人的眼前。

“渚宫”长大了,它成了秦王设立的南郡及江陵县的治所。

此时,渚宫之名也消失了,由江陵取而代之。何以名为江陵?不仅与“以地临江”有关,也因“近州无高山,所有皆陵阜,故名江陵”。

就像古人的名字一样,除了名而外,还有字、号、别号、雅号等称谓。荆州古城正式名为荆州,是因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将汉代疆域推向全盛,于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首次在郡上设州,置荆州为全国十三州之一,江陵城又成了荆州地方政区治所,荆州城遂正式定名。

由楚王的临江别墅、郢都陪衬“渚宫”,到南郡、江陵县治所“江陵”,再过渡到身兼县、郡、州地方政区治所的“荆州”,荆州城一步步地发展、演变、定型而至成熟,终于在三国时期揭开了它轰轰烈烈的一幕。

三

“闻听三国事，每欲到荆州。”

在我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三国演义》中，描写人物着墨最多者当数诸葛亮，而涉及地方最多的则为荆州，洋洋一百二十回本，就有七十多回与荆州之争有关。围绕荆州归属展开的一幕幕惊天动地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被《三国演义》渲染得生动传神、激荡人心、引人入胜、震铄古今。

魏、蜀、吴的鼎立与战争将三国时期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们一个个走马灯似地推到荆州这一争夺的焦点与前哨，上演了一出有声有色的历史活剧。诸葛亮、刘备、关羽、曹操、孙权、吕蒙等在中国历史上属于顶尖级的英雄人物，在荆州城展开了一场智慧、谋略、力量与意志的碰撞与较量。一个需要英雄并且诞生了一大批英雄的时代，他们为了各自的王国与利益，凭借可资利用的外部条件，将个人内在的潜能几乎发挥到了极致。荆州，以其异常重要的战略地位，仿佛磁铁般紧紧地吸附着一个又一个真正的英雄在此显露才华、施展抱负；同时，荆州也因这些三国英雄的伟大与璀璨而显得更加辉煌夺目。英雄与名城，二者有机地融汇一体，那逼人的光华直到今天仍闪烁在中华民族历史的天空。

荆州城的战略地位何以如此重要？究其因素，不外有三：

一为山川之险。它南有长江天堑，北有襄阳之蔽，东有武昌之援，西有夷陵之防，地势险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故此，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写道：“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也。”

二有经济后盾。古谚曰，“湖广熟，天下足。”位于两湖中心

地带的古城荆州，居于江汉平原之中，江河湖泊蜿蜒、散布其间。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盛，富饶的资源为荆州提供了充足的军用粮草。

三是交通之便。渡江南下可经洞庭湖至湘水而达岭南，溯江西上可通巴蜀，顺江东下可达吴越，北有大道直抵中原。荆州古城以中心辐辏的地位，据有贯通南北、左右东西的天然优势。

这块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在三国时期又显得尤为重要，就魏、蜀、吴三国的地盘、人口、人才、资源等分布情况而言，虽各有所长，但取长截短，总合起来，则相当匀称，可谓势均力敌，足以构成三角对峙、三国对抗的局面。而军事重镇荆州，又正好处于魏、蜀、吴的交接之地。于是，荆州就变成了三国间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谁得荆州，谁就可以增加一倍半的力量，就有可能乘势席卷中原，一统天下，也就难怪曹操、孙权、刘备都要举全国之力拼死争夺了。

发生在三国时期的荆州争夺战，数十年间几乎就没有间断过。小型的忽略不计，仅规模较大的，就有十三四次。

作为一代枭雄曹操，自然深知荆州之重要。因此，他的荆州战略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意义，直接关涉统一大业能否完成。对待荆州，他显得相当慎重。平定北方，有了一个安宁的内廷与稳固的后方，他才倾全国之兵，率军南征，直取江陵。以今日的眼光来分析，曹操这一总的荆州战略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孙、刘联合的局面，曹操对此估计不足，而征战的一连串胜利又助长了他轻敌的情绪，加上天时地理等客观因素，曹操终于功亏一篑，惨败赤壁，使得荆州得而复失，统一大业化为泡影。曹操英武一世，却因荆州战略的彻底失败导致了他人生中最大的失误与遗憾。

刘备与荆州的关系更为密切，他的荆州战略，基于诸葛亮的一篇《隆中对》。当时，刘备连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都没有，今天依附这个，明天投靠那位，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而他偏偏又胸怀复兴汉室的雄心壮志，于是，对诸葛亮的先取荆州作为基地，再向益州发展的战略不禁击节赞赏，并确定为他的立国战略。在依附刘表期间，他就开始着意经营荆州了。广交名士，招揽人才，体恤百姓，布施仁慈，一时间，刘备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此后，他竭尽全力与东吴联手抗曹，赤壁之战后向孙权借来荆州，荆州失掉后又不惜倾全国之兵争夺，结果惨败而归染疾而终，复兴汉室也就成了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荆州，是刘备建国称帝之基，也是他事业受阻不能如愿以偿之痛，真是成也荆州，败也荆州。

荆州对孙权来说，也是他的命根子，他将荆州视为东吴保守江东、发展势力的一个重要门户，只有占领荆州，才能雄据长江。为了夺取荆州，他不惜背弃吴蜀联盟而向曹魏俯首称臣；为了保住荆州，又与蜀汉恢复联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简直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终其数十年之久的三国时期，对荆州影响最大的当数关羽。

刘备借到荆州后，将守备重任托付给他忠诚不二的结义兄弟关羽。关羽身经百战，骁勇无敌，可谓能攻善守，文武兼备。从北打到南、从东攻到西的关羽，不谈什么政治、经济、军事与外交，仅从地理位置而言，他也懂得荆州该是何等的重要。因此，关羽对东吴与曹魏的防守相当严密，很长时间没有半点疏忽。仅从现存史料而言，有关荆州城墙的修建记载，最早即为三国时关羽驻防期间。为了很好地保住荆州，惯征善战的关羽不得不下马指挥普通百姓参与城池建设，担负起总建筑师的使

命。他在原有城郭的基础上，将荆州城分为不同的区域，出于战争与防守的目的，对旧有建筑或拆迁、或毁弃、或重建、或修葺、或扩充，形成了一个多功能的军事重镇。最值得一书的，就是修了一道高大厚实的土筑城墙。坚固的城墙、关羽的骁勇与严密的防守结合在一起，荆州城可谓固若金汤矣。

然而，关羽在成功地防守荆州十年有余后，还是麻痹大意，令人惋惜地丢失了这一军事重镇。其原因何在？问题出就出在他率领全军主力进攻襄樊而又与孙权严重失和。

关羽攻取襄樊，荆州兵力必然减弱。即使如此，仅凭地利，守个十天半月，关羽也能回军救援。没想到以吕蒙为最高统帅的东吴军队却来了个化装偷袭，轻取公安，招降荆州。

据《水经注》所载，当关羽闻听东吴袭取荆州之事，即傲气十足地说道：“此城吾所筑，不可攻也。”荆州城墙之高大与坚固，由此可见一斑。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东吴并未强攻硬取，而是出其不意地偷袭得手。此时的关羽，仍想攻下襄樊后再回军救援荆州，而曹操援军已到。眼见攻取襄樊无望，关羽这才不得已回师荆州，还未赶到，就在半路上听说守军早已投降东吴。荆州城失，关羽深知难以夺回。自己所筑之城，反而成了阻止自己进攻的坚固的屏障。无奈之际，关羽只得西走麦城，落了个身首异处的可悲结局。

关羽大意失掉荆州，不仅自己全军覆没，更为蜀国带来了一连串恶果，他的结义兄弟张飞、刘备因此而先后丧命，而诸葛亮《隆中对》中所规划的复兴汉室、统一中国的宏伟大业就此化为一缕青烟，永远飘散在历史的深处。

关羽虽败，但民间百姓并不以“胜者王侯败者寇”的评判标准待之，他们看重的是他刮骨疗毒的坚强、过关斩将的骁勇、忠贞不二的信义以及坐怀不乱的磊落等英雄本色。因此，荆州城

内有关三国的传说古迹及纪念性建筑数关羽最多,如关羽刮骨疗毒故地、马跑泉、点将台、掷甲山、关庙、春秋阁等等都是。

四

三国归晋,中国统一,天下平安无事,荆州也就波澜不惊。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只要局势动荡、天下纷争,荆州即首当其冲,成为各方政治人物、军事力量注目、争夺的中心。

东晋年间,长期不断的南北战争及内部混乱,使得荆州再次成为各派政治势力角逐争夺的焦点,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荆州战争高潮。

东晋王朝在丧失了北方的大部领土后,定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偏安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于是,顺江东下即可威胁国都、率军北上则能直逼宛洛收取失地的荆州,顺理成章地就成了东晋政府的一块“风水宝地”。

除桓温占据荆州时于公元 354 年、公元 356 年两伐中原外,此后东晋王朝其他各派势力看好荆州,其目的都不是为了收复失地,而是将它作为争权夺利、威逼王室、窃取皇位的一个重要筹码。

国难当头,外患频仍,东晋王朝却内讧不已,围绕荆州展开了一场无穷无尽的内耗,弄得东晋国力更加衰微。

这场你争我夺的战争,断断续续打了百年之久,一个个与三国英雄相比大为逊色的角色,“你方唱罢我登场”。对于这段令人丧气的历史,我实在不肯浪费自己的笔墨,可又无可绕过,唯有简要述之而已。

桓温死后,幼子桓玄借重所据之荆州,以讨伐司马道子为名,聚兵东下,被推为盟主,后逼晋安帝退位,自称皇帝;北府兵

统帅刘裕密谋起兵杀掉桓玄，进占荆州；桓玄侄儿桓振反攻荆州，再度陷城，自号荆州刺史；晋军合力进攻，桓振兵败被斩，窥视晋国神器的桓氏一族，由此遭致满门抄斩之祸。此后，豫州刺史刘毅又领荆州刺史，移镇江陵，极力培植私人势力，引来已执掌朝政的车骑将军、侍中刘裕的不满，命中军太尉王镇恶征讨，刘毅败北自缢而亡。公元420年，刘裕代晋称帝，国号宋，他深知荆州之重，为此，派任荆州刺史的全是自家子侄，同时又将荆州的管辖范围缩小到原来的四分之一，削减荆州地区的战略地位，这场百年内耗才告平息。

刘宋以后，南朝的齐和帝萧宝融、梁元帝萧绎、后梁宣帝萧岿等曾先后在荆州城建都，这一阶段的战争规模皆逊于以前。然而，发生在梁元帝承圣三年（555）梁朝与西魏之间的一场战争却值得大书而特书。其实，这场魏梁之战的规模并不宏大，也谈不上激烈，它导致的直接后果也就是建国仅只三年、一个并不怎么起眼的小小朝廷的覆亡。可是，发生在这场战争尾声的江陵焚书，却在中国文化史上造成了一场无法挽回的空前浩劫。这是一件比东晋王朝旷日持久的内部倾轧更加令人丧气、伤心的悲惨事件，也是荆州建城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

梁元帝萧绎虽然自幼瞎了一只眼睛，但他五岁时就能背出《曲礼》上半部。据《梁书·元帝纪》所载，梁元帝“博总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性不好声色，颇有高名”。终其一生，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爱读书、爱讲书、爱著书、爱藏书。他读书破万卷，著有《孝德传》、《忠臣传》、《周易讲书》、《内典博要》等文集四百多卷。萧绎还常为手下的大臣、将士们讲书，比如自公元554年10月19日开始他在荆州城内的龙光殿为部下讲解《老子》，11月23日，得知魏军已到达襄阳，这才停止讲课，宣布戒严。过了四天，他见边境并没有什么了

不得的动静，便又恢复讲课。大敌当前，那些文武将士，只得身穿朝服或军装，毕恭毕敬地听他谈玄讲道。出于对书籍的爱好的，梁元帝更是广搜藏书。侯景之乱平息后，时任湘东王的他即下令将文德殿的藏书与搜集到的公私藏书共计七万多卷从建康运回荆州城内。加上他以前的旧藏及不断搜回的书籍，元帝宫中藏书已多达十四万卷。

十四万卷图书，算得上当时中国的藏书之最了。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儒学经典就少了。汉武帝时，设置了专门机构收集散落民间的各种图书。汉哀帝时，共得图书三万三千零九十卷，分成七类，编为《七略》。王莽覆灭时，宫中图书焚烧一空。东汉建立后，形成了一股重视学术文化的风气，各地纷纷献书，皇宫中的藏书又相当充足了。董卓之乱时，曾遭到军人的抢掠与毁弃，但运往长安的还有七十多车。没想到长安也沦于战乱，这些书籍又被一扫而光。魏国建立后，开始收集民间藏书，加上古墓中发掘出来的一批典籍，共得图书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又在“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中荡然无存。也就是说，当历史延续到南北朝时，北方藏书已不成规模了。而南方自东晋立国后好不容易搜集在一起的七万多卷书籍，也被萧绎运到了荆州城。由此可见，荆州算得上当时中国的文化收藏中心了。这些经过战乱幸存下来的典籍，在印刷技术还没有形成的情况下，它们都是些稿本或抄本，其中还有一大批属于海内孤本，也就显得更加珍贵了。

然而，这么多的图书，却被梁元帝命令舍人高善宝将其付诸一炬。

荆州城破，梁元帝被俘，当问及焚书的原因时，他答道：“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

他将灭国之恨归咎于这些凝聚着无数智者的经验与智慧、历经无数后人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图书,说明他至死也不知道自己败亡的原因所在。如果他真正读懂了、用好了这些弥足珍贵的典籍,不仅不会招致亡国之痛,即使一统天下,也如探囊取物。

梁国与西魏之战,实际上只进行了一个多月。梁元帝为了控制潜在的敌对势力,将军队分驻江南各地,以致各路援军还来不及赶到,荆州城就已沦陷敌手。对于北方强敌西魏,他不仅不加防范,还企图利用它来消灭异己。当梁元帝接到梁朝旧臣马伯符从西魏发来的密函,告知西魏即将大举入侵这一军事秘密时,他根本不肯相信,也就未作任何有效的抵抗准备。魏军抵达江陵,梁军初战告捷。然而,荆州城内却突然失火,几千家民房与二十五座城楼全被烧毁,魏军乘机渡过长江,完成了对荆州城的严密包围,梁元帝与外界的联系遂完全中断。公元555年1月10日,魏军全面攻城,梁军主将战死,军心动摇,魏军乘机攻入西门。此时,梁元帝动了焚书之念,一把巨火点燃十四万卷藏书。立时,弥漫的大火与将士的鲜血染红了古老的城墙,冲天的烟雾将一场巨大的、人为的文化灾难写在高高的天空,俯瞰人类警示未来。魏军入城,不论老幼,见人即杀。最后从梁朝王公大臣及普通百姓中留下了数万人作为奴婢,押回长安。时值寒冬季节,又有十分之二三者在冰雪严寒的途中冻饿而亡。

不论何种战争,也不论何方取胜,最后遭灾的总是无辜百姓。而一次性地由皇帝主动焚书十四万卷的纪录,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即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从数量上来说,梁元帝毁灭了中国传世藏书的一半;以质量而言,他毁掉的是历代积淀的文明精华。

一切战争,都是人类的灾难之源,是毁灭文明的罪魁祸首。

如果梁元帝不是皇帝,他就无法下达焚书之令,他那愚昧与凶残的一面,也就没有机会得到充分的发挥与体现。凌驾于民族、国家与人民之上的封建专制集权,是阻遏人类发展、民主自由与文明进步的恶魔元凶。

如果梁元帝不是一个爱书的皇帝,他就不可能将那么多中国文化的精华聚于一处。一个皇帝或一批封建政府官员,懂文化比没有什么文化给文化人带来的麻烦更多,对文化的灾难也会更大。

如果梁元帝没有将那些藏书当作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就没有权利对这些文明的瑰宝施行暴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封建统治者眼中,土地、资源、财产、人民……一切的一切,都属个人所有,都可玩于股掌之间,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延续长达几千年之久而几乎原地踏步停滞不前的症结所在。

如果没有梁元帝的主动焚书,十四万册图书在西魏军队的洗劫之下也要遭到一定的破坏,但总会有所幸存,它们或是留在荆州,或是散落民间,或是被西魏当作战利品运往长安。那么,也就总有一些流传至今,中华文明的成果当然也就显得更加丰富而辉煌。

……

总而言之,梁元帝在荆州城内点燃的一把冲天大火,在中国文化史上造成的灾难实在无法估量。

让我们永远记住公元555年1月10日这个中国文化史上黑暗与耻辱的日子!

五

仿佛为了弥补江陵焚书这一文化浩劫似的，两百多年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在荆州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又出现了一种十分罕见的历史现象与文化奇观。

公元十世纪，大唐衰落瓦解，盛世变成了乱世，且乱得不可收拾。农民造反，军阀割据，藩镇林立；内讧、政乱、兵变，层出不穷；到处都是分裂、混乱与战争。一个好端端的太平盛世，再次陷入乱糟糟的杀伐末世，中国又一次进入了大分裂、大厮杀、大搏斗时期，这就是历史上的五代十国。

位于南北交通中枢的古城荆州，在接连不断的兵祸中屡遭破坏。当地居民不是逃亡，就是无辜被杀。至唐僖宗文德元年（888），荆州城内的居民只剩有十七户，真乃萧条破败之至。十多年后，才又增加到一万多户。

此后，荆州又几经争夺，后为梁太祖朱温所得，并派他的得力干将高季兴前来管辖，授任荆南节度使。

高季兴身为五代时梁朝将领，因战功卓著，深得朱温赏识。高季兴来到荆南，但见昔日的繁华富庶之地，如今已变得满目疮痍、荒无人烟，唯剩荆州一座凋敝的孤城兀立在广袤的旷野之上，不觉长叹不已。从小就在战乱中与父母离散的他，独自一人闯荡天下，严酷的生存环境培养了他有勇有谋的性格。并且，他一直心存大志，想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乱世出英雄，高季兴决心重振荆州雄风，在这混乱的世道中把握机运，脱颖而出。

他广交名士，大胆启用，并以此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地方军政领导班子。此后，他安抚居民，招纳流民，开垦荒地，鼓励农

桑，重建井邑，很快就将凋敝的荆州唤出了几分生机。

荆州从乱到治，不多时即恢复了元气，渐呈昔日繁华之景。

与此同时，他在一班谋士的策划下，积极地准备着割据事宜。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大规模地建造荆州砖城，为日后的称雄割据奠定基础。

自三国时关羽筑城后，东晋的桓温、南朝的梁元帝萧绎等都会有过扩修。桓温在大城之内修有金城（也叫子城），大城之外筑有金堤（即堤防），相当壮观；萧绎在荆州城内登上帝位，扩建规格完全仿效建康故都，大城设城门，门上立战楼，城外布木栅，景象宏阔。尽管他们所修城墙壮观宏阔，但皆为土墙。高季兴开天辟地，决定修筑砖墙。

公元912年，高季兴开始大规模地修筑砖墙。十多万民工冒着严寒酷暑，日夜不停，劳作不息，只要动作稍慢一点，就要受到杖责。负责修城的总监、高季兴的女婿倪可福，因工程进度迟缓，也挨了岳父老头子的一顿棍棒，连老婆也被高季兴接回娘家，说是何日筑城完工，何日再将女儿送还；若是磨蹭时间，或是质量不合标准，不仅老婆无归，恐怕脖颈上的一颗脑袋也难以保住。这样一来，城墙自然是修得又快又好。砌城的砖头不够，高季兴便下令四处挖墓，“郭外五十里冢墓多发掘取砖”。荆州城外千百年来埋着历朝王公贵胄的大坟小墓，一时间在劫难逃。那些墓用砖头，不仅坚固，且做工精细，十分考究，实为难得的上选材料。据说新城完工后，每到更深人静，城墙上便游荡出无数闪烁的磷火，令人毛骨悚然。

高季兴所筑砖城，真正称得上是一座“铁打的荆州”。墙脚以石头垒筑，墙体用青砖砌成，坚不可摧；他还将护城河拓宽掘深，常年流水不断，难以逾越。

一切准备停当，高季兴并未轻举妄动，他还在蛰伏、等待，

以寻找一个有利的可乘之机。

不久,梁太祖朱温逝世,梁朝顿时江河日下,渐呈衰颓之势。高季兴抓住时机,马上断绝与后梁的一切往来,在新修的荆州城内公开占地割据,自封武兴王,立国荆南,又称南平。

在当时的五代十国中,荆南最小,其辖境最大时也只有三州十七县。它介于南唐、楚、蜀与中原之间,地盘最狭,人口最少,兵力最弱,只能在夹缝中求得生存。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蕞尔小国,却侥幸存活了五十七年,安然地走完了五代时期的整个历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封建政治割据史上的一个奇迹。

更加令人惊叹的是,当时的荆州文学,在五代文化“一塌糊涂的泥塘”与荒漠中,竟放射出了独有的熠熠光华。

五代时期,列强对峙,纷争不已,昔日的兵家必争之地荆州,也许是立国之地太小不甚起眼的缘故吧,竟成了一块可为屏障的缓冲地带。加之荆南统治者高氏父子自强自立,恢复生产,招揽贤才,发展经济,保境安民,在外交上适当地采用一些“纵横之术”、甚至是被后人称作“无赖”的手段,因此,荆南之地也就显得相当的富庶、繁荣与平静,这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外部环境。而源远流长的荆楚文化如《楚辞》、《老子》、《庄子》更是深深地浸润、涵育、影响着本地作者,于是,荆州这一时期的文学,便绽放出了艳丽无比的奇葩。

五代文学中,成果最大的是词的发展与兴盛,其次便是诗,其他则较为逊色。在群星闪烁的荆州文坛,最为耀眼的星辰当数孙光宪与齐己这两位著名的词人与诗人。

孙光宪博通经史,勤于著述,成果颇丰,共创作有诗文集、农书、杂史笔记等约八十多卷,可流传下来的只有《北梦琐言》一书与词作八十四首。在中国文学史上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

晚唐五代文人词作总集《花间集》一书中，收录孙光宪词作共计二十五调六十一首。这些词，与晚唐词坛翘楚温庭筠相比，仅少收五首而居其次；若以调论，则比温庭筠多七调而为《花间集》中运用词调最多之人。而温庭筠为晚唐词人，那么，《花间集》中五代词人写词最多、用调最多者首推孙光宪。就题材而论，除“花间”外，孙光宪还写有咏史词、边塞词、风物词与抒情词。他的词作不仅在意境上有所“放大”，在艺术风格上也有所创新，色彩浓丽、情致闲婉与清新疏朗兼而有之，显得遒健爽朗、俊拔秀丽。

齐己从小出家为僧，但他自幼热爱诗歌艺术。作为一位佛门诗人，他的创作成就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当时的杜荀鹤、罗隐、韦庄等儒家诗人。齐己写诗颇多，门人曾就“所集见授”，辑有八百一十首，编为十卷，名为《白莲集》。齐己之诗，内容相当丰富，宇宙人生、社会政治、日常生活、参禅悟道、交游酬答、感怀抒情等，无所不写，表达通俗自然，意境闲散清寂，显得古雅清和、平淡清润，与一般士大夫诗人所创造的艺术境界具有明显的区别，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诗歌美的内涵。

对于五代文学，历代研究者都不甚重视。这不仅因为这一分裂割据与战乱频仍的时期所取得的文学成就有限，也与五代文学处于唐、宋两大文学高峰的夹缝中显得微不足道密切相关。然而，就五代文学本身而言，在如此短暂且动荡不安的环境中能够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实属不易。尤其是以荆州城为核心的蕞尔小国荆南，一下涌现出两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占据一席之地的代表人物，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颇具研究价值。

六

高季兴建造砖墙首开荆州城建之先河，此后，围绕城墙的战争、拆毁、修复、扩建，时兴时衰，反反复复，一直贯穿着宋、元、明、清封建王朝的始终。

宋朝时，荆州古城在“靖康之乱”中遭到战火焚烧，雉堞毁坏，池隍淤塞。

南宋荆州安抚使赵雄为加强荆州防御，于公元 1185 年重建砖城，历经十一个月才告竣工。城墙周长二十一华里，营造敌楼战屋一千多间，并疏浚了护城河。

公元 1276 年，为了方便蒙古骑兵的驰骋，元世祖忽必烈下令拆毁襄汉荆湖诸城，荆州城自然难逃厄运，亦遭毁坏。

明朝建立后，荆州城于公元 1374 年依旧基修复，城墙周长缩短为十八华里，高二丈六尺，设城门六个，城周挖有宽五米、深三米的护城河。

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占据荆州，号称西王。后移军四川时，为防完好的古城落入敌手，便下令滥加拆毁，造成了荆州城墙史上又一次空前的巨大破坏。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砖墙是清朝顺治三年（1646）再次重行修建的，城郭大小及城垣城门的营建格局基本上保持了明代的风格与规模。也就是说，巍然屹立在人们眼前的荆州古城墙已有三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了，它是我国南方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城之一，被考古界、旅游界誉为“我国南方不可多得的完璧”。

城墙高约九米，厚十米左右，东西长、南北短，依地势而高低起伏，因湖泊而蜿蜒迂回，仿佛一条不太规则的椭圆形绸带。城墙上四个藏兵洞，二十六座炮台，四千五百多个城垛。整

个设计构建,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特点。为防水浸雨淋,墙基全用条石砌成,每块重达数十公斤,用糯米捣成浆糊状粘砌而成,坚固异常。城内还修有较为科学的下水道,天旱时可引城外河水入城,暴雨后可将渍水及时排出。

古城共有六个城门,分别为东门、小东门、大北门、小北门、西门、南门。1970年后,因交通发展的需要,在城垣上又新开了三座六孔城门,加上原来的六座,共有九座城门。原有的六座城门都用巨砖砌成拱形,城门之上,还建有城门楼,显得宽阔高大,气势宏伟。但有五座已毁于战乱,仅存大北门城楼朝宗楼,东门的宾阳楼为新修重建。大北门是古人送别亲友北上中原与古都长安的话别之处,古人送行,习惯折柳相赠,所以大北门又称柳门。宋代著名诗人苏东坡曾在此赋有“柳门京国道,驱马及阳春……北行连许邓,南去及衡湘”的诗句。除小东门外,其他都是前后两个门道,中间围有瓮城。城墙内外两侧,遍植松、杉及多种观赏树木。

当我们置身古老的城墙漫步信游时,北望荆襄古道,西眺绿岭青山,南瞰滔滔大江,东顾一马平川,环视江汉平原、水乡泽国的秀丽与富饶,注目城内现代高耸的建筑与繁华的街市,回首荆州古城千百年的辉煌与创伤,将会获得一股从未有过的深厚的历史意蕴与人生感悟,一道未来的天启之门豁然于胸。

七

毋庸讳言,荆州古城在不断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已逐渐丧失了昔日的“焦点”与“中心”地位。避开往日的辉煌不谈,仅就今天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功能而言,它已退居为一个相当普通的城镇。

在政治上,荆州城一直是封建王朝或建都立国、或封王置府的重镇。即使在解放后,它仍是湖北省最大的行政地区——荆州地区行署所在。1994年,荆州地区撤销,与沙市市合并为荆州市,原所辖之地仙桃、天门、京山、钟祥、潜江等地或独立成市,或划归别地管辖;其中的石首、洪湖、松滋三市也属代管,真正所辖之地,也就荆州、沙市二区与江陵、公安、监利三县了。现有荆州市的党政机构,也分布于荆州城与沙市区两地。昔日的政治功能,随着辖区地盘的不断缩小,也在逐渐消失。

在军事上,这块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进入近代,其地位就开始下降了。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先以飞机轰城,继而空投仅数十人的兵力,一枪未发,即攻入荆州城内。1949年7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荆州,与国民党军队之间也未爆发激烈的战争。

在经济上,昔日荆州城不仅是当时湖北地区最大的城市,也是整个长江中游第一城。早在汉代,就是全国十大商业城市之一。它曾与下游的建康(今南京)、蜀中的成都、南海之滨的番禺(今广州)齐名,又与北方的名都长安、洛阳媲美,是连接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商业贸易十分繁盛。如今,不到十万人口的荆州古城不仅与发达的南京、成都、广州、西安等大城市无法相提并论,即与省内一般中等城市也不能相比。

在文化上,荆州曾是我国南方古代文化的中心。然而,自梁元帝一把大火将十四万册图书付诸一炬后,虽也有过五代时期的回光返照,此后就退居为一个地方性的文化中心了。

荆州的衰落,与沙市的兴盛、武汉的崛起紧密相关。

明朝末年,长江河道南移,荆州城不再濒临长江,过去的长江门户地位不复存在。荆州地区的经济与贸易重点,就转移到了东边的沙市沿江码头。沙市在不断发展与繁荣的过程中,自

然而地取代了荆州城的多种功能。

清朝末年,京广铁路修建开通,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日益崛起,荆州重要的交通地理位置、军事战略地位急剧跌落,由昔日的中心地带过渡为一个仅具地方性质的城镇。

除此而外,荆州城的衰落,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所辖地盘的日益狭促。

一个地区治所的兴衰,与所辖地盘的大小密不可分。大禹定九州,荆州即享有了“古九州之一”的美誉。楚国鼎盛时期,疆域包括了今日的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安徽、云南、贵州、广东等省的全部或大部,楚都纪南之繁盛列为南方第一。汉武帝时,荆州为全国十三州之一,地盘辽阔,治所江陵也为全国十大商业城市之一。三国时期,荆州所辖大致承续汉朝。东晋年代,荆州管辖全国九十六个郡中的十六个,有“荆扬二州半天下”之说。只是到了南北朝时的刘宋时期,刘裕为防枭雄割据,将荆州从原有的地盘中割出湘、郢、雍三州独立,存下的只及过去的四分之一了。以此为限,曾为九州之一的荆州版图便一削再削,在全国行政区划格局中再无“雄甲天下”的独特优势。解放后,荆州成为湖北省六个行政地区之一。而1994年的再度分割,使得古代荆州就此名存实亡。

从纪南城的毁弃,到荆州城的衰落,而至沙市市的兴盛,我们不难发现,城市的发展经历着由北向南、自西向东的演变与过渡。这不仅与我国城市的发展脉络基本吻合,也揭示了从古到今城市兴衰的一个基本规律与大体趋势。

三座城市,分别代表着三种不同的社会、时代与文化。

纪南城是奴隶社会的一个缩影,城中的宫殿、豪华的设施,都是奴隶主的专有产品,普通民众,不得不依附贵族而生存,缺少起码的人生自由。纪南,是一座帝王凌驾一切的城市。

荆州城是封建社会的一个象征，文臣武将、才子佳人，在荆州这一宏大的舞台上纷纷登场，个人的性格、智慧、才华、抱负有了充分展示与发挥的土壤。普通民众与封建主的关系，已从“工具”变为契约形式。荆州，是一座英雄叱咤风云的城镇。

沙市市代表了现代化城市的发展走向，商人、市民，是这一舞台的主角。人人可以较为自由地选择、把握、主宰自己的命运，都有可望获得成功。沙市，是一座市民创造历史的城市。

纪南城的突然毁灭，其功能全由荆州城取而代之。荆州城在不断衰落的过程中，由日渐兴盛的沙市市接替了它的部分功能，逐渐演变为荆州、沙市并驾齐驱的“双子星座”格局，它们分别承担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职能。也许，这一现象还将持续下去。

如果将荆州城的衰落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放在整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与变化的通盘格局之中来看，我们不仅没有黯然神伤之感，反会升出一股庆幸。因为，它的衰落与沙市的崛起不仅代表着政治与文化的进步，更代表了一种社会前进的发展趋势。

其实，荆州城的定位早在1982年就已确立了。那年2月，国务院首批公布了全国二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荆州（江陵）被列为其中之一。

既为历史文化名城，就应从历史与文化这两方面入手，将它们作为一种潜在的资源加以开发。如今的荆州城，其政治、经济、军事地位的衰落已无可挽回，也只有在历史与文化上“大做文章”，将荆州建设成为一个集工商、贸易与旅游于一体的新型城镇，才有可能焕发出新的生机，再创辉煌。

荆州有关政府部门的发展思路与基点也正在于此。城门城楼的修复，三观（玄妙观、开元观、太晖观）的开放，三国公园、

盆景园的兴建,博物馆的充实与丰富等等,都算得上是一种主体自觉的举措。

最值得一提的当数荆州博物馆,这是每一位游客进入荆州后的首选必游之地。

荆州博物馆藏有文物十多万件,整个陈列建筑分为陈列大楼与珍品楼两个部分。陈列大楼内,依通史时序陈列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楚文化等文物专柜;珍品楼有西汉古尸专题陈列及战国丝绸、越王勾践剑、战国连发弩、张家山汉简、新石器玉雕陶器、楚汉漆器等稀世珍品。此外,馆内还留有不少三国纪念建筑及唐宋元明清文物,也都颇具收藏及观赏价值。1998年初秋,当我又一次游览荆州博物馆时,坐在陈列大楼旁幽密、苍翠的竹林丛中,透过竹缝望着馆内具有楚风楚韵的典雅建筑,听着楚乐宫正在演奏着的一声声悦耳钟磬,整个身心,弥漫着一种难得的安宁、纯静与遐想,仿佛远离闹市、远离尘世,正置身在古老的历史隧道深处,超然地面对着翻卷激荡的千年历史云烟……

我的手头有一本论述荆州古城环境美的内涵与创造的书籍,题为《名城美的创造》。书中收录了四十多篇论文,涉及到荆州城的美学研究、规划探讨、建筑设计、风景园林、旅游文化等诸多方面。不少文中所论,颇具创造、启迪与建构意义,它们将保护与建设、保护与开发、保护与利用融为一体。论者的视野也相当开阔,不仅仅局限于荆州城内,还充分地考虑到了城外区域,如古文化遗址、纪南城遗址、古墓葬群、自然风景胜地及地方传统文化活动的开发与利用;在充分吸收、利用古文化、古传说、古遗迹、古名胜、古建筑、古墓葬的基础上,设计了城上、城北、城内、城南、城西等五条游览线路,还提出了建设荆州环城公园的宏伟构想。

漫步荆州古城,你会觉得脚下的每一片土地都是一部丰厚的历史,都曾上演过风云激荡的活剧;随便抓起一把泥土,都浸润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积淀着源远流长的民族精华;每一条街道,每一处景点,每一栋建筑,都折射、传递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信息……荆州城,简直就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历史文化富矿。然而,当我漫步荆州的街市与城墙时,却感到了一种深深的缺失,对此,我不得不遗憾地认为,有关荆州城的历史与文化开发,不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建设,与它昔日的辉煌灿烂相比,实在是相差得太远了!许多设想还仅仅停留在纸上,现在的规模只不过一个雏型而已。

前不久,我在武汉的两家大报上见到了两篇有关荆州问题的文章。一篇名为《应重视开发荆州旅游业》,作者为上海游客。他游了一趟荆州,觉得无甚地方可去,没有一条龙的旅游服务,在开元观见到的三国事迹展粗糙浅薄,谈不上什么历史文化意蕴,只有城墙与博物馆尚可一游。另一篇的大标题是《荆州护城河成了死水河》,副标题为“杂草塞河道,污水绕沟流”。一看题目便知,荆州护城河河床淤积,有的河段已变成沼泽地与臭水沟;整条十一公里的河内,长满了名为凤眼莲与水花生的水生植物,一眼望去,长长的河道上,竟现出了一座座绿色的“浮桥”。

古城荆州,正急切地面临着合理的全盘规划与综合开发,以创造真正的历史文化名城之美。

宜黄高速公路的通车与三峡工程的建设为荆州城的再度崛起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契机,我们相信,只要抓住这一有利机遇,古城荆州离“泛舟护城河,碧水浮城楼;笑语扬天庭,美景如画图”的建设要求也就为期不远了。

道教圣地武当山

常言道：“天下名山僧占尽。”这里的“僧”，当为泛指，不仅仅单指佛教中的和尚尼姑，也包括道教里的道士仙姑等诸多宗教信徒。位于湖北省丹江口市境内的名山武当便是典型的一例，它是我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所敬奉的玄天真武大帝（亦称真武神）的发源圣地。这里的二观、八宫、十二亭、三十六庵、七十二岩皆为道教建筑；在山野间、庙宇中日常修炼的也是道教信徒；就连它的名字“武当”，也是道教的产物，相传真武大帝在此修炼得道升天，有“非真武不足以当之”之说，武当山即由此而得名。

千百年来，道教氛围笼罩在武当山上空，浸润着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形成了一种强大的道“场”；同时，武当山俊秀绮丽的自然风光也为道教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一根幼苗在肥沃、湿润的土壤中发育成长，历经风霜雨雪，吸收日月精华，走过无数循环往复的春夏秋冬，日益茁壮，不断繁殖，渐至长成了一片苍翠欲滴的茂密森林。山因教而得名，教

因山而丰蕴，山与教连成一体，水乳交融，互为影响，相得益彰。

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以为道家是道教的前身，而道教就是道家的进一步发展。实在难以想象，与宗教并无多大关系的古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老子怎么就被道教选中奉为一教之主，一部本来没有多少宗教味道的《老子五千文》何以成为道教的主要经典被道教信徒尊称为《道德真经》，并长期作用、影响、决定、改变着中国广大民众的思维信仰、道德准则、心理特点与生活方式；对那些头戴冠巾、身穿道袍、足着云履，飘然穿行于山川田野间的道士在民间经常使用的占卜、符篆、旗幡、禁咒等所谓治病、招魂、去邪、镇魔的神秘方式，我一概视为封建迷信；于乡民们在日常生活中虽不怎么强烈，却时时透露出来的宗教信仰方式也抱了一种大不以为然的态度。直至1988年5月，我在友人的陪同下游了一趟武当山，这才多少理解了道教的“综罗百代，广博精微”（纪晓岚语），改变了过去一直存在着的偏见，并引发了我对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的浓厚兴趣，还做了一点有关宗教方面的比较与研究工作。

撇开道教不谈，仅就武当山的自然风光而言，它方圆八百里，面积广大，气势磅礴；奇峰孕秀，高险幽深；云缠雾绕，千姿百态。武当山共有七十二峰，峰峰矗立，气势巍然，遮天蔽日，宛如一座奇特原始的巨大峰林。人行山中，即被山的海洋包围吞噬，大有“沧海一粟”之感，个人的渺小与自然的伟大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对上天的崇敬之情，不知不觉油然而生，弥漫心头难以挥散，于是，人类最初的宗教情感就这样悄然萌生了。最为奇妙而又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座座山峰虽相互争雄斗奇，但全都俯身颌首，如众星拱月般地朝向主峰天柱峰。天柱峰海拔1612米，一柱擎天，引得“万山来朝”。这等奇妙的自然景观不得不使人联想到天庭等级分明的神仙座次（当然还有人间严

格的封建秩序),此情此景,小民们当然也只有顶礼膜拜、叩首臣服而已。

武当山的多姿多彩,还有攀猿栖鹤的三十六岩,跌珠扬波的二十四涧,吞云吐雾的十一山洞,神奇怪异的十石九台,孕日育月的十池、九井、九泉、三潭……其风景之美,颇有无峰不秀、无水不碧、无洞不奇、无岩不险之妙,更兼雄、险、峻、幽、奇、秀之绝。

“采石片片玉,折枝寸寸香。”武当山地处华中腹地,占尽南北地利,多种动植物都能在这里生活生长,珍禽异兽出没山野,奇花异草万紫千红,茫茫林海郁郁葱葱……明代医圣李时珍曾带弟子专门来此采药,《本草纲目》所载一千八百多种药草,就有四百多种生于武当山中,故此,它又享有“天然药库”之誉。

明朝嘉靖年间,皇帝朱厚赵册封武当山为安邦定国的“治世玄岳”,将武当山列为“四大名山皆拱揖,五方仙岳共朝宗”的“五岳之冠”。武当山获此殊荣,我以为除了它那雄奇险峻、瑰丽多姿、优美如画的自然风光与蕴藏丰富的自然资源外,更多的因素还在“道教”二字。

二

道教是中国地地道道的本土宗教。它形成于东汉顺、桓两帝时期,而作为一个成熟的宗教体系出现,那已是两晋南北朝之时。

在论及道教时,鲁迅曾经说过:“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之深刻,不仅一针见血、一语中

的,即在今天,仍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千百年来,在中华大地上盛行的两大宗教:一为道教,一为佛教。佛教由印度传入,属外来宗教,唯有经过一番“加工改造”,才为普通民众所接受。而道教则为正宗“国货”,土生土长,宗教体系独特,典籍文献丰富,信仰内容具有民族特色,对我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清代以后,道教虽然渐趋衰微,但道教观念、道教信仰已深入民间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心理定势与行为习惯,直至今日,仍有一定的影响。

其实,道家与道教,两者各自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道家纯属个人信仰,是一种源于老庄哲学的思想方式或人生态度,道家奉行独立遁世、个性自由、顺应自然的原则,常与隐士联系在一起,大多生活在穷山僻壤之间;道教则是一种具有正规仪式的宗教流派,有一套组织机构,相信鬼神,画符念咒,宣扬迷信,等级森严。

道教的前身也并非道家,而是巫术与方术。

远在殷商时代,就有了卜筮吉凶、祈福禳灾的巫师,他们掌握龟筮,被认为能够沟通神天。西周时期,人们对鬼神的信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天神、人鬼、地祇的鬼神体系。这些都为道教沿袭继承,并成为道教多神崇拜之源。

战国时期,方士出现,他们采仙方、炼仙丹,传播只要服食仙药仙丹即可升天成仙的神秘方术。后来,又吸收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形成了所谓的“方仙道”与“神仙家”,成为道教信仰神仙、信奉修仙得道之源。

任何一门教派,都需要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作为它的构架与支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严格意义上的宗教,道教自然也不例外。在由鬼神崇拜与方仙信仰向道教的衍化过程中,它吸取

或者说移植了老庄思想与黄老学说。

道教之所以选中老子奉为教祖，并选用《道德经》作为主要经典，恐怕与其中的神秘因素不无关系。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究竟生于何时何地，传说与记载不一，其身世阅历也众说纷纭。《史记》曾言：“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又说老子西出函谷关，“莫知其所终”。模棱两可的说法与不知所终的结果为宗教的创立者提供了想象发挥的余地，留下了神化的空间与可能。

而《道德经》中言近旨远、无法证伪的神秘内容更是比比皆是：“道之为物，惟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就连拉开全书序幕，奠定全书基础的开篇也是如此：“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不仅神秘，更与神仙家的幻想颇为接近，其自然适意、超然世外、追求永恒的人生哲学与道教的守神保精、养气全真、追求长生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老子被道教奉为至高无上的教主，约在东汉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也决定了道教的这一抉择。西汉时期，儒家定于一尊，并形成了它的准宗教形态——儒教；佛教输入中国，约于公元一世纪的东汉初期，此后便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不仅成为中国的主要宗教，更有一统天下之势。就当时的地位与影响而言，能与儒教孔子、佛教释迦牟尼相抗衡的，唯有老子而已。因此，老子被道教神化尊为教祖，也就在所必然了。

没有佛教的影响，道教也许长期仍然处于一种仅仅充满了神仙鬼怪的散漫无序状态；没有佛教的在中华大地的广为传

播,也就没有道教的危机之感与应急反应,老子与《道德经》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得到信徒们的普遍认可恐怕一时难以实现;没有佛教的挑战,道教缺乏强大的凝聚力与亲和力,也就不会形成严密的组织与团体;没有佛教的参照系统,道教根本不可能很快制定出整套严格的宗教教义、规范仪式与相应的传授系统……

说到底,道教是在外来佛教刺激下而产生的一种本土宗教。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正式道教团体于公元106年由张道陵创建。张道陵的五世祖即西汉时著名的道家与军事家张良,其家族长期以来都喜欢道家哲学,他本人就是一位炼丹术士兼巫师。张道陵以道家的思想和形象为基础,依照佛教虚构一个诸神世界,通过除灾治病、驱邪逐魔、制造奇迹等方式吸引信徒,他将神话、哲学、迷信糅为一体,创立了一个异常成功的宗教组织“五斗米教”——凡入教者须捐赠五斗米,故名。五斗米教发展迅速,很快变成了一场能够发挥政治作用的群众运动,东汉末的张鲁(即张道陵之孙)还在四川与陕西交界之处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半独立王国。

张道陵因创立道教被后人尊为张天师,他的成功经验也被其他巫师、术士视为法宝而广泛运用。因此,道教内部又产生了许多繁衍迅速的不同流派。公元三世纪后,这些流派变得更加精细复杂,他们修建道观,吸收儒、释精义,包融医药学、生理学、养生学等多门学科,改革旧规,著书立说,广收门徒,传授教义,并极力向上渗透,交接帝王,参与政治活动,取得统治阶层的大力支持……诚如葛兆光在《道教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所言:“在成熟的道教体系中,不仅有一套完整的神谱,有一套复杂诡秘的仪式,有一套真伪参半、科学与迷信混杂的健身术与药物

学,有一套严格的、合乎封建伦理纲常的行为规范,还有一套足以似是而非地解释一切自然与人生问题的哲理。因此,它脱下了巫覡粗陋破蔽的外衣,从民间迈入了殿堂……”经过一番艰苦努力,一股蔚为壮观的道教“洪流”汇成了,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奔腾不息。

三

武当山的巍峨雄伟及其“万山来朝”等独特景观,不知不觉地蕴育着人们原始而朦胧的宗教情感。据《武当山志》记载,早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康王时代,这里就吸引、聚集、活跃着一批具有原始宗教意识的信徒。道教诞生后,武当山被尊为“仙山”与“道山”,承袭祀奉真武神,并使之人格化,演绎出一段“铁杵磨针”的训诫故事。

相传净乐国太子得到玉清圣祖紫元君的启示,入武当山学道修炼。学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得道成仙,不免心灰意懒,就想出山还俗。下到半山腰间,突然看见一个老太婆蹲在井边专心致志地磨砺一根碗口粗的铁杵。太子感到奇怪,不禁走上前去问道:“请问太婆,你磨铁杵做什么?”老太婆答道:“磨绣花针。”太子不觉大吃一惊:“这么粗一根铁杵,磨得成绣花针么?那不是太难了吗?得磨到什么时候啊?”这时,老太婆慢慢回过头来,两眼紧盯太子,意味深长地笑着说道:“铁杵磨绣针,功到自然成。”太子闻言,顿时恍然大悟,马上转回深山继续修炼。原来这个老太婆不是别人,而是太子师父紫元君变化而成,特地前来点化他。太子受到启发,不论严寒酷暑,都认真修炼,从不懈怠,终于得道升天,成了北方的真武大神。

“铁杵磨针”,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毅力与耐心,对教徒们

的意志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道教正是凭了这种“铁杵磨针”的精神，修炼传播，深入民间，扎根大地，成为一个影响中国文化至深的宗教。如今，“铁杵磨针”已家喻户晓，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寓言。

后人为了纪念，便在老太婆的磨针之处建了一座纤巧玲珑、布局紧凑的“磨针井”道院。

武当山，也因真武大帝在此发迹而成为著名的道教圣地。

中国的宗教虽然没有形成、出现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类似的政教合一局面，但是，统治者的支持与扶植对宗教的生存与发展必然起到重大的乃至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古代皇帝对待道教与佛教的态度，不外以下情况：要么一概排斥，要么听之任之；要么抑佛崇道，要么废道事佛，要么佛道并举。

一概排斥与听之任之的情况极为少见，因为统治者本身也需要宗教作为精神寄托，或是利用它稳固自己的统治。更多的是则是徘徊在佛道两者之间，统治者的每一次重视、提倡与推崇，都会带来该教的兴盛发展；反之，当权者的压抑、控制与打击必将导致佛或道的停滞衰落。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自称老子李耳后代，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兴道抑佛，道教大盛。武当山被列为七十二福地，天下闻名。唐贞观年间，李世民颁敕修建五龙祠，不仅揭开了营建武当道场的序幕，而且首开皇家建庙祭奉之先河。

唐代以降，宋朝帝王尤其推崇真武神，武当山建筑规模更大更甚；元代帝王自称“受命天地合德”，“大兴老氏之教”，元世祖忽必烈曾下诏改观为宫，武当山的道教建筑也有所发展；及至明朝，武当山的道教建筑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

历朝历代营建武当山最得力者，当数明成祖朱棣，武当山

现存的道教建筑,大多是那时遗留下来的。

公元1399年,时为燕王的朱棣以“清君侧”为由,发动靖难之役,从燕京(今北京)带兵打到金陵(今南京),夺了皇帝宝座,迁都北京。朱棣为朱元璋第四个儿子,他以叔父的身份赶走侄子建文帝夺取政权,此举显然有悖封建法统。一时间,“以臣弑君”、“同宗相戮”的民间舆论传播朝野,他本人也觉得帝位来路不正,常常惴惴心虚。为了稳固统治,消除不利影响,达到名正言顺、心安理得的目的,朱棣绞尽脑汁,选中真武神美化自己,使得统治地位变得“合理合法”。他自称南征途中曾多次得到真武显灵助阵,保佑他顺利进军金陵;又说从南京迁都北上,是因为北京乃北极玄天上帝真武之神镇守的地方;还暗示他自己就是真武转世……大造一番声势之后,他又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修建真武大帝的发源之地——武当山。

明永乐十年(1412),朱棣征调军民工匠三十多万人在武当山大兴土木,营造宫观。历时十二年,工程方告完工,耗资百万。从原均州城至武当金顶,建筑线绵延一百四十华里,建成三百处三十三个建筑群共二万多间宫观庙宇,分为八宫、二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十二祠、十二亭、三十九桥,构成了一幅“亘古无双胜境,天下第一仙山”的立体画廊,被称为“补秦皇汉武之遗,历朝罕见;张宫阙之胜,亦环宇所无。”

明成祖当年修建的这个极其庞大的道教建筑群,历经五百多年的历史沧桑,一部分毁于战乱,一部分沉于建国后修建的丹江水库。现今所存,虽不及原先十分之七,但武当山道教宫观规模之庞大、气势之恢宏,仍居全国第一,并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那年五月,陪我游览武当的友人虽为公安老乡,但他长期工作在十堰市第二汽车制造厂,曾多次前来武当,对这里的自

然风光、庙宇建筑、典故传说及游览路线都相当熟悉。在他的介绍与指点下，我一边气喘吁吁地往上攀登，一边认真地观赏着一道道秀丽的自然风景与一座座奇巧的道宫庙宇。

我们正赶上了一个十分难得的好天气，明媚的太阳暖暖地挂在天上，缕缕薄雾缓缓飘移，座座山峰披金着银，道宇宫观流光溢彩。苍翠欲滴的树木与争奇斗艳的鲜花透着一股蓬勃勃的盎然生机，受到感染，我的心中也充满了一股莫名的激情，面对莽莽苍苍的巍峨群山，恨不得敞开喉咙，散漫而昂扬地高歌一曲。

武当山的整个建筑群落，全部顺应山势的自然走向，依照山峰间的相对高度，凭借峰峦岩洞的奇峭幽深等特点精心设计、精密布局，天然浑成；每一座具体建筑，也充分利用自然优势，建在岩、洞、峰、峦、坡、坨等合适位置，或凌空蹈虚，或雄奇高险……都尽可能地透出一种浓厚的宗教氛围，体现道教的仙风仙骨。置身道观庙宇，仿佛进入了一个玄妙的仙景胜地，体验道教那种通达天地、充塞宇宙、恍兮惚兮、无可言说的神奇与美妙。然而，你又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脚下大地的坚实与深厚，感到奇妙的天堂就在人间。天与地、神与人、物与我、宗教与世俗、伟大与渺小……一道穿越时空的电波于一瞬间就将它们彼此连接。这是自然造物的伟大，也是道教建筑的奇妙。

道教虽不由道家发展而来，但它们都以老庄哲学为依托，其精气、神韵仍然相通相似，其中一个最为突出的共同特点，就是顺应自然，天人合一。

一座座宫观庙宇，虽点缀、遍布在武当山的山峦峰岭间，铺排绵延，却有一条长长的“故道”将这些闪烁的“珍珠”串在一起，构成一根奇异别致的“项链”。故道从原均州城的净乐宫开始，直达武当山制高点天柱峰的金殿，全长一百四十华里，全用

青石铺成。沿着这条故道，一座座道教建筑或依山傍水，或临岩跨涧，其规格大小、间距疏密，都恰到好处，达到了时隐时现、忽高忽低、若明若暗、迂回曲折、玄妙超然的独特艺术效果。对此，明代诗人洪翼圣曾生动形象地描绘道：

五里一庵十里宫，
丹墙翠瓦望玲珑。
楼台隐映金银气，
林岫回环画境中。

而建造这些道观、庙宇、神像、供器、法器等耗用的建筑材料，既有金、银、铜、铁、锡，也有玉、珠、木、石、泥，还有一般建筑中罕见的丝、绸、皮、骨、纸，形形色色的建筑材料汇聚一地，蔚为大观。仅武当山的道教建筑群落，就可以构成一部独特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了。

在武当山的所有建筑中，最为著名的有金殿、玉虚宫、南岩宫、紫霄宫等，诗人王世贞曾有诗赞曰：

太和绝顶化城似，
玉虚仿佛秦阿房。
南岩雄奇紫霄丽，
甘泉九成差可当。

我感悟最深、最为推崇的当数金殿（即太和绝顶）。

一步步往上攀缘，过乌鸦岭，爬百步梯，翻分金岭，最后抵达武当山的最高峰天柱峰。

高峰巍立，似擎天之柱，非“天柱”二字不足以形容，故此名

常见于不少名山名峰。这里是“天柱”，那里也是“天柱”，自然就有了雷同之嫌。取名如果更为概括、形象、独特，对游客的审美冲击当更为深刻。

想着走着，山路自然是越来越险了，好在我们年轻胆大、精力旺盛，并未把登山看得多么艰难，不过多流几次大汗而已。最令人难忘的，是置身悬崖绝壁的奇妙，薄薄的云雾在身边、脚下缭绕，大有一种远离凡尘、腾云驾雾、飘飘欲仙之感。

上到天柱峰巅，上面巍然耸立着一座台阁式的宫殿，这就是著名的金殿。殿的四周，修有一道环绕山顶的城墙。城墙高达数丈，周长三里，全用千斤条石砌成。高高的山顶何以修一城池？自然也是宗教之故。城墙充分利用武当山的地理环境，给人一种独特的视觉感受。里看墙体，似乎向外倾倒；外看墙体，向里倾斜；远观墙体，则有如一道绚烂的光圈围绕金殿。加之城墙周围设有四座造型庄严、石质精雕的天门，远远望去，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座令人向往、神奇灿烂的天宫仙阙。

金殿高 5.54 米，长 4.4 米，宽 3.15 米，重檐迭脊，翼角飞举，仿佛正张开翅膀缓缓向上飞升。它的墙壁、门楣、宫枋、檐牙、檩椽、瓦楞等结构，包括里面的神案、供器、几案等全由一个个黄铜部件榫卯拼合而成。每一黄铜铸件要达到焊接严实密不透风，又要毫无铸凿痕迹的要求，即使今天，其技术难度也相当之大。金殿历经五百多年雨雪风霜、电闪雷鸣，至今仍辉煌如初，闪耀着金色迷人的光芒。因此之故，天柱峰顶又名“金顶”。

金殿中间，供奉着真武大帝的铜像，他着袍衬铠，披发跣足，虽然丰姿魁伟、庄严肃穆，但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生动形象、活灵活现，偶像化的倾向与痕迹相当浓重。这也是我国佛道庙宇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也许是为了使百姓产生强烈的虔诚

敬畏之情而有意制造的一种离间效果吧！

道教早期并不供奉神像，教徒们认为“道至尊，微而隐，无状貌形像也”。道教之神既至高无上又变幻无穷，人们难睹真容，也就不立神像。但民众无从祭拜，极不利于道教传播。后来也就借鉴佛教的做法，将神像视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介”，把普通民众难以读懂弄清的高深经典予以提炼，变成形象化的直觉造型。于是，与道教的天神、地鬼、人祇多神崇拜体系相吻合的一座座神像也就应运而生了。人们走进庄严的庙宇，仰望高大的神像，浸润着香火缭绕的神秘氛围，心头不知不觉间就弥漫了一股肃穆虔诚的宗教情怀。

关于真神大帝的这座铜像，还有一段无法考证的民间传说。

武当山的道教建筑，虽然一修就是十二年之久，但无时无刻不牵动着明成祖朱棣的心弦。这不仅关系到明成祖的统治地位能否长治久安，还涉及到民间的舆论、史家的评说等与他个人生前身后密切相关的重大名誉问题。特别是金殿内将要长期供奉的真武大帝，朱棣更是格外瞩目。召了几个工匠设计真武神像，朱棣一一看过，却没有一幅图像让他满意。最后，一位聪明的朝鲜工匠揣摸其意，便依照朱棣洗脚时的形象，描出一幅真武塑像设计图。明成祖一见，顿时大喜，即命工匠塑出披发跣足的真武大帝。

如果传说为真，那么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真武大神实际上就是明成祖本人的塑像。那环绕山顶的城墙，也与皇家相关，名曰紫金城，又叫皇城。武当山为皇帝敕封所建，自然要打上封建王朝的烙印。皇权与神权，在武当金顶就这样巧妙地融为一体。

自从金顶诞生了一座金殿，武当山便不时生出一些奇妙的

景观,其中最为神奇的有“雷火炼殿”、“祖师出汗”、“祖师映光”、“金殿倒影”、“海马吐雾”等。

雷火炼殿——每当雷雨交加之时,金殿周围便电光闪闪、雷声阵阵,滚动、腾窜着无数盆大的火球;

祖师出汗——祖师即真武,大雨之前,金殿内的空气水分受气压突变影响,常聚合为晶莹的水珠布满神像。于是,在人们眼里,真像大帝似乎也在大汗淋漓了;

祖师映光——雨过天晴,金顶上空的云端映出光芒四射的金殿与真武神像,有时游客也会映入其中,不过这一奇景稍纵即逝,千载难逢;

金殿倒影——夕阳西下,阳光斜射,金殿的影子倒映在二十里外的青峰翠壁之上;

海马吐雾——金殿装饰的海马,有时口中吐雾,并嘶嘶地对天长啸;

……

这些看似神秘的奇异景观,其实都是可以解释的自然现象。但是,当它们被道教徒有意夸张、利用、神化,赋予超自然的色彩,就成了“神仙显灵”的“圣物”与“圣迹”。

站在高高的金顶眺望四周,方圆数百里的武当胜景尽收眼底,群峰矗立,树木苍翠,云流雾绕;头顶的太阳放射出夺目的光辉,整个世界一片辉煌;山下的丹江水库犹如一面明镜,浮光跃金;阵阵凉爽的山风吹干汗水拂去疲劳,清新纯净的空气滤除尘世杂质,眼前、心头呈出一片从未有过的开阔与光明,大有身居瑶台,凌空出世,羽化而登仙之感。

宗教情绪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涌上心头,而金殿的威严肃穆与神奇景观更是加强了这种特殊情感。由此,我们似乎多少破解了道教信徒的心灵密码,窥见了他们的心灵世界,理解了他

们胸中所拥有的那份神秘、虔诚、崇拜乃至献身的宗教精神。

四

宗教的兴衰不仅体现、反映在寺庙宫观等宗教建筑物上，还与教徒的多寡成正比。道教也是如此。明成祖于武当道教建筑竣工之后，派了二十一名六品提点（即道官）主持庙务，当时即有道士两千多人。仅武当一地，就两千多人的规模，全国道士之多，由此可见一斑。千百年来，在武当山修炼的道士又何止千万？这些有名无名的信徒，对武当的道教建设，对中国的道教发展，都或多或少地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而对武当道教影响最巨的人物，当数中国古代十大道士之一张三丰。

张三丰踪迹隐显莫测，道名不胜枚举，生卒扑朔迷离，行为古怪诡异。他不问世务，专事修炼，人称“隐仙”。据《明史》所记，张三丰“颀而伟，龟形鹤背，大耳圆目，须髯如戟，寒暑唯一衲一蓑”。他五岁患了失明症，被道人收为徒弟，半年后眼睛复明。师父教习道经，兼读儒、释之书。七年后归家专习儒业，忽必烈搜罗人才，颇为朝廷看重。但他无意官场，感到“富贵如风灯草露，光阴似雷电浮沲”，遂云游四海，拜访名师，后入秦陇宝鸡山修炼。元仁宗时，年近七十的张三丰求道之心不减，入终南山拜陈抟传人火龙真人为师，深得精义妙谛，渐渐佯狂污垢，人不能识。后来，他又看中武当山，潜心修炼九年，终于得道，此后便往来隐显于湘云巴雨之间。元亡明兴，他又重返武当。明太祖久闻其名，深为仰慕，多次派人求访，恭请入朝，屡遭拒绝。不久，张三丰离开武当山，不知所之。

张三丰自称张天师后人，因其行迹诡异，传闻也就格外地

多。相传到了明成祖永乐十年，皇帝还在派人到处寻访张三丰。据有关史料记载，元仁宗时的公元1314年，张三丰年约六十八，如果永乐十年（1412）他还活着的话，当为一百六十六岁高龄的老人了。也许，帝王们心中明知张三丰早就羽化，只不过是利用他这块牌子，有意标榜自己罢了。终明一代，朱姓帝王对他念念不忘，各种各样的头衔封了一大堆。

张三丰高标隐逸，儒道双修，他认为“儒是行道济世，佛是悟道觉世，仙是藏道度人”，三教虽各各有别，但都有一个相通的“道”字，“儒离此道不成儒，佛离此道不成佛，仙离此道不成仙，而仙家特称道门”。因此，他极力主张三教合一。对于修炼方式，也不拘泥于形式，提倡“大隐市廛，积铅尘俗”，“在家出家，在尘出尘，在事不留事，在物不恋物”，并认为那种“抛家绝妻，诵经焚香者不过混日之徒耳”。

张三丰对武当山的贡献，主要功绩在于融道入拳，创立了武当内家拳。

武当拳的基本特点是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与少林寺外家拳并为武林两大流派。武当是道教武林圣地，嵩山少林寺为佛教武林胜地，武术界有“北宗少林，南崇武当”之说。关于两派拳技，黄宗羲曾比较道：“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以搏人，人亦得乘之。有所谓内家者，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仆，故别少林为内家。”

关于张三丰如何创立武当拳，历来有两种说法，一为“张三丰夜梦元帝（即真武帝）授之拳法”；二为张三丰受到蛇鸟等动物启发，与华佗模仿五种动物的动作演“五禽戏”相仿而创立了武当拳法。

后一种传说显然更为符合情理，对此，南岳国师文静之编著的《太极拳剑推手各势详解》曾写道：“一日，有鹊急鸣院中，

张氏闻之，由窗中窥见树上有鹊，其目下视；地上蟠有长蛇，其目仰视。二物相斗，历久不止。每当鹊上下飞击长蛇时，蛇乃蜿蜒轻身摇首闪避，未被击中。张氏由此悟通太极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之理，因仿太极变化而命名《太极十三势》。此太极拳定名之由来也。”

打拳舞剑原为道士们健体强身的一项重要活动，张三丰将道教的清静无为、不争退让、养生全形的教义与凝神专息、意气互用等修炼方法融入其中，创立武当内家拳，达到自然内避、以柔克刚、后发先至的目的。

内家拳分为太极、八卦、形意、大成诸门，受击者当时并无什么异样，须待二十天后才感觉到体内之伤，且越加严重，很难救治。内家拳不唯徒手搏击，即使武当刀剑等内家器械技法，也犹重内功，必先炼内勇，后练外功。武当技击主要在于御敌，非遇困危之境不发，一旦出手，则无隙可乘，所向披靡。

道与拳，由张三丰首创而融为一体，此后，武当拳便成了道士们修行悟道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

武当之闻名，教义之传播，教派之兴盛，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武当内家拳。后人为了纪念张三丰，在武当山供有张三丰头戴斗笠、脚穿草鞋的铜铸鎏金塑像。

今天，内家拳仍具有别致的生命活力，全球各地练习太极拳的人们日益增多。太极拳将意念的运行与形体的动作合而为一，搏击一途消失殆尽，已衍化为纯“柔”形式，可收到健体强身、祛病御疾、延年益寿之奇效。

五

道教的外丹、内丹、导引、吐纳、炼气、斋戒不过是道教徒的

修炼方式而已,其最高目的是为了得道成仙;道教的主要成分也并不在它的教理教义,而在集体举行的仪式所表现的宗教活动,如坛蘸、道场、招魂、占卜、符篆、禁咒等。

宗教虽然离不开迷信,但并不等同于简单的迷信。

道教信徒,即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这一特殊地位决定了他们必须“高人一筹”,于是,刻苦修炼也就成了他们的日常功课。也只有练就一身超常的本领,才能得到普通民众的信任、敬仰与崇拜,如过硬的武当内家拳就是一种提高道士“身价”的最佳途径;宗教信仰必有一定的迷信与狂热,才能获得异乎寻常的成功,而制造奇迹的仪式活动便是最好的方式。许多证据表明,道教创始人张道陵能够将他的理论成功地付诸实行,不仅在于他治愈了许多疑难病症,更在于以巫术创造奇迹吸引信徒,传说他曾经赶跑过一只吸食人血的白虎神,降服过一条喷射毒雾伤害多人的大蟒蛇。

有了以上认识,再来看待那些长年跋涉在穷山恶水之间,通过神秘的仪式征服乡民的道士,我的心中,自然就多了一层理解,他们并非有意强化封建迷信,而是把它当作一种手段,以传播信仰。仪式的背后,所透出的是一股难得的顽强执著与锲而不舍的宗教精神。

道教在其发展传播中,一方面与禅宗结合,向老、庄复归,影响着士大夫的心理自觉修养与生理自觉保养意识;另一方面又以鬼神巫术与儒家佛教相结合,影响着普通百姓,形成了他们恪守礼法、顺从怯懦、乞求平安、畏惧灾祸的文化意识,它对上层的士大夫与下层的老百姓产生了各自不同的深刻影响。

道教受到中国民众的普遍欢迎,在于它是一种土生土长的宗教,它的教义宗旨、活动仪式不仅与民族的生存环境相适宜,更与社会文化心理相契合。

佛教过分否定了人的自然本性与享受观念,认为人生只是一种痛苦,把欢愉与幸福建立在虚幻的来世;儒家虽重现实,但它过分强调了人的社会性,要求时时处处节制自己、压抑本性、克服欲念;而道教,正是弥补了儒家与佛教之不足,它教导人们抓住当下,抓住现实,本真地生存于世。人们最为害怕的就是生老病死,道教似乎全都考虑到了,它用斋醮祈禳、禁咒符篆等方式祛除病症灾难,以长生不死的丹药与方术化解死亡,以导引吐纳、食气辟谷、升仙羽化之法解决生理老迈……对于普通民众来说,道教既是人生缺憾的心理补偿,又是解决日常生活困难的具体工具,诱惑力相当强大,极易为广大百姓所接受。

道教所供奉的神祇,既有三清尊神、玉皇大帝等天神,也有雷神、土地神、水火二将、龟蛇二将等自然、动物的神化形象,还有人间忠义之臣关圣帝君以及佛教的观世音菩萨,显得颇为杂乱,不像西方宗教那样具有严格的神谱体系。这也与国人少思辨、重直感的思维模式暗相契合。

道教是一个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宗教,它虽然早在三世纪末就传入朝鲜,以后又传入日本,对那里的宗教、民俗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并未形成巨大的宗教运动。道教的传播与影响,其主要范围仅在中国。

严格说来,道教是回应佛教的应战产物。但是,它一经诞生,就得到了上自皇帝,下至百姓的普遍认可,很快形成了与佛教分庭抗礼的局面,甚至还有压过佛教之时。然而,它终究未能彻底取代佛教成为中国的唯一宗教。就士大夫的人生哲学而言,他们往往以儒家为主,道家为辅,相依相衬,形成了进则为官、退则归隐的独特生活模式。在宗教方面,儒、道、佛虽然免不了你争我斗,但总的趋势,是相互包容、三教合一。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类似西方那样

规模庞大、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中国的佛道之争，大有古国君子之遗风，“君子动口不动手”，最为激烈的就是相互辩论，以争一己之长。但此消彼长，以“握手言欢”为多。我们有时也会见到一种十分奇妙的宗教现象，那就是佛教的寺庙与道教的宫观相处于同一山头，彼此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对此，我们往往见惯不惊，而在西方，却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这，恐怕与国人的心理思维、宗教信仰不无关系。

与欧洲基督教文化圈及北非、西亚、中亚伊斯兰教文化圈比较而言，国人的宗教意识较为淡漠，未曾出现过全民族的宗教狂热。对某一宗教的皈依，并非出自灵魂的本真需要，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实用的目的。“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这一俗语所代表的民众宗教心理相当普遍，往往有求之时才想到修庙供奉。在人们眼中，供奉的具体神祇也没有多大区别，不论哪路神仙，只要具有超自然神力，能够解决实际困难与具体问题就行。许愿、还愿，是他们常用的表达形式。祈求金钱、保佑平安、禳除疾病的愿望一旦实现，求拜之人就要通过施舍、修庙、重塑金身等方式向神灵谢恩。那些出家的教徒，也少有献身的宗教情怀，他们或是人生受到挫折寻求精神寄托，或是看破红尘洁身自好。因此，中国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像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的神权凌驾于王权之上的情况。在中国，王权一直至高无上，永远决定、主宰着宗教的命运，当然也就不会出现所谓的宗教战争了。

这种独特的宗教现象，犹如磁铁的正负两极，既是一件幸事，也有它消极的负面影响。

西方的上帝就是人们的灵魂、依托与主宰，它永远居于王权之上。世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人人生而平等。因此，西方诞生了平等、博爱的民主意识。而中国，一直处于封建皇权等级

森严的统治之下。

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在日益发达的科学光芒照耀之下,宇宙间的神秘外衣不断剥去,人的主体意识日渐觉醒,上帝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跪着,站起来吧!人类顶礼膜拜的跪地姿势改变了,终于站成了一个大写的“人”字,上帝与宗教渐渐“死”去。

于是,人类的信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真空。

西方人很快就调整过来了,他们以法律填补了这一真空。法律超然独立,凌驾于一切之上,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新的上帝。一个新型的法制社会就此应运而生。

在中国,宗教从来就没有居于王权之上,而皇帝早就退出历史舞台,信仰缺失的危机长期笼罩在人们心头。目前,我们正在积极地建设着一个民主的法制社会,但广大民众能像西方那样,视法律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能够凌驾于“人治”之上的“上帝”吗?这得有一种严格而本真的宗教情怀才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视法律为“上帝”的民主社会呢?

言归正传,还是让我们回到道教与武当山来结束此文吧。

武当山虽不是最早的道教圣地,但它后来居上,宫观的规模最大,修炼的道士最多,对中国的道教发展作用甚巨。细心品味武当建筑与大自然水乳交融的巧妙结合,精心体会道教遵从自然法则的天人合一及无私容人、谦退守柔的宗教情怀,将使我们获得奇妙独特的人生感悟,进入博大澄明的宗教境界。

千百年来,道教深入上层社会,融入世俗民间,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中国的哲学、政治、军事、文化、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我们脚下的每一片土地,我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胞,几乎都打上了“道教”的烙印。因此,正确地认识道教、理解道教、评价道教,也就有利于我们正确地对待中国的

传统文化,切实地把握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理性地探索宇宙的
奥秘与精义。

辛亥首义

—

波澜壮阔的二十世纪眼看就要落下帷幕，在这世纪之交的历史转折关头，人们免不了回望百年来所走过的艰难历程，所经历的风云沧桑，所感受的悲欢喜乐，以追寻生命的价值与存在的真谛，把握历史的规律与时代的精神，探索社会的走向及人类的命运，从而消除固有的劣性，校正前进的罗盘，纠偏逸轨的脚步，智慧而理性地迈向一个崭新的世纪。

当我们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审视即将逝去的二十世纪，就会发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华帝国，黑云压城，风雨如磐，似乎看不到半点希望与光明。

戊戌变法失败，义和团运动失败，唐才常创自立军起兵“勤王”事泄失败，孙中山领导发动的惠州起义失败……八国联军攻陷洗劫北京，清廷提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与英、法、日、德、俄等国签订《辛丑条约》，成为“洋人的朝廷”，中国沦为“谓之亡不可，谓之不亡亦不可”的名存实亡状态。

残酷的压制，层层禁锢，沉重的黑暗，污浊的空气，简直

压得人们透不过气来。

除旧布新,本该充满了活力与激情,可十九世纪的中国民众却在血雨腥风的惨烈中跨进了二十世纪,绝望与死寂如一张大网沉沉地笼罩着中华大地。

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无数仁人志士仍在奔走在呐喊,他们不惜生命,毅然决然地作着挣破罗网的坚强努力。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同盟会在广东、广西、云南等边陲地带多次发动武装起义以推翻清朝,但如闪亮的火星划过夜空,很快就被黑暗吞噬了。1911年4月,孙中山又在广州发动了第十次武装起义,以全党之力,“为破釜沉舟之举,誓不反顾,与虏一搏”,结果仍以失败而告终,黄兴逃往香港,革命精英大部分牺牲。

一次甚过一次的惨重失败与致命打击,使得绝望颓丧的氤氲,几乎弥漫在所有幸存党人的心头,民主革命运动跌入前所未有的低谷。

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

谁也没有想到仅只半年,在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晚,又一次大规模的革命运动——武昌起义在中国的中部爆发并迅速取得了胜利。就连流亡海外,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城为下次起义募集经费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也没有料到。10月12日,他在当地的报亭买了一张报纸,打开一看,见到“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赫然标题,才知革命在武昌爆发成功,不禁欣喜莫名。

武昌起义的辉煌胜利,再次激励、鼓舞、唤起了革命党人的斗志与信心,短暂的惊奇与惊喜过后,他们不遗余力地奋起响应。奔突的岩浆冲破地表喷薄而出,干柴的烈焰熊熊燃烧越来越旺,潜隐的炸药在全国各地轰然作响……

由武昌起义触发的全国革命巨澜,不仅推翻了统治中原两

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而且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开创了崭新的历史局面。为了纪念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就以这年的农历辛亥年命名为“辛亥革命”,而武昌起义,自然便称作了“辛亥首义”。

迂缓沉积的中国历史河流,经过辛亥革命的清淤排沙、截直裁弯,变得清澈顺畅、宽阔雄奇多了;古旧衰迈的历史装束,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终于剪下长辫扔掉裹脚布脱下长袍马褂,换上崭新的中山服与笔挺的西装,日渐融入世界文明潮流;积满尘垢的心理灵魂,经过辛亥革命的风云雷霆,民主与法制的清风鼓荡于胸,封建与奴性渐次消隐……

历史的航船,仿佛于偶然间拐了一个大弯,改变了它的航向与航程。

其实,偶然与必然相辅相生,偶然包含着合理的必然,必然往往通过偶然的特殊形式得以体现。

二

同盟会曾发动多次武装起义,但都以失败而告终。究其缘由,主要在于起义的地点大多选在边陲之地,他们往往从外部的香港、越南将革命力量临时输入广州、镇南关等地发动武装起义。因为缺乏内在动因,难以形成力量优势,失败也就在所难免。

在付出一次次沉重代价之后,革命党人渐渐达成了一种共识,认为起义的首选之地当为北京,直接威慑、震撼、推翻清廷;中策在长江中下游,下策才为边陲之地。

然而,北方封建壁垒深厚,北京为封建王朝的心脏之地,戒备森严,起义难以发动,只有割舍放弃。于是,他们只好选择中

策,将目光投向长江中下游地区,对中国民族资本初具规模的江浙、湖北寄予厚望。内陆革命虽具优势,但与边陲起义相比,其劣势也显而易见。如果内爆型革命不能迅速取得胜利,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如果没有深厚的革命土壤,将陷入封建势力的重重包围,遭到残酷的剿杀。而边陲起义一旦失败,革命力量或可逃亡异国他乡。

内地革命起义,生存与死亡、发展与毁灭、成功与失败的机会相依相存。

武昌起义仓促爆发,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它迅速取得胜利,直接推动、导致全国辛亥革命运动的爆发与成功,决非侥幸的偶然事件,与武汉地区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密不可分,是多种合力的必然结果。

史学界在探讨辛亥革命何以爆发于武昌的成因中,其中一说即归功于张之洞之治鄂。此说虽然多少失之偏狭,却也涉及了事实的深层因素。

湖北深处内陆,在清廷闭关锁国的政策下,经济、文化、教育相当落后,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湖北自然成为势力圈竞争的中心。他们占租界、开商埠、设银行、办工厂、辟航道、筑铁路,在大举渗透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民主意识。而洋务派的后期代表人物张之洞于1889年出任湖广总督后,严厉推行“湖北新政”,经过近二十年的惨淡经营,更是使得湖北由一个落后的内地省区跃至与近代化程度甚高的上海、广东并驾齐驱的地位,成为与李鸿章、袁世凯控制的北洋系统相互并列的又一个洋务建设中心。

湖北新政主要由新式教育、近代工业、新军三大板块组成。

张之洞将早期的洋务移植湖北,第一件深感头痛的大事,

就是人才奇缺。那些整日诵读四书五经、以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秀才、进士显然不堪当洋务之任，张之洞因而仿照西方教育制度，开办了两湖书院和自强学堂，新式学堂的早期学员大都由传统士人转化而来。据有关资料统计，1860~1905年间，湖北共产生士绅约四万八千人，而接受新式学堂再教育的人数，估计在清朝末年的二十年间，最少有两万多人，约占士绅总数的43%。清末全国共有学生三百余万，仅湖北一省就有三十多万。这批接受了西方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已完全有别于中国旧式士大夫，他们不仅学习了西方近代文化科学知识，更接受了民权论、民约论、进化论、民主共和思想等资产阶级学说，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极易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有了人才，引进西方技术设备，湖北首次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开设的具有近代色彩的大规模工矿企业。其中尤以中国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湖北制铁厂最为引人注目，“其机力之宏大，运动之灵巧，火力之猛烈，迥非向来土炉人工所能到”。

与此同时，武汉地区还先后开办了两百多家民族资本工业。

官办商人、民族资本家及由在汉的四十多家工厂、一百三十多家洋行、近十家银行形成的买办队伍共同构成了一个较为庞大而独立的商人阶层，他们组建商会，积极投入到抵制美货、保路运动、立宪运动之中，以其自觉的主体意识与相对充实的财力成为这些社会运动不可缺少的支柱。武昌首义成功，他们很快就站在了革命一边，主动承担地方治安、后勤及战地救护工作，部分商团成员甚至“荷枪助战”。

“兵之于国家，犹气之于人身也。”张之洞认为唯有练兵与修筑铁路两事是挽救中国的“救死急着”。因此，他一面采用各种方法激发社会尚武崇力之气，一面“放胆大举”地编练新兵。

新军以新式后膛炮、克虏伯大炮、步枪取代戈矛土枪；训练与编制仿效欧、日，指挥官多由军事学堂出身者担任，而接受先进国家的现代化军事体制，也就相当于吸收了先进工业社会的科技管理及价值观念；科举废除之后，一般知识分子只得另谋出路，而多数贫寒子弟则投入新军。秀才当兵，已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普遍现象。由此，湖北的新军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也为接受革命思潮提供了条件。

于是，一个迥然不同于旧式绿营、勇营的新式军人集团诞生了。清朝末年，湖北已有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新军一万六千多人，且大部驻扎在武汉地区，成为一座一触即发、彻底埋葬清王朝的巨大火药库。

此后，湖北新政作为成功的样板推向全国，而那些“代练新军”人员，全由湖北新军派往各省。武昌首义爆发，他们很快就成了该地响应革命的重要人物。

民间常以“秀才造反”这一熟语讥讽理想与现实严重脱节的妄想之举，而秀才一旦与国家的暴力工具军队相互结合，就具有了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神奇力量，成了清朝统治与封建皇权的掘墓人。

湖北新政造成了文化的逸轨，诱发了社会的裂变，而裂变的绅商学军四大阶层联合组成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一致要求突破僵硬冥顽的封建专制。革命的种子只有找到武汉这块合适的土壤，才有辛亥首义的猝然爆发，并在短期内取得全国性的胜利。

三

自 1644 年清军入关统治中原，满汉之间的种族矛盾一直

不断。“扬州十日”，清军杀害数十万百姓，将一座历史悠久的繁华名城扬州夷为废墟；“嘉定三屠”，又是惨无人道地屠杀民众二十万；清军的残暴激起广大民众的强烈反抗，他们以“反清复明”相激励，斗争波澜迭起，绵绵不绝。后经所谓的康熙、乾隆盛世的融合，种族矛盾虽有所缓和，但先辈的血恨一直积淀在后人心头如一条巨大的潜流汹涌不息、澎湃不止。特别是满清政府强迫推行的剃发留辮政策，不仅没有达到同化各族民众的目的，那根拖在脑后的长辮反而被汉族人民视为耻辱的象征，仿佛在时时提醒他们不忘民族的深仇大恨。

鸦片战争后，人民日益觉醒，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而清廷仍然陶醉在天朝帝国的迷梦之中，闭关锁国，固步自封。此时的有识之士，酝酿、宣传、提倡的是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运动，他们并不想推翻清朝统治，只希冀求得一点有限的民主权利，推进国家的繁荣与富强，而这也得不到清廷的“恩准”。清朝廷对外奴颜婢膝，对内采取残忍的高压政策。洋务运动流产，戊戌变法失败，唐才常的“勤王”自立军遭到镇压，一系列改良运动的失败使得爱国志士终于认清了清王朝的本来面目，他们毅然丢掉幻想，抛弃改良主义，坚定不移地走上了推翻清朝的革命道路。潜隐着的满汉种族矛盾，再次跃出地表，“反清复明”的口号升华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于1905年确立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

武汉虽然具备了革命的基础与前提，却不足以自觉地转换成摧毁清朝的打击力量。还需革命党人的有力“催化”，才有可能过渡、发展到振臂一呼、群起响应的武昌首义。

湖北党人并未产生具有全国影响的思想家与政治领袖，但他们无不景仰孙中山与黄兴，基本上接受了他们的民主思想与政治纲领，并以此号召、组织群众。

湖北革命组织由吴禄贞等人于1903年发轫于武昌花园山设立的反清秘密机关,正式建立组织为科学补习所。此后,又有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共进会等组织先后成立,一个组织被破坏,新的组织随之诞生,湖北党人前仆后继,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后由文学社与共进会携手联合,组成统一的指挥部,推举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公为总理,共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

湖北党人脚踏实地,“耻声华,厌标榜,木讷质直”。他们采取的革命路线,既非耸人听闻的暗杀主义,也没有像同盟会那样急于求成,在条件并未成熟的情况下到处出击,动辄发动武装起义,而是长期深入底层,运动会党,发动新军,稳中求进。

起义前夕,湖北新军共计一镇(师)、一混成协(旅),约一万五六千人,其中“纯粹革命党人将近两千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四千多人,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一千余人,其余都是摇摆不定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革命党人基本控制了湖北新军。因此,一旦举事起义,就掌握了一支强有力的军事武装,而新军所具有的民主思想与革命目标又使得他们的行动远远超过了过去旧军队的哗变闹事。

10月10日晚,工程第八营首先发难,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并按原定计划迅速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掌握了起义的主动权。驻扎武昌的新军各兵种标营及各军校学生主动响应,齐集楚望台,总数三千多名。这时,起义临时指挥部又不失时机地作出了攻打督署的正确战略决策。

10月11日拂晓,工程营发难还不到十二小时,起义新兵就占领了武昌全城;10月11日晚,汉阳驻军反正,民军抢在清军之前占领兵工厂,保证了武汉战守及邻近各省起义的军火供

应；10月12日，汉口驻军起义。至此，被长江与汉水分隔开来的武汉三镇全部光复。

起义第二天，战痕犹存的起义军各路领导人便汇集在湖北谘议局会商大计，成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性质的政权——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湖北军政府），废宣统年号，定中华民国，以十八星旗为革命军军旗，推举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都督，并以他的名义通电全国，呼吁响应。

革命党人之所以看中黎元洪，主要在于他具有特殊的身份与地位。黎元洪，湖北黄陂人，在武昌驻军中地位仅次于第八镇统制张彪，他曾两度赴日考察军事，多次指挥湖北新军参加朝廷操典，素以“知兵”著称；对士兵态度较好，有“爱兵”之誉，人称“黎菩萨”；他思想也比较开通，与汤化龙等湖北立宪派代表有着一定联系；加之当时革命党人以“排满”为第一要义，汉官一概被视为争取的对象，革命党人在起义之前就曾议论过是否由黎元洪出任总督的问题……种种因素凑在一起，促成了黎元洪登上湖北军政府都督之位。

而在黎元洪一方，要他猛然改变态度，接受并领导革命，自然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经过三天三夜的紧张思考，在革命党人枪口的逼迫下，面对逐渐明朗、有利的战争局势，他才剪掉长辫，坚定信念，赞成民主共和，反对满清专制。

为了提高黎元洪的威望，首义成功后第一个来到武昌的同盟会主要领导谭人凤还特地为他举行了一次授旗授剑、慷慨誓师的仪式。

黎元洪出任都督之初，实权虽仍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他不过做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泥菩萨”，但却起到了他人无法替代的客观影响作用。军队中的封建等级观念十分严重，尽管是接

受了西方军事训练的湖北新兵，也唯长官之马首是瞻。黎元洪的名望在军队中号召力很强，他军阶高、有威望，与部属关系密切，其上台本身就给汉族官绅、军人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自然成为旧人物竞相效仿的对象，“所以全省帖然，内顾无忧，军政府得专心致力于战事矣”；黎元洪出任都督不仅维系了军心，鼓舞了士气，振奋了民心，稳定了湖北局势，还为全国官绅、军阀作了一个楷模，各省纷纷附和响应起义，使得清廷众叛亲离。

武昌起义在禁锢得如同铁板一块的满清王朝统治中部撕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清廷闻讯，满朝文武深感大难临头。于惊恐万状之际，急派陆军大臣荫昌率领陆军大举南下，又命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巡洋舰及长江水师溯流而上进入武汉江面参战，声称“今日必以急复武昌为第一义”。

革命党人深深地认识到保卫胜利果实的重要，湖北军政府刚一成立，就作出了“先击攘汉口之敌，渐次向北进攻，以阻止清军南下”的战略部署，全力以赴与敌作战。

两军相遇，展开了殊死较量。汉口古名夏口，因而这场在汉阳、汉口发生的战役被称作“阳夏战争”。

武昌首义，最为得利的当数袁世凯。“百日维新”时，他因向慈禧告密而导致光绪帝的囚禁。光绪帝死前留下遗诏，继位者必遵嘱处决袁氏。后袁世凯虽经多方活动幸免一死，但所有要职被一概“开缺”，着令他回乡“养病”。袁世凯退居家乡洹上，表面上似闲云野鹤，但暗地里却紧张活动，以寻东山再起之机。

袁世凯所持重的，是他一手经营起来的“北洋六镇”。北洋军队与湖北新军是清末训练和装备最好的两支部队，清廷让这两强并存，原想让他们互相制约。武昌起义爆发，平衡的局势被打破，北洋六镇成为清朝唯一可用的新式军队。

袁世凯在他退居洹上的三年时间里，北洋六镇虽交由陆军部管辖，但他仍遥控着旧部。陆军大臣荫昌率军南下，袁世凯暗中授意北洋将领按兵不进。满清贵族青年荫昌无法指挥、调遣军队，清廷无奈，只得请出袁世凯重返政坛，南下督师。

阳夏之战打得相当残酷，民军在势力强大的北洋军队面前，尽管顽强抵抗，但仍连遭败绩。

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在占领汉口、汉阳后，并未急急进攻武昌。功高震主，加之满清王朝对汉臣一直怀有猜忌之心，他可不想做一个殉葬的忠臣。特别是遭受贬谪的隐恨一直在咬噬着他的心灵，报仇雪恨的时机就在眼前，岂肯就此放过？此时的袁世凯，已成了独立于清廷与革命军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并占有明显的优势。清廷将他视为挽救颓局的“救星”自不待言；而对革命军的征剿，他也赢得了炮轰武昌、虎视南京的相对优势，革命党人也在尽力争取他“掉转枪口”。一番审时度势之后，袁世凯心中的权欲越来越盛，他决定抓住千载难逢的良机，纵横捭阖于清廷与革命党之间，步向权力的巅峰。

于是，此后的中国历史演义，就有了我们所熟知的南北议和、袁世凯弄权逼宫、清宣统下诏退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窃取胜利果实在北京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以满足一己私欲为前提，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充当满清王朝掘墓人的作用。对此，孙中山曾经说过：“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

武昌首义促成了袁世凯的复出，而袁世凯的介入及不断膨胀的权欲很快就使得辛亥革命中断了它的使命，改变了它的性质，延宕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历史，总是刚刚挣脱一个旧的怪圈，很快就难以控制地滑

入另一个新的怪圈之中；中华民族好不容易感受到了一点民主光明的温暖与灿烂，却又进入另一场新的战争与黑暗。

四

昔日的湖北省谘议局、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如今已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它坐落在蛇山南麓，掩映在阅马场北端的绿荫丛中，因楼房外表呈红色主调，武汉人称之为“红楼”。

红楼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仿照了西方国家行政大厦的建筑形式。在我眼里，它已不再是一座普通的西式楼房，而是记录中国历史变迁的一个符号，是近代化艰难历程的一个象征，是辛亥革命的一座纪念碑，是古老帝国融入世界文明潮流的一个见证。

湖北谘议局诞生于清廷的立宪声中，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立宪，在北京设资政院、各省设谘议局，以分别作为中央和地方的谘询议事机构。红楼于1908年筹建，1910年建成，是当时武昌城内首屈一指的著名建筑。

其实，清廷的立宪不过是一块装饰专制统治的屏风，并未达到真正的改革政治、富国强兵的目的。但立宪派仍希望以此为契机，使中国走向类似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道路。以汤化龙为首的湖北立宪派在清廷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政治活动，提出了《禁种洋烟案》、《禁止缠足案》、《整顿湖北吏治案》等反映民意的议案，来往京师发动请愿要求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在保路运动中抨击盛宣怀出卖路权媚外肥私……

然而，清廷却无意于真正的改革，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玩弄假立宪的手段欺骗、迷惑广大民众。他们所想的不是国家与

人民的利益,首先考虑的就是自己的专制统治。种族矛盾,是横亘在改革面前的一道无法跨越的障碍。改革一旦深入,自然会触及满清王朝的皇权统治,慈禧曾赤裸裸地说过:“宁赠外邦,不给家奴。”

原本忠于清廷的立宪派人物想求得一点有限的权力而不可得,他们逐渐认清了清廷的专制与假立宪面目,由失望而愤怒,不得不同情、附和、响应革命,走向了清朝的反面。以汤化龙为首的湖北立宪派领袖在武昌首义后很快就与革命党联手,共商大计,担任要职,一变而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

立宪行不通,才有革命党兴。压制愈甚,反抗也就愈烈。是清统治者自己一步步将自己逼上了绝路,从而结束了二百六十多年的中原统治。

我常想,如果没有1644年的满族入主中原,统治者仍是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汉族,也就不会如此神经质地害怕国内的民族矛盾,恐怕早就顺应历史潮流,赞成立宪,开放党禁,拥护民主,走上了类似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道路,中国的近代历史,或许也就不会出现令人压抑得喘不过气来的屈辱、黑暗与无序状态吧?

其实,只要清王朝真正推行立宪,民族矛盾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统治者维护统治的长久之计,应是启发民智、开放党禁、推行民主、实施法制,只有这样,政治才会清明,社会才能有序,经济才会发展,国家才会富强。这也是整个世界不可逆转的文明潮流。一味采取专制、高压与愚民政策,只会将人民推向它的反面,而这样的政府,必定是一个短命的政府。

历史无法假设,清王朝的封建性质决定了它的反动。

清王朝的落幕与消失还不到九十个年头。九十年,在漫长的中华历史长卷中,实在是太短暂了。稍不留神,我的思绪就

回到了风雨如磐的清朝末年。于是就想,设若我碰巧置身其中,做了清朝的一个臣民,那该是一副怎样的情景呢?如果我是一个男人,前额一定剃得光光,后面必定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走起路来,总是滑滑稽稽地左甩右摆;如果我是一个大臣,晋见皇上我将三跪九磕诚惶诚恐,口称奴才如何如何,面对下属我将厉言疾色狐假虎威……想来想去,不管我做一个什么样的人,都是一个变异的可怜角色,得不到半点幸福,见不到半点希望。这时,一种恐惧的颤栗,总是无法抑制地掠过我的全身,透入我的骨髓。

于是,我就更加仰慕“辛亥革命”的伟大,仰慕那些不惜抛却头颅、舍弃身躯的仁人志士,如果没有他们的献身革命,封建皇权是决然不会自动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的。

步入红楼,面对恢复原貌陈列的军政府礼堂、谋略处、秘书处、黄兴召开军事会议的地方以及当时使用过的步枪、大炮及信函、照片等革命遗物,辛亥革命的硝烟,便不知不觉地在我的眼前萦绕弥漫……工程营发难打响第一枪,各路义军汇集楚望台,民军奋勇攻打督署,汉口、汉阳新军起义反正,民军以民房为掩护坚守阵地打退清军的一次又一次进攻,广大民众踊跃支援革命,湖南援军赶赴汉阳,民军渡江反攻汉口……

一幕幕,生动而鲜活,仿佛一切发生在昨天。其中最让我感佩的便是因起义计划泄露而于起义前夕遭捕杀的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的牺牲场景。彭楚藩的公开身分是一个宪兵小头目,抓获审问时,参议官铁忠有意为他开脱递话:“你是宪兵,何得在此?是去捉革命党的吧?”如果彭楚藩顺水推舟,即可逃出魔掌,可他却大声叫道:“我就是革命党,我就是要为祖宗报仇的!除了满奴汉奸,所有的都是革命党,你们杀也杀不完!”杨洪胜临刑前怒吼道:“好,只管杀,你们的末日就要到

了！”而刘复基就义时则疾声高呼：“同胞们，大家起来革命！”

对此，后人诗赞曰：“龟山苍苍，江水泱泱，烈士一死满清亡，掷好头颅报轩皇，精神栩栩下大荒，功名赫赫披武昌。呜呼三烈士兮汉族之光！永享俎豆于千秋兮，与江山而俱长。貌清而洁，骨侠而烈，促革命之动机，贡牺牲于祖国。湖湘钟灵兮，孕滋三杰！共和成立兮，千秋万岁永纪念夫鄂州血。”

每当我的脑海里浮出三烈士慷慨就义的悲壮，就禁不住热泪盈眶，他们这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英雄主义精神永远激励后人前仆后继。

为了缅怀辛亥先烈志士，除军政府旧址被辟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外，武汉三镇还有三烈士亭、黄兴拜将台旧址纪念碑、辛亥革命首义纪念碑、伏虎山辛亥革命烈士陵园、辛亥首义烈士墓、起义门、武昌起义指挥机关、打响第一枪的工程营、楚望台军械库等多处纪念旧址及建筑。

五

透过一连串偶然因素的表象，我们看到了辛亥革命爆发的深层必然，它的发展、结局及其影响也是这必然链条中的有机一环。

推翻清朝与推翻帝制这两项任务，辛亥革命采取了同步进行姿态。其实，它只完成了推翻清朝的任务，而后一项任务却远未完成。种族矛盾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只要同属汉族，不论官商百姓，都可团结、凝聚在一起，而一旦清朝覆亡，新的矛盾、斗争就出现了，个人、党派、势力间的欲望的膨胀与利益的争夺又会将一个相对清明安稳的局面搅得天昏地暗，翻江倒海。

辛亥首义成功，在湖北军政府内部，以首义党人代表的革命势力与黎元洪为代表归附革命的旧军官及与汤化龙所代表的立宪派团结联手，共同构成了一副“三驾马车”的政治格局。而清皇室一旦宣布退位，三种势力间错综复杂的争斗就出现了。黎元洪因对革命同情而为革命党人所看重利用，在局势渐渐明朗的情况下，才不再等待观望，就任都督之位。革命胜利后，日益利欲熏心，他凭借手中的实力及日渐上升的声誉，不惜排除异己，镇压革命党人，由“泥菩萨”一变而为操纵、独揽湖北军政大权的风云人物。

在对推翻清廷的大计上，作为汉人一员的袁世凯与革命党也能达成一致的共识。只要能够达到覆亡清朝的目的，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也就作出了一定的让步与妥协。而袁世凯一旦登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就被更加膨胀的权欲熏得晕头转向、不明东西，急不可待地违背诺言，反对革命，做起了“黄袍加身”的美梦，结果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唾骂声中一头栽下权利的峰巅跌进历史的深渊背上遗臭万年的骂名。

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清王朝，三十年代虽出现了日本军国主义扶植下复活的傀儡“满洲国”，但那不过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而已。然而，与推翻清王朝同时并举的推翻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势力的任务，却远未完成。它只不过在形式上推倒了高高凌驾于中国民众头上的皇帝，而封建毒素仍顽固地笼罩着中华大地，民众心中的皇帝依然存在，封建残余势力常以各种改头换面的方式走马灯似地卷土重来。

几千年的皇帝于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人们心头的依托变成了空落，种种欲望很快就填补了这一缺失的空间。于是，便有人想当新的皇帝，袁世凯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的下场虽然使得那些权欲熏心的各色人物改变了策略，他们不再做形式上

的皇帝,却对实质上的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利梦寐以求。诚如高一涵在《非君师主义》一文中所言:“中国革命是以种族思想争来的,不是以共和思想争来的,所以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于是,统治不断更迭,社会陷入失控与无序状态,结果产生了中国现代史上最为黑暗的军阀混战及国民党的专制独裁。

武昌首义后各省的响应,也是当地颇有名望的旧官僚、旧军人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们仅以推翻“满清”为宗旨,并未触及封建政权内部的基本结构,只是走走改头换面的过场而已。而阳夏之战以袁世凯的胜利而告终,更加意味着北方作为君临万邦、四夷宾服的天朝中心依然没有改变。

阳夏之战中,如果没有宋锡全率领的鄂军第一协官兵私自离汉,没有湘军的撤回,没有军政府的内部矛盾,其结果恐怕要好得多。那么,也就没有袁世凯的挟威和议。汉口虽失,只要能够保住汉阳,辛亥革命的发展历史也许会重新改写。武昌首义成功,湖北军政府成立,在民主人士的心目之中,武汉俨然已成民国首都。只要阳夏战争取得胜利,在当时民国的建都之中,作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城市武汉,又具国之中心与九省通衢的交通便利,必当首选。

可实际情况却是拟定南京,而袁世凯又凭借手中的政治、军事优势不肯南下就位,于是,北京仍为中国的首都。那是一块被皇权浸润透了土地,即使那些生活在皇城脚下的臣民,经了一种日积月累的潜移默化,也有着一种莫名的自大心理狂热,打上了“君临天下”的皇权烙印,他们将发生在北京的皇上登基、出巡、祭祀等封建仪式看成是一种提高自己身分的荣幸。今日的北京人身上,我们还能明显地感到他们这种首都人对外省人的优势心态。而南京,也曾是六朝古都,皇权意识也相当

浓厚。只有武汉,从未被哪朝哪代定都,它崛起于近代,其经济发展与文化氛围又代表了一种融入世界文明的趋势,当为最佳的国都之选。可是,它却错过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此后的湖北,辛亥革命所形成的中心地位与优势也就永远地消失了。新政中断,新军解体,湖北再次变为一个落后的内陆省份。而随着后工业现代化的到来,人类交往联系渠道的多样化、立体化,武汉原先所具有的航运、铁路等重要交通地位日渐丧失,区位优势也不复存在。如何抓住新的机遇,实施国际城市发展战略,重现昔日的“东方芝加哥”风采,已成为今日武汉人所面临的一项严峻任务。

然而,即使阳夏战争革命党人取得了胜利,也并不等于辛亥革命完成了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残余一时根本无法彻底清除。

辛亥革命在全国各省会及大中城市闹得沸沸扬扬、轰轰烈烈,但是,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农民却仍是平静如水,压根儿就没有半点改变。而幅员广阔、生活贫困、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村,正是封建统治、封建专制、封建残余得以生存、盛行的温床,这块广袤的土地没有翻耕,仍是板结着的封建土壤,民主也就无从谈起。

于立宪派而言,他们本身所倡导的就是“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梁启超主张民权学说,但“以为中国数千年之积习,且民智未开骤然予权,固自不易”,只能实行英、日等有君主的民权国家,不能实行美、法等取消君主的民主国家。他们所立所行,仍想保有一个权力无边的皇帝。

而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旧军人、旧士绅则更不懂得民主为何物。1912年4月,孙中山卸任后应邀来到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武汉巡视,在与黎元洪会面时,他曾问道:“你对三民主义有何

看法？’

黎元洪闻言，不禁莫名惊讶地反问道：“三民主义？什么三民主义？”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推翻满清王朝吗？”孙中山又问。

黎元洪笑了：“这个我自然知道啦，因为满清不是我们汉人，所以要推翻它。”

当孙中山告诉他光推翻满清还不够，这只不过是实行了民族主义，下一步还要进行“五族共和”的民主政治时，黎元洪道：“推翻满清，赶跑皇帝，选了总统，不就是实行民主政治了吗？”

孙中山继续开导说：“选总统不过是一种形式，如果表面挂着总统招牌，换汤不换药，骨子里还做着皇帝，就不能说是民主。”

黎元洪不高兴地说道：“孙先生，就是换块招牌，换碗汤水，依我看这就很不错的了。连我都不知道民主是啥玩艺，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

不仅黎元洪，就是革命党人、军人也少有懂得民主含义的。

即使在海外生活过三十多年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对西方的民权与自由学说也缺乏基本的理解。

孙中山一生都与革命、战争相联，他最关心的是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与国家的富强，他曾说过：“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要将来能够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孙中山把民权与个人自由分开，又把分散疏离的个体农户解释成享有过多的自由，并以此推导出中国革命的目的不是争自由，而是争取民族的独立与富强。同时，他还强调忠孝治国，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中认为“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才自然可以强盛”。以我们今日的眼光来看，当

然会认为他所强调的忠孝没有摆脱旧道德、旧文化的范畴。只有当公民充分享有自由权利,具备完全的独立人格,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真正的民主与法制才有可能出现。

孙中山在国内的组织运动,起先主要依靠的就是秘密帮会,他最为注重革命所需要的组织与纪律,极端夸大政党和政府的宣誓手续。在南京临时政府组阁时,他极力反对宋教仁的内阁制,而取独揽大权的总统制,这也为日后袁世凯的独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辛亥革命的过程,自始至终更是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士兵对官长的效忠,黎元洪的登坛誓师,黄兴的登台拜将,都是中国封建专制文化改头换面的展演。

辛亥革命消灭了外在的皇帝,却一时难以革除中国民众心头的皇帝;它推翻了清王朝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却一时难以建构新的适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结构。这不仅是武昌首义中一群三十岁左右的新军义士无法解决的难题,即对那些资历深厚、赫赫有名的革命党领袖而言,无疑也感到深深的棘手与困惑。

武昌首义爆发,黄兴从香港回国,突然与张謇等具有浓厚传统文化素养的立宪派头面人物相遇,两相交谈,黄兴“即歉然自以为不如,还视同党,尤觉暴烈者之只堪破坏,难与建设”。

只破不立,没有美好而完整的建设,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权,引发的只有危机与混乱。

而中国的封建土壤又过于深厚,封建意识与残余势力一有机会,就会死灰复燃。辛亥革命提出的民主课题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弘扬,后被压倒一切的民族救亡运动覆盖,直到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还在轰

轰烈烈地上演着一出全民狂热的封建悲剧。人人喊万岁，个个奉圣旨，从上到下只有一个头脑在思考，只有一个声音在回荡。人们不仅受到外在的专制束缚，在灵魂上还要“早请示晚汇报”，时时处于检讨反省的洗脑状态。封建专制之强之烈，几乎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极点。

噩梦醒来是早晨，改革开放后，人们才意识到那是一场民族的悲剧与灾难，才陷入了痛苦的反思，才重拾辛亥革命的话题。

灾难与悲剧为什么总是接连不断地出现在中华民族头上？我们何时才能变得更加智慧理性？何日才能真正步入世界民族强林？

反思历史，我们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交的学费实在是太多了。

今日，当我们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审视辛亥革命，尽管它差点沦入“改朝换代”的模式之中，但它毕竟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历次暴风骤雨般的农民起义，它是一次国家的暴力机器军队与具有西方先进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相互结合的产物，将中国革命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尽管辛亥革命没有带来真正的民主，但它推翻了清王朝，消灭了皇帝，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了一次大的解放，懂得了怎样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利争取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与自由。

尽管辛亥革命未能完成民主的革命任务，但它所提出的问题在经历了一段历史的怪圈后又重浮水面，凸显在我们眼前，令我们时时警醒，促使中华民族的有志之士不遗余力地献身于未来的现代化民主建设。

.....

辛亥革命蕴藏着丰富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内涵，它产

生的影响之巨、覆盖的内容之广、包容的课题之深构成了一座我们无法绕开的高山，具有永恒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茶韵仙骨

—

常言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饮茶，早已深入广大民众的生活之中而成为仅次于饮食的日常之需。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地，是茶叶的故乡，是最早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的国家。茶，首先是以物质的形式出现，并以其固有的实用价值作用于人类的生活。从神农尝百草得茶而解毒，到隋唐以前的药饮及解渴式的粗饮，莫不如此。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里，许多平常的物质生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一定的时期，便都注入了深刻的文化内容。自唐宋始，在茶的自然、实用属性之上，又附着了一层浓厚而炫目的艺术色彩，经过漫漫岁月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一种神韵独具的茶文化。

当我们回首遥望灿烂的历史，为中华古国的“四大发明”而骄傲而自豪的时候，不知想没想到，近几百年来，我们民族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发明什么推动世界文明进程的东西了。放眼一望，天上的飞机、卫星、导弹，地上的汽车、坦克、自行车，水中的轮船、潜艇；使用的冰箱、空调、电话、电脑、煤气、肥皂、洗衣粉，

看的电影、电视录像,听的录音机、收音机,唱的卡拉 OK,穿的西装、皮鞋……从大到小,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是人家西方的发明。不唯物质,即使制度、文化、艺术等软性的、隐性的、内在的东西,大多也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痕迹。

属于我们民族自己的,从古代传至今日仍具有生命活力、真正称得上“国粹”的传统物质文化,硕果仅存的,也就茶文化、中医文化、饮食文化等为数不多的几种了。

唯其不多,也就更加值得珍惜与研究。

这些传承至今的物质文化,经过千百年的积淀,无不包孕着民族的历史精髓,反映着民族的个性特征,折射着民族的灵魂风骨。

中国茶文化,范围广泛。以茶待客,以茶为会,以茶交友,以茶养性;以茶为礼品、为药物、为聘礼、为祭品……茶文化精神,已深深植根于社会生活之中。

中国茶文化,雅俗共赏。从民间大众的饮茶到文人儒士的品茗,从庙堂寺院的茶禅到上流社会的崇尚,茶活动层次不一,规范有别。饮茶,可以简单、普通、俗化到“粗茶淡饭”,仅为满足其生理需要的程度;也可上升到茶艺、茶道的高度,茶的历史、栽采、煎制、饮用、风俗……几乎每一项都是高深的学问。

中国茶文化,内涵丰富。它不是单纯的物质文化,也不是单纯的精神文化,而是二者巧妙的有机结合,有着一套完整的构建体系。饮茶有道,饮茶有术,茶文化中所包含的儒、道、佛哲学意蕴、思想精髓,整个饮茶过程中所体现的美学意境、道德情操、礼仪形式令人叹为观止。

中国茶文化,全球普及。茶文化自神州大地经“茶之路”传播而出,辐射至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如今,清香爽适的茶叶已成为世界上一百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二十多亿人口的大众化

饮料……

当我们手捧茶具在清香扑鼻的氤氲中啜茶品茗的时候,当我们谈及茶文化对人类世界所作出的不朽贡献的时候,当我们研究茶文化为它的博大精深而赞叹不已的时候,谁也不会忘记一个闪光的名字——陆羽。

陆羽是历史上第一位从事茶叶研究的人,他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茶书——《茶经》。《茶经》搜集整理了唐代以前包括茶艺、茶道、茶事在内的一系列文化思想,搭设了茶文化的基本构架,勾画了茶文化的总体轮廓。《茶经》一出,标志着中国茶文化体系的正式形成。

自唐以来,上自达官显贵,下至普通百姓,凡好茶者无不知晓陆羽之名。人们在崇拜的过程中将陆羽渐渐神化,他曾先后拥有茶博士、茶仙、茶神、茶圣、祖师等多种封号,其形象也以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再现于世,被后人视为偶像,奉若神明。

我们只有拂去笼罩在陆羽头上的光环将他还原为一个普通的本真之人,透过历史的面纱走进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循着他的足迹深入其内心世界感受一颗灵魂的热烈与躁动,才能找到中国茶文化的源头,了解它的本质意蕴,把握它的发展脉络,并使之发扬光大。

二

陆羽人生之初,就给人们带来了一道难解之谜,竟以一个弃孩的身分出现在世人的视野之中。

不知父母,不知血统,不知贫富,既不明不白,又无挂无碍。这一独特的现身之况,为他的日后发展与人生道路埋下了一道迂回的伏笔。

为他作传的后人在感到困惑的同时，也为灵动的思维展开想象的翅膀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唐开元二十一年（733）一个秋天的日子，从湖北省天门市（唐开元年间属复州竟陵郡）城西湖滨的龙盖寺里，信步走出一位和尚。他走出山门，走在广袤无垠的江汉平原上。纵横交错的河流湖泊微波荡漾闪烁着点点银光，收获过的田野裸露坦呈着一片肥得冒油的黑色，一袭红色的袈裟点缀着这油画般的风景使其跃动着一股神性的光芒。和尚越走越近，于是我们就知道了他是龙盖寺的主持，法名智积禅师，人称积公。积公正在苦苦地思索着玄妙的禅机佛理，突然就听到了一阵凄厉的雁叫。“雁叫声声长空裂”，难道佛祖通过秋雁昭示着什么奥妙的天机吗？积公抬头一望，但见不远的杨柳林中群雁喧集。他缓缓地走了过去，竟发现三只大雁正展开洁白而温暖的羽翼，守护着一个约摸三岁的孩童。这孩童不是别人，就是日后被人誉为茶神的陆羽。以慈悲为本的积公见到这一来历不凡的孩童，不禁善心大发，当即抱回寺院收养。

陆羽一露面，就有神灵护佑，就有佛光普照，传说虽则神奇，但也算得上与他身后的“茶神”称誉前后照应。顺便提一句，陆羽的姓名及其字号，即与这发现情景有关，并在他长大后，正式根据《周易》“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以为仪，则最据上极”，而取名为陆羽，字鸿渐，既纪念了他那不寻常的来历，又寄寓了求吉祥的愿望。

往日的天门城里，就有雁叫关、古雁桥等地名，可见这一传说流传之广、影响之深。

积公将小陆羽抱进寺院，出家之人既无抚养小孩的经验，坐禅诵经的生活环境也不宜于养育孩童，只得将他托给当地一名姓李的儒士代养。李家有位比陆羽略小的女儿李季兰，他们

俩青梅竹马，相处甚洽，充满了难得的情趣与欢乐。

一晃五六年的光阴转瞬即逝，这年，李儒士因出仕而离开竟陵，陆羽也就重新回到了智积禅师的身边。

不难想见，在李儒士家中，陆羽曾接受了较好的启蒙教育，其内容自然便是那些典型的儒家经典。但到了寺院，积公理所当然地就教陆羽念经诵佛，并打算为他剃度受戒。

然而，已受了儒家思想浸润的陆羽却不买账，他说自己无兄无弟若是做了佛门弟子岂不断了祖宗香火？他说他不想在古刹深院寂然枯坐研读佛经，要学的话，就继续先前的儒家学业……积公没想到陆羽这孩子不念养育之恩，竟敢违逆自己的意愿，不禁十分恼怒，“执释典而不屈”，一定要陆羽学习佛家经典。陆羽虽只九岁，但性格倔强，毫不妥协，针锋相对。积公虽怒，但也没有采取什么断然的强硬措施，而是把他当作一个杂役来使唤，要他清洗器具、打扫寺院、清除粪污、和泥抹墙、背瓦盖屋、放牧耕牛，积公想让他繁重的劳役折磨中改变初衷。

不曾想陆羽仍然我行我素，杂役、放牛之闲，他就掏出东汉文学家张衡的《南都赋》等文章研习、诵读。积公恐陆羽在儒学典籍里越陷越深，就不再让他外出，将他关在庙后园中除草剪枝，还派一名大徒弟监视督促。

陆羽实在不堪忍受寺院的封闭寂寥与苦役折磨，一日乘人不备，他翻墙逾院，顺利地逃出了龙盖寺。

逃出寺庙的陆羽还只有十一岁。一个十一岁的孩子，自然谈不上什么思想，但他独特的身世使他从小就养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个性。在李儒士家，作为一个寄养的小孩，积公肯定支付了一定数目的抚养费用。这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寄人篱下，真父无从知晓，养父是积公，七弯八拐地转到李儒士手上，虽尽养育之责，但对他的管束自然不会太多，要求也不会过于苛刻。

也就是说,陆羽是在一种较为宽松的环境里长大的,从小就养成了无拘无束、倔强不羁的性格。与李季兰的嬉戏玩耍,使他感到了一种难得的亲情与家庭的温暖;刚一懂事,接触到的就是儒家经典,使他的接受思维带着某种明显的指向态势。将这样的一个陆羽再行送回寺院,其格格不入也就可想而知了。本来就没有亲情的积公对他整日板着脸呵斥来呵斥去,他无法忍受;与世隔绝的寺庙里没有民间的活泼、清新、惬意与欢笑,死气沉沉的空气让他憋闷难受;人们虽然尊重理解佛教信徒,但对其生活方式总是怀着一股善意的嘲讽与怜惜,如今却要他剃光头发清心寡欲一辈子寂守青灯,这在陆羽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由此可见,陆羽并不是对儒家喜欢到了骨子里头并将其作为人生信奉的要义,而是把它当作一种反抗的工具与手段罢了。其实,回到龙盖寺的两年生活对他此后的人生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反感佛教的世俗形式,但喜欢佛家经典深得佛学精髓;陆羽与茶有缘,肇始于他给养父兼师父的积公当“下手”,干些煇炉子、清洗茶具的煮茶辅助杂活,积公原指望日后能将自己的袈裟传给养子,没有想到在陆羽心田中播下的却是一棵爱茶嗜茶的种子;他对积公的搭救抚育之恩念念不忘,四十多年后智禅师圆寂,陆羽闻讯,不觉放声哀哭,并作了一首《六羡歌》以明心迹并表悼念之情……

且说陆羽逃出寺院,举目无亲,且年龄尚小,其貌不扬,说话结巴,身无长物,何以为生?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他在一座十里凉亭歇息时,遇到了一个戏耍班子。班主见他聪明伶俐,无依无靠,就收留了他,让他表演滑稽戏。陆羽生性诙谐,滑稽多智;其貌不扬,正好可以扮演令人捧腹的角色;说话口吃,反而增加喜剧效果。如此一来,陆羽“歪打正着”,一下子就成了戏班的名角,颇有几分“英雄有了用武之地”的味道。他不仅表

演,还编写“台词脚本”,作《谑谈》三篇达数千言,并撰有一卷戏学专著《教坊录》。因戏子之卑与戏班的辗转流浪,这些著述当然不可能留传后世。

这样的过了三年演艺生活,也就是在他十四岁的时候,命运之神向他露出了灿烂的微笑。原河南尹李齐物被贬为竟陵太守,为迎接上任新官,竟陵县令特召陆羽所在的戏班前来演出助兴。李齐物慧眼独具,看罢陆羽的演出,不禁大为赏识,专门接见。李太守爱抚地拉过他的手,拍着他的背,一番交谈后,更是为陆羽的身世及求学求艺的事迹所感动,觉得他不该久陷戏班,应重返学业。临别时,李太守“亲授诗集”,并郑重地把他介绍到火门山隐士邹暨夫子那儿去求学。

陆羽在火门山除了系统地诵读经书外,还经常到附近龙尾山的野生茶林里采摘茶叶,为邹夫子煮茗烹茶。禅茶一味,清心明目、提神醒脑的茶叶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就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一般和尚都能通晓茶事,主持积公就更不待言。陆羽在龙盖寺经过积公的调教,对茶事已有相当的基础。但那时,他是被动的接受茶事,还带有一定的抵触情绪。而在火门山就不同了,他是出自内心深处地爱上了茶,并开始有意识的对茶进行考察与研讨。邹夫子见陆羽爱茶懂茶,特地请人在火门山北坡凿了一眼深泉,井水清澈澄明、甘冽醇厚。正是在这里,陆羽初步认识到了茶叶与泉水之间的亲和与互补关系。

三年学业期满,陆羽俨然成了一名饱学儒士,他告别邹夫子走下火门山,到了另一位受株连而贬到竟陵的礼部员外郎崔国辅那儿游处,做做清客,日子过得甚为清闲而散淡。

时间一长,陆羽心头总要不时地涌过一股深深的失落与惶惑,他觉得生活里还缺少一点什么。缺点什么呢?缺少质量,缺少意义,缺少一种有声有色的滋味。他决心从眼前雍容生活

的茧壳中挣脱而出,去追寻生命的另一种别致的风采。

唐天宝十三年(754),二十二岁的陆羽第一次告别故乡竟陵,向西蜀进发。他心中潜隐着的一棵种子在火门山萌芽后已渐渐长大——从对茶事的被动接触到依恋执著,现已变成了一种自觉的行为。陆羽西行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考察茶叶、研究山水,并探讨茶叶与山水间的有机关系。

唐代饮茶成风,据《封氏闻见记》所载,中原地区自邹、齐、沧、隶,以至京师,无不卖茶、饮茶。当其时,佛教盛行,特别是“坐禅”,要求晚间不食不睡,茶既能解渴,又能驱赶睡神,僧人们自是得益匪浅,一时成为佛门良友;唐代科举会试,举子们困于考场,监考官终日疲劳,于是,朝廷特命以茶果送到考场。举子们来自四面八方,朝廷一提倡,饮茶之风在全国士人中大为倡行;唐代诗歌极盛,吟咏成风,诗人为了激发文思,需有提神之物助兴,茶为首选;封建帝王、达官贵人食甘厌肥,难免昏沉积食,为提神消食治病无不饮茶。一时间,贡茶竟为民间一项新的沉重负担,各产茶区必得定时定量定质向上交纳名茶;唐中叶后提倡禁酒,民间无酒可饮,就以茶为补,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饮茶的进一步盛行……

饮茶在各地、各阶层的广为流行使得茶叶渐贵、茶具渐精、茶艺渐成,可是,却没有一部有关饮茶的著述。饮茶源流需要梳理,饮茶技艺需要概括,饮茶艺术需要总结,茶道原理需要开掘……是的,中国的饮茶历史发展到了唐朝,应该有一部指导性的、系统性的、综合性的、全面性的茶学专著面世才足以与当时盛行的饮茶之风相互匹配。

历史与时代在焦灼地期待着,呼唤着。

对此,陆羽在饮茶的过程中已敏锐地感知、捕捉、把握到了,于是,他义无反顾地将这一重任扛在了自己年轻而稚嫩的

肩头。

忘年之交崔国辅深知陆羽心志，临行前，他将自己最为珍惜的一头白驴、一头乌牛赠给陆羽，以助一臂之力。

西南地区是茶树的原产地，我国发现茶树和饮用茶叶的历史，有文献可资查考的，已在三千年以上。为追本溯源，陆羽的目光，自然地投向了与湖北近邻的四川。正是此次的出游考察，使他见到了大小不一、高矮参差、形态各异的多种茶树。于是，在此后的《茶经》撰述中，他一开头就写道：“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

如果他足不出户，长期困在书斋，长期固守一隅，能有以上的广见博闻与详细记载吗？

陆羽遍游巴山、峡川，后转而北上，至义阳郡（今河南信阳一带）。第二年秋天，他才风尘仆仆地南返故乡。在远离县城三十多公里的晴滩古驿附近找了个幽静之处——东冈岭，潜心整理出游所得，进一步研究茶学，为正式撰写茶学专著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在东冈岭呆了一年有余，为了充实有关资料，陆羽又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出游考察。他渡江北上，足迹遍及山南、淮南、河南等地。

此次出游，正值“安史之乱”爆发。一时间，战火弥漫，城镇毁弃，田园荒芜，生灵涂炭。正在江北光州（今河南光山县）一带山区考察的陆羽为避战乱之祸，仓促间只得随着涌动的难民大潮一同渡江南下。

为求一个安宁的环境，陆羽没回故乡，而是流落到了东南的江苏、浙江等地。

陆羽本意，是想此次考察后再回竟陵，找一静谧之地，继续

茶学研究并潜心著述。猝然爆发的战乱打断了他的回乡计划，终此一生，他再也没有回过故乡竟陵。然而，连年的战乱却怎么也不能终止他心中的伟大宏愿——创作一部全面而系统的茶学专著。

三

陆羽在流浪逃难途中，念念不忘考察茶树，访问山僧野老，搜集有关采茶制茶的宝贵资料。江苏、浙江等地，原本不在他的考察计划之列，却因了一场战乱，使他发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这里的茶叶、山水、茶事、茶艺堪称一流，这给他的茶学研究注入了更加新鲜、丰富、深刻的内涵。“祸兮福所倚”，他不禁喜出望外！为了获取翔实的资料，采到中意的叶芽，品到甘冽的清泉，他半刻也不能闲住，那匆忙、疲惫、憔悴的身影，常常穿行、往来于湖州、常州、润州等地。

直到上元初年（760），陆羽二十八岁之时，他才在湖州（今浙江吴兴）城郊的苕溪结庐定居。陆羽为何定居湖州？恐怕与那儿得天独厚的茶文化氛围密切相关。湖州古时就盛产茶叶，五世纪开始为皇宫进呈茶叶贡品，唐时的紫笋茶已是声名远播，湖州的顾渚山茶林更为陆羽提供了一块研究茶学的天然园地。

有关陆羽定居湖州的生活情况，在此我们不妨将他创作的《自传》抄录一段略作剖析：

上元初，结庐于苕溪之滨，闭关对书，不杂非类。名僧高士，谈宴永日。常扁舟往来山寺，随身惟纱巾、藤鞋、短褐、犊鼻。往往独行野中，诵佛经，吟古诗，杖击林木，手弄

流水，夷犹徘徊，自曙达暮；至日黑兴尽，号泣而归。故楚人相谓“陆子盖今之接舆也。”

从上自述，我们可以见出陆羽独特的人生哲学、心灵状况与生活方式。他闭门读书，清心寡欲，不与俗人往来，结交的尽是志趣相投的名士高僧如皎然、灵澈、张志和、孟郊等人。他行踪自由，常驾一叶扁舟，随身只带纱巾藤鞋、粗布短衣；或信步山林敲击树干，或手抚清流沉思遐想，或吟诵诗文引吭高歌。他有着深厚而系统的儒学根底；接触过大量佛经，即在苕溪，也常诵读，骨子深受影响；而他过的却又是一种道家的隐居生活，儒、道、佛，就这样有机地统一于陆羽一身。这为创作《茶经》奠定了深厚的哲学底蕴，正是有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基础，茶文化才不致流于轻浮变成泡沫消失，而能源远流长地发展影响至今。陆羽从早晨游至黄昏，直至夜幕降临，他才长啸一阵，痛哭一场，尽情而归。因此人们都说，这个陆羽呀，恐怕就是当今的狂人接舆了。

陆羽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为何要哭要狂？

我以为不外乎以下三点：一为昏暗的时局而哀哭，安史之乱，何日才能寰宇廓清乾坤朗朗？二为自己的人生选择而狂，他尽量靠近儒家研习儒学，可他接受的只是儒家的形式，内心深处对那一整套束缚人性的枷锁充满了狂逆与反叛；他反对佛教的形式，却深得清心寡欲、执著追求、茶禅一味、融通事理等佛学真义；他表面上没有接近道家，其生活方式、生活实践又与道者并无二致，儒、道、佛，在他身上统一着的时候，却又无时无刻不在他的心中矛盾冲撞、相互撕扯。三为即将问世的《茶经》而哭而狂，一部伟大作品的诞生，往往要耗尽作者的精血，弄得身心疲惫憔悴损，几至癫狂迷乱的程度。

长啸而歌，长歌当哭，以哭为歌——呈于诗，则诗传四海；
现于文，则文播千秋。

一部流传千古的《茶经》，就要脱颖而出了。

果不其然，陆羽在苕溪住了还不到一年，即公元760年底，
就完成了中国第一部茶文化专著——《茶经》的初稿。

三年后，“安史之乱”终于平定，陆羽的欣喜之情自不待言，
为了庆祝纪念，他不仅亲自设计了一个煮茶的风炉，把平定安
史之乱的大事铸在其上，还对《茶经》作了一次全面的修改。

大历九年(774)，湖州刺史颜真卿修订《韵海镜源》，陆羽参
与其事，趁便从古籍中搜辑历代茶事，补充《七之事》一章。至
此，《茶经》的全部创作任务才算真正完成。我们今日见到的
《茶经》，便是这一年的修订本。

从早年的接触茶事到萌生创作《茶经》的念头，从二十二岁
的外出考察准备到二十八岁开始创作，从初稿、修改到四十二
岁时的最后定稿，一部《茶经》，几乎耗尽了陆羽大半辈子的精
力与心血。

陆羽仿佛为茶而生，他的清贫生活、习儒诵经、东奔西走、
辗转磨难、艰辛坎坷……一切的一切，都为了一个字：“茶”！

陆羽深谙茶艺精通茶道。

煮茶不只程序繁琐，且火候的掌握近乎神秘，成为高雅茶
事中一项最难的技艺。而陆羽却特别擅长煮茶，颇负盛名。传
说智积禅师由于饮惯了陆羽煮的茶，再饮别人煮的便觉乏味。
此后陆羽离开寺院浪迹江湖，积公“宁缺勿滥”，索性不再饮茶。
代宗皇帝征召积公供职，命宫中煮茶能手煮茶，再由皇上赐饮，
积公也只品尝两口就搁下了。后来，皇上暗召陆羽前来煮茶，
积公观其色闻其香，不觉一饮一尽。喝完了还舔舐了一下嘴唇
说道：“这茶怎么好像是渐儿煮的？”陆羽字鸿渐，渐儿，即陆羽

也。皇上闻言,这才请陆羽出来相见。传说归传说,但陆羽精于茶艺茶道由此可见一斑。

陆羽品水也有神到之功。

水质的好坏对茶汤的色、香、味具有很大的影响。陆羽早年就注重水质的研究,在火门山初知茶与水的互补关系,在崔国辅处曾“相与较定茶水之品”,在江浙一带更是探访天下名泉。于是,他在《茶经》里专辟一节论水,指出“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此上、中、下三水还有一番讲究:“其山水,拣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水取汲多者”。他曾品评天下水味,选出了前二十名。

陆羽品水之神,唐敬宗宝历时人张又新在《煎茶水记》中有所记叙。一次,新任湖州刺史李季卿路过扬州,陆羽正在扬州大明寺逗留,应邀同船而行。船抵扬子驿,李季卿想见识一下陆羽的高超茶艺与辨水绝技,便道:“陆君煮茶天下闻名,而扬子南冷水乃水中绝品,如今二美毕具,还望陆君一显其技。”说罢,就派一士卒驾小舟往南冷取水。江水取来,陆羽舀了一杓,扬了扬道:“江则江矣,非南冷者,似临岸之水。”军士赶忙分辩:“我划船前往,上百人观看,哪敢弄虚作假?”陆羽不言,将取来的江水慢慢倒入盆中,约一半时,突然停住,又用杓扬水,然后点头微笑道:“这才是真正的南冷水了。”士卒大惊,赶紧磕头认罪:“小人从南冷打水回来,船靠岸时,不小心泼了一半。担心水少受责,就舀了些岸边的水灌满,没想到您老一眼就看出来了,真神鉴也!”陆羽品水之神,出自同代人记载,时间、地点、人物几要素一应俱全,加之所述情景绘声绘色,想来决非虚言。

陆羽深得茶韵,长年累月浸泡茶中,实为一地地道道之“茶人”也。

陆羽嗜茶,更重精神。喝茶,可以达到一种俗人难以企及

的大境界大超脱。大瓢舀来甘甜清水，水中映着天上明月，银辉贮入水盂，茶汤沸腾如松涛阵阵……江流、明月、松涛汇于一气。这哪里是在喝茶，纯粹是一种难得的与大自然的节律一同起伏着的美的陶冶与享受。寂处草庐，啜一口香茗，听一声更鼓，天上人间，自然恩惠，全在这一汲一煎一饮之中了。

在这种与天地融为一体的纯美陶冶中，茶人质朴自然，清静无私，心态平和，廉洁简约，胸怀阔大，退隐励志，孤傲自重，洒脱无羁……

一个真正茶人所具有的这些高贵而独特的品性，在陆羽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茶经》一出，陆羽声名广播。朝廷闻知，特征召他任“太子文学”，并授之为“太常寺太祝”。但陆羽无心仕途，仍一如既往，过着闲云野鹤般的自由自在生活。好在他没有父母的督责，也就没了什么光宗耀祖的规范与概念，不必为出世做官而困而恼，可见儒教思想对他人生的影响实在是少之又少。他曾在一首明志感怀的《六美歌》里写道：“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登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

《茶经》问世，世人争抄，大有“洛阳纸贵”之势。陆羽设计的一套茶具，远近倾慕，纷纷仿造。“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不少人争相延请陆羽，想一睹他的风采神韵，观赏他的茶艺绝技，品尝他的煎煮香茶。特别是那些附庸风雅的达官贵人，更是以啜饮陆羽之茶为荣。这不仅搅扰了他的宁静生活，还使他受到了不少显贵的羞辱。一气之下，他激愤地写了一篇《毁茶论》。不知《毁茶论》写后是自己藏之“高阁”并未示人，还是人们根本就不理会那违心的抨击，反正《毁茶论》连只言片语都没留传于世。

陆羽在江浙的几十年生活，除了隐居著述，就是广泛交游。他所结交往来的，都是一些可以称得上“茶人”的名流。如高僧皎然，他是南朝著名诗人谢灵运的十世孙，参佛甚深，诗文俱佳；如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颜真卿，两人时相奉和，留有不少珍贵诗文；还有权德舆、孟郊、戴叔伦、耿纬、张志和等等。我们仅从《全唐诗》所涉及与陆羽交往的诗篇中，就可发现五六十个文人士大夫都是他的朋友。以文会友，以诗唱和，以茶相聚，真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也。

当我检索、翻阅了几乎与陆羽有关的历史资料与文献后，却没有发现片言只语谈及他的妻儿家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早年，他就是拿着儒家的这柄“尚方宝剑”反抗养父积公、反抗命运的播弄。到头来，却还是做了一个实际上的“和尚”，未娶妻室，未留血脉。这恐怕与陆羽儒学为衣、佛教为本、道家为骨的人生哲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为了一个“茶”字，他想摆脱人世的挂碍。无牵无挂而来，无牵无挂生活，又将无牵无挂而去，这是一种多么难得的境界啊！人生传世的方式不外两种，一是肉体的，留下一代一代的子孙绵绵不绝；二是精神的，以其思想影响一代又一代后人的心灵。陆羽在研究茶学的过程中，渐渐地看淡了前者而着意后者，能有一本《茶经》流传，此生此世，更复何求？

可是，他的心灵深处，却一直眷恋着一个魅力非凡的女性。这个女性不是别人，正是他那青梅竹马的儿时伙伴李季兰。

自从陆羽九岁那年重返寺院，李季兰随父离开竟陵，两人一直音讯杳然。没想到二十多年后，他们俩竟在乌程开元寺的一次诗会上邂逅相逢。见面相认，当时的惊喜之情可想而知。然而，此时的李季兰已不是他想象中的名门闺秀，而是一位方外道姑。原来，李季兰父亲来江南赴任不久，即染病身亡；不

久，母亲又撒手而去。为葬亡母，为了生存，她只得卖身为奴。后为主家不容，将她转卖青楼做了一名诗妓。她卖嘴不卖身，出污泥而不染。久留风尘，她不免看清世人嘴脸，看破滚滚红尘，就到开元寺出家当了一名女道士。因其才貌俱佳，她受过唐玄宗征诏，在宫中呆了一个来月。

与李季兰重逢，不禁勾起了陆羽强烈的故园之情与亲人之恋，季兰的悲惨命运更是震颤着他的心灵。在对小妹妹的关怀、体贴与爱护中，自然地就多了一层男人独有的相恋情怀。李季兰见到陆羽，也感到了一种坚实的依靠，仿佛又回到了童年那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于是，两人来往频繁，唱和酬酢，感情益增。一次季兰卧病不起，陆羽焦虑万分，嘘寒问暖，精心照料。李季兰不禁感激涕零，作了一首《湖上卧病喜陆渐鸿至》，抒发心中的喜悦、关切、伤感、撒娇、无奈等复杂缠绵之情。

然而，一件突如其来的变故自天而降，又活生生地将他们两人拆散。唐大历末年（779），朝廷再召李季兰进宫，为唐德宗吟诗奏曲，为诗会酒宴助兴添乐。不久，发生“泾原兵变”，叛军占领长安，拥朱泚为“秦帝”。李季兰等宫中人员逃避不及，皆为朱泚所获。也许是慑于淫威，也许是出于对德宗强召自己入宫的怨恨，李季兰写了一首贺诗赠与朱泚。没想到唐德宗第二年就带兵打回京城，朱泚兵败逃亡。唐德宗知悉李季兰的举止后，一气之下，“遂令扑杀之”。一个多才多艺的弱女，就这样令人哀婉浩叹地一命永归黄泉。

陆羽辗转得知季兰被杀的消息，悲痛欲绝，更是看透社会、看透人生、看破尘世。一切荣华富贵、一切虚妄之念、一切欲望之想都随风飘逝，飘得无影无踪。唯一所存，仅有一个“茶”字。

陆羽为茶而生，为茶而来，为茶而活，岂不是上帝遣至人间的一位茶仙么？

是的，他就是一个神乎其神、活灵活现的“茶仙”！

写到这里，我的心中，也承认了他是一位飘逸灵动的茶仙。当然，我眼中的仙并非那种不食人间烟火、虚无缥缈的怪诞之仙，而是有着人的躯体、仙的风骨的茶仙——所谓茶韵仙骨是也！

“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耿滢与陆羽联句诗的开首一句，可视为对陆羽恰如其分的概括与定评。

陆羽之文传世不多，但他早年写戏，尔后撰述《茶经》，与友人唱和作有大量诗文，还主持或独撰了近十种地方志书，称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墨客”。

陆羽晚年，曾一度由浙江经湖南而移居江西上饶，后又返回浙江。他的《自传》，只写了个“我的前半生”，后半辈子行踪模糊，真迹难觅，只《新唐书·隐逸》记了一笔，说他“贞元末卒”。据有关专家考证，陆羽活了七十二岁，最后终老湖州，时间为公元804年。

四

一般来说，男人都有烟酒之癖。

我从小与酒无缘，稍一沾唇，就会头晕脑胀；与烟倒是结过一段亲情，但自从五年前开始用电脑写作，两手敲击键盘无暇抽烟，加之电脑“娇气”，见不得烟雾，就抽得少了。而1997年深秋的一场咽炎，弄得我上呼吸道严重感染，差点大病一场，这样一来，也就彻底绝了抽烟之念。如今所嗜，唯有茶也。我所看重之茶，在于它的提神醒脑，使我能够很好地进入创作的最佳亢奋状态。当然，日子一长，也就多少懂得了一点辨茶、识水、烹茶、品茶的雕虫小技。于是，对陆羽的仰慕之情也就逐渐

地浓了，总想着能到他的出生、成长之地天门市去走上那么一遭。

终于下定决心前往，已是1998年的初秋了。

凌晨从武汉出发，经汉川而至天门，下得车来，正值中午。又叫了一辆的士，前往位于西寺路的陆羽纪念馆。

在天门竟陵城周围，从唐末以迄明清，历代有关纪念陆羽的名胜遗迹有西塔寺、陆子井、陆子泉、陆羽亭、古雁桥、雁叫关、陆公祠、东冈岭、火门山陆羽读书处等十四处。后来，这些遗迹已大多不存。而陆羽纪念馆正是要将有关古迹纳于一体、重行修建，以供后人凭吊观赏。其中的陆羽故居建筑群已竣工对外开放，陆羽公园及有关纪念陆羽的建筑正在兴修之中。

说来令人奇怪，刚上车时大有“秋老虎”之势的艳艳红日，一入天门市境，却钻入了云层，一时间天就阴了。刚至陆羽纪念馆，竟下起了一场凉爽的秋雨，难道是陆公在用上品神水——天雨泡茶来迎接我的到来吗？

中午时分，职工下班；建筑工地静静的，民工们也在休憩。纪念馆门房后院内几个老人正在悠闲地打着麻将，跟他们说明来由，就独自一人趑了进去。

雨似乎越下越大了，还刮着一股劲厉的秋风。我赶紧走过新修的古雁桥，在充满了古朴韵味的山门后躲雨。正巧那儿放着一个凳子，我一屁股坐在上面，掏出早晨泡好、随身携带的一杯清茶，望着绵密的雨脚，一口一口地啜饮起来。

凉凉的秋风鼓荡着，不时将几滴细密的雨珠洒入我怀。不一会风小了，慢慢地止息了，而雨还在一个劲地下着，在天地间织着一张透明且闪亮的雨帘。陆羽纪念馆位于市区边缘，机器的轰鸣、汽笛的鸣叫、车轮的滚滚等市声虽然隐约可闻，但我却实实在在地感到了一股难得的幽静。沙沙的雨声中夹杂着秋

虫之唧唧,还有一只母鸡在“咯咯答”、“咯咯答”地欢唱。不知哪儿飞来两只苍蝇绕着我转了一圈,眨眼间就不见了,疾来速去,不着半点痕迹。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不是与陆羽之茶有着一种内在的、相通的心韵与神韵么?不正适合我挣脱日常的俗务,达到纯粹的思想境界么?望着眼前的雨帘,听着沙沙的天籁,品啜浓浓的绿茶,感受秋日的丰富与大自然跳动的脉搏,仿佛一瞬间,我就思接千古、神游八极,进入了中国茶文化的氛围与反思之中……

茶的用途可远溯神农氏之时,但是,发现茶、会喝茶,还谈不上茶文化。茶的发展历史并不等于茶文化的历史。只有当人们把饮茶当作一种精神享受,产生了与之相应的各种文化现象和社会功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茶文化。茶文化萌芽于两晋南北朝,形成于胸怀博大的唐王朝,后经历代发展、补充、完善,才构成了中国茶文化的整个格局。

如果没有文人的参与,茶不过是一种单纯的物质形态。也并不是所有的饮料、食品都能形成博大精深的文化,“柴米油盐酱醋茶”中,也唯有茶才发展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中国人含蓄、沉静、忍耐、务实的性情与茶相互契合,中国人需要茶,选择了茶,发展了茶。先是汉代文人的喜好让它涂上了文化的影子,再是两晋南北朝的政治家们提出“以茶代酒”、“以茶养廉”来对抗当时的奢靡之风。于是,饮茶就注入了一定的社会内容,并透露着一股精神与情操的内涵,茶的文化功能由此显现。到了我国封建社会最为兴盛的时代唐朝,茶文化在佛教的发展、科举的完善、诗风的盛行、贡茶的兴起、严厉的禁酒等多重因素推动下正式形成。一个辉煌的时代造就了无数辉煌的人物,陆羽便是其中之一。《茶经》的问世,标志着茶文化这门独立学科的诞生与成熟。

一部《茶经》，在七千多字的篇幅里，广泛地收集了中唐以前关于茶文化的历史资料，深刻地论述了茶之源、茶之具、茶之造、茶之器、茶之煮、茶之饮、茶之事、茶之出、茶之名、茶之图，几乎囊括了茶学的各个方面，包括茶树形态学、生物学、育种学、栽培学、制茶学、审评学、分类学、地理学、药理学，同时还涉及故事、散文、诗歌、传说、寓言等体裁的文学作品及文字学、音韵学、审美学、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等多种人文学科，真可谓包罗万象，令人叹为观止。

《茶经》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搜集、整理了前人的有关茶文化历史资料，更在于其难得的创造与构建：它首次把饮茶当作一种艺术过程来看待，创造了从制茶、选水、煮茗、列具、品饮等一整套中国茶艺，贯注了一种美学的意境与氛围；它首次把“精神”二字贯穿于茶事之中，强调茶人的品格情操，把饮茶视为一种“精行俭德”、修身养性的方法与手段；它首次把儒道佛的哲学精蕴、思想文化与饮茶过程融为一体，创造了中国的茶道精神，它首次勾勒了中国茶文化的总体轮廓，搭设了中国茶文化的基本构架……

“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茶经》问世后，影响极为深远。民间一改往日饮茶旧法，纷纷仿效、学习陆羽所倡新法；无论官方或是民间，历代一再刊行《茶经》，自唐至清，版本约有二十种之多；《茶经》之后，相继问世的一百一十多种茶书，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陆羽《茶经》的影响；《茶经》于1191年传至日本，促成了日本第一本茶学著作《吃茶养生记》的诞生，为日本的“茶道”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茶经》传于朝鲜，形成了朝鲜独特的“茶礼”；目前，《茶经》已译成日、英、俄等多种文字，遍布世界各地。

“家在竟陵城下牛背读书，门临柘水之滨雁桥发迹。”有谁

能想象得到,当年的一个无父无母的弃儿、一个不甚起眼的放牛娃,竟凭自己的独特天分、执著努力,创造了一门至今仍具强大生命活力的纯粹“国学”——中国茶文化而名扬千古,远播全球。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

然而,陆羽之后的国人,在他所开创的茶文化道路上,最多也只做些修改、补充、考据与订正之功。

唐时的博大、刚健雄风一旦消失,我们的国土缩小了,民族的性格变得柔弱了,人们的创造活力也相应地萎缩了。

茶正式与国外贸易在南北朝时期就开始了,但是,它在传向世界各地的过程中,除东亚外,其他地区仅只接受了茶叶这一物质形态,并未理会附着其上的中国茶文化。中国向西方传播了有益于他们身体健康的饮料,却没有、也不可能传去中国茶人的清静纯朴、廉洁自省、修身养性等精神情操。绿色茶叶这一和平象征之物,非但没有换来友谊,反而引起了西方的贪婪与野心。为了改变茶叶输入的贸易逆差,英国殖民者将一箱箱鸦片源源不断地运抵中国。清朝白银流失,国人肌体遭受摧残,从而导致了一场鸦片战争的爆发。

在论及英国殖民者的残忍与霸道之时,也使我想起了当时不少清朝要员们颀颀而愚昧的嘴脸。他们以为洋人生命的物质基础就是茶叶,认为只要不再输出茶叶,洋人们就没法活命而不得不屈服于大清的天威;他们以为洋人的腿是直的不会弯曲,一旦开战,哪里是咱中国人的对手?他们还以为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其他的地方皆为不毛之地;那里的民众全是一些没有开化的野人蛮种……令人悲哀的是,持这些看法的官员占据庞大的优势,以上看法可算得上当时整个清朝统治者的普遍

共识。

一个朝廷愚昧无知到这种地步,如若再不警醒,我们民族就真的半点出路也没有了。一场酷烈的鸦片战争,一次血与火的洗礼,中华帝国才从沉沉的迷梦中惊醒,才睁开朦胧的双眼打量世界,才第一次开始了与世界的真正对话,才被动地打开大门迎接八面来风,才艰难而蹒跚地走向世界文明体系之中……

还是让我们回到“茶”字上来吧。

茶,目前已成为世界三大饮料(另两种为可可、咖啡)中饮用人数最多的一种。我们的祖先发现了茶树利用了茶叶发明了茶文化,传播海外,已发展成一股蔚为壮观的“茶潮”。而在国内,不论是茶的物质形态,还是文化精神,却反而落后了。古代的茶叶生产,一直停留在手工工具阶段,从来就没想过使之科学化、机械化。直到西方实现了由手工到半机械化、机械化、连续化的过渡,我们才零打碎敲地引用人家的先进工具,如1925年从日本输入用于绿茶初制的揉捻机和粗捻机,1933年从德国输入制造红茶的克虏伯式揉捻机、大成式揉捻机和印度的烘干机等。直至今日,我国有关茶园耕作、管理、采摘的整套机械及茶叶生产机具等方面仍落后于不少工业先进国家。虽然陆羽创作了《茶经》,发明了茶文化,但一直没有被人们上升到科学体系的高度来整理认识,加之近代战乱频仍,许多古老的茶文化内容早已湮灭无闻,在茶的国度与茶文化的故乡,对我们祖先的创造反而知之甚少。中国茶道久不存焉,我们只有在日本茶道里才发现、知道了自己昔日的部分身影,以致有人“反客为主”,误以为中国古代史书所载之茶道乃由日本传入。茶的原产地为中国,这一无可否认的事实也因茶叶种植、生产的落后,茶道的失落与湮没而遭人怀疑,出现了“原产地印度一

元论”、“原产地二元说”及“原产地多元说”等观点。

茶与茶文化发展至今，正经受着来自多方面的冲击与挑战。

如何发明有益身心的茶饮占据市场，与“可口可乐”、“雀巢咖啡”等饮料一比高低；如何使节奏缓慢的茶文化适应今日的快节奏生活；如何让昔日的茶艺茶道去其繁琐、陈腐的形式使之焕发新的生命活力……这些，无疑都是中国茶文化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崭新课题……

神思恍惚中，秋雨不知在什么时候柔了、小了，细细的雨点在和风中斜斜地飘来舞去。在轻灵与飘逸中，我分明感到了一股秋天丰收的醇厚与浓酽。一旁的菜园地里，藤架上结满豆角，有淡红色的喇叭花在蓬勃开放，萝卜菜、水芋头长势格外喜人。就连那些野生的狗尾巴草，经过一番秋雨的洗涤，也显得十分精神，草茎昂首秋空有如一条条拂尘，和风荡漾，天地间仿佛潜隐着一位道士正以一双无形之手将它们摇动、轻扫。

我走下山门台阶，步入柔柔的细雨中，认真地观赏凭吊。眼前是工艺精巧、古朴典雅的陆公祠，祠内立有一座约三米多高的陆羽铜像，呈现了他精心品茶的风貌。陆公祠后，是一座名为西塔禅寺的双重檐歇山式高大仿古建筑，分为上下两层。古雁桥、山门、陆公祠、西塔禅寺连为一体，一气呵成，构成了陆羽故居建筑群主体。四周小河环绕，偶有鱼跃，惊起一片绿波；河边杨柳依依，颇有“拂堤杨柳醉秋雨”的韵味。我漫步前行，眼前突然一亮，西塔禅寺之后紧傍绿水边，兀然耸立一座洁白的陆羽全身石像！只见他神情安然，满头长发束于脑后，右手持茶杯，左手握经卷，栩栩如生，一副典型的具有茶韵仙骨的“茶神”形象。石像底座，刻有“茶圣陆羽，功垂千秋”八个大字。

走出陆羽纪念馆，不觉云收雨霁，秋雨洗过的天空显得蓝

幽幽的,更加高远明净。这时,一道脉脉斜晖洒满大地,四周顿时一片灿亮。

亮光激发了我的神思,不禁想起了唐代诗人卢仝的赞茶诗句:

一碗润喉吻,两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汗轻,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生清风。

在诗人笔下,饮茶的过程,也就是人格纯净与精神升华的过程。陆羽曾在《茶经》中特别强调,真正的茶人,应是“精行俭德”之人。饮茶不仅生津解渴、提神醒脑、延年益寿,更能激浊扬清、洗涤灵魂、陶冶情操。

在一个喧嚣、浮躁的平面化社会里,是多么地需要纯粹的中国茶道精神、需要真正的茶人品格、需要陆羽的茶韵仙骨以正本清源呵!

寂寞与热闹

任何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在论及晚明文学时,都不得不对“公安派”大书一笔。公安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为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读音 zhòng)道三兄弟,其中袁宏道成就最大,因他们是湖北荆州公安人,所以称之为“公安派”。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它不仅开创了一代新的文风,主宰着当时的文坛,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继公安派不久,文坛上即出现了一个以继承发扬公安派之主张为己任的新的文学流派——“竟陵派”;明末清初,张岱、王夫之、袁枚等三名文坛骁将对公安派推崇备至,深得其精髓;明朝灭亡后,“公安派”主将袁宏道的《袁中郎全集》传入日本,并在那里开花结果,形成了一个“日本公安派”,左右着当时的日本文坛。影响所及,直至今日,在日本、朝鲜等地,有关公安派的学术研究活动仍在继续。

然在清朝中叶的乾隆年代,公安派却大倒其霉。清廷为了禁锢进步或异端思想,下令查禁了一大批书籍,袁宏道的一封书函、一首诗歌因其中有“华夷”、“犬羊”等语,虽是针对当时觊觎中华的蒙古族而迸发的愤怒之词,而同样属异族入主中原的

满族统治者便神经质地以为在影射、咒骂他们,于是,袁宏道的作品一度被列入抽毁、查禁之中,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及声名受到了严重的贬抑与冷落,长达二百年之久。直至清朝灭亡后,胡适、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才重提公安派,特别是陈独秀,更是以公安派的继承者自居。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驱,对其诞生与发展曾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因为一大批知名作家如周作人、林语堂、郁达夫、刘大杰等人对袁宏道的推崇,公安派大为“走红”。一时间,袁宏道的文集大量刊行,各种介绍性的文字竞相跃上报刊,竟掀起了一股颇有声势的“袁中郎热”。也正由此,引发了一段文坛公案。当时,鲁迅认为这股“袁中郎热”有失偏颇,便撰文从不同的角度对林语堂、周作人、施蛰存等人展开了严厉的批评。两相交火,论争颇为激烈。对于六十多年前的那桩公案,在此我们无意评判其是非,但这一争论所带来的结果却是公安派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寂寞与冷落。

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公安三袁才又开始不断地为人们所提及,其著作在国内、台湾、香港等地刊印出版,评论文章散见于国内外诸多报刊,研究专著也出了不少,并于八十年代中期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研究公安派的学术中心“湖北公安派研究会”。公安三袁的小品与随笔,更是受到当代读者的青睐,从八十年代初至今,好多家出版社都推出了他们的作品全集如《袁宏道集笺校》、《珂雪斋集》或《袁中郎随笔》、《袁伯修小品》、《游居沛录》等多种选本。

公安派之热,大有方兴未艾之势。

某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荆楚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共十本,其中一本就是介绍公安派主将袁宏道的。丛书编者通过

有关渠道找到了我,希望我能够将袁宏道传记的创作任务接受下来。作为一名与公安三袁同乡的学人,我义不容辞地应承了这一任务。

我撇开案头其他工作,在原有认识的基础上,对公安派进行了一番较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积累资料,认真构思,经过大半年时间的努力,准备工作业已就绪。但是,却有一件事情萦绕心头,使我迟迟难以下笔。

我虽然在故乡公安县生活、工作了二十五个年头才离开,非常遗憾的是,却从未到过三袁的出生之地。我在那儿当过农民、教师、干部,对那块土地可以说是熟悉得再熟悉不过了。但是,没有到过公安三袁的出生之地,没有感受那块地方的氛围,没有体验其生命与创作的源泉之所在,对他们的描述我便感到难以达到真实的把握。

为此,我专程回了一趟故乡。

公安县位于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处,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平原在此交汇接壤,北面是一望无际的广阔平畴,南端则为丘陵地貌。这里土地肥沃、河汉湖网交织,属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

先到县城,三袁兄弟也曾县城斗湖堤镇住过一段时间,特别是袁宏道,他于1600年三十二岁之际,在城南的柳浪湖边生活、创作,一住就是六年。可是,在一座日益现代化的城镇里,昔日烟波浩渺的柳浪湖早已变成陆地为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所覆盖,三袁当年之遗迹,已无从寻找凭吊。唯一可以沾得上边的,算是一块书有“袁中郎故里”五个大字的石碑了。此碑原为明朝万历四十三年(1615)袁宏道的生前好友、荆州太守苏云浦在柳浪湖畔所立。后来遭人毁弃,现在寻得到的,只是清朝嘉庆元年(1796)重立的一块了。当然,城里还有借重三袁之名的三袁里饭庄酒楼,但这些由钢筋水泥构造的现代建筑,

不过是今人纪念或借重公安三袁的一种方式而已,与当年之遗迹已无半点联系。

县城离公安三袁的诞生之地孟溪镇还有三四十公里,客车在平坦的柏油马路上行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孟溪镇。下得车来,很快就见到了大书的“三袁故里”字样,心中顿时涌过一股亲切与欣喜。时间已近正午,便寻了一家饭店,先将肚子填饱再说。边吃边与店家攀谈,问到三袁故乡去该怎么走。店主甚感诧异:“三袁故乡?咱们这儿不就是三袁故乡么?”我说我要去的是他们的出生之地,那里埋有他们的坟墓,还立有墓碑。“这……这俺就不晓得了。”将店内所有人问遍,却无一人知晓。对此,我并不在意,到大街上去问,总该有人知道的。可是,我站在大街上一连问了十多人,不是摇头作答,就是含糊其辞。还是在公安县工作时,我曾听人说起过三袁出生之地就在离孟溪镇不远的某个村落。以三袁之名声,到了他们故乡,还有谁人不知其出生之地呢?所以我也就忽略了该村之名。没想到实际情况竟会如此。我站立街头,五月的阳光充满生机地照耀大地,望着眼前浮来浮去的人们,我心里不禁生出了几分懊悔。但是,既然来了,我就非得找到不可!突然间,就想到了我读公安师范时一个姓孟的同学,八三年毕业后他分回了故乡孟溪镇。只要找到了这位同学,我想他应该是知道三袁出生之地的,由他带我前往,既拜会了同学,又可顺利地到达目的地,岂不是一举两得吗?可是,毕业后十多年,我们从未联系,也不知他现在哪一所学校教书。那么,到镇教育组去查询,总该找得到的吧?一打听,教育组就在旁边不远处。到了那里,很快就查到了他的下落,原来他已离开孟溪镇,调到县城工作去了。怎么办?念头一转,我就直奔主题,向他们问询三袁故乡之所在。他们是文化人,不会不知道,我满怀期望地等待着他们的

回答。果不其然，他们都知道。三袁故乡位于孟溪村，离镇上大约七八里。并指着一旁的道路，告诉我应该在哪儿转弯，然后怎样怎样走。一口气说出了好多地名，我怎么也记不清，就说：“干脆，我到街上租一辆三轮车去吧。”“那个地方很偏，一般的三轮车主也不见得知道，这样吧，我帮你找一位熟人，他就是那个村出来开车的。”一位热心的老师便带着我来到旁边的站口，好几辆三轮车停着没有什么生意，他径直找到其中的一位四十多岁的车主，要他把我带到目的地去。

柴油机发动了，三轮车驶出小镇不远，龙头一拐，便上了一条凹凸不平的土路。土路越来越窄，慢慢地就驶上了一条仅容车身的高高田埂。两旁是水田和堰塘，我坐在颤颤簸簸的车上感到惊心动魄的，真担心一个闪失车子翻下田埂。道路越行越窄，大约行了半个多小时，三轮车停在一家农民开的商店前，便再也无法前行了。停车熄火，车主朝前一指，说：“往这条路走，朝右拐一个弯，再拐一个弯，也就到了。”我问：“还有多远？”“不远，两里多路的样子。”

我还是搞不清楚具体的方位和地点，正在这时，过来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小伙，他自告奋勇地带我前去。我非常高兴，说了好几句感谢的话，他说他正闲着没事，带我去转转不过是小事一桩。

一路上，少不了问问有关三袁的情况，他懵懵懂懂的，知之甚少。便谈他自己的事，他说他初中还没毕业，就下学了在家赶着一群鸭子谋生。

聊着走着，不过二十多分钟，也就到了。

坦荡的原野上，兀然耸起一座山丘。山不高，但其四周全是平畴，一烘托，就显得颇有几分气势了。此山名叫荷叶山，山顶长着几棵稀疏的树木，山坡已辟为良田，种植着棉花、水稻。

当年，荷叶山附近的桂花台上住着一户殷实的人家，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就诞生于此。桂花台到底是哪一块地盘，现已无从考证，唯一见得到的，便是缓缓起伏的山坡上，耸立着几个高大的坟墓。其中两座下面，即葬着一代文豪袁宗道与袁中道兄弟两人。袁宗道于1600年死于北京，袁中道在1624年卒于南京，但是，他们的灵柩皆运回了故里。因袁宗道曾当过明朝光宗皇帝的侍讲，光宗看在当年“侍讲读有劳”的份上，宗道、中道同时得到了皇帝的“御赐祭葬”。据说在“文革”前，他们墓前数百米远处，还立着一块近丈高的大碑，碑上刻着御赐祭文。碑与墓之间，两旁种有郁郁葱葱的树木，林荫夹道，形成一条小巷，颇有情趣韵味，当地人称之为“碑巷”。可惜的是，此景在“文革”中遭人毁坏，石碑也不知弃于何处。如今，宗道、中道坟前也立着一块墓碑，但这是1987年为迎接全国首届公安派文学讨论会而重新修复的。此碑立的时间不长，但上面的字迹已经漫漶，认不真切了。

纵然身死它乡，也要归葬故里，这不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积淀的“落叶归根”文化心理，又是什么？

使我大惑不解的是，不知老二袁宏道怎不愿葬在故里。1610年，袁宏道病逝沙市，灵柩也曾运回了他的出生之地，但未归葬。一年后，却移葬到了离此约三十多公里的郑公镇法华寺。法华寺紧傍糍水河，旁有白鹤山，那里当然也是一个幽雅宁静之处。可是，三兄弟同葬于风光明媚的故乡之地，就像他们生前所创立的文学流派“公安派”一样，作为一个整体永不分开，供后人凭吊，岂不更好吗？

想来想去，我只能解释为郑公镇那里有一座法华寺的缘故。袁宏道尚佛，他对禅学有过深入的研究，著有《西方合论》等佛学著作，可以称得上是一代禅学大师。也许，他觉得对禅

还没有参够，想死后面壁参佛吧！

我坐在荷叶山上，点燃一支香烟，悠悠然地抽着，以尽量放松自己，进入三袁当年的氛围之中。

广阔的田野伸展着一望无际的绿色，水稻、棉花、大豆等农作物正在五月的阳光中疯长，我仿佛听到了一曲宏大的生命交响。可在明朝的三袁之时，根据他们文中的多次描述，那时的风景远比我今日所见更为原始古朴、美丽动人：荷叶山“乔松古木”，苍翠葱郁，松林中不时传来一声声老虎的长啸，令人心惊胆颤；荷叶山下，是硕大的淤泥湖，湖水清清，如一面大镜；山前约一公里处，有一座雄伟的古刹，名叫义堂寺，传说宋时岳飞镇压杨幺农民起义归来，曾在此悼念阵亡将士，寺庙因此得名，堂前巍然耸立一棵高大茂盛的银杏树；荷叶山后，有一条南通沅水、澧水，北接长江的长河孟家溪，明时交通闭塞，三袁兄弟正是由此乘船通向外面的世界；山下广阔的原野上，也是树木成行，芳草萋萋，农舍前后，翠竹环绕，野物出没其间，三袁兄弟还常随父辈们外出打猎……

有山有水，有树有竹，有花有草，可以听松涛鸟鸣，玩竹色花香，食鲜鱼杂果，三袁兄弟便是在这充满了灵秀的故乡山水间长大成人的。他们无忧无虑，娱情山水，与自然融为一体，正是故乡的山水，培养了他们的性情，给他们的生命注入了活力。此后，他们创立的“公安派”文学主张“性灵说”，其精髓即为不拘格套，提倡性灵：“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流自性灵者，不期新而新；出自模拟者，力求脱旧而转得旧……”

袁宏道针对当时文坛前后七子复古论调而提出的“性灵说”一出，立时树起了一面文学改革的大旗。天下有识之士群起响应，很快便形成了一个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

核心的强有力的文学派别——“公安派”，一股清新的文风刮过沉寂的长空，明季文坛，顿时焕然一新，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

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奇特的现象，其中之一便是一家人同扬才名，其显赫且为人们所熟悉的有汉末“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北宋“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再就是晚明的“公安三袁”了。所不同的是，“三曹”、“三苏”都是父子齐名，“三袁”则是兄弟齐名。“三袁”的闻名于世，与兄弟间的相互影响、相互鼓励、相互支持密不可分。尽管老二袁宏道的成就最大，但对整个流派来说，他们三兄弟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或缺。

纵观兄弟三人的生平经历，与那些轰轰烈烈的政治家、军事家们相比，显得非常平淡，并无多少跌宕起伏的传奇色彩。文学家的生命就是文本，他们将生命中的一切全部融入了作品之中。作品是其生命与智慧的结晶，也就是他们人生的辉煌。

兄长袁宗道生于1560年，十岁便能作诗，十二岁应童子试，二十六岁举会试第一，官翰林，三十七岁充“东宫讲官”即皇太子侍讲，四十岁便染病身亡。留下了一部文集《白苏斋类集》共三百篇。他虽然早年科举得意，但一生平淡，个人生活不甚如意。妻子早逝，两儿一女全部早夭，自己从小便体弱多病。一次进京赶考夜宿荆门时，旅馆倒塌，他差点被砸死其中。但他为人稳重朴实、勤勉刻苦，对两个弟弟像慈父一样予以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在为人为文两方面对宏道、中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袁宏道为“公安派”的主要代表，理论中坚，创作实绩也最丰。他生于1568年，小宗道八岁。他十六岁在斗湖堤读书时即组织了一个文学社，自任社长。现存的最早作品是他于十七岁时创作的《青骢马》、《古荆篇》。二十八岁中进士三甲谒选为

苏州吴县令。他在吴县虽只任两年，但将那儿治理得有条有理，深得民心。他坚决辞去吴县令后，进京得了个京兆教官。两年后，即1600年，便回故乡公安柳浪湖畔，过了六年的隐居生活。1608年由礼部调任为吏部验封司主事，他革新吏部，严惩猾吏。1609年“典试秦中”，即主持陕西的乡试。乘便游历了西安名胜、西岳华山、中岳嵩山。1610年因“考功事峻”，便告假南归，定居沙市，不幸患病去世，年仅四十二岁。留下的作品有《袁宏道集笺校》三卷约一百二十万字。

袁中道生于1570年，比宗道小十岁，小宏道两岁。他一生遍历祖国大好河山，追随宏道的文学主张并付诸创作实践。但他在科举考场上相当失意，屡考屡败，直到1616年四十六岁时，才中了一个进士。先授新安校，三年后移居南京，迁太学博士，次年又迁南京礼部主事。1624年调任南京吏部郎，也就在这一年，中道卒于南京，死时五十四岁。留下了一部《珂雪斋集》，共三卷，约九十多万字。袁中道在发扬光大、捍卫“公安派”的文学主张，肃清“公安派”末流之弊端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如果三袁不是以文学传名，而是因文治武功著称，那么，他们有可能是生前显赫，死后哀荣，其故乡也有可能因为他们而扬名于世，断不至于今日之寂寞。因为国人一般世俗眼光，仍停留在官品位的层次，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总是以其官职之大小。我曾问到好几名三袁故乡农民，“三袁”到底是指哪三袁，无人答得上来。因袁宏道、袁中道先后在吏部任过郎中，古时的吏部官员皆被民间称作“天官”，所以三袁故乡农民便将他们三人笼统地称为“袁天官”。

其实，他们兄弟三人并不是没有吏治才能，袁宏道治理吴县、整顿吏部便搞得有声有色。如果他们刻意经营官场的话，

袁宗道给光宗皇帝当过老师，只要稍稍巴结，何愁当不了大官呢？但是，他们却选择了一条寂寞的从文之路。特别是袁宏道，对当官从政更是深恶痛绝，他在吴县当县令时给友人邱长孺的一封信里写道：“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刚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于是，他坚决辞官，可上司不准，百姓挽留，但他去意已定，连续递了七次辞呈，才获批准。

从文是一条艰难的寂寞之路，如果名声显赫，如果浮于政事，就难免流于浅薄空洞，无法接近本真意义上的文学。为了求得宁静致远，直抵生命本质，袁宏道于1600年自我放逐，远离官场，远离文坛中心，远离市声尘嚣，在斗湖堤城南的柳浪湖畔一住就是六年，过着散淡恬静的生活。然而，这时的袁宏道，已是文坛公认的革新派领袖，无数文人学士的精神偶像。就在他隐居的日子，天下文人的目光，有意无意间，总是投向了公安城南的柳浪湖畔，或慕名拜访，或书信求教，透过寂寞宁静的表面，又分明涌动着一股汹涌的激流，滋润着当时的整个文坛。

在纵观三袁兄弟的人生，翻阅了他们现今留存的能够找得到的文集之后，我发现，他们并无什么明确的大志，或一定要达到什么目的，或一定要称雄于某一领域，或一定要实现某种野心。这些，与他们都不沾边。他们的进京赶考求取功名，很大程度上出于父辈的期盼与督促，一种社会惯性压力的推动；他们的选择文学，是出于生命的内在需要；他们所高举的文学大旗，也是针对当时文坛前后七子复古风潮的有感而发。一切的一切，都是出于本真率性与自然。事业的轰动，人生的寂寞，于他们来说，似乎是身外之物，与生命本身并无多大干系。由此看来，他们三兄弟，皆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顺其自然、出乎

本心的“真人”。

兄弟三人都活得不长，宗道四十，宏道四十二，中道寿命要长一些，但也只活了五十四岁。这恐怕与他们没有规律的生活及娶过一妻多妾有很大的关系。这，也每每为后人所诟病。他们死后的备受压抑与冷落，还与袁宏道的推崇《金瓶梅》不无联系。就现有史料所载，袁宏道是评论《金瓶梅》的第一人，他认为该书“云霞满纸”，并预见小说这一新兴体裁的发展大有成为今后文学主流之趋势。然而，袁宏道对《金瓶梅》的推崇，却被封建卫道士们视为“诲淫诲盗”。于“诲淫诲盗”之輩，理所当然要予以压制打击了。

一支烟抽完，想到还在等着我的三轮车主，便向袁宏道、袁中道的坟墓告别，慢步踱下荷叶山。然后，又由这位小向导带着行了两里多路，去看义堂寺中的一棵银杏古树。寺庙已毁，银杏围在一所小学校内。该树高四五丈，树身粗壮，枝杆挺拔，树龄已达四百多年了。袁宏道在《义堂寺》一诗中曾有“银杏熟果堕佛髻”之句，这恐怕已是当地留存下来的唯一曾与三袁有缘的见证之物了。

看了银杏，返回停车的那家商店前。头顶的炎阳与步行的疲累已弄得我气喘吁吁，便在店内稍作歇息。围过来不少当地农民，我便与他们以三袁为话题随便聊开了。

他们说，像我这样专程来看三袁故里及坟墓的，以前只有县文联的同志来过两次。一次为搜集有关资料，一次为重立墓碑。当时就想，尽管我生长在公安，故乡郑公镇离这儿只隔着几道河流，直线距离不到二十公里。可是，如果不是为了写作袁宏道传记，我会专程来到这个偏僻的所在吗？

谈到三袁的作品，其中还有中学毕业的青年农民，但他们却没有一人读过。其实，又何止他们这些农民们呢？以三袁为

荣耀的公安县学界及从公安这块土地走出去的学人,还包括那些买了三袁作品的读者,又有多少人谈得上认真地读过他们的作品呢?

问起三袁的后人,村子里也没有他们的直系后代了。我以为文学最大的悲哀就在于无法传承。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似乎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使自己的事业传承给自己的后人,可文学家却不能够。文学是一项天才性的独创事业,灵气与悟性是其重要的基础。三袁并非不想让他们的后代子承父业,也出现了宏道长子袁彭华、中道长子袁祈年两位佼佼者,他们都著有诗文。袁中道还将祈年的诗作收入自己的《珂雪斋集》附录之中,但已是“秀而不实”,一代不如一代了。

从古到今,公安县也出了不少名人豪杰,比如三国时期的蜀国大都督冯习,囊萤就读的东晋名士车胤、佛教天台宗创始人、隋代高僧智颢等等,但是,他们的知名度都赶不上“三袁”。也就是说,“公安三袁”是公安县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人物。可是,这并未引起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将“公安三袁”视为一项文化产业资源来进行开发。如果“三袁”不是文学家,而是三位名声卓著的政治家、军事家,那么,有关“三袁”的纪念性硬件建设就有可能不是今日这般样子。

“古来圣贤皆寂寞”,信矣哉!

其实,热闹与寂寞也是“三袁”生前心中一直纠缠难解的一个情结。

袁宏道在吴县辞职后到京城不久,便给他故乡的两位叔叔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语道:“长安沙尘中,无日不念荷叶山乔松古木也……当其在荷叶山,唯以一见京师为快。寂寞之时,既想热闹,喧嚣之场,亦思闲静……”

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认识程度的加深,他们才渐渐地看

淡了热闹,归隐山林,返回自然。特别是袁宏道,在度过了六年柳浪湖畔的隐居生活后,他已参悟了不少人生玄机。只要是顺应了人生的自然,热闹也罢,寂寞也好,他都能泰然处之了。

由此来看他们身后的遭遇,过于热闹与过于寂寞都不正常。纯属人为需要的哄抬或压制,从某种角度来看,也说明了社会机制中存在着不少问题。“三袁”的文学主张与文学作品,经过几百年时间的考验,已积淀为民族文化中的有机部分,作为一股内在的潜流,正无声地浸润、滋养着我们脚下这块广袤的土地,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

还是让我们变得成熟一些吧,既不要去刻意地营造热闹喧嚣,也不要人为予以压制冷落,最好的境界,便是顺其自然。

医中之圣

一

我父亲是湘鄂交界处一个小镇上颇有名气的中医，他与中国的普通百姓一样，自然希望我能够子承父业。于是，我的童年便在药书的诵读声中给拉得痛苦而漫长。我寂寞地站在自家的堂屋门口，一边机械地念诵着《药性赋》、《汤头歌》，一边羡慕地望着倒骑牛背悠然自得、抱着树干爬上爬下、躺在河里游来游去的小伙伴。“诸药赋性，此类最寒，犀角解乎心热，羚羊清乎肺肝……”“麻黄汤中用桂枝，杏仁甘草四般施……”我将《药性赋》、《汤头歌》中的有关段落背得滚瓜烂熟，然而，我半点也不知道它们在向我诉说、表达着一些什么。父亲没为我讲解，我更不会想到要去问问这些诵读的语句所包蕴的内涵。我在药书的诵读、药味的浸润、药气的熏陶中一点点地长大。读高中时，正值“文革”末期，还在继续地走毛泽东主席的所谓“五·七”指示道路，学校时兴分班，理论班、农技班、红医班、文艺班、体育班等等什么的。我自然地给分在了红医班，父亲还受聘来校为我们班讲了一段时间的针灸课。然后是一个月的实

习,与其他两个同学回到村诊所,打针、抓药、出诊,俨乎其然地成了一名医生。

然而,我终究没能成为一名医生。在父亲的影响下,母亲是村里的卫生员,弟弟在荆州市一家职工医院上班,唯有我这个曾寄予厚望的大儿子不是医生。为此,父亲深感遗憾,上次回家探亲,他望着我,突然转移话题冒出一句话道:“如果你当医生,你会是一个好医生。”

然而我不是。

一双看不见的命运之手将我的生命之旅在一个名叫黄石的重工业城市停留了整整十年。

黄石市位于长江中游南岸,刚到那儿,我的目光就投向了下游不远处的蕪州镇。

蕪州是我国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的故乡!

我虽然没能成为一名医生,但对医学实实在在地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被人们誉为“医圣”的李时珍,曾是我心中巍然耸立的一座高峰。

这座高峰并未因时间的流逝与职业的不同而变矮、变小,山峰依然巍峨,坡度依然陡峭,松柏依然苍翠,风景依然秀丽……

无论如何,我得上那儿走一遭才是。

也许,以我现在的身份,既能进入其中,又能超乎其外,对医圣李时珍及其《本草纲目》、对千百年来发展绵延至今的“国粹”中医会有一种更为冷静的思考,更为清醒的认识,更为独特的感悟。

二

蕪州位于湖北省蕪春县南部,西距武汉一百多公里,滚滚

长江经西南而过。境内冈峦起伏，湖泊纵横，地势地貌十分优越；古为吴头楚尾交会之地，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向称鄂东重镇。自南宋景定四年（1263）至1949年的七百多年间，蕲州先后为州、郡、路、府、卫、所、下江防道、行政督察公署驻地。解放后，蕲春县城才由蕲州迁往漕河。

1445年，明朝皇室荆宪王朱瞻珮也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将荆王府从建昌（今四川西昌）迁来，在蕲州镇内的麒麟山一带，修建了州署衙门、学宫、书院。这在客观上对蕲州的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就在荆王府迁到蕲州镇半个多世纪以后的明正德十三年（1518），李时珍诞生在蕲州镇的瓦硝坝村。刚一坠地，就与医药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生长在一个三代世医之家，从小身体非常虚弱，病病歪歪的，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不舒服。好在父亲就是当地一位颇有名望的医生，看病吃药，不仅方便，而且治疗得格外认真。直到十岁左右，身体才日渐好转。那时，医生的地位十分低下，在一般人眼中，他们与算命、卖卦、看风水的江湖术士几乎没有多大区别。要想成为一名医术高明的医生，既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还得刻苦用功，伴着青灯黄卷，于寂寂长夜中研读经书医典。而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读书之人，皆汲汲于科举，醉心于功名，热衷于仕途。李时珍的父亲李言闻就曾中过秀才，参加过乡试，但始终未能中举，这不能不说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李时珍虽然从小体弱多病，但他聪明伶俐，头脑灵活，悟性颇高。明朝对医生的管理有一项极不合理的制度，那就是每一医户，必得有一个儿子继承父业。父亲已决定让大儿子李果珍学医，自然地，就将改换门庭的希望，寄托在小儿子李时珍身上。

于是，李时珍在父亲的督责下开始诵经习文，以备科举考

试，博得个一官半职，光耀门庭。

然而，受着家风浸润的李时珍却对医学有着一种本能的喜好与独到的感悟。家里开有药铺，他能一味味地叫出这些草药的名字和它们的用途；哥哥学医，将一页页的药书背得琅琅有声，他耳闻目濡，也能记个大概；父亲病人多时，他常常帮着干些抄写处方、分发药物之类的下手活；他背诵为了科举赶考而用的《尔雅》，最感兴趣的却是里面的《释鸟》、《释兽》……再则，从小就在乡村长大的李时珍对大自然更是有着一种特殊的热爱之情。蕲州不仅物产丰富奇特，蕲竹、蕲艾、蕲蛇、蕲龟四宝闻名遐迩，而且山青水秀、风光秀丽，离村百步开外，就是水面宽阔的雨湖。湖岸绿柳成行，湖边芦苇丛生，湖中盛产鱼虾；湖光波影，水鸟翔集，渔舟唱晚，一派祥和。村子东边不远，大泉山、盘龙山、平顶山、龙峰山诸山起伏，绵绵不绝。漫山遍野，树木苍翠，野花灿烂，药材茂盛，禽兽奔走……原来，家中药铺里的那些草药，大都是在湖泊与山林中长大的。有时，他还将一些鲜活的植物采撷回家，与晒干了的药物一一比认，当发现两者相同时，不觉惊喜极了。

李时珍生活在这样美丽的湖光山色中，常与小伙伴们一起乘渔船，越山岭，采花草，捉小虫……哪有心思枯寂地守在家中念诵那些“子曰诗云”、研究什么“起承转合”？加之他从小体弱多病，父亲也不便过多督责，只有循循善诱地将他一点点地引上自己为他安排的科举之路。李时珍也能理解父亲的一片苦心，身体渐渐康复，也就开始发愤用功。十四岁那年，一考就中了个秀才。父亲大喜，信心倍增，认定李时珍是块读书做官的好材料，对他督促得更严了。此后，李时珍曾三次到武昌参加乡试，却一次都没考中。第三次赶考前后，也许是用功过度，也许是压力太大，李时珍突然患了一场感冒。一边咳嗽一边复习

功课，拖了好久，结果转成“骨蒸”病，皮肤发热，像炭火烧烤一般，每天吐痰一大碗。剧烈的咳嗽揪心扯肺，他感到痛苦难耐。自己用柴胡、麦门冬、荆沥等清热化痰的药物治疗，都不见效。后来，还是父亲重用黄芩才给治好了。

这年，李时珍刚满二十岁，可肉体的摧残与心灵的打击使得他对科举道路心灰意冷，便嚅嚅着征求父亲的意见：“爸，我还是当个医生吧？”

望着骨瘦如柴、面色灰暗的儿子，父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道：“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看来你只有当医生的命啊！”

正是这所谓的“命”，使得李时珍跻身于光辉灿烂的世界文化名人之列。

如果科举之途顺利，如果李时珍再行发愤穷经皓首，那么，中国历史的人物长廊中，大不了多出一个黯然失色、可怜巴巴的酸腐儒生罢了。

其实，以李时珍的家学渊源、生活环境、个人爱好、天赋秉性等各方面的情况而言，最适合于他、最有发展前途的职业，也是行医。从父亲的一厢情愿、逆其天性到科举失利、改弦易辙，李时珍终于回归本色，回到了最能发挥其天性禀赋的本真所在。

李时珍虽然走了一段迂回曲折之路，但十多年的诵经习儒没有白费，为他日后的研究中医、撰写《本草纲目》打下了扎实的哲学、文化与理论基础。

二十岁才开始正式学医，在年龄上似乎是晚了点。好在他早就读过一些医书，识得一些草药，懂得一些治疗，具有一定的医学基础。一旦转入医学，不觉找准了自己的人生坐标。因此，他学得十分刻苦，十分认真，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其中。

父亲李言闻的医术颇高,对人参和蕲艾研究较深,写有《人參传》和《蕲艾传》,还著有《痘疹证治》及探讨总结中医望色切脉治病经验的医书《四诊发明》。在谈及父亲的医术时,李时珍认为“精詣奥旨,浅学未能窥造”。有医术高超的父亲言传身教,李时珍进步之快可想而知。五年后,他就开始正式行医了。

李时珍的心中,一直铭记着父亲的一句名言:“熟读王叔和,不如临症多。”王叔和是晋代医学家,著有《脉经》一书。父亲的意思是,要想做一个好医生,光靠熟读医书是不行的,必须多接触病人,多看些疑难病症,医术才会有所长进。

父亲的教诲对他日后的行医、研究与撰述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一方面,凭着行医的便利,李时珍经常出入荆王府及当地的名门望族,借阅他们的大量藏书,深入钻研医学理论;另一方面,他也注重实践知识,到野外研究药草,为百姓行医治病。

李时珍不仅是一个好学之人,更是一个好思之人。随着行医经验的不断丰富,医疗技术的日益长进,他发现,许多被医人奉为圭臬的医学著作已与当时的医学、药理学发展有了很大的距离,特别是有关“本草”医书的内容,从最早的《神农本草经》到南朝时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唐朝苏敬等人的《新修本草》、宋代的《开宝本草》、《嘉祐本草》、《证类本草》,所记药物逐渐增多,分类也渐趋严密,但在李时珍所处的时代来看,又有许多新的发现与研究成果没有收录进去;旧有的记载舛误甚多,“草木不分,鱼虫互混”;更兼掺杂着方士们的迷信说法。因此,李时珍迫切地希望能有一部新的“本草”问世,纠正谬误,吸收新成果,总结新经验,反映新水平,以便更好地为广民众防病治病。

在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医学的整体发展作一简要回顾。

中医之源,可以上溯至传说中的远古神农治病尝百草。随着医疗经验的日渐积累,约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开始产生形成。此后,中医学基本上保持着一种缓慢的发展态势,既没停滞中断,也未陡然上升。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次较为全面的总结整理,即集大成的活动。

西汉时期是第一次中医集大成时期,《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医学著作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它标志着中医理论走上了规范化、系统化的轨道。

西晋为第二次集大成时期,主要表现为王叔和总结脉学成就的《脉经》,皇甫谧整理的针灸学专著《甲乙经》及葛洪收集的医方著述《玉函方》。

隋唐时期是中医知识第三次集大成时期,主要成就有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大型方书《四海类聚方》、孙思邈与王焘整理的《千金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及皇家组织人力集体编撰的《新修本草》等。

北宋为第四次集大成时期,表现为大型方书和本草著作的修编,主要著述有《太平圣惠方》、《圣济中录》与《证类本草》。

历史的画卷翻到明朝,中医知识又面临着一次新的也即第五次总结与集大成时期。

李时珍与同代医人相比,他不仅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所赋予的崭新课题,内心里更有了一个隐隐的打算,准备承担这一艰巨的重大任务。

当心头第一次萌生此念时,他毕竟太年轻、太稚嫩,有一种力不从心之感。

然而,种子一旦萌芽,不管多么柔弱稚嫩,总会尽其所能地吸收地气养料、承纳阳光雨露,顽强地向上腾窜、生长!

于是,他开始了暗暗的积累与准备工作。在行医中,他搜

集民间单方，记下自己的治病经验与心得；他研读药书，吸取前人经验，不断纠正谬误，补充遗漏；他深入田头、湖边、山林，亲自动手采集草药，逐一弄清它们的独特性能……

1552年，李时珍终于下定决心，一定要重新编写一部新的“本草”。这一年，他三十五岁。

本草，就是中药。中药的内容相当丰富，举凡鸟兽虫鱼、金石草木，都可入药。其中尤以草木类植物药占据多数，故此又称中药为本草。于是，我国古代凡是论述药物的医学著作都以“本草”命名。

本草类书主要供医人们翻阅、查找、对证，因此，一定要做到条例清楚，提纲挈领，纲目分明。于是，李时珍饱蘸墨汁，展开大幅稿纸，用力挥毫，为即将撰写的医书拟定一个题目——《本草纲目》。

三

立志虽已明确，但李时珍没有仓促动笔，他仍在收集整理、积累酝酿。

李时珍行医日子一长，不仅名振蕲州，而且在荆楚一带也颇有名气。武昌的楚王朱英熿的儿子患了重病，就把李时珍召去，为他儿子治病。李时珍略施医技，手到病除。楚王甚为高兴，就将他留下，任命为楚王府奉祠所的奉祠正，并以这个名义兼管良医所。

李时珍心之所系，全在《本草纲目》一书，为此，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与积累的良好机会。在楚王府里，他发现了许多在蕲州镇难以见到的珍贵书籍，不觉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一段时间，他饱览了陶弘景的《名医别录》、孙思邈的《千金方》、掌禹

锡的《图经本草》等医学典籍，还读了不少经史百家、方志类书、稗官野史，为以后的创作积累了各种丰富的材料。

这样地过了几年，到了1558年他四十一岁的时候，因其医术高明，李时珍又被楚王推荐到北京皇宫任太医院判。

在太医院，李时珍常有机会出入寿药房和御药库。这里，堆放着各地进贡和国外进口的形形色色的药材。他欣喜若狂，对它们不断地比较、鉴别、研究。

当时的明皇朱厚𪖇，一味信奉方士仙丹，征求“不死药”，追求“长生不老”，李时珍对此极为反感。一年后，他就托病辞职回乡了。

身不由己地奉召服务于楚王府与太医院的这段时间，《本草纲目》的写作计划显然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他也由此而获得了更多的理论与实践知识，准备工作更为充分。

回到蕲州，他在雨湖边筑了一间新居，以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为蓝本，并根据自己的分类标准，开始了《本草纲目》的编撰工作。

有时，各家医书说法互相矛盾，舛误之处多多，弄不懂的地方也有不少。李时珍深感知识不够，经验不足，不得不时时停下手中的笔，穿上草鞋，背起药筐，拿着药锄，带上必要的药书与纸张，在徒弟庞宪和儿子李建元的陪伴下，足迹再次遍及蕲州一带的山山水水。

随着研究与创作的不断深入，许多药物在蕲州一带难以找到。为使《本草纲目》尽量充实、正确，不留遗憾，李时珍不得不远离故乡，多次外出旅行、考察、采药。时间长达数年，范围遍及大江南北。特别是在武当山一带的长时间旅行，收获更是不小，并在那里留下了不少生动感人的故事。

在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国度里，曾经诞生过成千

上万学究与腐儒，他们以书斋为限，以考据为癖，以寻章摘句为乐，以雕虫小技标榜，以书本印证书本为业……而李时珍与他们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的注重实践，将书本知识与社会实践融为一体！设想一下，如果这种治学风格形成传统，汇成一股蔚为壮观的潮水，千百年来不断冲刷着我们脚下这块板结的土地，那该出现一种多么令人振奋的可喜局面啊！

可惜的是，像李时珍这样的学者不过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漫漫长空里闪烁着的几颗为数极少的星辰，它们的光亮实在是太微弱了。

一边严谨著述，一边外出奔波、考察验证，两者贯穿着李时珍创作《本草纲目》之始终。他披阅了八百多家著作，深入北京、河南、湖广、江西、江苏、安徽等地考察，访问了成千上万群众。直到五十多岁了，他还是那么精神饱满地行走在祖国的名山大川间，向农民、猎人、樵夫、渔民求教，向大自然寻找正确答案。即使回到家中，他也要亲自栽培、炮制药物，对比野生、家药的异同；掌握播种时间、收获季节对药效的影响；弄清土壤、施肥、灌溉等因素对药物生长的作用；研究炮制的不同方法、工序繁简、时间长短、配料不同对药用的改变；他还对矿物药亲自炼制，曾将铅炼成胡粉、黄丹、密陀僧、铅霜等多种化合物……李时珍将这些反复验证的实践经验一一写入《本草纲目》，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该书的系统、丰富、完整与正确、有效、实用。

初稿完成后，李时珍又作了三次较大的修改，直到1578年，《本草纲目》才最后定稿。此时，李时珍已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了。这部医书，耗去了他二十七年时间。后半辈子光阴，二十多年心血，就这样变成了一个个浸透纸背的密密麻麻的墨迹。

李时珍一生勤奋，著述很多，见于文史记载的，还有《濒湖

脉学》、《奇经八脉考》、《濒湖医案》、《集简方》、《五脏图论》、《三焦客难命门考》、《白花蛇传》等,但大多现已失传。目前完整保留下来的只有《本草纲目》、《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三书。

《本草纲目》自 1596 年问世以来,已有四百多年历史。它在中国世代相传,共有六十多种版本,并以英、德、法、日、俄等多种文字的全译本、节译本,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对东西方医学界、生物学界、矿物学界、文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本草纲目》一经问世,即将中国本草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水平,医学界研究本草学蔚为成风,使得本草学臻于一门成熟的独立学科。

1956 年,郭沫若为李时珍墓碑题词时恰如其分地评价道:“医中之圣,集中国药学之大成;本草纲目乃 1 892 种药物说明,广罗博采,曾费三十年之殚精。造福生民,使多少人延年活命。伟哉夫子,将随民族生命永生。”

《本草纲目》最早传到日本、朝鲜、越南、印度等地,被视为药理学宝典;后来通过传教士和驻华使馆人员传入西方,受到西方科学家的普遍重视。生物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称赞《本草纲目》为“1596 年出版的中国百科全书”,并在他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的变异》一书中引用了有关《本草纲目》的资料。

鉴于《本草纲目》长期享誉世界并为东西方学者所共同推崇,世界和平理事会在 1951 年的维也纳会议上,一致决议将李时珍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之列,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永远纪念。

那么,《本草纲目》何以具有如此长久的魅力?它究竟包含了哪些方面的科学内容?

《本草纲目》分为五十二卷,近二百万字。全书正文收录了 1 892 种药物,每种药物都有详尽的释名、集解、气味、主治等解说,大多药物后面还附有历代经验药方,共计 11 096 个。此外,

该书还选介了四十一部历代诸家本草著述,从一些医药名著中摘录有关药物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列举了各种疾病的名称和治疗这些疾病的主要药物种类,附有图示三卷共1160幅。

《本草纲目》的科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中医学方面。它建立了本草新体系,内容全面,论述系统,增加了新药,纠正了错误,发展了药性理论;它既论药又论医,是一部医药结合的宝典,创立、发展了新的医学理论与思想,贡献了大量临床医疗经验。《本草纲目》实为历代研究中医学、中药学及中国医学史、药学史 of 必读书目。

同时,《本草纲目》也是一部古代药学百科全书。

它运用了通常达变的辩证思维方法,体现了李时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反映了十六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成就。无论研究哲学,还是宗教、民俗,都可从中发现有用的资料。

它记载的十六部六十类中药,包括了无机物、有机物、动物、植物共一千多个品种。李时珍在分析、论述这些药物时,涉及了动植物的生态、生长环境、培植繁育方法和矿物的特性、产地、采制手段等许多科学知识。它对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地质学、物候学及农林牧渔生产技术、冶炼技术具有研究价值。

它对每一种药物的历史渊源、主要产地、发现过程、贸易交流等方面,都作了详细记载,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如历史、地理、文字学、训诂学等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

难怪《本草纲目》初版时,当时的文坛领袖王世贞即在序言中称赞此书“上自坟典,下及传奇,凡有相关,靡不备采……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又说打开此书“如入金谷之园,种色夺目;如登龙君之宫,宝藏备悉。”可见此书一出,即光彩灼灼,

使方家学者为之倾倒。

四

从黄石顺流而下，不过两个多小时的水路，蕲州镇就到了。

上得岸来，行不多远，便是“李时珍医药一条街”。街道笔直，由西而东向雨湖伸展。街道两旁，耸立着清一色的具有明代风格的仿古建筑。白墙灰瓦，飞檐翘角，朱色门窗，虽为后人借重李时珍之名所建，但也甚为别致，颇有几分看头。医圣楼、时珍大药店、药商楼等建筑，将历史与现实、医药与贸易、纪念与商业、文化与经济融为一体。街道长长的，我缓步而行，感到脚下伸展着的是一条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长廊。鄂东重镇古蕲州，也算得上是一个风云际会之地了，几千年来，这块土地上该晃动过多少英雄人物的身影，留下过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呵！可是，在历史长河的淘洗与选择中，留下来的还有多少？历史是无情的，又是公正的。一时的显赫、表面的虚华、多余的杂质全被历史冲刷得一干二净，而经受住考验存留下来的积淀与结晶，总是一些亮闪闪的无价之宝。在封闭、隔绝的明代皇朝，在一个科技饱受冷遇的社会，李时珍凭着个人的天才禀赋、社会良知、坚韧毅力，垒起了一座个人的、时代的高峰。历史选择了他，历史造就了他，同时，历史在将他身边的一些杂草败絮、浮华喧嚣冲洗得无影无踪的时候，也更加凸显了他。观赏街道两旁的景致，我仿佛看见了李时珍无所不在的身影；略显湿润的空气里，我分明嗅闻着一股浓烈而熟悉的草药气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百年来，蕲州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条流水，包括头顶的天空，都浸润在李时珍的氛围之中。蕲州以它的灵秀与丰韵推出了一位流芳千古的医圣，而这位医圣又无时无刻

不在影响着蕲州、改变着蕲州，同时塑造着一个具有独特文化意蕴的新型蕲州。

走过长长的医药一条街，尽头便是雨湖了。李时珍正是诞生在雨湖西畔的瓦硝坝村，其煌煌巨著《本草纲目》，也是避开闹市、结庐雨湖潜心构撰而成。雨湖在李时珍的一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地位。今日雨湖，依然是那么清秀，湖水清澈，碧波荡漾，渔舟往来，湖边已无昔日那茂密的芦苇，但岸畔的依依杨柳与水边的青青荷叶、艳艳荷花，更具风采。

一条名为“李时珍大道”的土路横穿雨湖，它像蕲州农民扛在肩头的一条扁担，一头挑着李时珍陵园，一头担着蕲州镇区，将它们紧紧地连为一体。

而我此行的目的地，就是曾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李时珍陵园。

1593年，七十六岁的李时珍与世长辞，后人将他安葬在雨湖东畔的蟹子地，与故居瓦硝坝村隔湖相望。解放后，以墓区为基础逐步扩建为李时珍陵园，由药物碑廊、纪念馆、药物馆、百草药园及墓区等五部分组成。

陵园入口处便是山门。每到一处风景名胜，我总是绕不过“山门”这一极具民族特色却又千篇一律的建筑。山门之本意，原为佛寺大门，因佛教寺庙多建山间，所以就有了“山门”之称。无山无寺，为何也要建一山门？对此，我未作过较深的研究，只有归于佛教普及与世俗化的结果。

进入山门，即为药物碑廊，长方形院落，三面长廊，内壁嵌入镌刻着的《本草纲目》序言、蕲州八景及药物图案一百八十多种。纪念馆内立有一座两米多高的李时珍全身塑像，陈列着大量介绍李时珍的实物与图片。百草园占地十五亩，植有中药材一百多种。

最为丰富的，当数药物馆。呈“U”形的两层建筑内，共分四个展厅：历代名医塑像及其著作展厅，这些名医包括神农、华佗、扁鹊、张仲景、孙思邈、苏敬等十人；植物药物标本展厅，共有标本一百八十多种；矿、动物药物标本展厅，有虎、熊、鹿、扬子鳄、各种鸟类及“蕲州四宝”中的蕲蛇、蕲龟活标本；还有中成药成果展厅。

来到李时珍墓区，见到的是两座合墓，一为李时珍与妻子吴氏合葬，一为其父母合墓。墓后树木苍苍，青翠欲滴；墓前耸立着一座洁白的李时珍半身塑像。我抬头仰望塑像，久久地凝视着，那飘动的胡须、眺望的眼神、严峻的面容一时间使我想了很多很多……

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医圣”的，除李时珍外，还有张仲景。

张仲景是我国东汉晚期的著名医学家，河南南阳人。他从小就精心研究医学，广泛征集方剂，总结前代的医学经验，写成《伤寒杂病论》十六卷。现流传下来的，只有经过晋代名医王叔和改编过的《伤寒论》与《金匱要略》两种。张仲景在中医学上的贡献，主要在于诊断与治疗两个方面。他建立的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诊断八纲”及汗、吐、下、和“治疗四法”，已成为后代诊断治疗之准绳。

两位医圣，中间相隔着一千三百多年的漫长历史。时代迥异，专攻有别，一为诊断治疗，一为中药本草，但透过表面深入内里，我惊奇地发现，他们两人研究的课题实则同一：整理前代的医学成果，纠正谬误，清除日渐附加在医学上的巫气、“仙”气与妖气，正本清源，补充新的发现和内容。也就是说，医中之圣者如张仲景与李时珍这样的杰出人才，在中医学这一领域所能做的，并非开拓性的研究创举，而是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此外，中医学每隔一段时间，就得在大集成的过程中清除巫术、风

水、道教、仙怪等神秘之气笼罩其上的迷障。

中医何以一至于此？

考诸起源，中医与我们的自然条件密不可分。神农尝百草这一远古传说，就已包含了中国传统医学诞生的基础——丰富的草药资源。形形色色的花草植物所具有的各种药物效用，在生产实践中为人们一一掌握，日积月累，中医学渐成胚胎与雏型。如果没有广袤的国土、优越的环境与繁多的植物等得天独厚的条件，也就不可能形成中国的传统医学。一个狭小的国家、单纯的海边区域或沙漠地带无论怎样也产生不了中医科学。

由草药到人体、由个别到一般、由感性到理性，中医的源头一旦形成，日益丰富的经验与不断提高的认识便亟切地呼唤着理论的升华与总结。这时，中国早熟的传统哲学思想便介入其中了。对此，我们也可视为中医理论在它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需要哲学、文化予以指导、把握、涵盖。只有这样，它才有可能构成一个庞大的体系，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也就是说，中医学的形成过程，也即中国传统哲学、宗教、思想与文化的整合过程，精华与芜杂共生共存。

于是，中医理论直接引进了朴素的“元气”理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自然哲学。这些理论用某些特定的属性和关系解释所有事物，便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事物的不同属性与相互间的复杂关系。比如用金木水火土五行归类万物，未免牵强附会；把事物运动的周期性视为五行相克的封闭圆圈，不免平衡绝对，解释病理现象有时甚至得出荒谬的结论。再则，神异巫术、风水学说、道教仙丹等封建迷信大多也建立在元气、阴阳、五行等学说的基础之上，由此可见，中医理论与它们有着本质上的相通之处，也就难怪中医学不时充斥着一些异端邪说了。

与中国的儒、道、墨等传统哲学相仿佛，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与构架一经形成，就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后世中医理论的发展，不是修改增删古人建立的理论原则与框架，而是通过运用已确立的理论来解释具体的、新的经验事实。具体而言，中医学的理论集大成主要就是一部《黄帝内经》，我们可以将这部著作视为中国传统医学的圣经。比如说，明清以后的中医对各科疾病的分析诊断治疗肯定超过前代，但这并不等于明清的中医理论已超越过去，只是明清的医家运用中医理论对这些疾病做了具体的、前人所未及的解释而已。而张仲景、李时珍所做的，也只是运用《黄帝内经》的基本理论，从某一方面对其进行具体而微的解释。直到今天，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大体仍在沿袭《内经》。

而西医理论的发展就不仅表现为对新事实做出理论上的解释，更通过新经验提出新的理论，使原来的理论得到补充或修正，甚至推翻重建。中医理论属思辩型，而近现代的西医理论属实证型，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

对中医发展影响最大的当数儒学，儒学崇古尊经的保守主义作风阻碍了中医的创新；儒教的“孝”、“恕”伦理观阻碍了解剖学的产生，导致了形态医学的窒息；儒家重实用的作风决定了中医学朝着实用化、经验化的方向发展，却束缚了理论医学的进步……

对中医的理性分析至此，我的思维又回到了李时珍身上，不禁想起了当代著名科学史家、英国李约瑟博士对他的评价。

李约瑟不仅认真地研究过李时珍，还于1980年9月亲自来蕲州，考察李时珍故土，参观李时珍陵园，并兴致勃勃地站在一株被他称为“奇草珍药”的蕲艾前留影纪念。

他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写道：“毫无疑问，明

代的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那部攀登到本草著作之顶峰的《本草纲目》……李时珍达到了与伽利略——维萨里的科学活动所隔绝的任何科学家所不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我揣摩着这段话所包孕的含义，理解有四：一、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朝，已走入极端进入了死胡同，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对此作了精辟、系统的分析；二、自我封闭是封建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明朝统治者继续陶醉在唐朝帝国的博大与辉煌中醉生梦死、作茧自缚，不知西方世界早已突飞猛进；三、医学即为明代科学成就的峰巅；四、李时珍置身于特有的时代与环境中，已达到了个人能力所能达到的极致。

李约瑟在高度赞颂李时珍成就时，其用语相当客观、公允而独到。

我仰视着李时珍的伟大，同时也在解读着他那远眺的目光与严峻的面容。

他在眺望什么？是否渴望着不同文明的交流与对话？

他为何严峻如斯？是为传统医学几千年的蜗牛爬行而焦灼，是因自己在一部近二百万字的煌煌巨著中只能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而伤感，是为《本草纲目》又被后人奉为圭臬而停滞不前所苦恼，还是其他我无从解读的内心隐忧？

大音稀声。

李时珍无言，就那么象征性地立着、望着，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个无法确认的变量函数。

然而，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四百多年过去了，中医学发展至今，仍在《内经》的医学理论框架中兜来转去；他的《本草纲目》一经问世，又变成了一座新的“珠穆朗玛峰”，后人所能做的，也只是在他的基础上来一些修修补补，加点儿作料与盐巴。

李时珍是多么地希望能有一部新的《本草纲目》、一部新的

中医巨著横空出世,超越他在四百年前垒立的这座高峰呵!

而要超越地球上的最高峰珠穆朗玛,只有通过飞机、卫星、宇宙飞船等现代高科技手段离开地面、升向蓝天才有可能实现。

五

西医的丰硕成果,无疑为中医的借鉴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系统。

国人先是“拿来”,后是结合。

1892年9月,孙中山在澳门镜湖中医院挂牌行医,他建议该院实行中西医结合诊治,互济不足,这一建议很快就被院方采纳施行。

就现有资料所载,我们可以将此视为中西医结合之始。

西医迅速且显著的疗效很快就赢得了良好的信誉,中西医相较,优劣显而易见,西医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接受、信奉,很快即发展为中国医界的主流。

据香港医生、章太炎的关门弟子陈存仁先生在四十年前所著《银元时代的生活》一书所记,清皇倒台,民国初建时,在一大摊子所要施行的革命事务里,其中有一项就是废除中医中药。陈先生得知此事,急忙张罗着到南京请愿,总算才将中医中药给保留了下来。

在中国的国土上,废除几千年来发展至今有着博大精深之誉的国粹中医,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白纸黑字,却是不可抹杀的事实。

不论提倡也好,禁止也罢,中医这一诞生在中国特殊环境仍有着坚实土壤与深厚基础的科学,永远洋溢着一种旺盛的生

命活力。但该书所载,确也透出了一个促人警醒、无法否认的事实——中医早已面临可怕的危机与强烈的挑战!

纵向比较,几千年来,中医虽无大的创意与突破,但总在前进,且国人的所有病症都是靠了它才有治愈的可能。因此,医界大可悠哉游哉、怡然自得。

然而,西医闯关而入,“狼来了!”中医学界这才发现了自己的局限,才知道了自身的弱点,才看到了内里的不足。

中医,也只有在与西医的相互比较中才能发现它的弊端。

对此,我不妨由一则有关李时珍的故事稍稍展开谈谈。

说的是李时珍在北京太医院就职时的事儿。一日,他忽然接到皇帝圣旨,被一名太监带到皇宫为皇后搭脉诊病。皇后是不能轻易得见的人物,何况还有“男女授受不亲”之嫌,于是,她只能躲在厚厚的帐幕后面应诊。一根长长的丝线即为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中介,它一头搭在皇后娘娘跳动的脉搏上,一头递给医生诊断。李时珍将丝线绷紧,然后将右手食指与中指并在一起,轻轻地按在丝线上,开始把脉。

李时珍通过丝线的传导,感受着病人脉搏的起伏跳动,以此判断病情。这种丝线把脉,本是李时珍的拿手好戏,可这次却非常奇怪,他在丝线上摸了好久,静静地感受着,没有发现半点脉搏的跳动。

于是,李时珍将丝线一放,对太监道:“此物无脉不是人!”

这可是在给皇后看病呀,你能说她不是人吗?太监一听,当即吓得浑身发抖。

这时,帷幕后伸出一个侍女的脑袋,她传出话道:“刚才是丝线没系好掉在地上,现在好了,再请李大夫把脉吧。”

李时珍只得再诊,摸了老半天,觉得对方的脉搏跳得相当怪异,他还从未接触过这种脉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李时珍定了定神，只得说道：“此脉过于离奇，不仙即怪。”

太监一听，又是吓得不行，说皇后娘娘是个神仙也许不错，但能骂她是个怪物吗？他双膝一软，跪在地上连连磕头，既为李时珍、也为他自己请求皇后恕罪。

“哈哈……”这时，幕后突然传来一阵大笑，帷帘一掀，里面走出一个头戴皇冠、身穿龙袍的男人，定睛一看，这不是当今皇上朱厚熹吗？

李时珍见是皇帝，当即一愣，只得跪在地下请罪：“卑职多有冒犯，乞望陛下息怒。”

朱厚熹挥了挥手，赐他平身落座，然后说道：“皇后无病，朕亦无病，不过弄只花猫试试你的本事而已，果真名不虚传啊！哈哈……”

传说固然当不得真，但从某个角度说明了中医之玄妙。

传统中医的医疗方法为辨证论治。具体而言，就是诊断、辨证、立法、用药四个环节。

诊断是基础，没有明确的诊断，便无法辨证用药，或者导致错误治疗。

诊断四法为望、闻、问、切。

望，就是观察病人的气色、神色，病人身体的各个部位都是望的对象与范围；闻，包括听与嗅，听病人的言语、呼吸、咳嗽等，嗅对方口鼻的呼吸气味；问，当是询问了解病情；切，即切脉、触诊。

望、闻、问、切四个环节都具有很大的直观性、模糊性与随意性。它们与医生的情绪、好恶、风格等密切相关，病人的语言表达、心理状态、看病时间乃至某些细微的东西也会影响到医生的诊断。

而最令西方医学感到不可思议的就是切脉。

古代切脉在手、足、颈等多处进行,演变到后来,主要集中在手腕部,即所谓寸口脉。传统医学认为,脉搏的跳动包含着全身五脏六腑的信息。医生正是要根据脉搏跳动的快慢、强弱、大小、滑涩、浮沉等方面来判断病人所患何症,轻重与否,从而施行治疗。

王叔和在《脉经》中把脉象分为浮、芤、洪、滑、数、促、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弱、虚、散、缓、迟、结、代、动等二十四种;李时珍增加了长、短、牢三种;明朝的李中梓又增加了疾,共成二十八种。

对这二十八种脉象,全凭医生搭在病人脉搏上的指头来感知,实在是玄之又玄。医生功夫稍不到家,或是出现环境嘈杂干扰过重、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佳等偶然因素,就会滑入另一种脉象,导致误诊错诊。

病人之病,除具一定的普遍规律外,还受昼夜、季节变化的影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人亦应之;“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等等这些,都与人体的脉相有关。而病人随自然界阴阳变化的这些微妙因素与模糊条件对医生的拿脉诊治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再拿针灸治病的理论基础——经络来说,它是沟通人体内外上下、连接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等组织器官和运行气血津液的独特系统。可是,那些未经解剖证实的经络与穴位完全凭借经验与直感,没有现代科学的观照与廓清,真应了老子《道德经》中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哲学可以展开空灵玄虚的翅膀翱翔,而科学应具备的基本精神却是严谨求实、精确细致。

中医的最大弊端,恐怕就在于缺少“精确”二字。

我常常听得医生为病人开完药方后说道:“吃了试试看,不

行再来。”

行就行，不行就不行，病人的身体哪能当得试验品？每每听到这样的话语，我就感到困惑与担忧。

中医的诊断无法精确，基础一失，后面的辨证、立法、用药也就相应地打了折扣。

最令人忧虑的当数用药。

中药以草药为主，根、茎、叶、花、果皆可入药。但是，草药的药用效果却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自然野生与人工栽培、长在山间与生在平地、采摘的季节不同、太阳晒干与风吹阴干、炮制的方法有别……等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疗效。一般而言，野生的、山间的、太阳晒干的草药疗效要佳。而医生开药时只在处方上写明某药剂量多少，对草药的生长、采制等条件是忽略不计的。医生处方时，一般以一个疗程为单位开药，三副、五副、七副不等。药剂师在拿药时，常常将几副药中的某一味药一次秤上，凭感觉平均而分。我二十年前实习时就是如此，秤好药后，随手一抓，一分到摊放在柜台上的每副药中。直到今天，中草药的分发仍是如此，并不是每幅药一味一味地一一秤来，没有严格而精确的量化。

中草药剂量大，用药极为不便。病人自己煎制，时间与火候直接影响疗效；一大碗一大碗的药汤，苦涩难咽，吃药对病人来说，无疑于是一次折磨与受罪。中成药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但不少疑难病症，还没有、或者说还无法生产出相应的成药。中药药剂由于缺乏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使生产的广泛性、疗效的稳定性、可靠性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

中药的功能与主治，不论是草药还是成药，都存在着针对性不强、笼统模糊的不足。不少中成药的说明书中，见得最多的便是滋阴补肾、清热解毒、活血化瘀、补益调气、消肿止痛等

用语,涵盖面过广过宽,许多病能治又不能治,不清不楚,似是而非,不如西医简单明了,能治什么病就治什么病,且疗效显著。

中医与西医比较,严格地说,它只能算是一门养病医学。西医属进攻性,中医的方法以养为主,既养病又养命。

《本草纲目》就是一部养病医学的百科全书,它包治百病、包罗万象,但它只能算是一部平和的药理、医理书,不带突破攻治,讲究的是调和性。

我们不得不承认,近三百年来,古老的东方传统医学受到西方医学无情而致命的冲击,整个医学体系几近摧毁。特别是近百年来,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死亡”更是在东方医学界隆隆回响。

中国传统医学艰难地生存着、发展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它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日渐走出困境。

随着社会精神、物质生活的发展,当今疾病正朝着综合性、系统性方向扩展,癌症、爱滋病等疑难病症、顽症绝症、不治之症迅速蔓延,占据主导地位,但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单功能医学的西医对此却一筹莫展。再则,西药的副作用过大,在治病的同时严重地危害了人类的身体,大量聋哑残病、肝肾疾病等综合性病例皆因打针吃药造成。据有关统计表明,西医治疗的成败比例约为四比一。

面对现代医学的种种弊端,面对化学药品可畏的毒副作用,人们发出了“重新回到大自然去”的呼喊,期望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中国的传统医学,并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医、中药与针灸的世纪。中医学在整体动态平衡思维方法指导下的实施辩证论治,对某些难治之症、慢性疾病往往可以收到很好的疗效;中药副作用少、无药瘾之患等优势为医学界看好。于

是,一个学习、研究中医的热潮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学的外在表现并无半点现代气息,但是,它却富有值得现代甚至未来予以研究的科学内涵。中医数千年的医疗历史、整体辨证的认识观念、独特完整的理论体系、丰富翔实的临床经验及切实有效而接近自然的治疗方法和手段,凝聚为一个有机的医学整体,其潜在的实力不禁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挑战与机遇并存!

如果中医学再不抓住这一发展契机复苏振兴,恐怕真的就此衰落永无“出头之日”了。

世界性的“中医热”期待并要求着中国传统医学的现代化。

中医的思维方法亟需引进以实验观察和数学推导为基础的现代分析方法,全面地揭示人体的系统结构和层次关系;诊断与治疗的手段应彻底改变过去的直观观察与经验思维的局限,改变过去的“三个指头一个枕头,一张处方一根针”的原始诊治方式;中医必须实现定量化,引进数学计算、电子计算机等现代科技成果,对中药的化学成分深入研究,以分子水平的角度来认识、阐述中药的药理作用;那些具有多重内涵、玄妙模糊的中医语言应用准确的、通俗的哲学语言和系统科学语言来表达……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论及中医时也曾说过:发展中医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要用强大的现代科学体系使中医从古代的自然哲学式的、思辩式的论述中解脱出来。

因此,中医学必须在自然观、人体观、疾病观、诊疗观、方法论等方面作出深刻的反思与变革,大量吸收西医及当今各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在理论上总结、升华,建立新的中医学科分支,构筑一个充满生机的、呈开放态势的中医学学

术体系,以期推陈出新,达到真正的质的飞跃。

中医若能发挥其内在潜力,攻克癌症、爱滋病等现代难治之症及多种慢性疾病,延长人类的寿命,增进人类的健康,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便是在为整个世界做着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人们期待着中医的再度辉煌!

……

想到这里,我不禁再次抬头仰望李时珍那高大的塑像,映入眼帘的仍是那飘动的胡须、眺望的眼神与严峻的面容。对此,我已不再陌生。一番梳理,我似乎已经破读了这极目眺望与面容严峻的深层内涵。

他的目光早已穿越重重历史迷雾,直逼今天,射向未来——他期待着中医的再次崛起,能够与时代同步矗立于世界医学之林;他希望中医学早日从古代经验哲学的思辨范畴中挣脱而出,发展成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武装的真正科学;他希望中医学尽快转型,发挥它的内在潜力以攻克肿瘤、爱滋病等当今社会的不治之症;他更希望后学走出前人的窠臼,不要老是停留在对《内经》、《伤寒论》、《千金方》、《本草纲目》等医学权威著作的修修补补上,也不能总像往日那样“集大成”,而应吸取古今中外医学成果,整合当今各门学科,有所发展,有所开拓,有所创新,有所超越,创建严格意义上的中医科学。

常言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以此喻于中医学界,自李时珍之后,也当有新的医圣面世了。

时代、社会、世界都在呼唤着医中之圣的脱颖而出——确切地说,是在呼唤着新的中医之圣的横空出世!

放弃与守望

—

’98 抗洪救灾,将湖北省一个并不怎么起眼的公安县一下子推在了世人面前:荆江分洪区实施分洪预案,33 万人马大转移;孟溪大垸溃口,三百多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顿成泽国,为长江流域特大洪灾受淹面积之最,是嘉鱼簰洲湾溃口所淹面积的三倍多。

一时间,公安县成为人们与新闻媒介关注的焦点。

我的故乡就是公安。我在那儿生活、学习、工作了二十五年,才于 1988 年的初秋离开了那块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热土。

那是一块僻远而沉寂的土地。她位于长江中游南岸的湖北与湖南两省交界之处,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平原在这里交汇、接壤,北部是一望无际的广袤平原,南面多绵延起伏的低矮丘陵,其间河流纵横、湖泊密罗、堰塘棋布,素有“江河走廊”、“百湖之县”之称。全县不通铁路,四通八达的水路运输因其航线迂回曲折、航速过于缓慢而退出历史的交通主宰地位,由公路运输取而代之。在 207 国道这根贯通全县南北的主动脉上,伸

展着一条条或粗或细、或东或西的血管，组成了一张血脉畅通的公路网络。

公安县的自然地貌无甚突出奇崛，没有一处响当当的风景名胜。值得一书的，恐怕也就一座位于东南与湖南安乡县接壤之处的黄山。广阔的平原上，仿佛上帝的有意造化，兀然耸起一座高山，甚是令人为之一震。“江河一片白，黄山一点青。”明代文学家雷思霈描写黄山的著名佳句，几百年来为人传诵。但是，黄山因其面积不到十平方公里，主峰仅为 364 米，不仅与那同名的安徽黄山无法媲美，即在湖北稍有名气的旅游景点中，也只能勉勉强强挂个号而已。

那么，人文历史又是如何呢？

翻阅所能收集到的有关历史记载，我不得不黯然神伤地写下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那就是公安县不仅地处偏远，几千年来，也一直处于历史的边缘。在人类发展史、在中国文明史这样的大背景中值得大提而特提的东西为数不多。

三国时，公安县很是“红”过一阵子。东吴、蜀国为夺荆州，曾在此有过一番争持，留下了刘备城、孙夫人城、张飞田、吕蒙营、陆逊湖等遗址及有关传说，东吴还在此短暂定都。县名由来也源于那时，刘备领荆州牧时，曾将军队驻扎在今天的公安县城斗湖堤镇一带。当时刘备为左将军，人称左公，所以就将西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 195 年）建立的原孱陵县改名为公安县，取其“左公安营扎寨”之意。

此后，公安县在历史舞台上的身影就显得异常遥远而模糊了，无论怎样透视，也难以在这块土地上寻觅曾激荡过中国历史的风云雷霆。最为有名的人物，当数明朝万历年间的文学流派“公安派”领袖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值得一提的，还有三国时期的蜀国大将冯习，他在夷陵之战中担任过蜀军大

都督；东晋时官至吏部尚书的车胤，车胤囊萤聚光读书的故事被编入古代启蒙读物《三字经》而广为流传；出生在公安县玉湖区茅穗里的隋朝佛教大师智顗，他曾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个宗教流派天台宗……

公安县虽然一直徘徊在历史的边缘，虽然没有出过顶尖级的人所熟知的伟大人物，虽然没有逼人的亮丽华贵与炫目的大红大紫，但你不得不承认，她属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这块肥沃的土地千百年来生长着水稻、棉花、玉米、麦子、高粱、红薯等茁壮的庄稼，滋润过“公安三袁”这样的文学大师，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出类拔萃的有用人才及无数生生不息的普通民众。自从1977年底高考制度恢复以来，公安县的教育质量及升学率在荆州乃至湖北省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这块土地上走出去的人才更是成千上万，遍布全国各地。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块热土曾尽其所有无私地奉献过自己的一切。

其中最大的奉献，当数她作为荆江分洪区在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分洪蓄水！

新中国成立不久，人民政府就开始着手根治长江水患的计划。“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荆江河段之险，主要在于堤身要比两岸地面高出十多米，而河道又过于弯曲、狭窄、淤垫，不能承泄大量洪水，每当汛期来临，洪峰逼近，就有溃决的危险。一旦溃决，江汉平原受淹，长江航道受到影响，短期内难以堵口善后。如果荆江大堤安然，则长江水位不断抬高，注入洞庭湖的水量猛增，滨湖多数堤垸必遭溃决。于是，对荆江水患的治理，就成了计划的重中之重。为保障湖北、湖南两省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1952年3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出了“加固荆江大堤并在南岸开辟分洪区”的决定。

公安县，以其有利于调蓄荆江超额洪水的地理位置而成为

修建荆江分洪工程的最佳选点。

1952年4月5日,荆江分洪工程在公安县境内全面动工。这是新中国成立不久所进行的一项重点水利建设工程,其轰动效应可想而知,它不仅闻名全国,也闻名世界。于是,公安县从漫漫沉睡中一觉醒来,抖一抖蒙在身上的尘埃,猛然一跃,即升至历史的表面。

中央一声令下,武汉、长沙、上海、北京、天津、大连等地的数万名产业工人,湖北、湖南的十六万男女民工,解放军官兵十万名一齐涌入公安县,准时进入各自的“阵地”。建设所需的汽车、发电设备、钢材、水泥、木材、石料及各种生活、医疗卫生物资,也源源不断地运抵工地。

整个公安县沸腾了!

三十万建设工作者的热情、智慧与汗水汇成一条波澜壮阔的河流,冲刷、改变着这块沉寂的土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昭昭业绩。

建设吸引着世人的目光,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会的各国代表一行二十多人曾专门来到工地参观访问,对新中国刚刚诞生就能高速兴建这样浩大的工程而感到惊叹,认为这是“一件大奇事”。

荆江分洪工程分两期进行,于1953年4月25日全部完工。它由208公里围堤、北闸进洪闸和南闸节制闸组成,总面积921平方公里,可蓄洪水54亿立方米。与分洪配套的还有电力排灌站、排灌涵闸、排灌渠道等排灌系统及供群众转移时使用的安全区、安全台、躲水楼、民房、移民路、移民桥等大量有效设施。为纪念分洪工程的建成,还在分洪区北端的进洪闸(北闸)及南端的节制闸(南闸)旁,建立了纪念塔、纪念碑、纪念亭,塔、碑上分别镂刻着毛泽东、周恩来、李先念等中央主要领

导的题词及撰写的碑文。

荆江分洪工程建成后的第二年,就及时地发挥了它巨大的水利效益。

1954年夏季,长江出现了百年罕见的全流域性特大洪水,荆江分洪区连续三次开闸分洪,滔滔洪流向蓄洪区奔腾猛灌,近千平方公里的良田沃土顿成泽国,唯有无情的洪水在翻滚汹涌、澎湃怒吼。

公安县,以博大宽广的气势、以英雄断臂的悲壮,牺牲自己,将汹涌的江水与滔天的浊浪容纳于胸,降低了长江水位,减缓了洪水对北岸荆江大堤的压力,保卫了江汉平原的三百万人民、八百万亩良田;减少了泄入洞庭湖的洪水流量,使湘北滨湖数县的人民免遭灾难;同时,也保证了长江航运的畅通无阻。

荆江分洪工程,不仅成为公安县的特有标志,也是公安人民顾全大局、自我牺牲、无私奉献的一个象征。

二

弹指一挥间,四十四个既漫长又短暂的春秋流入苍茫浩瀚的宇宙,与人类生生不息的历史融为一体。

四十多年来,荆江分洪工程一直静静地躺着。它刚一诞生,就经历了1954年特大洪水的考验,在一阵喧嚣与辉煌之后,它似乎感到了一种独有的疲累。每年夏季,总有洪峰在荆江大堤外不住地奔腾、冲突、吼叫,惊醒它的美梦;隔不了几年,长江就会有一次较大洪水出现,分洪区内的居民免不了要遭受一番惊扰,它与普通民众一道感受着一次又一次如期而来的躁动;它静静地躺着,随时准备容纳暴虐的洪水,接受新的洗礼,但是,它与生活其中的人民一道,又热切地企盼着一次次的洪

峰能在大堤的束缚下俯首东去，不来惊扰这儿的安宁与祥和；四十四年来，虽然有过多次激昂与躁动，但每一次洪峰所造成的压力都让九曲回肠的荆江大堤给顶住了，“狼”终归是没来。它默默地准备着，承受着，等待着，没有半点张扬。它希望就此隐居，希望自己的一切变成史书上的文字记载仅供有关研究者翻阅，希望世人的目光最好是再也不要落在它的身上，希望1954年那样的特大洪水不要再来，希望公安县境安宁，希望整个长江流域的人民生活幸福再也不要经受洪水的暴虐与侵袭……

然而，就在人们似乎忘记了它的存在，就在它经过漫长的等待与准备后酣然沉入梦乡的时刻，'98长江全流域特大洪水来了！武汉告急，九江告急，荆江大堤告急……频频不断的告急使得荆江分洪工程又一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8月6日晚8时，一道道电波穿越茫茫夜空，在公安县上空不断回响——分洪区的所有群众务必于十六小时之内，按预定的地点迅速转移！

荆江分洪区要分洪了，“狼”这回可真的要来了！

于是，公安县再次凸显，一时成为中央关注、记者报道、人们谈论的热点。

朋友、同事、熟人见了我，都要关切地询问荆江分洪区及公安县的有关情况，我便尽其所知、不厌其烦地予以叙述。其中曾会有好几人这样说道：“过去哪个晓得什么公安县，这回呀，可是人人皆知，举世闻名了。”我无言以对，只有勉强挤出挤出一丝笑容。而内心，却涌出一股无法形容的酸楚。

独自一人时，我便时常回想那挤出的沉重而苦涩的一笑。故乡人民的“断臂”之举，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惊惶不安，难道就是为了“出名”？

如果真是这样,那她宁愿踞于僻远的角落保有一分安宁、寂静与自在,也不要进入这世所皆知、喧嚣沸腾的历史中心。

只有长期生活在分洪区内的人民,才知道四十多年所经受的等待与磨难到底是个什么滋味。所谓切身利益与切肤之痛,只有当事人感受得最为深刻最为彻底,而旁观者的言说与叙述不是漫无边际,就是蜻蜓点水。

生活在富庶的沃土上,的确是一件十分难得而幸运的事情。可是,本当安宁幸福的日子,却因了荆江分洪工程的修建而时刻准备放弃。这种人为的主动毁弃完全出于服从大局、舍小家保大家的需要,“分洪保全局,不分洪保丰收。”这便是分洪区内人民所担负的重任与生活的实质所在。

公安县总面积二千二百多平方公里,一条从长江太平口入境的支流虎渡河纵贯其中,将全县分割为两块面积大致相等的部分——虎东与虎西,虎东即为荆江分洪区。全境大部由古云梦泽演变而成,至今仍留有古泽遗绪,被纵横交错的河流与星罗棋布的湖泊分割成大大小小五十一个民垸。这些民垸,全靠高大厚实的堤坝撑持保护。全县堤坝总长度近八百公里,是全国堤防最长的县份之一。因此,每到夏天入汛季节,公安人民不仅要守护长江干堤,还得守卫民垸支堤。

防汛护堤,不仅妇孺皆知,也是人所必尽的职责与义务。为了保卫家园,只要上面一声令下,大家就都带着工具,自觉地上堤巡护。

我在故乡务农的日子里,就曾加入到防汛大军之中,成了不甚起眼的普通一员。那时,防汛工具简陋,夜晚巡堤,连个手电筒也没有。我们一组两人,横举竹竿,竿的末端系着一个农村男人屙尿用的夜壶,壶内灌满柴油,壶口塞了长长的布条以作灯芯。就着这样简陋的照明工具,在晕红的火光照耀下,我

与同伴不放过任何一处渗漏、浸水等可疑的地方。

千百年来洪水所形成的压力使得公安人民将防汛抗洪视作自己分内的事情，干得十分卖力。其实，每一民垸的形成便是与洪水抗争、搏斗而结出的硕果。为了保卫自己的劳动果实，他们不得不义无反顾、心甘情愿地投入到抗洪斗争之中。长江每年都要发大水，公安人民每年都要上堤防汛，所不同的是，长江有时温顺有时乖逆、水量则有大有小而已。

自从荆江分洪工程建成后，分洪区内的人民便不得不面临一种无可选择的选择：汛期一到，上堤守护；一旦长江告急，必须主动从大堤撤离，放弃多年的劳动果实，让那凶猛的洪水在自己的家园肆无忌惮地横冲直闯。

如果是无法抗拒的洪水冲决守护的堤坝，是自然天灾毁坏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建立的可爱家园，他们只有认命的份儿；可这人为的放弃、主动的撤离实实在在叫人多少有点想不通。由想不通到想得通，由理智的接受到情感的认可，这过渡的时间并不长。公安人民识大体顾大局，中央的决策有啥说的呢？除了响应，还是响应！

思想转变一旦完成，就在分洪区人民的脑海里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思维定势：只要长江洪水稍大，他们就开始考虑分洪，考虑自家的撤离与转移了。

平时，他们辛苦勤劳，将土地潜力几乎发挥到了极致，沉甸甸的果实使得他们的脸庞常常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而这些朴实的农民又继承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节俭传统，省着吃、省着穿，恨不得将一分钱掰成两半使。他们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营造一个舒适的安乐窝——建一幢像模像样的住房。因此，你不要看着分洪区的农民省吃俭用开销不大，手头也没有多少存款，可每家每户都住上了红砖红瓦房；稍富一点的，还会修个两

层或三层的小洋楼。

自1954年分洪直到今天,荆江分洪区的人民一点一滴、不声不响、脚踏实地地改造着脚下的这片土地,使她变得更加富裕更加发达了。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事情的另一方面。

中央的有关政策制约了分洪区内工业、农业、经济等方面的规模建设与发展。头顶一盆水,不知什么时候就要倾泻而下,投资越多,损失也就越大。在原荆州地区县改市的浪潮中,就公安县的综合实力而言,完全可以跻身县级市的行列之中。可是,上级有关决策部门不得不考虑荆江分洪区位于公安县境内这一事实。仅就县城斗湖堤而言,它也只能限制在原有的安全区内发展,难以达到现代化城市的规模与水准。

生活在分洪区内的人民,几乎每年都要面对可能分洪这一严峻的考验。年长月久,这种考验便溶入到日常生活之中,并影响着他们的人生态度。一方面,他们尽其所能地建设着一个美好的家园;另一方面,又得随时准备舍弃自己含辛茹苦构筑的窝巢。中国农民长期以来所追求的安宁与稳定的生活似乎与他们绝缘,只要安稳,哪怕贫一点苦一点也成。若环境实在恶劣无以生存,也可以举家迁移,在朦胧的希望中寻找新的家园。可是,公安人民却不能够!他们无法舍弃这块热土,他们转移了还将回来。建了毁,毁了建,这是怎样的一块令他们心碎伤感又令他们心醉梦萦的土地啊!放弃与守望,他们注定了要在这无法选择的选择中、在不时交织的矛盾与情感的不断撕扯中过着一种别有滋味的独特人生。

犹如钱币的正反两面,自自然然地,消极怠惰、及时行乐、尽情享受的人生观念一旦遇到较为合适的土壤,也就悄悄地萌

芽了。有些人整日想着分洪,觉得自己再辛劳,洪水一来,眨眼间什么都将给冲得无影无踪,因此,勤劳的弓弦也就日渐变得松弛起来,除了起码的生活资料外,什么富裕啦、发展啦,也就不再考虑。能娱乐则娱乐,能享受则享受。分洪区内流行最广的,一是麻将,二是花牌(又叫十七个)。麻将和花牌与宗教和鸦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旦上瘾,它就将人们死死地“钉”在桌上,不分白天黑夜,不管农闲农忙,可以无节制地玩下去。虽然就那么一些固定的牌与子,全是小范围小圈子里的那么一些熟悉的面孔,但其中的排列与组合却是层出不穷、花样翻新,永远没有单调与烦腻。时间与空间,在麻将与花牌这两种奇妙的怪物面前,似乎也失去了它们固有的本真意义。麻将与花牌,能使一种没有意义的游戏无限制地“游戏”下去。鲜活的灵魂与生命,在这些人们自己发明的不甚起眼的玩具面前,竟变得那么渺小而无奈,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每到夏季,洪水暴涨,荆江大堤压力稍大,分洪的紧迫自自然然就压上区内人们的胸口,闷得叫人有点喘不过气来。为了减少损失,减轻转移负担,分洪区内杀猪宰羊、杀鸡宰鹅、酒香飘逸,仿佛过年过节似的,呈现出少有的热闹,与即将分洪的严峻形成一种对比与反差。

四十四年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就在这种守望与放弃、勤劳与松弛、节俭与享乐、达观与惊惑的两极间不断痛苦地撕扯着。一年又一年,经历了日积月累的长期渗透与积淀,荆江分洪区内,也就形成了一种独有的生命现象与一道特殊的文化景观。

三

四十四年了，每年都在叫着“狼”来了，可是“狼”却一次也没有来。

’98特大洪水出人意外地说来就来，一来就气势凶猛得令人心悸，使得长江流域的防汛形势变得异常严峻。于是，人们就想到了荆江分洪区这个可以容纳五十四亿立方米的“蓄水袋子”。之所以建设这一工程，不就是为了分洪用的吗？长江大堤频频告急，此时不用，更待何时？

几十年的准备与等待，公安人民心里早就清楚明白，分洪区说白了，就是装水的，把长江河道超载多余的洪水装进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回，分洪区可要动真格的了，比“狼”还要凶恶还要无情的洪水就要来了！

8月6日晚8时，分洪转移令下达，荆江分洪管理局立即组织人员将填写好的《转移通知单》发放到户，负责转移工作的1654名干部带着任务进村包组紧急动员，实施具体转移措施。

正在紧张防汛的青壮劳力接到命令，没有半刻犹疑，马上从堤上撤离，回到家中安排家人转移。

顿时，公安县沉浸在一片喧嚣沸腾的海洋之中。

一个令人难忘的不眠之夜！

妻子放下手中的活计，将家人的几件换洗衣服稍稍清理，马马虎虎地打个包裹，又开始忙着准备干粮；老人丢下取凉的蒲扇，赶紧摇醒已然入睡的孩童；男人默默地进入牛棚，耕牛，可是农民的命根子啊，说啥也不能将这忠实得力的助手抛下……

一切准备在恍惚间、仓促间进行着，尽管年年嚷过分洪，尽

管时时想着分洪,毕竟四十四年来没有分过一次洪,面对上面的紧急通知,忙乎着手头的准备,很多人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有人竟伸出长长的指甲掐向自己的大腿,直到觉出了钻心的疼痛,才相信这不是在做梦,而是面对一场活生生的严酷现实!

为了行洪畅通,上级要求每家每户打开门窗。

时间紧迫,部分群众还要转移到荆州、沙市、江陵、松滋、石首等市区,不管多贵重的物品,不能带的、带不走的只有留在家中,洪水冲也好,盗贼偷也罢,只得听其自然了。

就要走了,望着几代人辛辛苦苦建立的美好家园,有人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一声哭泣,牵惹出一大片眼泪。特别是那些老人,他们对自己的家怀有一种神圣的特殊感情,有的扼住门框,无论怎么劝说,就是舍不得离开。其实,他们心里也明白,不走是不可能的。然而,理智是一回事,情感却又是另一码事儿。

走吧,快点走吧,再耽搁,时间可就来不及了。他们抹抹眼泪,狠狠心,头一低,猛然转过身去。踉跄着走了几步,又不禁回过头来,依恋地再望几眼。大门敞开,窗户敞开,这哪里是在舍弃,倒象是迎接远方的客人呢。走吧,快点走吧,走了还会回来的,洪水一退,咱们可就又打回老家来了……

一股股人流汇聚成一支转移的莽莽大军,三十三万群众为了同一个目标在茫茫夜色中踏上既陌生又熟悉的路途,大家扶老携幼,相互帮衬,心情的沉重与依恋很快就融入滚滚人流,淹没在不时鸣响的喇叭声、马达声与喧闹声之中了。

转移工作有组织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着,在预定的时间内全部转移完毕。

分洪在即,二十吨炸药自1954年以来首次埋入北闸拦淤堤内的119个药室内,并设置了电爆网络、导爆传爆线路、雷雨

天电爆系统等三种引爆方法,以确保起爆成功。只等荆江分洪前线指挥部一声令下,就要炸毁二千二百米长的拦淤大堤,开启北闸实施从小到大的分级分洪。

长江第四次洪峰正在通过沙市,8月6日上午8点,沙市就已超过原来规定的分洪水位44.67米。45米,是国务院确定的荆江分洪区运用的争取水位。44.80、44.90、44.91、44.92……水位一路攀涨,人们在紧张地等待着,有人在虔诚地祈祷,希望水位就此定格下落。可是,水位还在不断地上涨,44.93、44.94……仿佛要考验人们的心理与神经的承受能力似的,水位一直上涨到44.97米才嘎然止住,随即开始缓缓回落。

44.97,离45米的分洪争取水位仅差0.03米。好一场虚惊,人们不禁吁了一口长气。

然而,抗洪形势容不得人们有半点乐观。8月12日,长江第五次洪峰又通过沙市,荆江分洪区再次作好了分洪准备。令人庆幸的是,此次沙市水位达到44.84米,就不再继续上涨。

历经了两次虚惊,移民中有人开始返家了。常言道,穷家难舍,热土难离。何况现在的家中并不贫穷,他们惦记着屋里的电视机、录音机以及其他比较贵重的家当,门窗大敞大开,要是有人“顺手牵羊”,那不是太容易了吗?还有栏里的几头猪,好几天没喂,也许早就饿死了;那些鸡、鸭、鹅又怎样了呢?棉花的顶尖该掐了,稻田的害虫该治了;这些天来,田地太阳的暴晒下早已干渴,又该考虑抗旱了……唉呀呀,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平时家里有人,倒不觉得怎样,可出来了没几天,就感到空落落的,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想家想得不行,硬是想得心肝肚疼呢。就连那些艰难地转移到江北的耕牛,也出现了不服水土的现象,它们喝惯了湖水,就是不喝江水,连草也不吃,病病怏怏的。移民们急得不行,竟拿出自己每天定额发

放的一瓶矿泉水让给牛喝。于是,不论干部怎样劝阻,不论分洪的形势仍有多么严峻,群众们就是要想家要回家。明的不行,就近的群众就偷偷摸摸地回了去,忙着干些田地的活儿。转移到外地的群众,想家更是想得不得了,既然没有分洪,既然洪水退了,干嘛还不让咱们回去?两千多农民赶到已经封锁的沙市渡口,叫着嚷着要回家。有关主管部门只得组织力量进行耐心的劝导与疏散工作。

江水只平静了短短三天,8月16日,长江第六次洪峰通过沙市,据专家预测,此次将要突破分洪争取水位45米。

公安县第三次接到了荆江分洪区准备分洪的命令。

为了确保群众的生命安全,由大批解放军、武警官兵、公安民警、地方干部组成的小分队,再次奔赴分洪区内,又挨家挨户地进行了一次拉网式搜索,彻底清理,将所有回村及滞留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一个不剩。与此同时,各主要路口再次实施严格的交通管制。

取出的二十吨炸药又埋进拦淤堤的药室内,为防电动闸门出现意外,几百名解放军官兵与民工聚集北闸,做好了人工开后闸门的准备。从北到南的整个荆江分洪区内,每隔五公里站立一名持枪民兵,若分洪令正式下达,将一路鸣枪报警。

又一个紧张得令人揪心的不眠之夜!

洪水一路飙升,当晚8时,沙市水位很快就超过了8月6日的最高水位而达到44.99米,离45米的分洪水位仅1厘米之差。如此严峻的形势牵动了中南海,中央授权国务院副总理、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温家宝:分不分洪,什么时候分洪,由温家宝全权决定,下达命令。

晚9时,沙市水位突破45米大关,达到了45.01米。北闸前面的拦淤堤实施爆破准备,所有人员后撤七百米。荆江分洪

前线指挥部的空气仿佛都要凝固了。

水位还在继续上涨,没有半点回落之势。

在荆州市,温家宝副总理正在召开由水利专家及各方人士参加的紧急决策会议。荆江大堤抗不抗得住第六次洪峰?第六次一过,长江即使再有洪峰,也是强弩之末了。只要抗过这一次,公安县也就保住了,否则,将是前功尽弃。此次上游泻下的超额洪水量估计只有2.1亿立方米,2.1亿立方米的水量,动用一个可装54亿立方米的“大水袋子”,划得来吗?一旦分洪,荆江分洪区的经济损失将高达四百亿人民币。然而,若是超过分洪水位而没分洪,荆江大堤抗不住发生意外怎么办?那将是江汉平原受淹,直接危及武汉三镇,损失会更大,后果不堪设想!怎么办?洪水到底分不分流?据卫星拍摄的遥感图片及有关资料表明,整个荆江大堤完好,抗住45.30米的水位不成问题;此次洪峰虽然来势凶猛,但属尖瘦洪峰,来得快退得也快,分不分洪对下游各地最高水位的影响有限;近段时间天气晴好,堤面没有雨水侵蚀,洪峰也没有雨水进一步加大……根据方方面面的情况及科学分析与精确计算,荆江大堤完全有把握抵挡长江第六次洪峰。

水位越涨越高了,8月16日晚10时,沙市水位45.04米;17日0时,沙市水位45.09米;17日1时,沙市水位45.11米……荆江分洪前线指挥部异常寂静,大家在紧张地等待着中央的决策与命令,每个人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几乎达到了所能承受的最大极限。

17日凌晨5时30分,沙市水位已抬升至45.18米,荆江分洪前线指挥部收到了一份重要传真,温家宝副总理要求:坚持严防死守,咬紧牙关,顶过去!

指挥部全体人员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嘴里长

长地吁着气,疲倦的脸上浮出发自内心的微笑。

长江洪峰还在一浪高过一浪地奔涌而来,沙市水位还在不断地往上跳动,直到8月17日上午9时,沙市水位涨到45.22米,这才定格停止不动。

两小时后,水位开始回落,荆江分洪区再次有惊无险。

巍然耸立的荆江大堤抗住了一次超历史最高水位的特大洪峰,荆江分洪区的人民再次经受了一场历史上最严峻的考验。

8月20日,沙市水位退至44.56米,分洪的可能性不复存在。荆江分洪前线指挥部向三十三万移民传达了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请转移群众作好返回家园的准备。

在十五个牵肠挂肚的日日夜夜里,一个个家庭翘首企盼着的就是这一特大喜讯。他们奔走相告,恨不得插上双翅,即刻飞回那魂牵梦萦的家园。

回来了,终于回来了!一脚踏上故土,大家那躁动、悬挂、忧郁的心灵很快就得到了一种无法形容的安宁与抚慰。

这种大转移既不同于大迁徙,也不同于游子远离故乡,它是一种牺牲小我保大局、牺牲小家保大家的暂时放弃。去兮复归来,危难一过,他们还要回来“重振旧山河”。

农民们回到家,喂养的猪、羊、鸡、鸭,不是死了就是跑得无影无踪,有些家庭还遭了偷窃;地里的棉花正在绽蕾,棉铃虫猖獗得不行,得赶紧上棉田治虫;水稻正在抽穗,关键时刻没顾上施肥,田里早已干枯,得快点抽水抗旱……一回家,就忙得屁颠屁颠的,但他们感到特别的充实特别的精神——一股从未有过的充实与精神。

想到今年的损失,牲畜家禽不死即丢、棉花水稻减产、水果提前摘下霉烂损坏……粗略一算,每户平均损失约达七千

多元。

七千多元,对一个普通农家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然而,他们没有半点责难与怨言,房屋完好、田地完好、树木完好,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没有分洪,他们简直都有点喜出望外了。若是分洪的话,要想恢复到现有的生活水平,至少得需十年。转移的损失与分洪的牺牲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他们豁达开朗、知足常乐,都说这点损失真的算不了什么,不要政府半分补贴,完全可以自我救济、自我补偿。

四

随着移民的返家,我也踏上了回乡的路途。

在抗洪救灾最为关键的日子里,我正泡在武汉市的有关区、县进行紧张的采访,我接受的任务是创作一部反映抗洪救灾的大型话剧。为了充实有关资料,也为了创作两篇关于'98长江流域特大洪水的纪实与反思性文章,我拟回故乡公安县,进行一次比较全面的采访。

汽车一过沙市轮渡,就在公安县的公路主干道 207 国道上快速疾行。望着两旁广袤的田野,抽穗的稻谷与绽蕾的棉花长势特别喜人,正翻着绿色的波涛一浪接一浪地涌向远方。望着望着,心里突然地就想到了另一番情景,只要稍有不测,公安县今年的分洪就已成定局难逃一劫。那么,我的脚下,将是一片汪洋,洪流汹涌、浊浪排空、房屋倒塌、树木挣扎、田地遭劫……我展开思维的翅膀想象着,越想就越为故乡人民在'98 特大洪水中的有惊无险感到万分的庆幸。

但是,我的心情半点也高兴不起来。

就在荆江分洪区的虎西,孟溪大垸于 8 月 7 日 0 点 45 分突

然潰口，三百多平方公里的良田沃土頓成澤國。

我赶到孟溪大垸，洪水正在缓慢地退去，可一栋栋的房屋、一块块的良田、一棵棵的树木还淹没在深深的洪水之中。横贯大垸的 207 国道不见半点踪迹，唯有浑浊的洪水一望无际。汽车只得在高而窄的河堤上绕道而行，南来北往的车辆繁忙地奔跑着，扬起遮天蔽日的厚厚灰尘。堤两旁，不时现出几户临时灾民棚，棚内的群众挤在狭窄的空间里靠着政府的救济打发时光，焦急地渴盼着洪水快快退去，好早日回到自己家中。这眼前的日子可真是难捱得很啦。也不知那在洪水中已然浸泡了一个多月的“家”倒塌没有，不管怎样，只要田土还在，就有了生命的根。

本世纪末的 1998 年对公安县来说，可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份啊！

4 月 23 日下午 5 时许，一场百年罕见的龙卷风曾袭击了公安县。大风在位于县境西南的郑公镇牛浪湖形成登陆。我在公安的老家正坐落在牛浪湖旁，大风上岸，屋顶当即就有三分之一的瓦片吹落在地。尔后越刮越大，狂风怒卷，雷电交加，暴雨助虐，它从西南刮到东北，横扫公安县境六十多公里，碗口粗的大树被连根拔起，耕牛、石碾也给卷到空中重重摔下，房屋成片倒塌……据灾后统计，共吹断大小树木三十三万多株；损坏房屋二万四千栋，其中完全倒塌的有一万一千栋；死伤人员达一千五百人，其中死亡二十七人，重伤四百二十六人；两千多头耕牛等大牲畜被倒房倒树砸死……直接经济损失达二亿二千万。

仅一场龙卷风，就将整个公安县一年的财政收入给全部刮走卷跑了。

8 月 7 日的孟溪大垸溃口，灾害更为惨重，直接经济损失高

达三十多亿元。

荆江分洪转移,分洪区内一百二十多家工厂搬迁设备停工停产,所有商店停业,大量农田荒芜,因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二十多亿元。

还有防汛抗洪期间的其他损失,如7月下旬特大暴雨袭击给全县造成的洪涝,长江水位上涨导致十二个洲垸漫溢……这些渍灾损失约有三亿多元。

1998年,公安县真可谓百孔千疮,损失惨重,步履维艰。

难能可贵的是,公安人民在自然灾害面前并没有趴下,他们一次次地挺直着腰身,自始至终地保持了人类的尊严与高贵。

五

还是让我们回到荆江分洪这一话题上来吧。

公安县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要多出一个特殊的行政机构,那就是荆江分洪工程管理局。

回到故乡,我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无论在哪儿采访,都能遇见过去的同学、同事、朋友、学生或熟人,加上又有公安县长江河道管理总段总工程师、朋友冯德平先生及县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同学周从喜先生的精心安排,我的采访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

无论是领导,还是普通百姓,只要谈起今年的洪水,谈到荆江分洪的大转移,每人都会滔滔不绝,能够绘声绘色地讲出几个精彩动人的故事。可惜的是,我不可能在此一一描述。这些弥足珍贵的素材我将通过另外的文学形式予以反映。

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同时,我在荆江分洪工程管理

局、县水利局、县档案局等单位又翻阅、占有了相当充实的文字材料。

’98分洪准备工作,由于组织得力、措施到位,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其中的每一环节、每一步骤基本上都按照分洪预案有计划、有条理地实施到位。一场大转移、三次大虚惊,虽然荆江大堤最终抗住了’98特大洪水而没有分洪,但对四十四年以来从未用过的荆江分洪工程来说,无疑是进行了一次全方位、大规模的“实战演习”。这次演习,对分洪区几十年来建设形成的交通、通讯、供电、供水、医疗卫生、市场供应能力,对各级干部的工作作风和工作能力,对分洪区人民的凝聚力、心理承受力等方面都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验。“实战演习”充分证明,公安人民经得住考验;荆江分洪区在关键时刻启用,必能取得成功,从而很好地发挥它在整个长江防洪大局中具有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在为故乡人民感到骄傲与自豪的同时,分洪准备所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又不得不使我忧心忡忡。“实战演习”敲响的警钟,分明在我的耳边一声接一声清脆而悠长地回荡不息。

分洪区内民工从防守的大堤撤离,必有外县劳力换防。按照程序,应该是先上后下,也就是说,得等外来的劳力接防后再实施大规模的转移。而’98分洪准备,接防与转移,几乎是同步进行。转移人畜向外流,防守人员朝内涌,在一些交通路口造成严重的对流堵塞,导致接防、转移两者延误,堤防出现真空。在长江高水位的剧烈冲击下,有的堤段无人防守长达十多个小时。幸而没有出现大的险情,不然的话,大堤溃决,洪水肆虐,将影响、打乱整个分洪部署。前来换防的民工所带工具甚少,有的根本就没带任何防汛器材。技术力量也薄弱,对公安

县堤防的有关情况不够了解,遇到情况拿不准,根本无法处理。在这种忙乱且危险的情况下,解放军部队及时赶到,严守长江干堤,为分洪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转移群众由于时间仓促无法准备,生活用品极缺,有的群众两天一夜只吃了一点随身携带的干粮。因预案中的搭棚器材不能及时到位,不少群众只有露宿在外。长途奔波、餐风露宿、人畜混杂、蚊虫叮咬、体能下降,造成各种疫病流行。而转移到外地市、区的群众情况更差,每到汛期,公安县周边地区的防洪形势同样紧张,安置地点并不安全,如转移到石首的群众因当地溃口,只有在一旁的山坡上露宿;转移到松滋小河口镇的移民,因那儿已扒口行洪,移民只好就近住在堤坝上。

就公安县境内的安全区而言,安置房大都修建于五十年代,不少房屋已是摇摇欲坠、天穿地漏,无法住人;而稍好一点的房子,又已出租,短期内无法腾出。全县共有二十一个安全区,其中就有五个没有通讯设备,十六个没有供电设施,大部分没有排水设施。一旦分洪,不少安全区即成一个个无法与外界联系、缺少自救能力的孤岛。最为令人担忧的,是安全区长达两百多公里的围堤。这些围堤建于1952年,除1954年分洪拦过一次水外,四十四年从未用过。堤既未用,堤内的鼠洞、蛇洞、獾洞、蚁穴等也就没有进行认真全面的整治。一旦遇水,老鼠、蛇虫、獾子受不了深水的强大压力会从藏身之处钻出,这些洞穴将对安全区的人民带来灭顶之灾。而安全区内,长期生活着近二十万居民,加上转移而住入的群众,人口总数有四十多万。如果安全区发生意外,将是“锅里煮饺子”,后果不堪设想。

除安全区外,分洪区内还建有安全台⁸⁷个,躲水楼²⁰³座,以就近转移群众。分洪后,这些台、楼将全部浸泡在浩浩洪水之中成为一叶叶名副其实的“小舟”。据有关专家预测,一旦

分洪,分洪区内将出现风急浪高的情况,原来仅一米高的水浪,分洪后将达三米。若如此,躲水楼台随时面临着被风浪吞没的危险。

’98分洪准备期间,上级没有下达正式分洪命令。也就是说,分洪一直处于准备阶段。但在实际操作中,已经把分洪阶段除炸堤开闸分洪以外的其他所有工作都做完了,造成了分洪准备与正式分洪两个具有不同性质阶段的工作混淆。如此一来,安全保障是有了,但群众的损失和后勤消耗过大。如北闸防淤堤的爆破准备,炸药装入药室宜在正式分洪令下达后进行,提前装入,出现了不少隐患:放置时间过长,炸药受潮失效,将造成拒爆或不完全爆炸;雷雨闪电有可能造成意外引爆;装填炸药取土,堤面损坏,有可能出现漫溢溃决等险情。再如安全区内排水涵闸过早地在准备阶段封堵,而有关的排水设施又没有及时解决,生活污水、散浸渍水全部滞留在安全区内,部分民房、道路被淹,既于群众生活不便,又造成一些无谓的物料消耗。

就分洪区的发展情况来看,1952年工程修建时,区内只有十七万人口,如今已增加到五十二万;全县的五家骨干企业和两家最大的农业产业化集团都在分洪区内,其工业总产值已占全县的75%左右。因此,分洪区内的有关经济发展思路和配套政策也有待于调整。不少有识之士认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今天,国家也应该尽快地制定出相关的分洪区政策,将荆江分洪工程推向市场,建立谁受益谁出钱的防洪抗灾资金制度,使得分洪区的人民得到应有的补偿……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再次庆幸荆江分洪工程只实施了预案而没有正式分洪。

如果没有这次相当于“实战演习”的预案,就不会发现具体

施行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警钟鸣响，一声声，震颤着公安人民的耳鼓，使得他们心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与紧迫感，催促着他们尽快行动，及时采取补救措施，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

我相信，当再一次新的长江特大洪水袭来需要启用荆江分洪工程的时候，公安人民将会变得更加成熟，以一种应付裕如、举重若轻的风采闯过分洪难关。

公安人民时刻面临着家园的放弃与放弃后的重建，放弃与守望、守望与放弃，这无可选择的唯一选择何日才是尽头？这长久的等待、无奈的放弃、不时的惊惶、疲惫的守望、洪水的梦魔除了造成的巨大直接经济损失外，带给分洪区人民间接的损害及心理的压力实在是太大太大了。孟溪大垸的溃口，就与荆江分洪转移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分洪转移令于8月6日晚8时下达，县领导的工作重点与主要精力忙于分洪区内群众的安置转移工作，于是，守堤百姓对堤段的巡查防护就有所放松。一旦放松警惕、麻痹大意，灾难之魔就会乘虚而入。8月7日0点45分，就在分洪区的群众准备离别故土之时，孟溪大垸突然溃口，垸内的十五万多名群众于睡梦中惊醒，衣服来不及穿、物品顾不上带，只有惊叫着哭喊着慌不择路地仓皇逃命。

公安人民是多么希望永不分洪安居乐业啊，他们真的做梦都在想着能够踏踏实实、红红火火地过上没有提心吊胆、没有转移放弃、没有洪水侵袭的安稳生活！

然而，除了等待外，他们别无他途。

只有等待人类的科学水平进一步提高，等待人类的理性不断完善，等待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协调和谐……

他们还在等待着三峡工程的早日建成。

三峡工程的首要作用就是防洪，工程竣工后，水库库容量

为 222 亿立方米,是荆江分洪区的四倍。那时,荆江防洪标准就可由现在的防十年一遇的洪水而提高到防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

有关水利专家经过模拟预演后显示,只要三峡水库将上游洪水拦截蓄住,使中游洞庭湖洪水先行泻走,两大洪峰错开,沙市水位可降低 4.8 米左右。

这真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数字与消息,果真如此,公安县虽仍需全力防洪,但荆江分洪工程将不再动用!整个长江防洪历史,也将因此而揭开崭新的一页。

2009 年,是三峡工程竣工之年,这日子已为期不远了。

公安人民,心中毕竟有了盼头。

但愿 1999~2009 年间荆江分洪工程不会动用,但愿 2009 年后荆江分洪区永不分洪。

但愿后人们对荆江分洪工程的概念与认识,只有到老人的记忆深处与发黄的书页中去搜寻查找。

不管怎样,荆江分洪工程给分洪区人民造成的影响将会十分深远,即使这一工程永不启用,但在人们心灵深处留下的痕迹、打下的烙印长年累月地积淀着,将成为一块心灵的化石,一种历史的符号,一套基因的密码代代传承,构成一道独特而别致的文化心灵风景线。

走向自觉之路

——关于'98 长江洪水的反思

一

1998 年入夏,长江流域的人们像往年那样按部就班地平静而幸福地生活着。在一个战争威胁业已消除,国际关系不断改善,国内政治、经济、生活环境也因改革的深入正日益发展、稳定、繁荣的年代,人们似乎没有半点理由怀疑平静的生活即将经受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与考验。可是,就在人类自我关系日趋协调之时,大自然却在我们头上祭起了尖锐的达摩克利斯利剑——一场报复性、毁灭性的长江特大洪水仿佛自天而降,以横扫一切的狂啸澎湃着汹涌着向我们发起了凌厉的进攻。于是,人们的生活节奏与生活方式不仅受到严重干扰,即使生命与生存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其实,这场始料不及的特大洪水,早在有关人士的预料之中。

1926 年,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就发现长江流域的雨量与太阳黑子的活动周期相关,而太阳黑子的每一周期变化约

为 22 年。事实证明,本世纪太阳黑子的新旧周期交替之时,长江流域都发生了峰高量大、灾情严重的特大洪水,其中尤以 1931 年和 1954 年为甚。1998 年又是太阳黑子新的活动磁周期之始,专家们正是以此为依据进行科学预测。早在 1992 年出版的《中国减灾重大问题研究》一书中就已指出,1998 年为洪涝期,显著变化将发生在长江上下游等区域;同是 1992 年出版的《湖北省自然灾害防御对策》及有关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的论文中都会出现过类似前瞻性的声音。’98 洪水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又与近百年来爆发最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和有记录以来发展最快的拉尼娜现象密切相关,这两种偶发的异常现象一先一后的突然“交接班”,搅乱了地球冷暖气流的固有规律,使得长江流域少雨的冬季长期笼罩着绵绵阴雨,底水远远高出往年;多雨的夏季更是暴雨如注,头顶的天空仿佛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撕开了一条口子倾盆而下无止无息。此外,还有不少其他方面的信号也对’98 洪水作了预告,比如青藏高原在 1997 年 11 月至 1998 年 2 月发生了本世纪最为严重的雪灾,其厚度、面积均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极大值,积雪融化,将会垫高长江水位;浙江、江苏等地在 1998 年 3~4 月间发生了“雷打雷”的奇特现象;北方于 1998 年 4 月出现了最大沙尘暴;唐山在张北之后再次发生地震等等。

必然性与偶然性结合一体,一场特大洪水也就在所难免了。

可惜专家们具有相当前瞻性的声音过于微弱,被社会的喧嚣与时代的泡沫淹没、覆盖着,并未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及采取相应的防御对策。只有当惊涛拍岸的洪水张开血盆大口无情地吞噬生命、毁灭财产时,人们才捂住流血的伤口,在一阵手足无措的愕然与惶恐后调整自己,紧急动员,奋力抗争。

长江流域的普通民众着实感到水患的严重与侵袭,是1998年7月21日那场突然而至的特大暴雨。严密的水网在天地间挂了两天,就以超过660毫米的降水量刷新了武汉、黄石等地的百年特大暴雨之最。湖泊早已溢满,武汉低洼的城区被淹,工厂进水,交通受阻,人们在齐腰深的水中艰难地行走着,一些木板钉成的简易“小舟”与游动的鱼儿成为街头一道别致的风景;黄石除了街道被淹,还经受了山洪的袭击,房屋设施、人畜生命在倾泻而下的洪水与泥石流中变得那么弱小无助。

就在人们的焦点正关注着堤内的积水两耳灌满匆忙的排渍声时,可能很少有人想到,更大的威胁却在长江外洪。于6月下旬形成的第一次洪峰就显得异常凶猛,使得监利与九江两地的水位一下子就超过了1954年的最高水位。从设防水位、警戒水位、紧急水位到最高水位,中间似乎没有什么缓冲,一支红色的箭头往上一蹿就刷新了标高。尽管如此,但第一次洪峰过后,长江汛情缓解,似乎没有什么咄咄逼人的态势与表现。长江年年夏季发大水,年年夏季要抗洪,这对于生活在长江流域的人们来说,似乎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任何特殊与特别。然而,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长江第二次洪峰却正好赶上这场特大暴雨,它于7月18日通过宜昌后,一路奔涌而下,外洪内涝,夹击长江中游两岸。就在第二次洪峰势头正旺时,7月21日开始的特大暴雨于23日左右又在长江上游形成了第三次洪峰。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峰连峰,峰叠峰,峰咬峰,高水迎峰”。第三次洪峰紧跟而来,“大步流星”地追赶着第二次洪峰,干流、支流、湖泊的所有洪水争相奔涌着赶热闹似地凑在一起,呼啸声越来越大,一浪高过一浪,滚滚波涛如利剑刺向中下游的胸膛,如雷霆劈向高悬的堤坝,如猛兽扑向两岸的生命。

人们还没有从内涝的灾害中喘过气来，就听到了头顶雷鸣般隆隆而来的长江惊涛骇浪的怒吼。

第二次、第三次洪峰接踵而来，它们你追我赶、叠相交加、气势汹汹，除武汉、黄石而外，长江中游河段均超历史最高水位。“狼来了！”似乎说来就来，且凶猛、残忍、无情到了极点：7月30日凌晨，滔滔洪水致使鄱阳湖东岸86座圩堤漫顶溃决，四十多万民众被困；就在同一天的中午11时许，武汉长江干堤丹水池区域出现一起自1954年以来武汉市最大的管涌险情；8月1日晚八点半左右，嘉鱼县簰洲湾合镇垸决口，受灾面积八十三平方公里，九万亩耕地被淹，五万多群众和部分抢险官兵被洪水围困；8月7日零点30分，湖北公安县孟溪大垸溃口，三百多平方公里的面积成为一片汪洋，十五万多群众受灾；8月7日下午1点30分，长江干堤发生了一起近七十年以来的首次溃决事件，九江市防洪堤墙突然陷塌，洪水迅即涌进西郊，四十多万人民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而溃决的小型民垸及长江干堤、支堤出现的渗漏、管涌、崩岸、脱坡、滑坡等重大险情更是不计其数……

然而，人类毕竟不是昨日那般弱小可欺，面对特大洪水挑战，在一阵仓促与忙乱之后，很快就进入了有序的应战状态。

长江部分河段封航，防洪抢险成为长江流域的工作之重，一切都以防汛为中心，流域内所能调集的农民、工人、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全部动员上堤；武警部队、解放军战士源源不断地开赴长江大堤投入紧张防守抢险，汽车、火车、飞机一齐出动，部队及民兵的总兵力超过一百万；遥感技术、卫星定位、回声测量、水下摄像等高新科技在抗洪预测、查险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十二亿人民总动员，前线与后方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抗洪救灾成为宣传媒介的重中之重，抢险物资及时供应，通讯

联络得到保障；以赈灾义演为主体的募捐活动盛况空前，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力出力，一道道慰问飞向长江大堤，一笔笔捐款汇往灾区，一车车物资运抵灾民手中……

于是，中华民族昂扬着进入了一场新的战争之中，各种应急方案、抢险措施在防守中发挥了异常重要的作用；一艘艘绿色的冲锋舟在汹涌的波涛中往来穿梭，将簰洲湾、孟溪大垸等溃口灾区的几十万群众抢救、转移；一个个民垸主动放弃破口，行洪蓄洪以减轻水势；荆江分洪区内实施分洪预案，三十三万群众大转移；九江决口在三万多官兵与民工的奋力抢救下堵口成功；一个个重大险情被控制、排除……在人力所能达到的前提下，将洪灾损失尽量减少到最轻的程度。

于是，在此后的第四次洪峰直至最后的第八次洪峰面前，人类已由被动变为主动。尽管也出现了汉江北河民乐闸被洪水撕裂扭曲、洪湖乌林镇青山段发生溃口性大脱坡、岳阳县麻塘大堤从中间断开一条长长的口子、石首市大垸乡合作垸发生重大崩岸险情、荆江大堤发生一起‘98最大管涌险情……但都因发现及时、抢救得力而没有发生一起灾难性的溃堤决口事件。

自6月下旬形成的第一次洪峰，到9月2日先后通过监利、莲花塘及螺山水文站的第八次洪峰，历时两个多月的‘98长江抗洪抢险至此才算真正划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

这是一场用宝贵的生命与财产换来的胜利。

这一付出惨重代价后划下的句号，我们更应将它视为划在二十世纪末的一个沉重的惊叹号，一个正在进行与继续着的还远远没有结束的顿号才是！

‘98长江特大洪水抗不过季节转换的自然规律无可奈何地俯首东去，那压在我们心头的千钧巨石终于落了下来。可我

们的眉头却无法舒展,心头无形的重负怎么也无法卸下。难道我们在与这场特大洪水的抗争中付出了超额的学费之后就就此撒手,而不应该好好地反思一番,并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与惨痛的教训吗?

苦难催化一个民族的深刻,我们只有在吮吸流血伤口的过程中进行客观而冷静的反思,在历经1998年夏季的重大洪灾后进入涅槃之境,才不至于愧对那些被洪水卷走的生命,才不至于辜负一颗颗远逝灵魂的殷殷瞩望,才有可能从自在到自为,一步步走向自觉的成熟之路。

二

当我站在岸边面对肆意妄为的滔滔江水时;在淹没的民坑内采访、感受体验灾难的残酷与无情,坐在巡行的船上低头注视脚下被淹没的土地与房屋时;在接收不同渠道与传媒的有关洪水肆虐的大量信息时,我脑海里想得最多的便是这样一个问题:

‘98特大洪水是否可以预测?我们能否将这场灾难的损失减少到轻而又轻的最低限度?

回答自然是肯定的!

‘98洪水,不仅是长江全流域的特大洪水,东北的松花江、嫩江也出现了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就连常常断流有成为内陆河之虞的黄河也出现了汛期;这场洪水,不单是中国、韩国、孟加拉国、俄罗斯、英国等国家和地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侵袭。这是一场受着太阳黑子磁周期、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影响、左右的必然性洪水。如果大气层不被人类工业化的污染所破坏,‘98洪灾肯定要减轻许多。因此,整个人类都对这场洪灾

负有不可推卸的共同责任。

如果我们有着敢于正视灾难的勇气,面对倾泻而下的暴雨,在可以划分的独立责任范围——长江流域内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并自觉地、一以贯之地维护这一地域的生态环境与生态平衡,是断断不会出现这场具有毁灭性的洪涝灾害的。

’98洪水,是自1954年以来发生的又一次长江全流域性特大洪水。这两次洪水具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入夏普降暴雨,水势来得猛而急,不少水文站突破警戒水位、紧急水位、危险水位的时间几乎同步等等。可是,就流量与水量而言,’98洪水却没有1954年的大。以宜昌水文站为例,1954年的最大洪水流量每秒66800立方米,而1998年的最大流量为每秒63600立方米;再以超蓄洪量为例,1954年超过1023亿立方米,1998年则仅为156亿,比1954年要少超867亿立方米。可是,长江中游、下游仅除武汉和黄石外,不仅超过了1954年的最高水位,而且全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位,一些河段的水位比1954年要高出1至2米。也就是说,’98洪水不如1954年的大,其防洪指标与艰难程度却远远超过1954年。如果我们以1954年的防洪设施、防洪标准及防洪状况遭遇1998年的洪水,不仅不会出现特大洪灾,而且一次又一次的洪峰将会通过得比较轻松而坦然。

科技在发展,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为什么我们抗御洪水的综合能力却越来越差了?在1954年至1998年这近半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我们都在做些什么?

只要稍作回顾,就不难发现四十多年来许多丧失理智的短视行为在长江这条母亲河身上所留下的深深创伤。

我们先看上游。

当一棵棵大树在一把把斧头越来越快的砍伐中轰然倒下

时,当一片片森林在一条条现代化的电锯中痛苦地呻吟着吐出一摊摊比那股红的鲜血还要刺眼的白色锯末时,当一片片扬起的镢头、锄头、铁锹以开垦耕地的名义在一道道山坡上频频挥舞时,我们可曾想过将要带来的严重后果?

长江上游原始植被的破坏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造成长江中下游大量的泥沙淤积。

曾经一个时期,我们的头脑里不仅没有这种最起码的常识概念,还情不自禁地陶醉在对大自然的所谓征服之中。

然而,陶醉的美梦未醒,大自然的惩罚与报复却一个接一个毫不留情地降临人们头顶。

据有关资料表明,自公元前 185 年至今的两千多年时间里,长江遭遇的较大洪灾共计二十二次,大致规律为平均每百年一次。可自 1949 年以来,长江大洪水基本是每十年一次;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就更加频仍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发生了 1991 年、1995 年、1996 年、1998 年四次大洪水。这也就是说,两千多年以来的二十二次大洪水,就让我们新中国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占有了其总数的三分之一强。

这是一个令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惊诧且汗颜的黑色数字!

若照此发展下去,像 1998 年的特大洪灾更要一个接一个地奔涌而来,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将时时面临着一场场拼实力、比消耗的长江大战,将时时做出一些沉船、沉车、扔粮食堵溃口的非常之举,更将时刻准备着用无数的血肉之躯构筑一条条特殊的堤坝。

这并非危言耸听。

如果我们不正视眼前的现实,不从'98 洪灾中吸取沉痛的教训,再不亡羊补牢,也许,我们面对的结局将会比这更惨。

据 1957 年的调查统计,长江流域的森林覆盖率为 22%,水土流失面积为三十六万多平方公里;至 1986 年,森林覆盖率仅剩 10%,水土流失面积则高达七十三万多平方公里。而自 1986 年以来,砍伐与开垦仍在大规模地继续着,到目前为止,四川宜宾以上金沙江、大渡河两岸的原始森林已砍伐殆尽,岷江、沱沱河、乌江等几条长江上游的支流植被也同样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仅 1998 年,沿江森工企业就已砍伐了约三十万立方米的木材,相当于砍光了一片五万亩的原始森林。据有关专家估算,一万亩森林的蓄水能力相当于一个一百万立方米库容的水量。

面对这种滥砍滥伐的情况,就连美国专家莱斯特·布朗也不禁大声惊叹道:“长江流域的原始植被丧失了 85%,曾经吸纳雨季大量雨水的森林大半已不复存在。”

是的,如果上游的原始森林保护良好,就可将'98 夏季从天而降的特大暴雨吸纳、含蓄,而不致于迅速流下眨眼间形成一个接一个令人措手不及的洪峰。

开垦山坡所造成的水土流失更是惊人,倾斜度为 5~10 度的山坡耕地每平方公里的年水土流失量为 1 359 吨,超过 20 度的则高达 5 000 至 10 000 吨。

大量的砍伐与开垦导致成千上万吨的水土源源不断地流入长江,水流变浑,污染严重,泥沙淤积,河床抬高,于是,长江的调汛能力一年比一年衰减,防汛形势也就一年比一年严峻。

再看长江中下游。

中下游除了遭受着上游江水裹挟而来的泥沙淤积等恶果外,也在急功近利地做着一些自毁长堤的盲目行为。

洪水汹涌而来,中下游如何抗御?除了人为的加高堤坝而外,更靠沿岸的成千上万个湖泊承纳、调节、蓄控。

建国初期,长江共有通江湖泊一万六千多平方公里,可如今只剩下六千多平方公里了。素有“千湖之省”的湖北,1949年全省共有0.5平方公里的湖泊1066个,1977年锐减到326个,而到了1985年,就只剩下192个了,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一下子就减少了72%。

这大群的广阔湖泊都上哪儿去了?除了因上游的水土流失导致的泥沙淤积而自然萎缩外,大多数则是在开荒造田、人工围垦的活动中变成了一亩亩所谓的“良田”。

素有我国第一大湖之称的洞庭湖其全盛时期是在唐宋之时,号称“八百里洞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洞庭湖区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经过“大跃进”、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三次大规模的围垦,不少大型国营农场及围垦民垸应运而生。因为围垦,洞庭湖不再是中国的第一大湖;整个水系也被切割成千奇百怪之状,被湖泊生态专家称之为“洞庭河”;面积也骤减到2691平方公里水面,仅为唐宋盛时的三分之一,“洪水一大片,枯水几条线”,令人惨不忍睹。以三分之一的面积,却要接纳同样乃至更多流量的洪水,洞庭湖承受得了吗?

五十年代初,鄱阳湖尚有5160平方公里,截止1997年,就有1300平方公里的湖泊被围垦蚕食;在枯水期,湖面仅剩可怜兮兮的146平方公里水面。

像一群破落的败家子,我们将祖宗留下的美好家产就这样一点点、一片片地消耗得所剩无几了。我们不仅愧对祖先,更无法向后代作出一个满意的交代。难道说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一代代血脉传承着的坚韧之桥,将在我们手中轰然坍塌吗?

“人定胜天”、“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口号声恍惚还在耳边轰然回响着没有消失,那大音希声的老天默默地俯视尘寰、俯视渺小的人类,嘴角浮出一缕嘲讽,轻轻地吹

了一口气,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我们就承受不住了,竟至折腾得死去活来。

《圣经》有语曰: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如果人类狂妄无知,那上帝又将有何表现与反应呢?

恩格斯曾经说过:“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大自然的胜利,对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事实正是如此!

上游挟着泥沙的浑浊江水滚滚而来,中下游昔日储水的如巨盆般的湖泊不是消失就是萎缩。下泻的江水既不能分散,而普降的暴雨要么强力排灌入江,要么昔日的“水盆”无法存储,总之,所有的水流全给赶进了长江主干道,将它们逼在一起,夹束在一条狭长的地带。如此一来,本来就因泥沙淤积抬高了河床的长江水位能不增高吗?这便是江堤不断增高,可防汛形势却一年比一年吃紧的原因之所在。一条高出两岸十米左右的长江悬在人们头顶,而江中的洪水正如一匹匹脱缰的野马,挣扎着、冲撞着、奔突着寻找出路。如此情形,能不紧张吗?稍有不测,就是灭顶之灾啊!

长江中游的大部分堤段就是这样在超历史的高危水位中浸泡了一个多月。17.8万解放军、武警部队,数千万人民群众和各级领导全力以赴地投入抗洪抢险长达两个多月。在这两个多月里,抗洪压倒一切,其他各项工作及生活根本无法开展无法进行。不要说这些隐性的损失,也不谈那些被淹的千万亩农田,仅'98洪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近一千七百亿元,真可谓元气大伤矣。

除了水土流失、湖泊萎缩外,长江身上还有不少令人触目惊心的硬伤。

在长江河道及岛屿上开垦居住,与水争地抢占河道,仅长

江干流的江心洲、外滩圩就有 263 个,总面积 248 万亩,成为行洪、泻洪的严重障碍;在长江干支流上滥建的住宅、道路、工程、码头等不计其数;而无计划、无节制、无选择地采挖河沙更是直接威胁着长江大堤的安全……

正是这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大小小的破坏汇聚着形成了一个无形而巨大的黑洞。一旦天象有变,这个黑洞将以不可阻遏之势在长江流域为所欲为,把一些宝贵的生命、财产横扫、席卷、吸附而去。

三

长江流域的自然环境在人类日益膨胀的欲望与没有节制的行为中一步步变得恶化起来,对防洪的要求与标准也就相应地变得越来越高。

人们在几千年来与洪水的搏斗中总结出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修筑堤坝,加强水利建设,以防为主。

俗话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要想挡住洪水,也只有修筑高出汛期水位的堤坝。而长期的水土流失又使得河床不断抬高,水位越来越高,堤坝也就得相应地越修越高。今日长江堤防普遍要比 1954 年高出 2~3 米。这样,本属冲积平原的长江中下游地带,夏季涨水季节,总是低于江水十米左右。在一条高悬头顶的河流下生活,令人心惊胆颤不已。

可是,除了将堤坝越修越高而外,人们暂时似乎还没有找到比这更好的防水对策。

据史料记载,长江中下游堤防已有三千五百多年历史。如今,长江中下游各类堤防总长度为三万三千多公里,其中长江

干堤约三千六百公里。

大堤初建之时,人们并没有什么科学的规划与决策。哪里洪水泛滥,就在哪里仓促间紧急筑堤拦坝,施行堵截。堤身下面的土质及杂草等堆积物,根本就无暇顾及。而整个长江大堤,就是在这一段段的自发构筑的堤坝基础上慢慢形成的,如荆江大堤的“九曲回肠”就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因此,本身就建在冲积土层上的堤防,基础多沙,容易出现翻沙鼓水(即管涌)险情;加之建筑历史悠久,情况复杂,堤身更是隐患多多。在高水位的压力下,随时都有险情发生,如发现不及时,抢救不得力,就面临着崩塌溃决的重大灾难。

要想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只有彻底从根本上加以整治才行。而当我们把这一理论付诸实施时,方知其难度之大不得不使人怀疑它的可行性。

我们能将具有九曲回肠之称的长达 182 公里的荆江大堤凭人工裁弯取直吗?我们能够将三万多公里长的长江各类堤防全部重新构筑并改造其多沙的根基吗?

我们所能做的,似乎只有在原有的基础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堤坝加高,做些修修补补的预防工作;但对常常出险的部分险段进行彻底的改造,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即使如此,也面临着一个令人头痛的资金问题。

1980 年,水利部曾根据国务院要求召开了一次长江中下游五省区防洪座谈会,出台了一个《关于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的报告》。报告在论及加高、加固上千公里长江堤防时,共安排防洪工程 34 项,测算的资金为 48 亿。就我国当时的国力而言,十年投资 48 亿并不为多,是一个可以承担的合理数字。可结果如何呢?我们从一份名为《三峡工程防洪论证报告》中可略略得知,从 1980 年到 1987 年这七年间,水利部仅投

入资金 3.99 亿,加上各省的配合,也只有 12 项工程陆续开工。由此,我们不得不沉痛地指出,至少到 1987 年为止,长江十年规划完成得实在是太差太差了。最令人遗憾叹息的是,1980 年部署的关于八十年代的诸项水利任务,直到 1998 年特大洪水来临之前,仍没有全部完成,更不说九十年代的设想与规划了。

如果长江干流堤防的质量更好一些,有关防汛的安全建设更周全一些,'98 抗洪形势决不至于如此被动。

从当时来看,一下子投入多少多少亿,似乎是多了点。但这点投入与洪灾所造成的损失相比,就显得微乎其微了。不说远的,仅 1995 年长江五省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59.2 亿元,1996 年为 700 亿,1998 年高达 1 666 亿。除了直接损失,还有间接损失、人员伤亡等,如若算在一起,数字就更惊人了。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注重历史与传统的民族,自公元前 841 年历史有了确切纪年以来,至今一直就没有间断过。司马光还根据历史事实编了一部《资治通鉴》,以便后来的统治者从历史上吸取教训。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尽管此后的帝王一个个都将一部《资治通鉴》颠来倒去地翻得哗哗直响,却没有一个从中真正吸取教训获取裨益,就连与司马光同代的北宋统治者,也将他的警告与启示当作耳边风,左耳进、右耳出,一个好端端的帝国很快就在北方异族的侵袭下化作云烟飘散在历史深处。

由此可见,我们又实实在在是一个相当健忘的民族,常常是好了伤疤忘了痛,缺少一种博大且深远的忧患意识!

对待防洪也是如此。

洪灾来了忙抗洪,洪灾过去就忘洪。“临时抱佛脚”、“头痛便烧香”的负面文化传统一直绵延到今天还是具有着强大的生

命活力。

1995年汛期,长江干堤曾发生险情2562处;1996年汛期,又是这些地方再度暴露出堤防未能达标的种种隐患。如果我们汛后对这些险段险点予以彻底根治,肯定不会出现1998年的如此沉重的惨痛。

就现有技术而言,我国已具备修建一百多米高的水库土质大坝并保证不会发生渗漏的能力;而维修、加固十几米高的长江大堤不出纰漏,应该是不成什么问题的。

可实际情况如何呢?

1998年8月7日,位于九江市城西四十公里处的长江干堤发生溃口,其主要原因就是防洪墙的质量问题。

这是一片新修的挡水墙,建于1995~1996年间,投资近一亿。建成后,被九江人称为“放心墙”,成为一面心理安全的旗帜。然而,正是这面“放心墙”与九江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让人最放不得心。从撕裂的墙体表明,挡水墙的墙体中竟没有钢筋,水泥标号也明显偏低,而沙子又掺得太多——严重的偷工减料!

没有资金就不说了,即使投资,却又弄出这样的一些“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这又该如何向世人交代呢?

再则,即使建设达标、质量优异;如果只建不管,也等于没建,甚至还有可能遭致不应发生的灾害。一个工程建成之后,能否按设计要求安全运行并充分发挥效益,主要依靠管理工作的好坏。任何水利工程,不管其结构如何,总是在发生着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既有自身的,也有外力的作用。如果疏忽大意,不能及时发现问题,或发现后没有及时处理拖到汛期,不仅劳民伤财,更有可能使小险变成无法抢救的大险。1998年8月8日,位于湖北汉阳县境内的汉北民乐闸正是由于年久失修和

管理上的疏忽,加之承受堤外洪水压力太大,闸门支架出现弯曲,导致闸门撕裂。为了堵住翻涌的闸口,竟付出了两艘大型船舶、九十一辆大货车的巨大代价。

防是主动,抢是被动。所谓防洪抢险,关键在防;万不得已,才投入人力物力抢救。衡量水利管理工作的标准应以不出险或少出险论英雄。

可是,从'98特大洪水中我们可看到,资金匮乏,堤防建设达不到相应的标准;而有了投入,工程却不合格;昔日的水利工程,又因年久失修管理不善而导致漏洞百出……'98抗洪所能做的,似乎没了“防”的概念,只剩下了“抢”。哪里有险情,部队、民工、车辆、物资、冲锋舟就开向哪里;此处抢毕,彼处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险情;抢,抢,抢!险情此起彼伏,层出不穷,抢不胜抢……

一声声令人心悸的警钟敲响在整个'98抗洪的过程之中,至今仍在长江流域的上空一声紧似一声地回响,强烈地震颤着我们的心灵。

四

1998年7月30日上午11点左右,武汉市城区自1954年以来的最大一次险情在丹水池区域内发生了。

丹水池,一块非同寻常的地段,在武汉地方志里有着特殊的历史记载:

1931年长江特大洪水,汉口被淹,洪水正是从这里决口呼啸着扑向肥沃、繁华的江北大地;

1954年长江又一次全流域性特大洪水,江流冲撞着乘机寻找薄弱所在,硬是在这同一地方将江堤咬穿了一个洞口,军

民合力抢险成功。

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与雷同。1998年,本世纪以来第三次长江全流域性特大洪水爆发,又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大大的管涌。

具体地点位于中南石油化工公司武汉分公司大院内。

管涌是在紧靠堤边的一座房屋后发现的,而这座屋子却是中南石油化工公司武汉分公司的一个煤气仓库,里面放有三百多罐家用煤气。房屋严重妨碍了查险、排险、抢险,慌乱中,赶来抢险的人们很快扒开屋顶、拆掉墙基;与此同时,又将一罐罐煤气紧急转移,这可是一枚枚威力无比的定时炸弹啊!稍有不慎,就会爆炸;只要爆炸一罐,其余的也将接二连三地引爆;那么,江堤与民众将在一片火海中化为乌有。

情况危急、危险到了极点!

所幸的是,煤气罐全部安全转移,并未发生半点意外。

房屋很快也被拆除了。

人们扛来沙包、土袋,直往冒水的管涌上压。

可是,往上喷涌的水柱怎么也无法压住,眼见得管涌越来越大,水柱越蹿越高,而管涌所在离长江防水墙不过数米之远。

就在这紧要关头,正在家中午睡、曾在1954年抗洪抢险中获得过一等功臣的退休老工人王占成在人们的呼喊声中惊醒而赶来了。他拨开人群,看了看抢险现场,马上大声叫道:“这样堵起不到作用,应到江边找漏洞!”

于是,他率先一人爬上江堤,纵身一跃,跳入堤外湍急的江水中寻找漏洞。

水面上飘着一层厚厚的树枝、杂草、烂木头等浮渣,什么也难以发现。就在这时,一条紧急抢险备用的小船开过来了,船上的突击队员帮助着扒开浮渣。立时,江面上就出现了一个大

大的漩涡。

有漩涡,说明下面在流水,而流水处就是漏洞。

“快扔沙包!”随着一声令下,一个个百来斤重的沙包如雨点般抛入水中,可转瞬间就被吸进漩涡之中变得无影无踪。

管涌更大了,四五尺高的水柱喷射着落在地上形成一条条急流在中南石化大院里乱窜。

千钧一发!

凭着经验,王占成知道,只有探明漏洞的大小及准确位置,才能彻底地堵住。于是,他拄着一根从水里拣来的约两米多长的木棍,叉开两腿,紧张而认真地探索着。不一会,他的脚下就感到了一股漩涡的巨大力量,直将他的大腿拉着扯着往下攥。要不是拄牢棍子叉开腿子,他的整个身子,恐怕早被吸卷进去。

漏洞的准确位置找到了,直径粗约一米。

令人奇怪的是,这个漏洞竟是斜斜地穿过江堤,并不像平常出现的管涌那样与大堤垂直,也就增大了查找的难度。

漏洞的大小与位置一旦探明,早已跃跃欲试的突击队员们一个个跳入水中组成了一道弧形人墙。人们搬来单位招待所的六十条棉被,一条一条地摊开,将一个个沙包放入其中,包饺子般地裹在一起抛向漏洞。一条、两条、三条……一共抛入四十四条棉被包裹着的“饺子”,才将漏洞堵住。

人们惊魂未定,突然又听得大堤发出一声轰响,抬头一看,江堤猛然下坠,并裂开了一条长长的缝隙。

原来,管涌已将水泥墙下的泥沙冲走,漏洞堵住,江水断流,堤身顿时下陷,填补泥沙冲走后留下的空间。

如果再晚一刻,管涌将防水墙下的泥沙掏尽,江堤会突然崩塌溃决,洪水将直扑武汉市区,后果不堪设想!

所幸堵漏成功,险情排除,武汉保住了,铁路大动脉保住

了,千千万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保住了……王占成成了人人尽知的英雄,被誉为‘98 武汉抗洪抢险第一人。

这是一场并未付出多大代价的成功性抢险。就在这一抢险过程中,我们仍发现了不少令人深思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和国务院关于河道管理的有关规定,凡堤脚 50 米范围内根本不应该存有任何建筑及沟渠堰塘,否则,皆属违规违法。违章建筑不仅影响查险,更影响抢险道路的畅通,需要的物资无法运抵险情所在,到时只有眼巴巴地看着大堤溃决而无半点回天之力;而沟渠堰塘不仅遮蔽险情,更软化堤脚导致险情的频频发生。

中南石化公司武汉分公司的违规显而易见,紧靠堤脚就是一幢房屋,并且还存放着危险至极的煤气罐。一旦发生意外,真是后悔莫及!

不仅中南石化一地,长江中下游流域其他各处的干堤、支堤,紧靠堤边的堰塘、房屋比比皆是。我每每见到一处,总是要心惊肉跳一番:又是一处隐患啊,如不及早清除,不知何日将由由此而引发一场无法挽回的灾难。

武汉市在经过一场虚惊后,深刻认识到沿江建筑物对抢险阻碍的严重性,很快下达紧急指令,拆除各类建筑与障碍物,在丹水池区域打通一条十米宽的防汛抢险通道,与汉口沿江大道连成一体。

丹水池险情发现后,人们想当然地将一个个沙包堆向出水口。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以为只要堵住出水口,就能制服管涌。没想到强烈的水柱竟将百十斤重的沙包顶到一边,汹涌的积水在堤脚汇成了一个水池,堤内堤外的洪水已经形成一条相连的“通道”。“通道”形成,溃口在即。若不是富有抗洪抢险经验的王占成及时赶到,将人们的视线、将抢险的重点转移到堤

外的江水中寻找漏洞,堵住管涌之源,一场灾难势不可免。

武汉市防汛指挥部通令嘉奖王占成:“冒着生命危险,跳入堤外江水,探明险源,为抢险排险提供了宝贵依据,避免了一场重大险情的发展。”

抢险并不仅仅在于与洪水拼实力、拼人力、拼物力,更多的得靠防汛抢险知识。

仅仅依靠专家显然也是不行的。险情紧急,水火无情,安危往往系于一瞬;长江堤防漫长,关键时刻,险情迭生,专家一时难以赶到。因此,抗洪救灾,更多的是依靠广大群众,依靠防汛抢险知识的普及。

在整个抗洪抢险的采访期间,我有心刻意寻找带有普及性质的防汛抢险读物。所见到的为数极少的几本,也属专业性的小册子,薄薄的,大多印于十多年以前,有的还是钢板刻印的油印物,都是内部资料,没有一本属于正规出版社的出版书籍。

直到第八次洪峰俯首东去,我在故乡公安县——荆江分洪区采访时,才得到了两本由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专业防洪书籍,一本为《荆江防洪 100 个为什么》;另一本叫做《前事昭昭,足为明戒》,副标题是“1954 年以后荆江两岸堤防、涵闸、泵站溃口事故反思”,两本皆为 1998 年版第一次印刷。见到两书,我顿时两眼放光,惊喜不已。尽管这样的书籍来得迟了点,但毕竟是出版了,且印刷也称得上精美。于是,我一直失望着的内心总算得到了一丝慰藉。当天午餐时,我与公安县文联主席李寿和先生欣喜地谈起了这两本书,谈到了两本书的同一作者易光曙先生,据有关介绍,像这样的读物他一共编写了六本。易先生从事水利工作四十五年,任过副县长、县委副书记、荆州市水利局局长等职。我们都认为,只有像他这样的官才没有白当,而像他这样集官职与业务技术于一身且成果卓著的官员却

是少之又少，真可谓凤毛麟角矣。

在'98 抗洪抢险之初，许多上堤民工连最基本的防汛知识都没有。他们不知道防汛查险需准备哪些工具，连手电筒之类的查险必备品都没带，而是两手空空地跑上大堤，也不知道怎么个查法守法，简直就是一群“汛盲”。长期生活在江水的威胁之下，一个有着几千年防水治水历史的民族竟会“汛盲”到如此程度，实在令人震惊！

当我们的宣传舆论工具开动大力宣传'98 抗洪时，大有“人人说汛情，个个话水灾”之势，有关防汛的专业名词如洪峰、散浸、管涌、干堤、子堤、民垸、水位、坍塌等也飞进了千千万万个寻常百姓家中。因此，从某一角度而言，我们可以将'98 洪水视为一次长江流域民众的“扫盲”活动。

但是否真正弄懂了这些防汛专业名词所包括的含义？真正懂得了如何防汛、查险、抢险等防汛知识？

从“汛盲”到弄懂、掌握防汛知识而至专家，其间毕竟隔着一段遥远而漫长的距离。

只有当我们将被动应战变为一种自觉主动行为，有意识、有目的地开展防汛知识讲座，开办有关防汛知识培训班，使防汛知识深入千家万户，普及到长江流域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并对当地的堤防历史、现状、优势、不足了然于胸，人人懂防汛、个个是专家，只有这样，才能在以后的抗洪斗争中游刃有余，举重若轻。

五

在'98 长江抗洪中，不少昔日默默无闻的普通军民于一夜间因人性的闪光与生命的搏击而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比

如高建成、潘良勇、李向群、王占成、王美满、彭志龙、柯琴芳、胥良发、潘云水、李伟……

在这一长串名单中，我们会觉得其中缺少了一个焦点性的特殊人物。

谁？小江珊！

嘉鱼簰洲湾溃口，久经压抑的洪水挣脱大堤的束缚狂奔直泻，浊浪排空，喧腾怒吼；一棵略显光秃的小树在一个又一个恶浪的冲击中摇曳着随时面临摧折的危险；一个弱小的女孩，像一只惊怯的小鸟紧紧地抓住这棵小树的枝桠，以坚强的信念与顽强的意志将生命的潜在力量几乎发挥到了极致，坚持了九个多小时，终于等来了解放军的救援。

这一画面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及其他许多关于抗洪救灾的节目中反复播放，此后，小江珊又出现在中央电视台1998年8月16号的“我们万众一心·抗洪救灾募捐义演”上……

于是，江珊一下子成了万众瞩目的“明星”。

是多种偶然的巧合因素改变了小江珊的命运。

小江珊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家大口阔，贫穷的环境使得她从小就没有得到父母的呵护，经常一个人到外面乱跑乱“野”，养成了机灵、顽皮的性格，并学会了爬树、游泳等本领，被大人们称作小精怪，落了个“猴子”的外号。

大难临头时，她被奶奶攥着没命地奔跑。洪水席卷而来，无情地卷走了她的母亲和一个姐姐。要不是奶奶一手抓住她一手抓住一棵小树，她们也会被洪水冲没。大水越流越急越来越深，不一会就漫齐奶奶胸部漫过江珊头顶。幸亏她会游泳，一下子就水底浮了出来。奶奶拼尽全身力气将她拉到树边，就在这时，又一个恶浪扑来，奶奶眨眼间被洪水卷得无影无踪。

“猴子，快爬树，莫睡觉……”奶奶在卷走前的叫声在江珊耳边不停地回响着，支撑着她顽强地坚持了九个多小时。

要是江珊不会游泳不会爬树，要是她没有奶奶的帮助与激励，要是她身体稍重一点小树不能承载，要是没有解放军的紧急援助，要是救助时的镜头没被电视台的记者拍摄下来……也就不会有我们今日所知道的江珊。

江珊是幸运的，她不仅免于灾难，还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北京圣朝私立学校不仅将她与她的姐姐江妮免费收为学生，而且决定免除她们俩小学至初中的全部生活学习费用。

在为江珊感到庆幸的同时，我们是否想过，又该有多少其他幼小的生命被这场特大洪水所吞噬？据事后统计，江珊是澜洲湾溃口事故中唯一依靠自身力量获救的幸存儿童。

不唯小孩，就是成人的自救意识、自救能力也十分有限。

美国等西方国家十分注重孩子的素质教育，中小學生都开设有“基本生存能力训练”及“特殊环境下的自救”等课程，不仅把骑自行车、汽车驾驶、游泳等作为基本生存技能与手段，要求学生必须学会；并且教授学生在遇到水灾、火灾、地震、野外迷路等特殊情况下的自救技能。在日本，更是全民进行防灾教育，提高防灾意识，差不多每月都要进行防灾演习，九月一日更是日本的全国防灾日，就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灾害来了怎么办。在洪水面前，他们建立有一整套预报预警系统，设计有洪水风险图，洪水泛滥时，人人都知道上哪个场所避难及走哪条路线。

由此反观中华民族，对于灾难，我们似乎患有一种神经质的痼疾。不说开展防灾救灾的宣传，进行灾难自救的素质教育，就是谈一谈“灾难”二字，我们都感到害怕与恐慌，总是讳疾忌医，缺少一种面对灾难的信心和勇气。

这恐怕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

无庸讳言,我们是一个缺少真正悲剧意识的民族,这在戏剧、文学等作品中反映得最为充分。尽管标明为“悲剧”的作品,其结尾不是“大团圆”,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哪怕是人间不能圆满解决的问题,也要在阴间予以相应的褒扬与惩治,留一条“光明”的尾巴。在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里,没有一部称得上真正的悲剧之作;在我们的骨子里,缺少西方严格意义上的悲剧意识。没有悲剧意识,凡事总是朝好的方面设想,也就缺少直面灾难的勇气。而灾难却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总是不期然而然地降临在世人面前。一旦灾难来临,我们剩下的只有动物般的求生本能,往往反应迟钝,措手不及,被猝然而至的灾难裹挟而去。

所谓高质量的生命,我以为就是清醒地活着,随时准备面临一切可能出现的生存状况,从而应付裕如地排解隐患、消除灾难,活出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不能直面灾难常与侥幸心理相依相存。

1998年8月9日,黄陂县滠口镇刘店府河大桥桥拱闸溃口,洪水奔涌着直逼此处中商集团实业公司液化石油汽站。在防汛形势十分严峻的紧要关头,上级有关部门已正式通知该单位领导,要他们处理好液化汽站三个二十吨重的原生罐安全保护工作。可该公司的有关领导却置若罔闻,麻痹大意,心存侥幸,想当然地认为不会有什么意外情况发生。没想到洪水凶猛,说来就来,一来就将一场特大险情推到了一触即发的可怕程度:三个油罐,一个装满了二十吨的汽体,一个储存半罐十吨液体,还有一个剩有两吨半残汽。洪水涌来,强大的浮力使两个十吨、两吨半的油罐相继冒出水面。三个罐体连在一起,只要有任何一个阀门和任何一处管线出现问题,将造成大量汽体泄

漏，一场特大火灾或爆炸事故势不可免，处于下风方向的数百家居民必定惨遭劫难。

险情危急到了极点，一个由市建委、公安、消防、劳动、燃气等部门组成的抢险指挥部迅速成立，他们紧急疏散群众，又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水底排险，关严阀门、切断三个罐体间的管线联系，排放残液，拆除附件。风浪越来越大，三个罐体不仅相互碰撞，那浮着的两个随时都有失控飘浮远去的危险。又运来砂石堆于上浮的罐体顶部，用绳索、木桩等物固定罐体。然而，隐患并未彻底消除，最后又制定出向罐内注水的方案，用消防车以高于罐内的压力注水，使两个上浮的罐体全部沉入水底复位，又将五吨重的砂石压在罐上，这起重大险情才得以完全排除。

涪口液化汽站的每一步排险过程，都充满了惊心动魄的传奇色彩，稍有不慎，一场恶性爆炸事故就会发生。

如果有关领导不怀侥幸，不存大意，提前加固，防患于未然，根本不会出现这起重大险情，也就不必动用、消耗太多的人力物力。

不仅是这次，'98抗洪抢险中的多起溃口事故皆因怀有麻痹大意的侥幸心理而在一瞬间爆发，从而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损失。不管多大的险情，只要发现早，抢救得力，都可及时排除。可是，本不该发生的事故却偏偏发生了，我们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沉重了，常令人扼腕叹息不已。

为了避免类似灾难的发生，我们有责任深刻检讨，认真反思，吸取教训；我们应该在嘉鱼簪洲湾与孟溪大垸等地的溃口处建立石碑以示警醒；应该为这次洪灾的死难者建立公墓常常祭奠……不少国家都有“国耻日”、“灾难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可谓多灾多难矣，我们为什么就不

能直面历史直面现实标示此类日子予以纪念反省呢？

我以为这是一个民族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只有不忘耻辱不忘灾难，才能消除耻辱避免灾难，步入灿烂与辉煌之境。

从小江珊身上，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江珊兄妹一共五人，属违反计划生育的严重超生现象。不唯江珊一家，也不仅是嘉鱼一地，这种现象在长江流域随处可见。在'98洪水到来之前，我们的计划生育大堤早就严重溃口了！

乍一看，计划生育与抗洪救灾是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可是我们只要稍稍透过表面，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人口增加，维持生命的田土有限，为了生存，就要拓宽生存空间，砍伐树林开荒造田围湖成垸也就在所难免。人口密度的增加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失衡也就决定了自然对我们的惩罚势不可免，只不过是一个时间迟早的问题罢了。

如今，长江流域养育着严重超载的4亿多人口，平均人口密度约220/平方公里，人均占有耕地不足0.9亩，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三、世界人均水平的五分之一。长江为世界第三大河流，可它的人口比名列第一、第二的亚马孙河、尼罗河的总和还要多得多。这么多的人口，要吃饭要穿衣要生存，怎么办？除了索取一途外别无他策。

我真担心早已疲惫不堪的长江会有一天累得趴在地下长眠不醒。

六

翻开中华抗洪史,追溯其发展源头,我们不难发现,由于黄河、长江流域等河谷地带的自然环境及个体力量的渺小,就决定了先民们不得不相互依存、凝聚在一起,发挥氏族集体的力量,将泛滥的河水一步一步地纳入人类给定的轨道。也正由此而创造了古代的中华文明。假如不想使这种文明归于毁灭,就必须继续维护与农业生产兴废攸关的水利建设。于是,氏族组织的形式也就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巩固。

那千百年来不断加固增高的防汛大堤,便成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符号,它是文明的发展象征,是文化的传承与积淀,还可将其视为一道权力的界碑。洪水再汹涌,也给圈在大堤之中,也就为它划分了势力与活动范围,这是我们人类由对大自然顶礼膜拜而发生疑问产生不恭的转折与开始;于普通百姓而言,大堤是一道长期悬于头顶、悬于心中的警示,一旦洪水肆虐,无数个弱小的个体便汇成另一条新的人类力量的滔天大河,形成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牢牢地束缚、制服堤坝中狂奔乱闯的“野马”。

鲧在对洪水的失控中落得个身首分离,而他的儿子大禹却在治理洪水的成功中获得了尊严、威信、权力等宝贵的东西。据传说,一旦实权在握,他就将舜与他的两个妃子流放于苍梧之野,不仅报了杀父之仇,也使自己的权威得到了更加的巩固,将个人的地位定于一尊,为他的儿子后顺利夺权过渡到奴隶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禹治水之所以成功,就是掌握了自然规律,变单纯的堵截为疏导,扫除水流障碍,将其导引至浩瀚的大海。大禹的成

功,是先民们以自己的聪明智慧利用自然所取得的一个初步胜利,为后人治水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是天人和合、顺应自然的一个伟大范例。

大禹治水成功,不仅留下了许多永久性的纪念建筑古迹,其变堵为疏的治水经验,以及在治水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合法权威与专制集权,更像一条绵绵不绝的坚韧长带,贯穿着几千年中华古国的悠久历史。

据有人统计,在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灾害中,就有 60% 以上来自洪水。洪水,这古老的梦魇一直困扰着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人们虽然直到今天还不能完全将其控制,但在与它的搏斗、抗争中却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早在西汉末年,官居待诏的贾让就向皇帝提出了治理黄河的上、中、下三策。不与水争势,主动为其提供出路为上策;分流减洪,多辟水道,引水灌田,分杀水势,此为中策;筑堤防洪,加高增厚,劳费无已,是最下策。

贾让的“治水三策”至今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对待洪水,我们没有必要与它强拼实力,应顺应水势,疏通江河水道,纳入百川大海;我们应将昔日的“令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变为“与高山相依,为河水让路”。

在'98 抗洪救灾宣传中,一个用得最多的词汇就是“洪魔”。将水视为魔鬼,活脱脱一副剑拔弩张、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架势。我以为大可不必如此。对待水,俯视和对抗的态度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应与其采取平等的、对话的态势。

水,是人的生命之源。没有水,人的生命极限仅为五天;没有水,别说生存,地球上根本就不可能诞生具有高级智慧的人类;而作为人的物质生命之构成,其中 80% 以上就是氢氧化合物——水!

水在地球上的存在已有上亿年的历史,人们常说地球是人类的家园,但相比于水而言,地球才是它的真正家园。依靠了水才出现在地球上的人类,却与水动起了干戈,两相争夺家园。如果水有思想有灵魂,该作何想?它是否后悔为人类提供了生命之源?是否鄙薄人类的忘恩负义?

在水面前,我们人类不仅历史短暂,也显得十分渺小。如若真正与水对抗,我敢断言,失败的肯定是我们人类自身。

水给了我们生命,江河湖泊给了我们灌溉与舟楫之便,我们应该心存敬畏与感激,应该尊重、爱护、善待它们,使那一条条的江河经络畅通,血脉流贯,体魄健美。

洪水为何肆虐?它失去了自己应有的湖泊、堰塘等家园,它被人类弄得污浊不堪,它给我们逼得走投无路,难道发脾气都不应该吗?

我们应该好好地反思自己,以平等、真诚与江河之水进行对话与亲和,而不是剑拔弩张的对峙。只要我们因势利导,为它提供出路,为它解决生路,它必将以相应的行为回报人类,断断不会出现泛滥、溃口、横扫、席卷等狂暴与凶恶之乖张。

贾让之所以将筑堤拦水的行为视为下策,我以为他一是针对当时的大量围垦而言,二指将洪水逼上一条狭窄的河床,一旦不测,溃口改道,即给人类带来突发性的毁灭灾难。

对黄河的治理正是如此。黄河之所以在历史上成为“中国的忧患”,与它的多次改道有关,这改道往往因无法预防而危害更大。

而今,中国的重大水患已由黄河南移长江。近几年,民间流传这么一个笑话,它是根据三十多年前一部国产电影中的一个镜头而来。内容为:“长江,长江!你听到没有?请回答!”“黄河,黄河!我已听到呼叫,但我也将成为黄河!”它所昭示的

正是这一可能出现的危机。

为什么正是这两条哺育了中华文明的“母亲河”恰恰会给我们带来无情的水灾呢？

没有反哺之恩的敬畏，只有无尽的索取、贪婪的掠夺，即使母亲，她也要在这些不孝子孙的屁股上狠狠地抽上两个巴掌呀！可我们却不明其理，不思改悔，不是索取，就是暴殄。于是，母亲黄河在历经了过多的忧患与创伤后无可挽回地衰老了，她的乳房再也挤不出过多的奶水，只能以断流的方式再一次警醒人类。如果我们再不改弦更张，另一条母亲河长江的命运，也许会比黄河更加悲惨！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可以预料的事实。而到了那时，一切弥补可就晚矣。也许，当我们的后代面对枯涸的长江，遥想历史上的'98 抗洪，他们将根本不可理喻，还以为是前人们杜撰了一段有趣的故事，而显示民族的幽默呢。

幽默？不错，一个令人心悸的黑色幽默！

但是，只要我们顿时警醒，一切从头做起，从现在做起，从防洪做起，还来得及。

而科学治水，就是最好的防汛抗洪，也是目前我们与长江对话的最为合理的方式之一。

我们不仅要从前人的治水历史中吸取经验与教训，还可参照国外的防汛抗洪经验为我所用。

巴西是世界上水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全世界 10% 的淡水。巴西境内河流纵横、降雨丰沛，却少有特大洪涝灾害。除了巴西人口密度小外，最重要的还是巴西江河流域的植被没有遭到什么破坏。为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预防性措施予以保护：建立受法律保护的森林公园和生态保留地；专门立法，规定江河上游及主要支流两岸应保留一定宽幅的防护林带；制定

整个流域经济发展战略时,也考虑了保护植被环境、防洪防涝的问题;教育江河流域的民众自觉行动起来保护生态与植被等等。

荷兰全国有四分之一的土地低于海平面以下,而60%的荷兰人正是居住在这些低洼的地区。荷兰西南部又是多条河流的入海处,经常受到水患的威胁与侵袭。过去,荷兰人以为防洪就是抬高堤坝,他们直到二十世纪初还是这么做的,后来才发现堤坝越高,危险越大。如今,荷兰的防洪建设是以疏导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组合。比如,在洼地铺设管道,建设抽水站用以排水;在缺水的地方开挖运河,把水引过去;对需要靠堤坝保护的城市不断加固;深挖河床、拓宽河道……总之,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科学设计。鹿特丹以南的三角洲工程,便是荷兰综合治理的一个典型性系统工程,除了一圈圈的防洪大堤将大片大片的低洼地和城市保护起来外,还有排水管道、抽水站、运河、泄洪区和可开启式的大坝等各种设施。

日本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不仅地震,洪灾也大。对待洪水,日本重视的是水利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建筑,其堤坝防洪标准可治百年、两百年一遇的洪水,现在试验在近城区修建一种新型的宽达几百米的超级大坝。这种大坝不保证洪水绝对不出来,但能保证即使出来也不会毁坏大堤。

美国的密西西比河采用一百五十年至五百年一遇的防洪标准,对保护城市和重要经济区的其他河流堤防采用百年一遇的标准。

与外国横向比较,我国不仅没有巴西的植被保护,没有荷兰较好的综合治理措施,也没有日本、美国可防百年以上洪水标准的水利设施。长江堤坝的防洪标准,还只能控制十至二十年一遇的常发性洪水。

科学知识、专家学者、水利设施等，在防洪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98特大洪水，对我国的综合国力也是一次检验。几十万部队的紧急调用，数百万群众的及时上堤，运输力量的及时到位，通讯网络的密切联系，高新技术的成功运用，葛洲坝、隔河岩等水利枢纽工程的蓄洪错峰……都在这次抗洪救灾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这也是’98水灾虽大，却未动用荆江分洪工程而将损失减少到比1931年、1954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的危害少之又少的原因所在。当然，也不应忽视那激荡回旋在整个中国大地上空的英雄主义豪情所起的巨大作用。

同时，也应该看到其中透露出来的一些重要信息。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严防死守，人在堤在”、“誓与大堤共存亡”等口号自始至终成为’98抗洪的主旋律。血肉之躯构筑堤坝挡水，勇则勇矣，但其机巧、智谋与人类的发展、与科学治水极不协调。发展到后来，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严防死守，人不在堤也要在”的口号。这不禁使我想起了义和团的勇士们光着臂膊、涂着一些古怪的符号冲向八国联军的枪弹与炮火构成的严密火网成批成批倒下的悲壮情景。在枪弹与洪水面前，血肉之躯能抵挡什么？人的价值与尊严何在？人类正跨入二十一世纪航天时代的大门，我们也应该“鸟枪换大炮”，舍弃蒙昧原始的思维、声音与行为，完成历史性的科学转轨才是首要之义。

在抗洪抢险中，也出现了不尊重专家意见、权力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痼疾。九江堵口，就现场的沉船来看，专家说最好的方式是横着沉，而有关领导却命令竖着沉。专家无权，自然是领导说了算，于是，船就竖着沉下去了。结果形成一股巨大的

暗流,给堵口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也延缓了堵口的顺利施行。

’98 抗洪抢险,截止 8 月 24 日,共出动解放军和武警官兵 433.22 万人次,车辆 3.57 万次,飞机和直升机 1 289 架次,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在长江沿线投入的总兵力为 17.8 万人。8 月 16 日傍晚,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打电话给亲临抗洪前线的广州军区司令员陶伯钧上将,转达军委主席江泽民指示,任命他为湖北抗洪部队总指挥,并表示要多少兵就给多少兵,要求确保长江大堤的安全。8 月 25 日,长江抗洪一线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17.8 万官兵遵照江泽民主席的最新指示,于当晚 8 点全部上堤,全力以赴迎战长江第七次洪峰。这些严密得当的组织措施,连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前主席兰普顿先生也认为,即使美国也难以做到。在长江沿线出动如此众多的兵力,渡江战役为第一次,这是第二次;喊出“保卫大武汉”的口号,在历史上也是第二次,第一次是 1938 年的抗日战争的武汉大会战,那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双方投入兵力最多、战争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迫使日本从战略进攻进入战略相持的一个转折点。只有当我们民族的经济、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受到严重威胁,才会出动如此大规模的集团军队。以往,这种威胁主要来自战争,而 1998 年一场洪水,却使我们感受到了这种威胁的严重侵袭。国家的安全不仅来自外部,也可来自内部;不仅来自人类自身,也可来自严重的自然灾害。据此,也使我们以往对国家安全与国防建设的传统观念提升到了一个新的认识高度。

七

人类出现在地球上虽然已有一两百万年的历史,但与古老

的地球、与人类赖以生存的空气、水分相比,是太年轻太幼稚了。人类对地球、对宇宙的认识,也只有在不断的发展与探索中日益全面深刻。

当人类从蒙昧的昨天走到二十世纪末期的今天,对自然界经历了被动的服从到盲目的征服,正在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而欢欣鼓舞时,一系列新的问题与挑战,又严峻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人口激增、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它们之间互相关联、互相作用、互相制约,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生态失衡系统。

在新旧千年相交之际,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发展、进入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临界点:要么继续我行我素,没有节制地滥用,加速人与自然的两极对立,致使自然向无机世界回归,那么,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都将由此走向死寂;要么在深刻反思内省的基础上转变观念,更新行为,不再妄图凌驾于自然之上或超脱于自然之外,而是置于大自然的摇篮之中,将人类视为自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之和谐相处协调发展。

以人类的睿智深邃,并非难以抉择。只要我们保持清醒的认识,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行为,就能从无序到有序、从感性到理性、从直觉到科学、从初始的自在到历史的自为走向未来的自觉之路,逐步迈向人类理想的自由王国。

在'98抗洪救灾中,我们已欣喜地看到,不少行为已经纳入自觉化、规范化的范畴与轨道。

在这次洪灾面前做得最好的,我以为就是卫生防疫。清朝八次大的洪水过后,就发生了八次大的瘟疫。这次,由于有关部门通力合作,打了一场救灾防病的持久战、攻坚战和总体战,从而确保了'98特大洪水过后没有疫病流行。

长江防汛历史表明,水位回落,往往也是溃口之时,“涨水

不溃退水溃”。为此,有关部门一再督促、强调不能麻痹大意,不能功亏一篑。事实证明,长江退水时虽然也有险情发生,但因排查及时到位,没有出现一起溃口事故。

面对接踵而来的第三次强大洪峰,中央有关抗洪部署的决策调整十分及时英明,7月28日凌晨,江泽民号令抗洪前线,提出了三个确保:“确保长江大堤安全,确保武汉等沿江重要城市安全,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确保,有重点,就有放弃,克服了轻重不分、缓急不明、面面俱到的毛病。放弃是为了更好的防守,舍小家是为了更好地保卫大家,舍小局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大局与全局。于是,长江沿岸的一些民垸主动扒口行洪。在黄陂县防汛前线,为了保证京广铁路线的畅通,保住天河国际机场,保住庞大的华中电网,他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忍痛放弃曾长期坚守、付出过心血与代价的堤坝,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抢险抢险再抢险,破堤破堤再破堤”。正因为他们识大体明大局,主动弃守破堤,避免了一次又一次大的灾难,为国家减轻了损失。

’98抗洪救灾,其中不少认识都是在与洪水的搏斗中不断提高不断加深的。一旦有所认识,也就及时地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与行动。

6月6日,江泽民在湖北防汛指挥部的一份紧急报告上批示:“今年大灾以后,建议很好总结一下中国水利建设。”

朱镕基总理更是果断拍板,从1998年开始,加大水利建设投资力度,当年即追加投资254亿,其中长江占91亿。

四川省省长宋宝瑞在1998年8月23日宣布,为保护森林资源改善长江上游生态环境,从9月1日起,四川省阿坝、甘孜、凉山三州,攀枝花、乐山两市和雅安地区,立即无条件地全面停止天然林采伐,关闭木材交易市场,全面启动四川天然林

资源保护工程。

8月29日至9月8日,国务院灾后重建小组分别来到湖北、湖南、江西,带来了国务院领导关于灾后重建的“三十二字方针”：“封山植树,退耕还林;退田还湖,平垸行洪;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道。”

未等洪水退去,一些地方已按“三十二字方针”和生态保护要求开始了防治洪水、重建家园的行动:

在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作出各地按照1954年最高洪水水位两米的标准加固长江干堤;同时,对今年溃口的149处民垸,除保留其中最富经济价值和极少数不太碍洪的大垸外,其余一律作“平垸行洪”处理。

在湖南洞庭,沅澧尾间今年被洪水冲毁的五六十个民垸已作出退田还湖的规划,灾民被安置到新的移民点。

在江西、安徽等地,灾后重建工作也在按照国务院的“三十二字方针”有序地开展进行着……

对长江洪水的治理,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到长江的水质污染、滥垦滥伐、水土流失、生态平衡等严重问题,更应抓住这些现象背后所反映的实质性问题。

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人口激增。超生、多生的现象普遍存在,在'98洪水的救灾物质发放中,仅查出的一直隐瞒没有上报的人口就有成千上万。不论采取何等有力的措施,生活在长江流域的四亿多张嘴巴要吃饭要生存,这是一个怎么也不能否认的事实。封山造林,禁止砍伐,需要木材怎么办?上游的老百姓要烧柴怎么办?退田还湖,平垸行洪,过去生活在民垸里靠开垦出来的田土为生的老百姓的安居生活怎么办?这都是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八十年代初,广东某些丘陵地带生长着茂密的森林,并得到了严格的保护,禁止滥砍滥伐。可是,这里的

侵蚀却越来越剧烈。原因何在？当地老百姓要柴烧，拣走了林中的枯枝落叶。而正是这些残落在地面的枝叶，比林木本身重要得多。涵水的枝叶被刮走，地表裸露，无法留住雨水，侵蚀也就在所难免了。

由此可见，治标得治本，严防死守计划生育的大堤，不让出现任何“险情”至关重要。

我们还应该认识到长江防洪的长期性。谈到长江防洪，不少人往往寄希望于三峡工程。到2009年整个三峡工程竣工后，其防洪库容为222亿立方米，可以有效地拦蓄洪水，防止像1870年长江特大洪水给两湖地区造成的毁灭性灾难。但是，三峡工程的建成，并不等于防洪任务的终结。三峡库容量毕竟有限，若遇1870年那样的特大洪水，还有每秒八万立方米的流量下泻，长江流域仍将处于十分紧张的情势之中。再则，三峡工程建成后，又会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泥沙大量淤积水库，下泄流水中含沙量减少，长江中下游河道必将发生严重冲刷现象，出现新的崩岸险情……

’98洪水的呼啸怒吼已随秋风秋雨的如期而至飘然远去，’98抗洪的“硝烟”也袅袅飘散与高远蔚蓝的天空融为一体；但是，未来的抗洪形势仍然十分沉重十分严峻，不容我们有半点乐观；’98洪水带来的灾难将时时警促我们内省反思，它带来的损失将有一段时间才能弥补，它带来的问题必有艰巨且长期不断的自觉行为才能得以真正解决，它留下的深刻教训正锻造着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走向成熟，走向涅槃。

附录

东方文化大散文原创文库

书名	作者名	作者简介
千年沉重	胡 平	南昌大学当代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曾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奖、《中国作家》杂志报告文学奖；另还有作品获《人民日报》杂文一等奖、台湾《中国时报》报告文学首奖等。近几年的代表作品有《移民美国》、《千年沉重》、《美丽与悲怆》、《苦难的祭坛：1957》等。
千秋家国梦	曾纪鑫	专业作家。多次获国家、省市级奖励，出版个人专著十多部。近几年出版的主要作品有文化大散文《千秋家国梦》、《拨动历史的转盘》，长篇小说《楚庄纪事》、《凶手与警察》及长篇纪实文学《中原较量·郑州“12·9”系列银行抢劫案侦破纪实》等。
大雅村言	李国文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专业作家。1980、1984年，短篇小说《月蚀》、《危楼纪事》分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2年，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1999、2001年，短篇小说《涅槃》与散文集《大雅村言》分获首届与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天地雄心	王开林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在湖南省作家协会工作。迄今已出版《站在山谷与你对话》、《灵魂在远方》、《穿越诗经的画廊》、《火焰与花朵》、《民国女性之生命如歌》等十余部作品。作品入选一百余种文学选本。曾获首届“湖南毛泽东文学奖”、第四届台湾“《中央日报》文学奖”、第四届及第七届“《十月》文学奖”等二十余个文学奖项。

书名	作者名	作者简介
长歌当啸	卞毓方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已出版《雪冠》、《岁月游虹》等多种。作品连续在1998、1999、2000年全国散文榜上位居前列。2002年获得首届冰心散文奖。
古典幽梦	朱以撒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福建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近年来在《散文》、《美文》等刊物发表散文作品五十多万字,连续入选2001、2002年度中国最佳散文,有多篇作品编入《中国散文精选》、《美文十八家》、《散文十家》等。其散文作品专集《古典幽梦》于2002年先后获首届冰心散文奖、福建省第十六届优秀文学作品奖。
叩访感觉	南帆	福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文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曾获全国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奖,福建省文学作品一等奖等。已出版学术专著与论文集有:《理解与感悟》、《理论的紧张》、《自由与享用》、《没有重量的生存》等。
夹缝中的历史	朱鸿	现执教于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已出版散文随笔集十余部,主要作品有《西楼红叶》、《叶叫黄连》、《西部心情》等,其中《西部心情》曾获得首届冰心散文奖,另有多篇文章入选中学语文教科书。

书名	作者名	作者简介
岁月山河	沈 琨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作家协会理事,国家一级作家。山西长治市作家协会主席,市文联副主席暨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现已发表文学作品近三百万字,获多种奖项。其中结集出版的有散文集《太行黄栌红》、《望云间》、《心月照云溪》、《散天花》及长篇纪实文学《太行山的回声》。
怅望千秋	李元洛	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研究员,兼多家大学客座与名誉教授。发表研究著作与散文作品多部,曾多次获奖。《李元洛文学评论选》获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当代文学研究奖”。《诗美学》获湖南省社科系列优秀成果二等奖。《月光奏鸣曲——唐诗之旅》,获“第五届中国广播文艺奖”一等奖。
把栏杆拍遍	梁 衡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曾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作品有科学史章回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新闻三部曲《没有新闻的角落》、《新闻绿叶的脉络》、《新闻原理的思考》;散文集《名山大川》、《人杰鬼雄》、《梁衡散文》。曾获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有散文《把栏杆拍遍》、《晋祠》、《夏感》、《觅渡,觅渡,渡何处》、《跨越百年的美丽》等多篇入选各种学校教材。
旷世风华	夏坚勇	小说家,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过小说、话剧多部,曾获庄重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

书名	作者名	作者简介
沧桑无语	王充闾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作家,兼任辽宁大学、辽宁师范大学、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已出版作品《柳荫絮语》、《人才诗话》、《春宽梦窄》、《何处是归程》等多种。曾获辽宁省散文创作“丰收奖”特等奖、一等奖,“东北文学奖”一等奖及首届鲁迅文学奖。
灵魂之门	汪应果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作家。曾出版学术专著《巴金论》、《科学与缪斯》、《解放区文学史》、《艰巨的啮合》、《无名氏传奇》,并出版长篇小说、散文、戏剧、报告文学及各类学术论文百余万字。
远去的牧歌	赵剑敏	上海大学副教授,中国武则天研究会理事。在京、沪、港、台出版《盛世魂》、《皇冠与凤冠》、《竹林七贤》、《五代史》等多种。曾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上海市教育成果三等奖。
昨天的地平线	郭保林	山东文艺出版社编审,多产作家。已出版过散文集《青春的橄榄树》、《有一抹蓝色属于我》、《绿色的童话》、《一半是蓝,一半是绿》、《阅读大西北》,长篇报告文学《高原雪魂孔繁森》、《塔克拉玛干:红黄黑》等多种。曾获首届冰心散文奖、首届齐鲁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入选作品奖及其他奖项二十多种。散文《我寄情思与明月》被选入高中语文教材。

书名	作者名	作者简介
神圣回忆	蔡翔	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已出版著作主要有:《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回答今天》等十余部。
烟霞边地	汤世杰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诗集、散文集、小说等十余部,主要有:诗集《第一盏绿灯》、长篇小说《情死》、中短篇小说集《独奏之梦》、长篇报告文学《土地诗篇》、长篇散文《古摇篮——从紫溪山到金沙江》等。
堕落时代	费振钟	文学评论家,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副主任。主要著作有:《江南土风与江苏文学》、《悬壶外谈》、《黑白江南》、《在一枝一叶之间》等。
寂寞圣哲	鲍鹏山	现供职于上海电视大学。出版著作数部,在《随笔》、《美文》等杂志发表文章多篇。《永恒的乡愁》、《人在江湖》等文化大散文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编全国高中语文教材。
傲骨禅心	张加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长兴县作家协会主席。从事散文创作多年,出版散文集《忆江南》、《乌镇依旧》、《南浔往事》等多部,并获“鲁迅风”等五个全国性散文奖项。
湮没的辉煌	夏坚勇	小说家,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过小说、话剧多部,曾获庄重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
精神守望	鲁枢元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生态文艺学研究室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创作心理研究》、《隐匿的城堡》、《生态文艺学》、《猥狎言说》等。